

铁托自述

铁 托 自 述

编者：佩·达姆扬诺维奇博士
布·格利戈里耶维奇博士
尼·波波维奇博士
米·韦索维奇博士
译者：达洲 李代军 赵乃斌

新华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86543

986543

译 者 的 话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现代史研究所一九八二年为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诞生九十周年，决定编纂这本《铁托自述》。铁托生前公务缠身，一直无暇顾及写回忆录，但是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途上，他留下了大量史料：报告、文章、谈话、书信。贝尔格莱德现代史研究所维达克·佩里奇等四位历史学家正是根据这些史料，编纂成了这一本铁托自传体式的回忆录。从《铁托自述》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铁托是如何从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和工人成长为著名的革命家的，而且可以了解到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如何历尽艰险发展壮大的，南斯拉夫革命是如何几经挫折最后取得胜利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本书是南斯拉夫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原书分上下两卷，长达八百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了压缩，删节了内容重复、雷同的部分和若干过于琐碎的细节，合并为一册。原书还配有大量图片和文件影印件，中译本只选用了七张。原书的脚注一律照译，但原书有些章节未注明所引材料的出处，

并非漏译。另外，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译者加上了若干脚注，“*”符号为原注标志。

蒙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协助，特请原书编者同志写了介绍，现作为“代序”收录于中译本中。

译者谨识

一九八四年春

代 序

铁托从克罗地亚扎戈尔耶地方的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和五金工人成长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务活动家的生活道路，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崇高事业，数十年来一直是南斯拉夫和世界公众所关心、所研究的课题。

铁托没有来得及写回忆录。早在少年时代，铁托就献身于社会主义，献身于争取使明天的世界变得美好和公正的斗争，他自觉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把革命看成是对旧的不断克服，对美好、人性和自由的不断追求，他找不出时间来悉心写回忆录。在他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在他已经侧身于病榻的时候，他所关心的仍然是国家和当代人类的一些紧迫问题，他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世界上的许多矛盾和复杂问题，如何在和平的条件下扩大人的自由的范围，为人类更为美好的生活创造条件。

然而，铁托在他卓有成效的漫长一生中，在不同的场合，曾回顾过去发生的事件，曾对许多历史事件、对他共事过或在不同场合下会见过的人物谈过自己的印象。铁托曾对某些历史时期和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不仅谈到他所领导的革命，而且谈到

战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当代世界的许多事件。

铁托是一位容易接近的人，他总是鼓励同公众对话。在不同的场合，记者以及其他来访的人通过书面和口头曾向他提出过许多问题，因此留下了一大批铁托向记者发表的谈话和言论。同他谈话的人总是请他谈谈个人对走过的道路的看法或者谈谈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对于大多数这样的问题，铁托只能凭记忆来回答。与他谈过话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铁托的记忆力极强。

铁托的一些回忆录性质、自传性质的文字就是这样写下的，这一本《自述》大多取自这些材料。此外，铁托的一些报告和信件，特别是地下活动时期写下的报告和信件，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根据他的看法和印象写下的，而且是同他的活动直接相关的。这些报告和信件也具有自传的性质，因此也收录在本书中。

本书分两卷。第一卷涉及铁托一九四五年以前的生活和革命活动时期。该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与党在一起，投身于人民》，包含以下内容：铁托就学、学手艺和就业；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羁留俄国；回国和投身于南斯拉夫的革命工人运动。此外还包括铁托对以下事件的回忆：党内的反派别斗争，萨格勒布共产党人第八次地方代表会议（一九二八年），在所谓的炸弹案中受审（一九二八年），服苦役的日子（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出狱，在共产国际工作，进入南共的最高领导班子，走上党的领导岗位（一九三七年），巩固南共，为革命作准备。

第二部分是《在革命的烈火中》。在这一部分中，特别发人兴味的是有关以下事件的记述：乌日策共和国时期（一九四一年），创建人民解放军；几次大战役：奈雷特瓦之战、苏捷斯卡之战和德军空降德尔瓦尔；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以及为使人民解放斗争和新南斯拉夫在国际上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铁托《自述》的第二卷包含铁托有关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战后发展，首先是有关最重要的一些事件和关键性时刻的论述，正是铁托给这些事件打上了个人的烙印。这一卷也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新南斯拉夫时期》，包含铁托自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七九年年末的论述。在这一部分，铁托首先谈到新南斯拉夫的根本特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性质和一党制。专门有一个部分记述了铁托对以下事件的回忆：抵制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霸权主义，同共产党情报局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以及后来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外是有关实行自治、米洛万·吉拉斯事件、奠定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以及关于同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作斗争的论述。

这一卷的第二部分题为《关于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关于战友和同时代人》。这一部分摘录了铁托的一些言论和向记者发表的谈话，格外强调自传的色彩。在这一部分，铁托谈到自己作为一个领导人，谈到自己对若干问题的看法：关于个人的作用，关于最艰难的时刻，关于勇敢精神，关于集体领导。这一部分还收有关于铁托的战友的论述：久罗·贾科维奇、洛拉·里巴尔、莫沙·皮雅杰和爱德华·卡德尔；以及关于同时代人的论述：陶里亚蒂、丘吉尔、斯大林等。

本书是按照别具一格的方式编纂成的：根据所谈的问题，从大量材料中摘编部分材料而成。因此，把涉及同一问题的有联系的材料汇编在一起了，而不论这些材料产生的时间如何。同时，又按照时间先后的原则加以汇编，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我们这么做，是希望保持思想上的连贯性和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使得这本书读起来像是一本铁托的回忆录。当关于一个事件铁托有好几部著作，好几次谈话论及时，我们就取其最详尽、最有内容的部

分。本书就是这样编纂而成的。

编辑部只在必要的地方加注和加以说明。对铁托的原文也作了一些说明，以方括弧〔 〕标出。

通过书末的铁托生活和革命活动大事记，我们想补充某些空缺，纠正若干事实错误。

两卷都配有大量图片和文件影印件。

本书是为纪念铁托诞生九十周年而出版的。我们相信，本书将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和更加直接地了解铁托这个人，了解他的思想和事业。

佩·达姆扬诺维奇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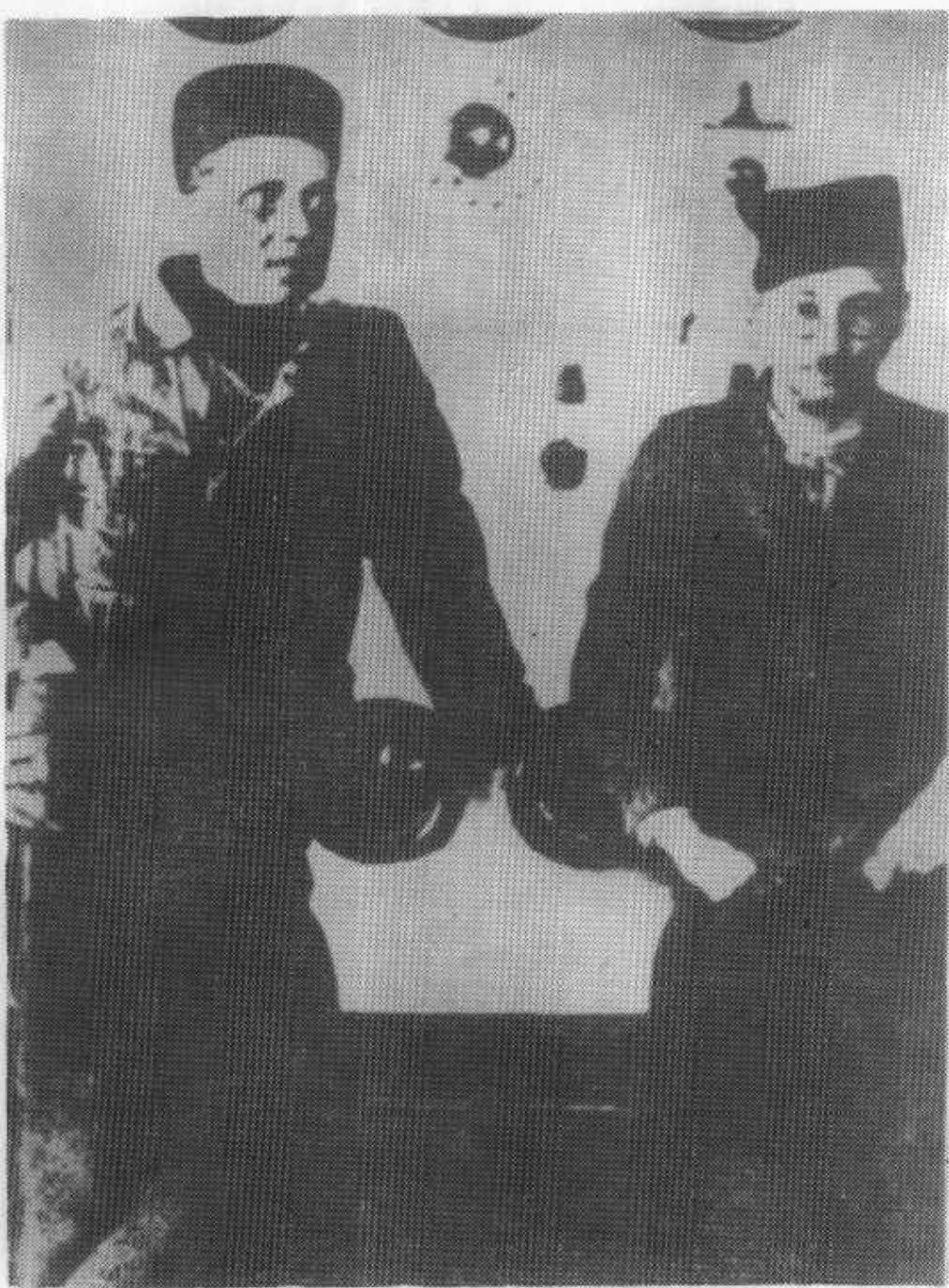
布·格利戈里耶维奇博士

尼·波波维奇博士

米·韦索维奇博士



一九二八年时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约瑟普·布罗兹和莫沙·皮雅杰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间在菜波格拉瓦监狱电厂

МАНДАТ № 135



Тов. Вальтер Фр.
От компартии Югославии

С совещательным голосом

Секретарь ИКИС

МОСКВА. ИЮЛЬ-АВГУСТ 1934 г.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参加共产国际七大时的代表
证，当时用的是假名瓦尔特

目 录

代 序(1)

与党在一起，投身于人民

基本传记资料	(3)
童年、就学、学艺	(8)
碰运气	(15)
服兵役	(18)
十月革命和内战时在俄国	(21)
奔赴战场和当了俄国的俘虏	(25)
在战俘中进行工作并同俄国的革命者接上了头	(31)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赤卫队里和吉尔吉斯人中间	(38)
加入共产党和返回祖国	(47)
在萨格勒布建立反派别核心	(50)
在萨格勒布党组织内	(58)
萨格勒布共产党人第八次地方代表会议	(62)
逮捕和审判(“炸弹案”)	(71)

按照《国家保卫法》受惩办	(80)
对德尼索夫同志的谴责	(84)
在莱波格拉瓦和马里博尔服刑	(86)
博日达尔·阿季亚博士事件	(92)
赫布兰的儿子	(94)
勇敢无畏和坚定不移的榜样	(96)
出狱后恢复党的生活	(103)
文学家之间的争论	(107)
农民问题	(110)
工会的活动	(112)
斯洛文尼亚的代表会议	(115)
进入党的最高领导	(117)
第一次到共产国际	(120)
处于党的领导岗位上	(128)
在巴黎的情况	(133)
改组与巩固党	(136)
在斯洛文尼亚的工作	(139)
青年问题	(144)
萨格勒布党组织的情况	(146)
萨格勒布的文化工作	(149)
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	(153)
解决南共内部的危机以及南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	(158)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162)
政治形势	(173)
共产党	(176)
再谈地下工作	(178)

清洗问题	(182)
再次上路返回祖国	(190)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192)

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斯拉夫被占领	(199)
一九四一年塞尔维亚人民起义	(204)
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谈判	(211)
“乌日策共和国”结束	(217)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夕	(228)
建立无产者第一旅	(232)
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235)
游击队的海军	(237)
“比哈奇共和国”	(239)
奈雷特瓦之战	(241)
苏捷斯卡之战	(247)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251)
敌人空降德尔瓦尔	(254)
与盟国的关系	(259)
南斯拉夫军队的最后几仗	(263)
苏联的援助	(269)
与巴尔干诸邻国的关系	(271)
与保加利亚的关系	(275)
战争的尾声	(278)

新南斯拉夫时期

新南斯拉夫	(283)
资产阶级反对派	(286)
一党制	(289)
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293)
同苏联的关系	(300)
关于我国的真情实况	(312)
实行自治	(334)
自治十周年	(343)
自治的根本问题	(348)
米洛万·吉拉斯事件	(350)
不结盟政策	(364)
反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	(375)
具有人道内容的社会主义	(379)
民族问题的解决	(381)
反对单一民族政府主义	(383)
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	(385)
反对伪自由主义	(407)
停滞和不时出现的危机状态	(422)

关于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关于战友和同时代人

关于个人的作用	(427)
关于“铁托”这个名字	(428)
南斯拉夫人民的特点	(429)

关于宗教	(431)
关于自己，作为一个领导人	(432)
最艰难的时刻	(434)
勇敢	(440)
关于战友与同时代的人	(443)
关于洛拉·里巴尔牺牲的消息	(448)
在莫沙·皮雅杰灵前的讲话	(450)
得悉爱德华·卡德尔去世的消息	(453)
关于历史性人物	(455)
关于陶里亚蒂	(458)
关于共同的工作	(460)
关于自己的著作	(461)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革命活动大事记

与党在一起，投身于人民

基本传记资料

从库姆罗韦茨到西伯利亚

我于一八九三年^①生于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扎戈尔耶。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农，但是一九一三年时由于欠了银行的债而把几乎全部田产都卖了，因此，我的父亲成了雇工。家里除了我，还有兄弟四人，姐妹两人，他们都当上了工人。我上完了小学（五年）和中学（两年）。一九〇七年，我主动到锡萨克市的一家制锁机工场当学徒。我于一九一〇年满师，成了独立的制锁匠和机械工人。我一结束学艺就成了社会党工会的会员。开始时，我在萨格勒布的一家机器厂里做工。后来，我又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的一家机器厂里做工。一九一一年年底，我去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时，我在伊内茨—琴科夫的一家生产金属的工厂里做工，后来又在比尔森的“斯可达”工厂里做工。接着，我又在德国的“本茨”（曼海姆）厂和奥地利的“戴姆勒”厂（汽车厂）里做工。

一九一三年秋天，我应召服役。我在萨格勒布的步兵第二十五团里服役。一九一四年八月初，我开赴塞尔维亚前线，当时我

① 手稿原件中误写为一八九三年，实应为一八九二年。——原注

任排长。在塞尔维亚战场上，我一直呆到奥地利军队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第二次撤退时为止。一九一五年一月初，我被调到波兰的加利西亚，被派往俄国前线。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二日，我成了俄国人的俘虏。我受了伤，又有病，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乌斯宾修道院里躺了十一个月。从斯维亚日斯克，我被调到阿拉季尔斯市，那里集中着准备开赴多布罗加前线的塞尔维亚志愿军。我跟七十名伙伴一起拒绝上前线。我们被带到阿尔达托夫市，分派我们给农民干活。我在卡拉谢耶沃村干活，在一个富农的磨坊里管机器。一九一六年秋天，我和其他战俘又被调到乌拉尔，我被分派在铁路上干活。我在孔古尔市的铁路上干活，充当翻译，曾当过战俘中的负责人。我在那里认识了一批铁路工人。一九一七年夏天，我逃跑了，因为我由于保护战俘的利益而受到严惩。六月份，我逃到列宁格勒，我想在普梯洛夫工厂就业，干我的本行。但是，由于六月份举行了大示威游行，我自己也参加了，我改变了决定，逃到芬兰，打算越境。我在芬兰被捕，于是在列宁格勒蹲了三个礼拜的班房。从列宁格勒，我被押送回孔古尔，在途中我又逃跑了，我前往西伯利亚，绝大部分时间是靠步行。^①

我是在一九一八年^②十一月到达西伯利亚的。当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由于身体不好，也是听了同伴们的忠告，我到草原上去干活。我前往鄂木斯克县鲍戈柳普斯卡区的米哈伊洛夫卡村。在米哈伊洛夫卡村，我给农民管蒸汽脱谷机：我给S.什克

① 在手稿原件上，作者删掉了接着的一段话，这段话说：

“十一月，我来到鄂木斯克，我已经病得很重：吐血，还……伙伴们建议我到一个村庄里去干我的本行，用煮沸的马奶和牛奶来治病。我于是前往鄂木斯克县鲍戈柳普斯卡区的米哈伊洛夫卡村，我在那里管蒸汽脱谷机。一九一八年春天……”——原注

② 手稿原件上误写为一九一八年，应为一九一七年。——原注

利亚罗夫和D·塔巴切克干活，一直干到一九一八年八月。为了免得被捷克斯洛伐克军或者塞尔维亚军动员入伍，我前往吉尔吉斯的一个村庄，在那里，我给吉尔吉斯人伊萨伊·贾克先巴耶夫管磨坊，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九月。

一九一八年春天，我就提出了书面申请，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和入党。在高察克叛乱(捷克斯洛伐克军哗变)期间，我留在草原上，因为通往鄂木斯克的道路全不通行。在高察克政权时期，我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反对白军，因此那里的农民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

一九一八年，我娶女公民P·D·别洛乌索娃为妻，她是米哈伊洛夫卡村一个农民的女儿。我的妻子E·A·尼古拉耶娃^①这时已是联共(布)党员，希洛夫区的指导员。

在征得鄂木斯克的同志们的同意之后，一九二〇年九月，我偕同妻子返回南斯拉夫。

我没有正式成为联共(布)党员，尽管我进行了鼓动宣传，并且同鄂木斯克的一些党员保持联系，例如，同鄂木斯克发电厂的电工塔拉卡诺夫以及火车站的一些工人保持联系。

一九二〇年，我成了南共党员。我到南斯拉夫后，在萨格勒布一家五金业企业里干活。我已是革命工会的会员和地下的共产党的党员。一九二一年，党被查禁，我离开萨格勒布，在别洛瓦尔的一家蒸汽磨坊里当技工。我在那里一直干到一九二五年。

鉴于党已被查禁，我与一些同志组织了别洛瓦尔州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我是州委委员。一九二三年，我由于从事共产主义宣传首次遭宪兵逮捕和毒打。一九二五年，我由于信仰共产主义

① 铁托夫人别洛乌索娃的假名，她当时住在苏联。——原注

而被解雇。此后，我就业于克拉列维察的造船厂。在我去之前，造船厂里既没有工会组织，也没有党组织。我很快就建立起一个有十五名党员的支部，接着又建立起一个有一百五十名会员的工会组织。在这个党支部的帮助下，我们在州内各地，在赫雷林、巴卡尔、苏沙克等地，建立了支部。我们还建立了州委，我是委员。一九二六年秋天，我前往塞尔维亚，就业于斯梅德雷沃帕兰卡的车辆厂。在这里，我也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组织。跟在造船厂时一样，这里的工人也选我当工人总代表。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被逐出工厂，被视为危险的共产党人和鼓动家。我前往萨格勒布，在那里，先在一家工场干活，但是当地的五金工人工会组织选我当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我当选为克罗地亚五金工人工会州委员会书记，在一九二八年被捕之前，我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从一九二七年七月起，我任萨格勒布党的地方委员会书记。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一九二七年秋天，我开始同右的和左的派别作斗争。一九二八年三月，在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会议上，我们的这场斗争取得了好结果。早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前，地方委员会里就发生了分裂。地方委员会有五名委员。结果其中的三人是派别分子，因此我和赫布兰同志向代表会议提出我们的报告，他们三人又提出他们自己的报告。在代表会议上，我得到二十九票，而对手只得到两票。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请共产国际干预，结果是发表了告南共党员《公开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我被捕，遭到毒打，在普里莫尔耶和利卡各地的监狱里关了两个月。一九二七年秋天，由于这次被捕，我被判处关押七个月，但是上级法院到一九二八年才就此案作出裁决。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我又被捕并被判处关押三周。一九二

八年六月，我被捕，但是我逃跑了。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我再一次被捕；我受审长达三个月时间，被判处五年徒刑。我总共服了六年徒刑。最初，我被关在莱波格拉瓦（两年半时间），由于组织绝食，我从那里被调往马里博尔监狱。

一九三四年三月，我刑满获释后，立即开始地下工作，着手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三四年七月，南共中央要我离开国内，并把我遴选进南共中央政治局，而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上，我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

* 《约·布·铁托选集》，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版。

童年、就学、学艺

我决心试试运气

父亲和母亲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去了，有好几天不在家。家里只剩下孩子们。有一天一位远亲来到家里，通常她总是嘲弄母亲，这次就嘲弄起我来了。她问道：

“约扎^①，你给孩子们煮什么午饭吃？”

“煮面汤……”

“汤里放些什么？”

“放点面粉、做面疙瘩……”（我年长些，负责照料弟弟妹妹，由我煮饭。我向母亲学了一点。）

厨房里，在熏肉的地方挂着一只猪头和一点肉。这个远亲指了指猪头和肉说：

“你不会切下猪头的下半部煮煮？这会煮成一锅鲜美的汤……”

“妈妈会生气的……”

“不会的。他们在那里什么都有，又吃又喝，已经三天了，你

① 约扎为约瑟普的昵称。——译者

尽管切好了。”

她把我鼓动起来就走了。

我知道，母亲舍不得吃这个猪头，她打算在家里有什么喜庆的时候才把它拿到桌子上来。我犹豫不决，最后下了决心。切下一块猪头，放进锅里煮，煮了很久。弟妹们肚子饿了，等吃午饭等得不耐烦了。汤做好后，来不及做面疙瘩了。我只放了一点面粉。弟妹们争先恐后地吃起肉，喝起汤来，汤很油……汤面上飘着两三指厚的一层油……

吃过午饭不到一个小时，弟妹们的肚子受不了了，都拉稀了。母亲回家了，带来了满满一篮子好吃的东西，弟妹们中间没有一个跑到她身边去。弟妹们像小鬼似的，脸色苍白，面容枯瘦，汤太油了，使他们受了罪。他们悄没声地走到母亲身旁。

母亲不安地问道：“孩子们，你们怎么啦？”

“约扎，给我们煮了一锅汤……”

“仁慈的上帝，他给你们煮了什么汤？”

“婶子来家里，对约扎说，煮点猪头肉当午饭……”

母亲立即全明白了。母亲尽管很严厉，这一次她却认为没有必要惩罚我。她是一位十分正直和富有自豪感的妇女。她知道，她的孩子们是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生活，因此她谅解、原谅了这样一些小的不听话的举动。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连面包都不够吃。母亲把面包锁起来。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面粉烤的面包，平时只吃玉米面烤的面包。她得把一点点玉米面烤的面包藏起来不让亲生子女看到，这对于她来说，一定是很痛心的事。但是，她只好把面包藏好，仔细地分配，使得人人有份。孩子们学会了利用邻居或亲戚来家里的机会，向母亲要一块面包。他们知道，这位自尊心强的

妇女在客人面前是不会拒绝切下一块面包给他们的……而当客人离开后，他们往往遭到一顿臭骂，甚至为此而受到惩罚。

童年时，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斯洛文尼亚的外祖父那里度过的。上学前，我才回到家里。我的克罗地亚语讲得不太好。这使我在学校里感到为难。我并不总是能够听懂向我提出的问题或者用克罗地亚语回答问题。主要由于这个原因和生病，一年级时我留级了。约莫是在春天，我得了猩红热。

高烧使我变得枯瘦，脸无血色，眼大无神，大部分时间蜷缩着蹲在灶上。有一次，邻村来了个人。那一天正好村里有游行队伍：神甫、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女孩子、妇女……。我缩着身子蹲在灶上，透过玻璃窗望着游行队伍，一边听着母亲和客人谈话。所有的妇女都去参加游行了，母亲没有，她留在我身旁。

客人朝我蹲在那里的灶上望了望，说：“米察，你这个约扎留不住了……”

母亲马上转换话题。只留下我们母子两人时，她紧紧地抱着我。她这样做，好像是想告诉我：“你，我谁都不给。疾病也不能夺走我对你的关心和爱护……”

这样的时刻，我是忘不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从俘虏营里回来，而母亲已经不在人世间，这使我十分伤心……这个看上去粗暴，生活使她变得硬心肠的妇女，懂得显示她的全部母爱，这是我永远忘不掉的。

我小学毕业了。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有一次，教师维姆普舍克和在库姆罗韦茨开了一家杂货铺的商人斯坦契奇问我：

“约扎，你将来想当什么？”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当跑堂伙计”。

教师和商人都感到奇怪：“你干吗恰恰想当跑堂伙计？”

“跑堂伙计穿一身漂亮的黑衣服，我想穿得漂亮。”

这个想法和解释并不使他们高兴，于是开始说服我。最后，我让步了：

“好吧，那就当裁缝……”

“为什么想当裁缝？”

“如果我自己是裁缝，我就可以给自己缝一身漂亮的黑衣服……”

小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我是在一位有钱的舅舅家里度过的。他有很大的庄园，有很多牲口，但是这位舅舅没有雇用仆人。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不少事落到我的头上。正如老百姓所说的，我从早干到晚。我给家里人捎口信说，这样长期下去，我受不了。不过，我在那里还是呆了八个月，后来就回家了。

当时，恰好有一位也姓布罗兹的在司令部工作的军士回库姆罗韦茨探亲。跟他一起回来的有锡萨克的一位旅店老板，这名军士就在锡萨克服役。这位老板需要一名小伙子。家里的人想起我当年曾想当跑堂伙计，而这又是一个就业的机会，于是就同意我去锡萨克的“施特里格尔”旅店干活。

那时，我第一次见到火车。我知道有火车，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想象中的火车是跑得很快的运载工具。但是第一步就使我感到失望。火车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你可以下了火车，跟它并排走，而不用担心它会把你拉下！

施特里格尔旅店，尤其是我所干的活，又使我感到失望。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黑色的服装。给了我一把扫帚，还给了我一条围裙。我什么活都干，就是不跑堂。当然，我感到不满意。我所认识和交往的一些小伙子劝我另找地方学手艺。军官们每天晚上到这家旅店里来消磨时光，打地滚球，在这里是不可能学到什么手艺

的。我下决心碰碰运气，找别的工作。

有一天，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离开了施特里格尔旅店，到锡萨克市中心去找工匠卡拉斯，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在我所找的那家作坊门前，我遇到了一个胖子。我觉得他是作坊主人。

我说：“你好”。

那个人打了招呼，望着我，问我有什么事。

“我是来拜你为师的。”

卡拉斯打断我的话：“‘拜你为师’是怎么回事？你不问问
我是否收你。你什么地方人？”他显然对我的机灵感到意外，不
过，他喜欢这样。

“扎戈尔耶人。”

“噢……好，你现在在哪里干活？”

“在施特里格尔旅店，在……”

“在那家小酒店里？……你在那里干些什么？”

“什么都干：扫地、整理滚木球、给客人递球……什么都干。”

“我明白了，这使你来找我。好吧，你明天来……你父亲还
在吗？”

“还在，我母亲也在，我还有兄弟。”我高兴地、激动地一口
气回答说……

第二天，我去卡拉斯那里之前，先去了一趟商店。我想，我是去学手艺，就得有一条铁匠穿的那种围裙。用我那不多的一点积蓄，我买了一条围裙。我一到卡拉斯那里，就把围裙穿上。卡拉斯看见我这身打扮就笑了起来：

“小伙子，别穿这玩意儿，你又不是当铁匠。”

卡拉斯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我呢，也尽力学好手艺。他到
锡萨克以外的地方干活，也把我带上。这种时候，他就给我钱买

吃的。往往给得比较多，超过了我的需要。我用剩下的钱买书。侦探福尔摩斯的那些冒险经历使我兴奋。正是由于一本关于这位著名侦探的书，我还跟师傅吵了架。

我一边干活，一边给其他的工人念这本书。当时，我的弟弟斯特凡也跟我在一起，卡拉斯已经收他为徒弟。一不小心，我弄断了一个钻头。几乎在同一时候，卡拉斯骂开了娘，并给了我一耳光，因为他正好这时进入工场，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并作出了反应。这记耳光使我觉得受了莫大污辱。再过三个月，我就满师了。但是，我还是走了。

卡拉斯报告了我失踪。警察找到了我，并把我逮捕了。卡拉斯想法让他们立即释放我。过不久，我就满师了。我拿着锁匠徒工的证明，离开了锡萨克，我在这个城市里呆了三年。当学徒的这三年过得不坏。活很忙，这我不在乎。唯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时间从事体育运动。

当时，所谓的古典式摔跤很时髦，我是在马戏团里看到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理发师摔跤，小伙子比我高一个头。摔跤前，我们打了赌。每人往第三个小伙子的帽子里放了一个克朗，谁胜谁得。我把理发师摔倒了。由于获胜，我高兴得忘了那两个克朗。这场摔跤比赛的那位“中立的”裁判连同帽子一起拿走了那两个克朗。

这两个克朗，我倒不怎么在乎。我获得了宝贵的生活锻炼。我有钱。有时，我避开工匠制做一、两把钥匙，或者给人修锁。靠这样挣来的钱，我买了书，或者用来支付其他一些满足自己需要的小笔开支。

离开锡萨克，我到了萨格勒布。我想就雇于某个技师，以便能够学到点东西。我想到克纳乌斯工匠那里碰碰运气，他能修各

种机器，从缝纫机直到自行车，甚至还会修汽车。他收留了我，这使我十分高兴。

克纳乌斯技艺十分高超，从他那里确实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不仅可以学到有关机器的知识，而且也可以学到有关机械学的知识……在他那里，我学会了开旋床。我在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对我后来有很大用处。

碰运气

小伙子，上哪里去？

克纳乌斯是一位出色的工匠，他也是一位大好人。他的专业知识是靠到处干活积累起来的。他有时候向我们这些在他的工场里干活的青年叙述他的这些经历，象父亲那样，而不是象老板那样向我们提出忠告，教我们。在他那里，我迎来了春天和萨格勒布的工人示威。我参加了五金工人的罢工。我担任纠察，提防警察袭击工人。从到萨格勒布的第一天起，我就是工会会员。罢工遭到禁止。

有一天，我对克纳乌斯说：

“师傅，我想到外面去闯闯，见识见识，学点东西……”

“你上哪里呢？”

“上德国或者奥地利……”

“小伙子，你想得对。我当年也远走高飞过，你看，我并没有做错。”克纳乌斯打开了话匣子。他对我款款而谈，并向我提出忠告，我该做什么，在国外，在外国人中间该怎么做。不久，我整理好行装就出发了。

靠着我的积蓄，我前往卢布尔雅那。我在卢布尔雅那市内花

了整整五天时间来寻找工作。由于身边还有点钱，我没有太费心去找。我在一家供过夜的小酒店里过夜。钱越来越少。尽管快用完了，我还是下决心前往的里雅斯特。两只脚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我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到当时亚得里亚海上这个最大的港口。

大海、式样新颖的房子、一座漂亮的大城市、轮船——在我看来，这一切既新鲜又美好。我在市内闲逛，观看着周围的一切，徒劳地寻找着工作。不多的那点钱也用光了。我决心往回走，当然还是步行。的里雅斯特已经远远地留在我的身后，黄昏时光，我听到车轮的辘辘声。一个农民驾着车赶上了我，并问道：

“小伙子，你上哪里？”

“回家。”我简短地回答说。

“你哪里人？家在哪里？”

“我是圣佩塔尔人”。我说了库姆罗韦茨附近苏特拉河岸斯洛文尼亚境内的一个较大的地方。

“那么老远的地方？！”他感到吃惊，并邀我上车。我欣然接受邀请。我躺在干草上，可以说马上就睡着了。这位农民还给我盖了盖……

经过几天步行，从比夫卡，经过茹姆贝卡和布雷日茨，我回到了家里……我突然赶回家时正好是晚上。

怎么回事？从哪里来？家里的人眼睛全盯着我。

“我没有找到工作。我得呆到春天。”

家里嘴多饭少。我跟兄弟商量好，我帮他挣点钱，不给家里拮据的预算增添负担，这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一冬，我都跟兄弟一起干活。他制造水泥构件。到了春天，我居然还有了一点积蓄。靠了这点钱，我又动身去找工作。这一回，

我到了卡姆尼克。我听说，那里的一家工厂，就是今天的“巨人”厂，在招工人。消息是确凿的。我一到那里，就受雇了。厂里大约有二百五十名工人。

卡姆尼克的生活是组织得很好的。那里还有“鹰社”^①。跟其他青年工人一样，我参加了这一体育团体。我们天天锻炼，想在室内运动项目上超过“鹫社”的竞争对手。加入“鹫社”的都是当地有钱人家的子弟，该社受神甫的庇护。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工厂在走下坡路。后来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工厂关门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这时有一位师傅邀集一批工人跟他走。他打听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伊内茨—琴科夫市在招工人。这一批人中也包括我，我们就上路了……

在火车站上，有一大批工人迎接我们。那里在罢工。我们这些来自卡姆尼克的工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原来是要我们充当破坏罢工的角色。然而，我们这批人立即同当地的工人站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继续斗争。工厂主不得不接受工人的条件。给所有的工人增加了工资。甚至给从卡姆尼克来的我们这批人也增加了工资，根据合同，我们这批人的工资本来比厂里原来的工人要高。

我在伊内茨—琴科夫没有呆多久。我转到比尔森，进入了“斯可达”厂，稍后，我又前往德国。最初，我就业于曼海姆的铁锚厂，后来在“本茨”厂工作。在那里，我也没有呆多久。过了一个月，我收拾好行装，前往维也纳。我就业于“格里德尔”厂，但是为时也不长。不久，我转到维也纳诺沃梅斯托，进入了“戴姆勒”汽车厂。

① 为捷克人米罗斯拉夫·蒂尔什于一八六二年所创，本为一体育组织，后传至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均为斯拉夫人所参加，带有民族主义色彩。——译者

服 兵 役

我希望跟同胞在一起

不久，我又上路了，是回家乡。那是在一九一三年秋天。我当时十九岁，我应征服役。我在维也纳穿上了奥匈军队的制服，由于我当过五金工人和技工，被分配在炮兵的技术部门服役。

在那里，我的日子过得不坏，但是，我希望跟同胞在一起。在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中间，我感到孤独。我写了申请报告，要求调到第五十三团。

我被调到驻守萨格勒布的义勇军第二十五团。我在所有的新兵报到两周后，才赶到新部队。他们的头全被剃光，而我还留着发。在维也纳不那么严格，没有把我们剃成光头。班长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操起理发推子在我的头的中央交叉推了两道，然后让军内的理发兵把我的头剃光，这使我感到失望，最初我几乎后悔不该要求调换部队。

我可以说，班长老是盯着我。很可能给他下了这样的命令，因为我已被证明是“社会主义者”。而这是危险的。我的自由思想可能使周围“受到感染”。班长一有机会，就刁难我。对此，我不予理会，但是不久我赢得了几位军官的好感，这主要归功于我当年

在“鹰社”的锻炼，还由于我剑术相当好。

一个叫穆尔科维奇的上尉是一个狂热的击剑爱好者，是全军马刀劈刺的佼佼者，他让我跟一批军人每天接受他训练，后来又让我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全军比赛代表队。部队首长一位上校不满意于这一选择，大概是因为我不是出身于名门，而是一个工人。穆尔科维奇上尉坚持己见。他断言我会从比赛中拿到奖牌回来，这才说服了司令官。

比赛的第一天，我最出色，虽然差一点把我淘汰了。一度，我击中了对方，而裁判没有看见。我提出抗议。军官们跳了起来。一个士兵竟敢提意见？最后总算解决了。第二天，我位居第二。因此，按总分计算，我得到了奖牌。证书和奖牌是由约瑟夫大公授予的。我，一个工人，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儿子，一个唯一的资本是双手和手艺的人，居然接受大公的祝贺。一个普通工人居然同皇族成员握手！

回来时，军官们在兵营门口迎接我。上校派了一名勤务兵来接我。在司令官的办公室里，我感觉到了，他用严厉的口吻，断断续续讲的话里流露出了满意的心情。

“不错呀，小伙子。”但是，即便在这种场合，上校仍然显得对穷人，对不是出身于名门的人不能容忍，对象我这样一个还是社会主义者的人，那就更其如此了。他嘲笑我，说：“我似乎觉得你并不魁伟，还没有发育成人”。

上校这番不怀好意的话，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我用带点傲慢的口气回敬他说：“不可能人人都长得又高又大。的确，我不是什么大力士，但是我的肌肉发达，我又灵活顽强，首先是我有自信心。”

训练结束了。我领受了排长的军衔，被调到正在塞尔维亚前

线作战的一个师里。我是奥皇的士兵，但是我却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的英勇抵抗感到高兴，他们在占优势的敌人面前也丝毫不退让。这是在一九一四年……*

* 《铁托回忆录》，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解放报》。

十月革命和内战时在俄国

我当过工人、无产者，
曾经无家可归

我曾经多次说过，我参加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内战是很不足道的。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我没有长时间参加有组织的赤卫队或红军的国际支队，因此，我的参加不可能有多大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直接经历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宏伟事业，正是这场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这场革命的全体参加者和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我立即就接受了革命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我是社会主义者，我属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当时不存在共产主义运动，只有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人运动叫做社会主义运动，我就属于这一运动。当我置身于俄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之中的时候，我完全被它卷进去，我自己又双手接受改变社会存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思想，就是显而易见的了，特别是，在此之前，我看到了沙皇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专制的压迫制度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思想和行动同苏维埃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尽管我是作为被俘的奥匈

军队的士兵经历这一切的。

此外，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结束后震撼全世界的革命形势的出现，与此相关联的是，欧洲当时各个腐朽的帝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当时，世界经受了前所未闻的苦难、无谓的流血，特别是欧洲各国人民身临其境，在这场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的时候，这种局面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危机和寻求摆脱这种大混乱的出路。

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作为沙皇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在这场不义之战中使他们遭受的苦难的造反行动，作为寻求摆脱这种无谓的相互战争较量的出路的愿望产生的，以使生灵免遭屠戮，多少世纪以来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瑰宝免遭破坏。这场革命正是由于企求创造一个新的、较美好和较公正的世界、仁爱与和平的世界来代替这样一个旧世界，而使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心潮澎湃，立即赢得他们的好感。

一方面，十月革命受到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群众，受到被投入欧洲战壕中的所有被剥夺了权利的劳动人民以及受到占领者铁蹄蹂躏的被压迫民族的赞扬、赞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它却使统治阶级狂怒不已。因为这场革命带来了新的规则。受压迫的、被剥夺了权利的，也就是说，顺从的贱民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举成了左右局势的主宰。十月革命因此而推动和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就这一方面而言，十月革命立即成了我们的事业，成了我们自身的追求和愿望的一部分，向我们所有的人指明了摆脱当时的苦难和困境的出路。

当我们现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①的时候，在我

① 铁托这番回忆写于一九七七年。——原注

看来，当时发生的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却变得意义更为重大。这些事件对我政治和思想上的抉择，总的来说，对我的意识的形成的直接影响，也因此而更大、更为持久。我是在十月革命期间最终地选择了共产主义和革命的。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此以前，我是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无产者，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在欧洲当时的气氛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什么明确的前途，尤其是当战争已经成了严酷的现实的时候，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要直接作出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各国社会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和一些国际会议上，社会党人发出了清醒的呼声，提醒人们要反对甚嚣尘上的战争歇斯底里，社会党人、无产者不应该参加反对其他国家的自己的阶级兄弟的战争，总的来说，工人不应该去为本国的剥削者和统治阶级卖命。但是这些呼声湮没在煽动战争的宣传、民族主义的狂热、所谓祖国和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假爱国主义的呼吁的汪洋大海中，因为这种种都是为有产阶级效劳的，为的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既得特权，或者是用关于爱国主义和祖国的花言巧语来掩饰他们自己对别国人民和别国的征服野心，掩饰他们自己主张重新瓜分世界的图谋。在这些自相矛盾的利益、蓄意的欺骗、背信弃义的勾当的汪洋大海中，总的来说，一个人是很难于适从的，而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工人，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奥匈军队士兵的制服已穿了一年，被禁锢在兵营中。

因此，俄国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活动以及成功地进行的革命把我深深地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之中，自那时起，我一直置身其中。

因此，我在回首往事时将比较详细地回顾战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我整个一生以及对我在那几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二十年代从苏联返回祖国的经历的影响。

奔赴战场和当了俄国的俘虏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
奥匈军队中的第一天

LOVE

我已经说过，战争爆发时，我是奥地利的一名士兵，更确切地说，我是正在驻防萨格勒布的义勇军第二十五团服役的一名年轻士兵。实际上，我是在一九一三年秋天在维也纳参军的，当时在炮兵的技术部门，但是应我自己的要求，我被调到萨格勒布。

我不喜欢在奥匈军队里服役，这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是一支压迫者的军队，它不仅奴役我国人民，而且充当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工具。其次，作为军队，这是一支糟糕的军队。这支军队光讲操练，陈规戒律比比皆是；根本不允许士兵表现出一点主动精神。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奥匈军队中的第一天。我参军时，跟所有年轻人一样，留着头发。我知道士兵必须剃光头，但是把我的头剃光的方式使我深感受了污辱。班长在门口等候我：“噢，社会党人先生，你也在这里！请你过来，我来给你的头发整理整理。”他操起理发推子，在我的头上推了一个十字。

有许多事情使我们感到苦恼。我们必须立即记住哈布斯堡家

族的家谱。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同乡，他后来留在库姆罗韦茨种地。他是一个普通农村青年，无法很快记住大公和王族其他成员的冗长的名字。于是，班长就惩罚他。可怜的小伙子得爬上我们寝室里烧得很热的大取暖炉子上，蹲在上面，不停地用手指敲打脑袋，大声地说：“我是个笨蛋，我是个笨蛋……”

奥匈军队里还用其他的方式来虐待人，在这方面，尤其是班长们很起劲，他们是些名副其实的恶棍。

然而，我既然已经到奥匈军队里来服役了，我就留心很好地学习军事技术。不久，我就有了机会。参军后过了几个月，我被指定去上军士学校，我于一九一三年年底进入该校。在学校里，我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了全团最年轻的中士。我是一个出色的击剑运动员，我还从事其他体育运动，这帮了我很大的忙。作为全团击剑冠军，一九一四年五月，我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奥匈军队击剑锦标赛。在奥匈军队上百名最优秀的击剑运动员中，我当时得了第二名，得了一枚银牌。（这块银牌我一直保留着，跟我度过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我在大特罗伊斯特沃附近的一家磨坊里修马达时丢了。）

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了，我所在的团很快就被派往斯雷姆的塞尔维亚前线，最初是派往贝尔格莱德以北的贝扎尼亚，后来调到鲁马附近。

战争一爆发，一些非常法就立即生效，根据这些法律，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报纸都被查禁，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都遭取缔。社会民主党的绝大部分干部都被应召入伍，被派往前线，但是与在议会里投票反对战争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没有对这些措施表明任何立场，而是保持沉默，听之任之，甚至对战争本身也默认了。另一方面，弗兰

克派^①和天主教僧侣利用宣战来煽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仇恨。作为社会主义者，我是痛恨战争的，我是反对穷兵黩武的。但是，跟大多数南斯拉夫人士兵一样，我同时又把这场战争看成是最终摆脱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桎梏的一个机会。我们的反战情绪也促使我这样看，一进入奥匈军队，在连和团的大多数军官身上，我们就感觉到了他们对塞尔维亚人有一种仇恨情绪，这使我们的反战情绪更为强烈。我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反战信念。

由于我向士兵们谈论反战，有一段时间我被关进了佩特罗瓦拉丁城堡。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第四十二师司令部里值勤。有一天，我这个排长得到司令部的一道命令，让我前往诺维萨德，到几个军官的家里把他们的东西拿来，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在前线呆较长的时间。我执行这项任务，到了诺维萨德附近的马尤尔村，在那里的一家水果蔬菜店里过夜，女主人是塞尔维亚人。那里还有几名第三批应征入伍的后备兵，其中还有一名来自利卡的军士长。那位妇女请我们喝茶，我们就谈论起许多事情来了。那位妇女向我们讲到，在佩特罗瓦拉丁城堡里，在上城，正在折磨塞尔维亚人，有的还被枪毙了。在谈话中，我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谴责对塞尔维亚人的这种迫害，由于我知道我所在的团要调往波兰加利西亚，我说，我将向俄国人投降。

那位老军士长听了我这番话，立即冲着我大声嚷叫，解除了我的武装，捆住我的双手，把我赶进了佩特罗瓦拉丁城堡。

我被关进佩特罗瓦拉丁城堡大门左边的一间囚室。这是名副

① 约西普·弗兰克(一八四四——一九一一)，克罗地亚反动律师、资产阶级政客，反对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友爱团结，鼓吹建立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三元帝国，曾领导克罗地亚纯粹权利党。南史学界称他的追随者为“弗兰克派”。——译者

其实的地下墓穴，没有窗户。

我一进入暗室，就开始触摸四周。

有一个躺在那里的德国佬用德语向我嚷道：“到这里来，到这里来”。

我告诉他，我叫什么名字，我是个工人，他也告诉我，他是工人。他对我说，他已经关了两个礼拜了，没有人来提审他。

看守每天给这个德国人送一点汤和面包来，不给我送任何东西，他同我分享自己的这一份可怜的饭。

当我看到没有人来提审我，就立即开始敲打囚室的门，要求带我去见城堡司令。这件事我到第四天才办到。城堡司令是一个奥地利人，叫容格，领少校军衔。他先审问了告发我的那名老军士长，然后审问我。

“中士，军士长控告你议论反战，号召士兵暴动。”

我当然一概否认，说这个军士长撒谎，他在这里以老大自居。我只是在师里服役的一名军士，我领有任务，让我找到已经上前线的军官们的东西。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过夜的那位女主人的证词对我有利。她认识那位少校，她说，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问了一声能不能过夜。这番话救了我。她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她说，是老军士长捏造了这件事，于是，我就与控告无关。这一控告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十分危险的。

少校最后对我说：“对不起，现在没事了，你可以去取那些东西了。”

那些东西，我一点也没有找到，我回师晚了，我表示歉意，并谈了我的遭遇。（几年以前，我从伏伊伏丁那的同志们那里获悉，马尤尔村的那位妇女叫科比茨尔，她的女儿现在加拿大。）

在塞尔维亚战场上，我一直呆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奥地利军队第二次撤退为止。一九一五年一月初，我所在的部队调往俄国战场，调往喀尔巴阡山的加利西亚。当时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展开了激战。俄国人越过了喀尔巴阡山，挺进到马尔马罗什—锡格特。一九一五年的冬天降临了。我们的团参加了反击，把俄国人一直击退到斯坦尼斯拉沃夫。

喀尔巴阡之战伤亡惨重。战事十分激烈，军队的武器和装备很差。此外，在山区挺进缓慢，双方经常冲锋。严寒夺走的士兵跟子弹夺走的一样多。那时，我十分痛恨这场战争。没有理由自相残杀，再说，在部队中，操练和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事把士兵们搞得很苦。在战争中，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侦察，因为侦察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我指挥一个侦察排，经常去执行某些军事任务。

一九一五年春天，俄国在喀尔巴阡山发起了新的攻势。我们义勇军第二十五团分阶段逐步从加利西亚调往布科维纳。俄国人把许多大炮运到这一战场上。有一天夜里，我领导的排正在行进中，一枚俄国炮弹爆炸了，把我抛上了天，我被严重震伤，接着被送进医院。我在医院里没有呆多久，在奥克诺与霍廷之间的战线上，离奥克诺不远处，我又归队了。

一九一五年四月初，一天早晨，俄国人突然发起攻势。在我的营所在的那一段战线上，俄国人步枪火力所阻，但是在我们的右翼，邻营顶不住了。俄国人在那里突破了防线，他们动用了“野蛮师”的契尔克斯骑兵。契尔克斯人包围了我们营，他们下了马，手持长矛从背后冲向我们的战壕。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契尔克斯人的到来，他们可以说是径直冲进我们的战壕的。一个契尔克斯人手持两米长的长矛，朝我冲来，但是由于我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我又是一名娴熟的击剑运动员，我挡开了这个契尔克

斯人。正当我在抵挡这第一个契尔克斯人的进攻的时候，突然我感到背上受到重重的一击。我转过身去，见到另一个契尔克斯人龇牙咧嘴的脸，鼓得大大的黑眼睛，一脸胡子。

这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就这样，我成了俄国人的俘虏。我躺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小城镇的医院里。

折磨我的不仅仅是伤口，还有别的疾病。我先是得了肺炎，后来又得了斑疹伤寒，当时在战俘中正流行着斑疹伤寒。一度，我在生与死之间命运未卜。

我的病床上挂了一根红布条，这是医院里的标志，表明这个病人没有救了。我常常说梦话，在昏迷中责怪挂在我病床墙上圣像中的圣人偷了我的东西。我脱离病危期以后，别的伤员后来把我同圣人吵架的事告诉了我。多亏我年轻，我康复了。

在战俘中进行工作并同俄国的革命者接上了头

我看到他们戴着五角星

从斯维亚日斯克，我被转到苏密河上的阿拉季尔市（后来的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塞尔维亚的志愿人员都集中在那里。我跟七十名伙伴一起拒绝参加志愿军。当时在志愿军中政治上出现了大动荡。一部分人，其中主要是这个军的领导，他们是按照塞尔维亚政府的指示行事的，把这个军看成是奉行大塞尔维亚政策的工具，而不顾志愿兵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来自当时还在受奥匈帝国统治的地区：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利卡，来自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其他地区以及来自斯洛文尼亚。另一部分人，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委员会^①的个别代表，则认为，这个军应当成为未来的南斯拉夫政治的一个机构。

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既不应去为大塞尔维亚卖命，也不应去

① 南斯拉夫各地的一批资产阶级政治家一九一五年在伦敦建立“南斯拉夫委员会”，谋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统一成一个国家，并向世界公众介绍南部斯拉夫人的联合问题。该委员会主席为安·特鲁姆比奇。——译者

为大克罗地亚、大斯洛文尼亚卖命，而是应为建立一个南斯拉夫各平等民族联合在一起的南斯拉夫而奋斗。在宣誓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我们拒绝向塞尔维亚国王宣誓。此外，在这个军的内部生活中也要求士兵盲目服从，特别是从萨洛尼卡前线来的个别塞尔维亚军官有这样的要求。他们跟奥匈军队一样虐待士兵。为此，我跟七十名同伴一起拒绝在这个军里作战。从那里我们被送往位于西伯利亚省的一个小地方——阿尔达托夫的一座战俘营。

在战俘营里我没有呆多久，因为我报名到卡拉谢耶沃村的一座磨坊里去当技工。事实上，是农民来到战俘营，来找会开动“德维加捷利”（马达）的专家。尽管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还是报了名，因为我对自己的知识是有信心的。一到村里，我一看，原来是一台机器马达。在这个村里干活的还有许多战俘，他们被安排干各种各样的活计。我在卡拉谢耶沃村的这座磨坊里只干了几个月，接着在一九一六年夏末我被调到彼尔姆省叶卡捷琳堡（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孔古尔的一座战俘营。

在这座战俘营里，俘虏们选举我当负责人，关心他们的权利、健康和饮食。我的任务是保管他们的证件，分发工资和经由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这个战俘营里的俘虏跟我一样，都被利用来修建铁路。在这条铁路上干活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波兰老工程师，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我把他的名字忘了，但是历史学家们后来查清楚了，说他就是工程师卡茨。通过工程师卡茨，我同一些工人革命者有了接触，其中有些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这一点我在当时是不知道的。这位波兰工程师是副工段长，在他的家里我出席过这些工人的会议，会上宣读过列宁的一些文章。

我履行战俘营负责人的职责，同孔古尔铁路工段长发生了冲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我断定这位工段长偷窃了国际红十字会寄

给战俘的包裹。战俘当时穿得很单薄，死亡率很高。这是在一九一六年冬天。食品也很少。因此，对于战俘来说，国际红十字会定期寄一点衣服和食品包裹来，帮了大忙。开始时，是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办这件事，后来由瑞典红十字会接办。瑞典红十字会还向孔古尔派来了一位名叫萨尔韦的代表。我发现了这一偷盗事件之后，就报告了瑞典人萨尔韦。这件事使得人们很激动。负责照料战俘的孔古尔红十字会里当时有一位伯爵夫人。我的这一告发使她感到深受侮辱。此后，偷盗事件再也没有发生。

但是，那位俄国工段长没有忘记这件事。他在找机会报复我，不久，他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负责登记战俘出工的情况。有一天早晨，三名罗马尼亚战俘没有出工，因为他们的毡靴穿坏了，留在营房里补鞋。然而，我给他们记了出工。工段长发现了这件事，他闯进营房，开始骂我，说我把这三个人的名字登记上了，好象他们出工了，事实上，他们坐在营房里。我解释说，这三个人得修补他们的毡靴，不然他们在严寒中会冻坏的。解释也无济于事。

尽管我再三解释，工段长还是嚷个不停，过不久，来了三名哥萨克，把我抓进了监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座监狱。我刚跨过监狱的门槛，走进牢房，这三个哥萨克就操起鞭子，抽打我的背。

我被毒打了一顿之后，躺在牢房的地面上，躺在干草上，牢房的门慢慢地打开了，看守进来了，原来是一个穿着俄式衬衫的俄国老头，他对我说：“奥地利人，奥地利人，跟我来！”

他向我解释说，哥萨克已经走了，他把我带到监狱内的他的家里去，他跟三个女儿住在一起。她们歌唱得很好听，三弦琴弹得也很出色。

我在那里稍稍休息了一下，恢复过来了，老人家把我送回牢房，给了我一床毯子，不然在这样的严寒天气下我会冻僵的。

我在这座监狱里呆了好几天。一天晚上，院子里突然传来不平常的吵闹声和叫喊声，使我感到意外。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远处传到我耳边“打倒沙皇”的呼喊声。原来是孔古尔的武装工人一听到沙皇在彼得格勒被推翻的消息后，前来监狱解救关在里面的人。原来是二月革命胜利了。

沙皇制度的垮台并没有使战俘的地位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仍然在孔古尔战俘营里继续干我原来的事。我继续通过卡茨工程师同工人们会晤。列宁的《四月提纲》也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学习了这一文件。

但是，工段长仍然没有忘记我的“罪过”。一九一七年五月，他再次设法使我被捕，指控我同布尔什维克有联系。在监狱里，我关了十四天。多亏卡茨工程师的干预，我才获释。

此后，我调到彼尔姆附近的一个小站耶尔加奇干活。尽管修铁路的活计很重，我继续阅读革命书籍。在休息的时候，我抓紧时间读书，扩大我对俄国工人运动的知识。

我在耶尔加奇铁路上干活期间，仍然同孔古尔的进步工人保持联系。但是，不久我就获悉，一些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在孔古尔被捕了，我也可能被捕。为了躲避再次被捕的危险，我决定逃跑，在这件事情上，卡茨工程师帮了我大忙。他给我买了一身衣服，让我去找他的儿子——也是一位工程师，在彼得格勒工作。他给了我他儿子的地址，我到达后就去找了他儿子。

我乘运粮食的货车走了好几天才从西伯利亚赶到彼得格勒。卡茨的儿子就业于普梯洛夫工厂，我马上就找到了他。我向他转达了他父亲的问候，他把我留在他家里。在他的帮助下，我进入

了普梯洛夫工厂。但是，我只干了几天活，因为发生了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反对临时政府的著名的七月示威。几万工人涌上街头，其中也有我。工人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示威显示的力量和组织性使我兴奋，从示威中我看到了工人阶级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然而，众所周知，反革命动用了武器来对付示威。反动派在二月——三月的革命中失败了，但是没有被消灭，反动派的势力（工业家、大地主、高级僧侣、军官、哥萨克等）很快就清醒过来。在七月示威中，反动派转入反攻。

当机关枪从一个大火车站顶上开火时，我正在这个火车站附近，跟示威工人在一起。一大批工人被打死。接着开始了大规模逮捕。年轻的卡茨工程师也被捕了。我的处境也变得困难。我不敢回卡茨的家里，因为我担心被捕，因此我在涅瓦河的桥下躲藏了好几天，后来我下决心逃回祖国。我说我回家去，回南斯拉夫去搞革命。

我前往芬兰，当我走到芬兰北部乌莱奥博尔（现为奥卢）的时候，我落到警察手中。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不敢说我是奥地利战俘，因为我担心他们会枪毙我。警察把我送回彼得格勒，我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我被关进一间很小的牢房里，四周是石墙，里面有不少老鼠，涅瓦河就在附近流过。

我躺了三个礼拜，才轮到审问我。他们把我带去受审，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发觉，魔鬼要想吵架。我就说，我是奥地利人，是战俘。“笨蛋，你不早说，不然我们早就把你放了。”他们原以为我是某个危险的布尔什维克。

我从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获释后，同其他战俘一起，在哥萨克的武装护送下，又被送往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后来，他们让我

往回走，回到逃离的地方。我答应了，但一路上我在想：我在那里已经尝够看守战俘的哥萨克的苦头了，那里我可不再回去了。我乘坐的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列车，列车很长，开得很慢，我提前一站下了车，又步行了两、三站。然后钻进开往西伯利亚的第二列列车。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时的叶卡捷琳堡，一位看守发现了我。我往车站走，那里往上通车站，往下通城内。我正沿着台阶走着，发现一名我认得的看守正朝我走来，我从他那把胡子认出他来了。他正押送我们的一名曾住院的战俘，因为那里有一座医院。当我走到他身旁时，他嚷道：“约什卡，你好呀，等一等！”他一嚷“等一等”，我就直往下奔，钻进列车。

在叶卡捷琳堡我非法地登上了开往鄂木斯克的另一列列车。那是一九一七年秋天，十一月初。在我第二次前往彼得格勒的途中，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在前往鄂木斯克的路上，在秋明火车站，当臂上带有标记的武装工人走进列车，寻找从彼得格勒逃跑的资产阶级时，我才感到俄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这些武装的工人都是赤卫队员，都带有革命的标记。但是，我还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我抵达了鄂木斯克，从阿塔曼胡托尔车站前往城里。路上有人拦住我。他们有两、三个人。“站住！”我停下了。“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奥地利战俘。“上哪里？”

“进城。”

“不用害怕。去那里吧！”我问，我该往哪里走，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地方去。

“你想往哪里去？”我想去有战俘的地方，有比较多的战俘的地方，去有战俘营的地方。

“现在那里是军营……小伙子们都武装起来了。去那里吧，不用害怕。”^①

我望着他们，发现他们帽子上别着五角星。我无法形容，我当时是多么兴奋……在这里，就这样在路上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前一天，当我们还在秋明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鄂木斯克，而在鄂木斯克，布尔什维克已经几乎夺取了全部政权。这项工作在那里组织得很好。

① 这里的五段对话，原书上都是用的俄文。——译者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 在赤卫队里和吉尔吉斯人中间

我没有掩饰自己的同情

在鄂木斯克，我立即向由战俘组成的赤卫队报到。红军告诉我们，我们不必回战俘营，因为战俘现在已经自由了，可以加入赤卫队。

我加入的那支部队由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南斯拉夫人组成。这是赤卫队的一支国际支队，可能还取了个名字，但是我记不起来了。在鄂木斯克的这支赤卫队中，我呆了几个月，完成了各种革命的军事任务。

在捷克军团暴动之前，我们的部队一直没有派赴前线，而是在鄂木斯克担任警戒任务，并在马尔扬诺夫斯克车站干活。我写了申请书，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都是这么做的。

不久就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和高爾察克匪帮到来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几乎不再有任何条件来正常地吸收入党。

一九一八年春天，当捷克军得到列宁的允准经由远东回国，他们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行军时，西伯利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而，这个捷克军的领导与反革命代表人物密谋，不是带领自己的军队离开俄国，而是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底在整个西伯利亚大铁道沿线举行叛乱。捷克军散布在整个西伯利亚大铁道沿线，这就使它的叛乱变得更为危险，而这场叛乱对于其他反革命也是一个信号。

捷克人的强大兵力还向鄂木斯克进攻，与他们一起的还有由哥萨克首领克拉西利尼科夫指挥的哥萨克。由乌斯宾斯基政委指挥的红军守卫着鄂木斯克市。我认识他，我清楚地记得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什么都听不进去，而对军事几乎又一无所知。

红军抵达后，站在离车站两、三百米的地方，下了列车都排成了纵队，而捷克人则排成散兵线。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乌斯宾斯基接着前往捷克人的司令部——捷克人有整整一个团——要求捷克人放下武器。他说：“列宁签了字，苏维埃命令你们把武器留在这里，不带武器回家。”

这时，哥萨克首领克拉西利尼科夫已从草原赶到。他们留在稍后的地方，这批哥萨克大概有八十到一百人。克拉西利尼科夫一赶到捷克人的司令部，立即抽出手枪把乌斯宾斯基当场打死。

这时，红军战士见白匪打死了政委乌斯宾斯基，没有散开准备战斗，由于混乱而胡乱开枪，因此白匪击溃了这个营，杀害了许多人。随后，白匪派部队打我们。捷克人立即向前挺进，哥萨克跟他们在一起。在翁格尔男爵的庄园——距离鄂木斯克大约二、三十公里——我们较量上了，但是……白匪占压倒优势，他们把我们包围起来，打得我们七零八落……

这一切总共只用了三天时间。我逃往米哈伊洛夫卡村。我前往大草原，到吉尔吉斯人那里去，但是即便在那里我也不得安

宁，白匪在找我。他们到处寻找我们。那里后来也有许多人被害，因为白匪组织了讨伐队。但是，农民喜欢我，保护我。我在那里是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我懂技术，是一个技工。在他们需要修理脱谷机和类似的机器的时候，我帮他们的忙，因此，农民把我藏起来，保护我，给我通风报信。

在距离鄂木斯克七十公里的米哈伊洛夫卡村，我受雇于一名富农，我替 S·什克利亚罗夫管蒸汽脱谷机，后来又给 D·塔巴切克干活。

多亏农民的同情，到处搜寻红军战士的反革命讨伐队没有找到我。我在米哈伊洛夫卡村呆了五、六个月。后来，我在多姆巴伊附近的一个吉尔吉斯村庄替有钱的吉尔吉斯人伊萨伊·贾克先巴耶夫管磨坊。这个村庄是按照哥萨克习俗建起来的，有帐篷，用泥抹房子。磨坊在草原深处，因此我在那里比较安全，可逃避白匪的搜捕。

伊萨伊·贾克先巴耶夫是从亚历山德罗夫卡的德国人手里买下这座磨坊的。那里有许多德国人。在西伯利亚有一个地方叫特鲁别茨科耶。当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把波兰伯爵特鲁别茨科伊发配到那里。德国人在那里有村庄，而且都是些富裕的村庄。是他们把磨坊卖给了贾克先巴耶夫。他在问了我之后才买下这座磨坊。他来到俄国人的村庄米哈伊洛夫卡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到他那里去干活。我说：愿意。因为我到那里，在吉尔吉斯人中间，我会安全些。他说，他想买一座蒸汽磨坊。我表示同意后，他买下了那座磨坊；机器运进了草原。这是磨面粉的蒸汽磨坊。我就到那里去了。

一九一八年的那个冬天，鄂木斯克的铁路工场里发生了闹事。工人不愿修复蒸汽机车。于是哥萨克就来到那里，屠杀工人。他

们把一些工人带到伊尔季什河上，而伊尔季什河已经封冻。要知道，从伊尔季什河上可以过车，冬天可以过雪橇，冰很厚。

布尔什维克来后，由于白匪破坏了桥，他们在河上铺设了铁轨，使列车从冰上通过。

白匪把一批工人带到那里，把他们枪杀了。是在黄昏时光枪杀的。那个夜晚，有几个农民从集市回来经过那里，他们发现那里出事了，听到枪声，过去一看，见有一大批人，就是那批铁路工人，被打死了。他们发现有一个人还在动，就把他挑出来，用自己的皮大衣给他盖上，把他带走了。

由于农民不敢把这个人留在村里，就问我能否收留他。我说，我愿收留。于是，我就把他留下了。他是一名铁路工人，是一个锁匠，一个青年工人，名叫萨沙，只不过我忘了他姓什么。前不久，有同志告诉我，他叫萨沙·西佐年科。他吓呆了，后来也没有完全康复……

在事情稍稍平息以后，我让他到我那里养伤。他跟我一样，喝马奶，在我那里管生火。后来，当讨伐队来时，他也躲到我的磨坊里来。这座磨坊离居民点不远，离那个村庄有两公里远，在一片白桦林中间。这是一座很漂亮、很大的磨坊。我们在白桦林中挖了很深的地洞，我们没有电，只好烧木炭。我们把烟囱装在外面，沿着白桦树，一直伸到树冠，这样烟容易散开。萨沙在那里一直呆到布尔什维克到来……

我在吉尔吉斯人中间逗留期间，学会了不少他们的语言，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习惯。我发现，白匪不断的征用，特别是抢劫把他们弄得很穷，白匪强行征召青年人入伍。

我同吉尔吉斯人关系搞熟后，对他们说，把粮食藏起来，一点也不要给高察克分子，因为那样就等于在帮助反革命。

在吉尔吉斯人中间，就如以前在米哈伊洛夫卡村一样，我并不掩饰自己对布尔什维克的好感，我相信革命必将取得胜利。我也向伊萨伊谈过这一层意思，让他不要向高察克提供粮食，因为布尔什维克会来的。*

着魔了，什么都不相信

我一边当技工，一边同工人保持联系。我需要重油，鄂木斯克火车站的工人私下出售重油。我常常以此为借口进城，在那里会晤铁路工人，因此对局势是了解的。我记得，一九一八年年底鄂木斯克的工人起来造反。这次起义被哥萨克镇压下去了。领导人被枪毙。

我见过外国武装干涉军——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是如何进入鄂木斯克的。当时报纸的纸张很糟糕，是黄色的。这些黄颜色报纸上用大字登着标题，今天是：《欢迎南意大利的子弟！》明天是：《欢迎英勇的法国》，后天又是：《欢迎崇高的阿尔比昂的子弟！》干涉军的军官挥舞着马刀在城里走来走去，把商店里最好的肉都买走了。我们利用这件事散发传单，说居民在挨饿，而外国征服者把城里的东西都吃光了。

革命和内战在人们的生活中和心理上是一件大事。看法在改变，世界观在改变。我还记得很清楚，西伯利亚的农民的情绪是如何变化的。内战开始时，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甚至仇恨布尔什维克。这种情况可用下面这一点来解释：西伯利亚的农民土地

* 摘自回忆录集《十月革命中的南斯拉夫人》，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版。

很多，特别是老住户，甚至达到每人十五公顷，而高尔察克放风说，布尔什维克准备把他们的土地全部没收。因此，大多数农民跟着社会革命党人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许愿说，将给他们以更多的土地。

但是，当高尔察克从农民那里拿走粮食，给他们毫无用处的纸币，后来又宣布动员入伍的时候，农民的情绪开始改变了。给高尔察克造成的损失之大莫过于动员入伍。

没有人愿意打仗。农民逃跑了，藏起来了。甚至我还藏过好几个人。哥萨克赶来，问农民，他的儿子到哪里去了，抢东西……就象切特尼克^①在我们南斯拉夫干的一样。

这惹怒了农民。高尔察克的影响开始缩小。

而在那里躲藏着不少我们这些以前的赤卫队战士，我们说服农民相信，布尔什维克不会没收土地，相反，会给穷人以更多的土地。

我在那里的一名有钱的吉尔吉斯人的磨坊里干活。他叫伊萨伊·贾克先巴耶夫。我对他说：

“伊萨伊，别把粮食给高尔察克。因为反正布尔什维克会来的。”

“约瑟普，他们会来吗？”

“肯定会来。”

布尔什维克后来来了，发现那里对他们很有利。许多农民志愿加入了赤卫队。

① “切特尼克”原为“参加队伍的人”之意，最初出现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系非正规志愿武装人员，为摆脱土耳其奴役而斗争。后为南王室所利用，变成了反动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切特尼克站在德意占领者一边，反对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其首领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译者

我逃到这个村庄时，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是布尔什维克。我只说我是战俘。当时，由于高尔察克的宣传的结果，要是我说是布尔什维克，按照农民的情绪，他们是会立即把我处死的。后来，全都变了。

高尔察克犯下了滔天罪行！骇人听闻！他们在伊尔季什河上枪杀人。当时是冬天，冰冻得厚厚的。我乘坐雪橇，雪很厚，从雪层的下面露出人的脚。整个冬天都是如此，他们甚至都没有收尸。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当时在打谷场上干活，开始出现白匪的讨伐队。我们称它们为贵族讨伐队，因为它们基本上是由地主组成的。它们跟在高尔察克的军队后面，无恶不作。我们明白，讨伐队一到，准是战场有变动，白匪在后撤。过不久，战场果然挪到我们村庄里来了。

白匪逮捕了我：“你们看，这家伙不象农民，很可疑。是技工？那就是工人？就是布尔什维克！”他们逮捕了我，把我关押在充当高尔察克一个师的司令部的一座房子里。在密探局的代理人中间有一个栗色头发的家伙。他是一个地主。他一直装作同前线通电话：

“那就是说，我军在前进？拔掉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好极了！那就是说，明天我们将转入总反攻！”

在整个通话期间，他一直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于是我就坐下，一无表示。对于军事，我当时已略有所知，我知道这全是骗局。现在什么都帮不了高尔察克的忙，外国军队也罢。

前线越来越靠近——这是夜里发生的事——看守我的人逃跑了，而我并不知道。我坐在房间里。突然，进来三个人。

“里面有人吗?”

我回答：“有人。”

“你是干什么的?”

“战俘。”

“点上灯。”

“我没有火柴。”

他们点上了灯。我一看，他们穿着赤卫队的制服。但是，我不吭声，因为我知道，白匪有时候在撤退前夕换上赤卫队的制服，到各家去试探情绪。对于表示高兴的人，他们就统统枪毙。因此，我一声不吭地站着。

“你听着，你害怕什么？我们是红军！”

我回答说：“那好呀！”

“真的，我们是红色的布尔什维克。你没有看见制服？”

“我看到了。”

“请看我们的钱，真正的钱。你不相信？”

“干吗要我相信。”

“着魔了，什么都不相信！”他们气冲冲地走了。

到了天亮，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红军确实进了村。

后来，我就回到鄂木斯克。那里的州委书记是我去年在这里会见过的一位同志，他随同电气工程师代表团来南斯拉夫访问。他叫彼得·伊凡诺维奇·沃耶沃金。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见。

一九五六年我去苏联时，收到一九一六年我在阿尔达托夫县卡拉谢耶沃村干活时交上的一位朋友的信。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名叫加拉伊。他现在是集体农庄主席。我老是没有空给他回信。再去看看所有那些地方，看看他们，那该多有意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不过，就象发生在昨天。

苏维埃国家曾经面临多么大的困难！我还记得我经由彼得格勒回国时，乘了三个星期的火车。在沿路各站，我下车跟农民交谈。当时在闹饥荒，全都破坏了。在西伯利亚有面包，而在这里，在俄罗斯中部却既没有面包，也没有食盐。只有经过战斗考验，经历过一九〇五年的工人，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因为农民往往是动摇的，而俄国的工人阶级同农民相比人数较少，但是工人还是领导农民，成了斗争的领导者。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列宁和他的战友当时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提高了工人阶级对胜利的信念，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加强了工人阶级。

列宁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所有这些困难并懂得该如何着手解决这些困难。列宁一刻也没有动摇，顽强地克服了一切障碍。当时，任何动摇都会是致命的。

布尔什维克给了人民以和平，让士兵回家，给了农民以土地。这样做，布尔什维克把大部分劳动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来。英明的政策！*

* 摘自向苏联《星火》杂志记者发表的谈话（《约·布·铁托言论集》，萨格勒布，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版）。

加入共产党和返回祖国

我的生活中的一段 就这样结束了

我一获悉鄂木斯克为红军所解放——我记得是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就下决心到那里去。

其实，我当时经常去鄂木斯克。当时，我积极参与革命工作。我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组织有接触，俄共(布)州委里有一个部负责该组织。州委设在鄂木斯克当时最大的一幢建筑物里，那就是银行大楼。南斯拉夫同志们吸收我入党，他们的代表当时是迪米特里耶·格奥尔吉耶维奇。他当时是奉俄共(布)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小组支部的命令来到鄂木斯克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南斯拉夫人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在他们中间展开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后来，我在莫斯科见到过格奥尔吉耶维奇，当时我已经是南共总书记，而他刚从西班牙回来，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我们重叙了鄂木斯克的友情。

我在鄂木斯克也没有呆多久。我想尽早返回祖国。当时，我们已经有条件来了解南斯拉夫的局势。那是在一九二〇年春天。从鄂木斯克出版的俄文报纸上，我了解到国内局勢动荡。以前

也有过关于“绿林军”^①的消息，我认为，在“绿林军”中可以感觉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农民也举行了起义。我还了解到一九一八年底和一九一九年初，义勇军的一个团在耶拉契奇广场发动兵变，但是遭到四周屋顶上的机枪的射击。参加兵变的许多士兵直接来自苏维埃俄罗斯。但是，当时没有党把他们组织起来，并把事情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更为重大的事件。这一切都促使我尽早返回祖国。

有一天，战争还在进行，我打开鄂木斯克的报纸，上面有一条标题《克罗地亚农民举行起义》。

我是乘货车返回南斯拉夫的，从鄂木斯克出发，途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从彼得格勒，又经过爱沙尼亚，到达纳尔瓦，在那里，在苏俄和武装干涉者之间的边界上，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里设有所有回国战俘的隔离检疫站。我在纳尔瓦呆了大约三个星期。从那里，我跟其他战俘一起，通过德国公使馆乘“莉莉·福耶曼号”轮船前往什切青港。轮船启程时，我被指定负责运输。到达什切青后，我们又被按照民族，也即按照国籍分队。我跟一批南斯拉夫人一起，经由德国和奥地利回到了祖国。在维也纳，我向南斯拉夫领事馆报到，我们被安排到马里博尔。到了马里博尔后，把我们在检疫站关了几天，在那里又把我列入“可疑人物”名单，因为我来自苏维埃俄罗斯，而资产阶级已经开始防备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担心革命了。

① “绿林军”系指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奥匈帝国军队中的逃兵和武装的农民，他们以森林和山区为基地，经常袭击宪兵，有时也袭击地主庄园，反映了奥匈境内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愿望。——译者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我抵达萨格勒布，十一月三日我向萨格勒布地方指挥部报到，那里又叫我立即向我故乡的区政府报到，而我自己也想尽早赶回故乡，因为对于双亲和其他亲属的情况，我已经六年时间一无所知了。

回到家里，没有见到父母，使我十分失望。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搬家了。后来我在兹德尼奇纳附近的库宾纳茨村找到了他，他在那里当护林员。

这些事我在两、三天内就办完了，十一月五日我就业于萨格勒布佩特里尼亚街三号的一家机械工场。我又继续过我的工人——无产者——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我立即加入了五金工人工会萨格勒布分会，我还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

我生活中的一段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多少变化，多大的变化……

接着是为议会选举(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举行)展开了竞选活动，我加入了自俄国返回者俱乐部，在萨格勒布无产阶级中积极进行工作，讲述伟大十月的国家的情况，与曾为十月的思想、列宁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并在这里继续为同一些思想进行斗争以在我们祖国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许多人相会，总是令我十分亲切愉快。

在萨格勒布建立反派别核心

党丧失党员的信任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政治上逐步趋于成熟的过程中，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其他一些共产党一样，面临领导的团结问题。实际上，在成立之初就进入了一场艰难的斗争，以确立与承袭下来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观点背道而驰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的新观点。在头七年中，领导层不团结。当时，党可以说是听天由命。我指的是全体党员，因为领导层的人热衷于彼此较量。

对于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具体条件，党适应得十分缓慢。早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间，就发生了思想上的最初争论，但是党还是相对轻易地摆脱了工人运动中明显的机会主义流派。南共在《禁党通令》^①和《国家保卫法》实施后遭受沉重打击，此后党

① 《禁党通令》是指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颁布的一条反动法令。该法令规定，禁止进行书面和口头的共产主义宣传，查禁南共的所有报刊，取缔南共的一切组织，不准举行总罢工，禁止一切示威游行，要求申报私藏的武器，从国家机关中开除一切“帮助布尔什维主义”的职员。——译者

的领导层中开始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争论和冲突,《禁党通令》和《国家保卫法》的实施使党不得不转入地下。

在一九二一一一九二四年间,党的领导层中的斗争是围绕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基本问题,围绕革命、无产阶级及其盟友的问题,尤其是围绕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展开的。在就这些原则性问题展开讨论的同时,党内出现了第一批小集团和流派。就思想倾向而言,有一批人主张采取革命的解决办法——他们是左翼。另一方面,右翼又持机会主义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批人变成了两派。

围绕这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围绕在地下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真正革命的党这样一个问题发生冲突是势所难免的。这是造成派别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原因还在于围绕谁来当党的领导、谁当书记或者政治局委员这个问题不断地展开了斗争。

左翼展开了斗争,想排除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遗产,因为它妨碍党比较明确地认清自己的基本任务。左翼看清楚了工人阶级团结的意义以及无产阶级盟友的重要性。左翼主张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党和在企业里建立支部。左翼主张加强独立工会,主张党更加直接地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

实际上,左翼认为基本任务在于把南共建设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党,把独立工会建设成为南共的阶级的战斗组织,在于争取农民和被压迫民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天然盟友以及在于加强党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影响。即便在实施《国家保卫法》的政权下,左翼还是找到了通过自己所建立的地下工人组织接近工人群众的途径。

你们都知道,我们于一九二三年成立了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尽管这个党的范围很小,当局生怕它发展成为群众性组织。因此,

当局于一九二四年就查禁了这个党。但是，尽管存在恐怖统治，独立工人党在一九二五年的议会选举中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例如，在某些州，象克里日夫齐州（我当时在别洛瓦尔工作），党得到的选票甚至比克罗地亚农民党还多。左翼的领袖莫沙·皮雅杰^①、科斯塔·诺瓦科维奇、久罗·茨维伊奇、卡米洛·霍尔瓦廷、拉伊科·约万诺维奇等人，对澄清民族问题以及与党的组织建设有关的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可见，当时，左翼是革命的，我们党员也接受了这种革命性。因此，左翼得到支持，在南共党员中间，首先是在我国各地的产业无产阶级中间有据点。

我说，我也被认为 是左翼分子，而我当时并没有认清这是两派，因为我当时说：我哪一派也不参加。

与左翼对立的是右翼，在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政党问题上，右翼基本上指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右翼轻视农民工作，在民族问题上持资产阶级观点。右翼抵制为把南共变成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把独立工会变成工人阶级的阶级的斗争组织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右翼反对在企业里建立党支部，特别反对党在农民和被压迫民族中开展政治工作。在右翼中，为首的是西马·马尔科维奇博士、拉扎尔·斯特法诺维奇、米利沃耶·卡列维奇、柳巴·拉多瓦诺维奇等人。他们的活动给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后果。他们控制着独立工会的中央领导和行业工会领导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些位置。正是由于持有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右翼一度没有得到广

① 莫沙·皮雅杰（一八九〇——一九五七），南共著名领导人，一九二〇年加入南共，一九二一年任南共执委会委员，后被捕在狱中结识铁托。译过《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经典著作。一九四一年为最高统帅部成员。解放后历任联邦执委会副主席、国民议会主席等职。荣获人民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译者

大党员的支持。我们大家都知道，右翼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了南共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是实施《禁党通令》后在国内举行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拒绝了右翼的机会主义观点，在党的建设和政策问题上采纳了左翼的观点。后来，共产国际对此予以确认，委托左翼领导党。然而，左翼自己后来又陷入同右翼领导人的派别斗争。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无论如何是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要选出一个折衷的领导，也即左翼和右翼都进入领导班子，而派别分子仍留在领导班子里。因此在党的领导层中，派别斗争越来越尖锐。左翼领导人不是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动员群众参加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来证明右翼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是在上层进行较量，自己陷进派别活动。

因此，左翼不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的一翼，为此，左翼相当一部分以前的追随者离开了左翼。左翼瓦解了，只剩下一批纠缠于派别争论的左翼派别分子，这使得他们越来越脱离党的实际工作和党员。南共领导层的团结的危机变得日益深重。党的历次代表会议以及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种种尝试，共产国际也提供了帮助，都不能解决这场危机。后来，在萨格勒布举行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才算出现了解决危机的可能性，我前面已经说过，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萨格勒布产业无产阶级的情绪得到了反映。

一九二四年，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冲突尖锐化了，带到了独立工会和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的领导机构中来了，到那时，党员才开始了解党的上层的争论。那时，在独立工会中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这给工人阶级十分沉重的打击，因为独立工会几乎四分五裂。

我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对于右翼的派别活动才有比较详

细的了解。当时，在一次讨论工人运动当前的问题时，我同工会中央右翼的一名领导人发生了冲突。这一件事，以及右翼了解到我哪一派也不参加，我谴责派别斗争，这些足以使我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期间无法参加任何一个党支部。派别活动猖獗到这样一种地步，致使正直的共产党人都无法进入党的组织，而使领导层中的派别分子得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当然，他们这样做最主要的是出于个人的利益，因为南共领导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不仅是援助，而且每月得到定期的工资。支委会的委员有很高的收入，因此竞相争夺这些位置，双方都玩弄阴谋诡计。这件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很多——促使我投身于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当然也由于其他的认识促使我这样做。

我在大特罗伊斯特沃工作期间——你们都知道，我在那里的一座磨坊当了几乎四年的技工，当时我是别洛瓦尔—克里日夫齐州委委员——以及后来在克拉列维察和斯梅德雷沃帕兰卡工作期间，我看到，这种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使党员不满，妨碍运动的发展。右翼得不到党员的支持，而当时左翼也丧失了这种支持，因为他们也陷入了派别斗争。的确，无产者的同情当年曾经在左翼一边，但是不是把它当作从事派别活动的一翼，而是当作革命的一翼。左翼不再成为革命分子之后，就丧失了党员的信任。

当时，我在斯梅德雷沃帕兰卡工作，我在那里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我从那里被赶走后，听从几位同志的忠告，前往库马诺沃，想在那里找一家磨坊当个技工。但是，在路上我又思量开了，我拿不定主意：干吗到那里去？那里的工资确实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还是自己跟自己斗争开了，我到底怎么办？在列车到达尼什之前的一个站时，我记不确切是哪个站了，我还是下了车，等候开往另一方向，开往萨格勒布的另一列车。我上了车，

于一九二七年三月抵达萨格勒布，在那里，我成了党和工会的负责人。从同年四月起，我成了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成了地方工人工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五金工人工会州理事会的书记。在那里，我有机会了解到党员和工会会员中的反派别斗争的情绪。正是在工会运动问题上，党员能够最清楚地评价右翼的派别活动勾当。这一切使我们心情沉重，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样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人是不团结的。

政治局里的左翼领导人试图利用这种情绪来达到自己的派别目的。在他们的倡议下，召开了地方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会议谴责右翼的行动，但是也指出了党中央左翼分子的无能。会议明确地告诉他们，他们只是在同右翼分子作斗争需要支持时才诉诸党员。

右翼在挑起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分裂之后，又继续采取行动，危害独立工会的团结。他们拼命想保住对工会运动的领导权，试图把克罗地亚各工会对右翼的政策和实践的正当抵制转移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民族问题上，力图使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分裂。他们竭力在工会中挑起冲突，甚至分裂，当然是在反克罗地亚的基础上这么做。

然而，站在反对右翼歪曲南共工会政策的斗争前列的克罗地亚省工会领导，不仅得到克罗地亚工人的援助，而且得到塞尔维亚，特别是贝尔格莱德工会联合会以及贝尔格莱德地方工人工会理事会的支持。此外，右翼试图在克罗地亚的工会中制造分裂，试图让斯拉沃尼亚的工会运动退出克罗地亚的工会，加入塞尔维亚的工会。这就是他们所干的勾当。

右翼的这一分裂活动开始于我一九二七年七月被捕前夕，在我于同年九月初从奥吉林监狱获释返回萨格勒布后仍继续进行。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右翼的这一活动。党的积极分子久罗·贾科维奇、布拉戈耶·帕罗维奇^①、约西普·克拉什^②、伊万·克尔恩德利等人跟我一起研究了党和工会中的状况。我们探究了摆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所处的艰难局面的出路。我们认识到首先需要使党健全起来，争取实现党的团结。这是革命工会团结的条件。反对工会中的右翼偏差是可以通过工会和工会报纸来进行，而反对党内派别活动的斗争，我们无法公开地进行，我们无法公开地说他们是这样一批人。可见，需要在党员中间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防止萨格勒布的组织陷于派别斗争。

当时，除了贝尔格莱德、尼什、奥西耶克、苏博蒂察、诺维萨德等其他几个城市的几个较大的组织外，南共萨格勒布党组织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就组织机构和人数而言，萨格勒布党组织最强大。它团结了一大批产业工人，经受过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独立工会在萨格勒布和克罗地亚的会员最多，比社会民主党人还多。在女工中间的积极工作造就了一批有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萨格勒布的党组织同青年组织，首先是同工业部门的青年工人保

① 布拉戈耶·帕罗维奇—施密特(一九〇四——一九三七年)，南共著名活动家。二十年代初即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加入南共。曾在共产国际工作。一九三四年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与莫洛托夫发生冲突，一九三七年被撤销在南共的领导职务并被派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曾任南共驻西共中央代表和法国比利时旅的政委，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译者

② 约西普·克拉什(一九〇〇——一九四一年)，南共著名活动家。一九二八年加入南共，原系面包工人，由于从事工人运动曾多次被捕。曾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南共中央委员。二次大战爆发后，致力于在克罗地亚西部地区组织游击队，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牺牲。荣获人民英雄称号。——译者

持联系。后来的南斯拉夫共青团书记米约·奥雷什基和约西普·德贝利亚克以及其他积极分子当时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党当时得到左翼知识分子，首先是得到奥古斯特·采萨雷茨^① 和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② 等人的援助。

萨格勒布组织通过一系列活动表明了自己是有力量的。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十分艰巨，而且是要冒风险的。鉴于派别分子在党的上层担任职务，对于派别活动的任何反对都有可能被说成是批评和不赞成党的官方政策，有可能对提批评意见的人采用最严厉的党纪制裁。对左翼或右翼提出批评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视为反党分子。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作充分的准备。我得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十分谨慎，因为我们有可能使党组织投身于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之前就被赶出党。^{*}

① 奥古斯特·采萨雷茨(一八九三——一九四一)，南著名革命诗人、小说家，南共首批党员之一，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一九四一年回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惨遭杀害。曾与克尔莱扎合编文学杂志《火焰》和《文学共和国》。曾翻译介绍高尔基、左拉、雨果等人作品。代表作为：《诗集》、《追求新路》、《逃亡者》、《祖国之子》、《今日俄国》、《西班牙的会晤》、《苏联记游》等。——译者

② 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南当代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曾任南辞书社社长、作家协会主席。一九一四年即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散文、文学评论。曾与人一起编辑和个人创办一系列文学杂志。克尔莱扎被认为开创了南斯拉夫当代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其选集达三十七卷之多。

代表作为：《三部交响乐》、《诗集》、《克罗地亚的战神》、《魔岛》、《俄国记游》、《各各他》、《狼狗》、《血腥的十年》、《画家约西普·拉契奇之死》、《布利特瓦的宴会》等。

曾荣获一系列文学奖和荣誉称号。——译者

* 摘自约·布·铁托：《两次大战之间的南共的斗争和发展》一书。这本书原系南共联盟主席约·布·铁托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向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学员作的报告(以下简称：《约·布·铁托的报告……》)。萨格勒布，一九七七年版。

在萨格勒布党组织内

广阔的工作天地

这里我想回顾一下萨格勒布党组织当时的工作的某些方面。

萨格勒布组织是国内人数最多的一个组织，这里的无产阶级加入独立工会的人也最多。在独立工会一九二八年时的二万七千名会员中，有一万多人在克罗地亚，而其中的大部分又在萨格勒布。当时，我们党的力量很小。今天，当我们谈论这一情况时，我们不应忘记，它的力量还在于独立工会。独立工会的会员是我党的同情者，独立工会是培养我党一切新党员的学校。在举行罢工、使产业工人革命化、组织他们的斗争以及尽量打入农村方面，正是这些独立工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什么恰恰是在萨格勒布这里揭开了反对两个派别的斗争？因为这里的条件最充分。我们得指出，如果我们公开地干，我们就会被赶出党，而来不及使萨格勒布组织投身于反对派别活动的坚决斗争，来不及向共产国际发出信号：我们党需要整顿。我们如果那样干的话，我们这些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就不可能明白表示，我们认为我们党的毛病在哪里，应当做些什么使我们党成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真正强大的先锋队。

我们召开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会议，但是我们没有形成派别和集团，而是在党组织内批评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现象，批评领导不积极，批评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

我想以我自身的例子最能说清楚当时党内的状况。我从克拉列维察来到贝尔格莱德之后，在一家工场干了四周活，我一个党组织也进不了。右翼不想接纳我，不让我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于是我就被拒之于组织之外。而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让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中的内部情况。右翼当时占据领导岗位，他们不让我进入他们的组织。我的遭遇就是这样，有很大一批人有这样的遭遇。当时担任领导的是西马·马尔科维奇、柳巴·拉多瓦诺维奇等人。

我回到了萨格勒布，对于我来说，那里自然有广阔的工作天地。有许多理由使我个人对我所经历的那些事以及对党内的那些现象感到痛心。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的三十一名代表中，有二十八人投票赞成我的报告和我的提纲，会议接受了我的提纲。我不喜欢谈论自己，但是我谈论自己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党员，有责任采取这样一个行动，而不论自己会有什么遭遇。共产国际接受了我们的信，作为复信送来了共产国际的公开信，我们当时如虎添翼，增添了革命之翼，我们满腔热忱地、精力充沛地着手于团结工人工作，罢工变得越来越频繁。萨格勒布的示威变成了筑起街垒战斗。还发生了武装斗争，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在萨格勒布市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存在着多么巨大的革命力量。而这样的斗争激情也席卷了全国：贝尔格莱德以及全国其他城市。在这里，我得赞扬我们的青年，他们跟我们的所有组织一样双手接受共产国际在肯定我们写去的信中提出的要求的同时提出的新路线。这在我们整个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而通过独立工会的工作，首先比较充分地表现在那时开始组织的大规模的罢工上。资产阶级惶恐不安。一月六日专制政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使无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危机。因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乃至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斗争，甚至人们开始谈论肢解南斯拉夫。这是帕希奇^①的路线，后来也是其他一些人的路线。资产阶级想划分掠夺范围，对于我国人民来说，这将是一场最大的悲剧。

在这一场政党危机中，我们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局面的地步。在此之前，我们党在农村的工作特别糟糕。如果我们今天回顾一下，在哪些地方当时有党的组织，在一九二四年^②的选举中在哪些地方我们得到了选票，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党组织和我们得到的选票是很少的，或者几乎没有。唯有在克里日夫齐州和别洛瓦尔州我们得票最多，因为党在这两个州做了一些工作。一般来说，各地的工作都很差。这意味着，对于当时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来说，农民问题具有次要的意义，而让我们的农民、农村贫民，特别是农业工人——当时南斯拉夫已经大约有三十万农业工人——听凭各种政党，首先是拉迪奇的克罗地亚

① 尼古拉·帕希奇(一八四五—一九二六)，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家，系一八八一年建立的人民激进党领袖。早年信仰社会主义。一八九一至九二年任首相。佩塔尔一世国王一九〇四年掌权后，一直在政府里任职，担任外相或首相，直到去世。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建立过程中起了显著作用，但积极镇压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译者

② 这里列举的年份有误。文内所指的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原注

农民党摆布。该党通过自己的蛊惑宣传，使农民越来越愚昧、消极。当时我们的领导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此，他们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 摘自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二十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铁托：《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十一卷)。

萨格勒布共产党人 第八次地方代表会议

并非万事顺遂

萨格勒布共产党人第八次地方代表会议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晚至二十六日凌晨在萨格勒布郊区潘托夫查克秘密地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四十多名代表和来宾，其中包括左翼的头面人物拉伊科·约万诺维奇·“伊利奇”（当时担任南共书记，因为久罗·茨维伊奇·“克雷希奇”到莫斯科去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和西马·斯特法诺维奇·“马尔盖蒂奇”（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常委）以及右派的领袖西马·马尔科维奇·“塞米奇”博士。这些派别分子的出席清楚地表明，他们多么重视这次代表会议、会议的决议以及对出席莫斯科会议的代表的选举。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还有米尔科维奇，他是乌克兰人，是共产国际作为指导员派到南斯拉夫来的。

我们反派别斗争的决定性阶段正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展开的。因此，通常的议程上的各项，甚至会议程序，都成了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立场的借口。在代表资格审查时就发生了冲突，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代表会议接受了我的建议——只承认选出的

代表有表决权，从而打破了左翼想借助于负责人、自己的追随者的票来得到必要的多数的计划。

然而，围绕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展开了决定性的较量。多数派的报告列举了地方组织的弱点，但是没有对党的领导在消除这些弱点方面的工作作出批判性的分析。党组织的成绩归功于左翼领导，而失败则归咎于南共省委书记处。右的危险被置于首位，被认为是危及党的最大和基本的危险，并且要求最坚决地粉碎右的危险。同时，又掩盖这一多数派对于党内的困难状况所应负的部分责任，掩饰他们为恢复自己的派别，把萨格勒布组织拖进派别斗争所作的尝试。

同杜尚·格尔科维奇报告中的这样一些立场相反，我在自己的报告中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问题出发，分析了地方组织中的状况，我谈到地方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在业已提出的任务中哪些没有完成，这给基层组织的实际工作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我特别谈到党必须参与解决能使它成为国内的一个政治因素的那些问题。而要这么做，一个基本前提是消灭派别活动、宗派主义和小集团主义。我强调指出，首先应当通过在产业无产阶级队伍中从事实际工作和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来做到这一点。

对派别活动的批判为其他代表所接受，在长达四小时的讨论中，派别活动遭到更尖锐的谴责。代表们用具体的事例指出地方委员会无所作为，强调指出，由于派别争吵，工人被置于一边，仅仅根据这一派或那一派的需要，充当表决大军而已。

由于在讨论过程中格尔科维奇指责地方委员会中的少数派，也即指责我和赫布兰，说什么我们进行有利于工会官僚和机会主义的派别斗争，而这意味着对右翼有利，我再次要求发言。我谈到地方委员会无所作为和所犯的错误。我强调指出，我之所以提

出专门的报告和工作计划，仅仅是为了使萨格勒布组织摆脱各派的影响。

出席第八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谴责以往的做法和把党员拖进派别斗争的企图，拒绝了地方委员会“左翼”多数派的报告。代表会议几乎一致地通过(二十七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我的报告为代表会议的正式报告，当然是在进行了激烈的和十分艰巨的讨论之后才通过的。

“左”派和右派领袖们的演说才能都未能动摇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通过决议的决心，尽管他们比我们擅长演说。这些决议首先谴责右派和“左”派的有害活动，要求共产国际加以干预，以消灭派别活动和排除从事派别活动的领导。一句话，当时朝着党的团结和健康化迈出了勇敢的头几步。

代表会议选出了新领导，选进新领导的基本上是同生产和工会有直接联系的工人。他们是：德拉古廷·萨伊利、布拉戈耶·帕罗维奇、约西普·克拉什、科莱沙等人。这些活动分子的以往的工作保证了他们将致力于推行党的新方针和为反对派别活动而斗争。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当时当选为地方委员会的政治书记。

除我的报告外，还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早在代表会议之前就作了准备。在莫斯科会议上需要谈谈南斯拉夫党及其健康化，谈谈如何整顿南斯拉夫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非常任务的决议以及我以委员会少数派的名义提出的三个月工作计划。

在通过给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萨格勒布组织的代表的《指示》以及选举代表时，也讨论了派别斗争问题。就其内容而言，这个文件有深远的意义，超越了萨格勒布组织的范围。

《指示》的出发点是，应当让共产国际更加详细地了解党内的

状况，以便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措施来克服我们党所陷入的危机。《指示》叙述了南共党内关系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发展情况，分析了西马·马尔科维奇为首的右派、“左派”以及所谓的中派的立场，并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评价。《指示》指出了右翼的派别活动表现在什么地方，认为他们的错误具有机会主义的性质，右派及其活动是危害党的团结的主要危险。《指示》特别指出，右翼在自己的工作中力图摆脱党的领导，置于党之上，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竭力贬低党、无视党，尽管他们是它的成员。

左翼的缺点和错误也受到尖锐的批评。据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左翼维护了党的正确路线，并在各次中央全会上代表了这条路线，但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错误。尽管自四月全会以来，左翼在政治局中有决定性的影响，却没有什么作为，既没有使政治局的工作，也没有使党的工作活跃起来。我们指出，左翼低估了群众工作，没有能力来领导党。左翼不是到群众中去，到党员中去进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斗争，而是把斗争局限于运动的上层，也即局限于同右翼领袖们进行。

至于说中派(若尔加、萨拉伊等人)，我们指出，他们很不坚定，对于整顿党内关系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精神，而共产国际和我们都认为，他们本来应当在南共中央政治局中在左翼和右翼这两派之间起折衷作用。他们在领导机构中表现得不象共产党人，既不想责怪右翼，也不愿开罪左翼。

《指示》特别指出，把派别斗争从党的上层引到基层所造成的后果，这样做的结果是党员和工会会员士气消沉，忽视地下工作，而在党的活动处于非法条件下的时候，地下工作具有特殊的意義。

为了使共产党能够克服党内的危机，胜任今后的工作，需要

从组织上巩固党并使党积极起来，在工会中培养和动员党的积极分子，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我们强调，应当通过在群众中展开工作、吸收产业工人入党等途径来克服派别活动和宗派主义。鉴于认为，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无法整顿党内的状况，我们要求组成不搞派别活动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萨格勒布第八次代表会议意味着整个党开始进行改组。从当时的斗争条件出发，萨格勒布的共产党员要求南共成为一个干部党，处于高度的秘密状态下，由工人充当领导人并且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我们认为，在对国内的所有民主力量，特别是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加剧的情况下，舍此，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无法保存整个运动，就无法成功地同劳动群众保持联系，完成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这实际上为建立列宁式的党的斗争的开始，这样一个党的任务将产生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和政治形势。

当然，在代表会议开过后，也并非万事顺遂。你们都知道，后来出现了一月六日专制政权，共产党人惨遭杀害，许多人被送去服苦役，等等。尽管派别活动分子在萨格勒布的共产党人中遭到了彻底失败，有些人仍然继续从事破坏活动。

在萨格勒布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我们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要求帮助我们，使我们党摆脱派别活动。会上确定了派遣一个代表团，其成员既有右翼，又有左翼，还有我们这些反对派别的人。这个代表团在边界被逮捕了并被关进了监狱。我曾到马里博尔监狱探视他们。

莫斯科会议于一九二八年上半年举行，我们的代表团未出席。如果代表团携带我们的信抵达了莫斯科，结果或许就会是另一副样子。当时，独立工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

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但是，他们不大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们还是了解不少情况，因此他们能够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很弱，威信不高，影响不大，几乎象是不存在似的。后来，我们寄去的材料送到了。根据我们的材料，共产国际向南共党员发出呼吁书，对所谓健康的核心的工作表示赞同。当时，这是指我们。后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从来就不是什么健康的核心了。于是，我们才能开始工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好景不长。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国际的著名代表赫尔曼·雷梅莱、瓦西尔·科拉罗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博胡米尔·什麦拉尔等人，有农民国际和共青国际的代表，有在莫斯科的南共中央书记和南共积极分子，还有我前面提到的正在莫斯科出席工会国际的独立工会的代表们。对造成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危机的原因进行了五天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代表要求制止派别活动，把派别活动的代表人物排除出领导，把领导的责任委托给真正为党的利益奋斗的那些干部。会上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南斯拉夫共产党员，首先是工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号召他们起来同来自左的和右的派别活动和小集团主义作斗争。共产国际列举了派别活动主要代表人物的错误，指出两派的头面人物负有同样的责任。

得到公开信赞扬的唯一的组织是萨格勒布的党组织。共产国际认为，萨格勒布的党组织表明，南共拥有健康的党员，他们懂得，“用工人的坚强有力的手来整顿党”。公开信说，唯有党认识了派别领导人的方针是错误的，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加以纠正，才能更新党的领导，把那些妨碍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人排除在外。这封信的末尾写上了我们萨格勒布反派别阵线提出的口号：更加

深入地到群众中去，为工人阶级和独立工会的团结，为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联盟而奋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了临时领导机构——南共中央执行局，派别活动的代表人物被排除在外，而执行局中的主要人物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的菲利普·菲利波维奇。中央执行局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公开信和准备党的代表大会。此外，几位在莫斯科受教育的党的积极分子以指导员的身份被派回国内，以帮助贯彻执行公开信，其中有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久罗·贾科维奇。他当时越来越成为党的新领导的中心人物，尽管菲利普·菲利波维奇是政治书记。我认为菲利普·菲利波维奇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共产党员，但是就其天赋而言，不是在当时不正常的情况下领导得了党，能够同派别活动展开斗争的那种人，因此，在他的领导下，领导机构里的派别斗争继续发展。

国内的南共党员，绝大多数(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接受共产国际的公开信，但是贯彻执行这封公开信可不是一场简单的斗争。久罗·贾科维奇还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就指出，且不管公开信如何，党内的危机不会很快结束，我们决不能天真地以为国内的状况不经斗争就会变得正常。贾科维奇说：“不应当忘记，我们南斯拉夫人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所有的决议和建议我们都是一致通过的，但是不付诸实施”。久罗·贾科维奇这番话讲得很好，在会上受到欢迎。

左派和右派的领袖们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只是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对南共内部争论的干涉。由于共产国际对两派同样加以谴责，并把两派的头目排除在领导机构之外，最后，两派都起来反对公开信。

在召开萨格勒布第八次代表会议期间，我们只有一百三十四

名党员(而这个萨格勒布组织却创造了奇迹)和九十名同情者，分布在五个区的二十二个支部和十八个同情者小组里。萨格勒布当时有三万多享受社会福利的工人和私人雇员。最大的企业是铁路企业，它的工场有一千七百多名工人，而机车库约有八百名工人。市内总共有四千名五金工人。我们的地方委员会向支部和党员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经常同工人保持接触，了解他们的日常问题。当时我在地方委员会中说过，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听够了空话，需要同工人建立直接的接触，共产党员必须到有工人的地方去，跟工人一起投入行动并领导他们。

代表会议之后，尽管警方发布禁令并进行刁难，我们还是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规模很大的行动。我们当时在萨格勒布已能发动上万人上街抗议和示威。富有战斗精神的萨格勒布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五月一日走上街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庆祝劳动节。数以千计的工人响应我们地方委员会的号召，走上街头，来到耶拉契奇广场、萨瓦河大街、伊利察、兹林涅瓦茨、大剧院、萨格勒布市议会等地方。这是《禁党通令》颁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在同警察的冲突中，我被捕了，被判处关押两周。

过了不久，六月下半月，萨格勒布又发生了激烈的示威。这件事发生在斯捷潘·拉迪奇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另外几名议员被打死之后。参加这些示威的约有三万名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示威的人要求推翻反动的君主主义政权，建立共和国。我们地方委员会散发了传单，号召萨格勒布劳动人民在这危急的时刻尽可能紧密地组成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以王室集团为首的资本家政府。当时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场斗争使我们自己经受了锻炼：看看我们是否能胜任采取

更大的行动。事实证明，我们是胜任的。有五名工人牺牲了，五十来名工人受伤，一百多人被捕。宪兵和警察全都上了街。无轨电车被推倒。在伊利察，“科尔佐”咖啡馆的座椅全被扔了出来，堵死了街道。还筑起了街垒。我夜间回家时，还不知道筑起了街垒。我在兹维耶兹达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我告诉司机，把我送到维诺格勒大街。当时已是午夜过后两点钟光景。在“科尔佐”咖啡馆附近，我们遇到一批警察，我在想，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认出我来？走运的是，没有人认识我。他们问司机到哪里去，他说：这位先生急着去火车站。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说，因为我告诉过他，把我送到维诺格勒大街。一名警察走过来，望了我一眼，而我的口袋里带着手枪和炸弹。他望了一眼，阴沉着脸，说：走吧！我们就这样通过了。

这些事件表明，党是有纪律的，是团结的。党有能力采取行动，领导罢工。

后来，当局查禁独立工会的时候，萨格勒布无产阶级的回答是举行更为激烈的示威和总罢工。我当时写了一张传单，号召工人起来罢工，指出这是对统治者再次侵犯工人阶级基本权利的回击，无产阶级不容受压迫和奴役。

我记得，当大批警察和军队走上街头镇压示威的时候，我又受到被捕的威胁，自那时以后，我就完全转入地下。警察曾多次来到我们的工会所在地，想逮捕我，但是，我总是设法逃跑。不过，我仍然在五金工人工会里履行自己所担任的书记职责。*

*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逮捕和审判(“炸弹案”)

在狱中受到折磨

我们准备庆祝“五一”节，但是当局不准游行。群众还是聚集起来了，于是我们一起出发，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大会。在那里，我被捕了。拉迪奇[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在议会被打死后，我们也组织了示威，后来变成了武装冲突。夜间，我在米罗戈伊跟同志们开会。会上，地方委员会起草了致工人阶级呼吁书。从政治上来说，这份呼吁书的提法得当，当夜就发出去了。

会议结束后，我就回家。^①我叫了一辆车送我，我告诉司机，送我到维诺格勒大街，但是没有告诉他门牌号码。我们就走了。汽车经过伊利察。

在“科尔佐”咖啡馆附近筑起了街垒。咖啡馆里的桌子椅子都搬出来了，把马路隔开了。然而，街垒中间有一个通道，口子上有特务、暗探和警察。后退已不可能。我自己身带武器。

特务们嚷道：“到哪里去？什么人？”

司机说：“我送这位先生去旧火车站。”

^① 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原注

一名特务走到汽车跟前仔细地瞧了瞧我。我平静地坐在后面。我一身穿得很讲究。

“走吧……”

司机似乎是预感到什么，于是说送我去火车站。他把我送到我说的地方：维诺格勒大街街口，然后，我步行走向我所住的四十六号。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于是我走进院子。这时，有两个人从背后扑上来。他们抓住我的手，搜出了手枪。他们野蛮地把我捆绑起来并把我带走……

在警察局里，他们死死地盯着我，说：

“终于把你抓到了。你躲开我们很久了。你要武器干什么？”

“自卫。”

“防谁？”

“防你们。就差一点儿时间，不然我把你们统统打死。”后来，我一口否认说过这番话。在法庭上我说：“警察撒谎。”

当时，不论谁被捕，都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我不想那样做。我想：为什么要否认这样一种强大的思想呢？为了它，你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却又否认拥护这一思想。我同久罗·贾科维奇商量好，我在法庭上要说，我是共产党人，要让党的活动和我们为之奋斗的思想得到承认。*

……在警察局里我获悉，星期六下午就对我所住的那幢房子进行了搜查，女房东和她的丈夫都被捕了。在这幢房子里，警察搜到了：二十六本《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央委员会公报、九本《列宁主义》、四枚手榴弹、一支手枪和若干军用步枪子弹。为了这一切，他们要追究我的责任。

* 摘自《铁托回忆录》，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解放报》。

在监狱里，他们折磨我，不让我找大夫看病。从星期六(八月四日)起，我就进行绝食，我身体弱多了。

我听说，他们还捕逮了我的妻子。

其他被捕的人也受到虐待。不让外面给任何人送食品来。

他们要我说出，除我之外，党的领导还有谁。

他们搜了我的身，搜出了几页笔记。他们威吓我，说要把我弄死，还说要把我送进贝尔格莱德的“格拉夫尼亚查”监狱。^①

“你抗议……”

“我情愿死去，也不会[在警察面前承认假的控告和出卖自己的同志]……”

不久，我就站不住了，因为我太弱了……*

为了自己的思想 我愿牺牲生命

八月四日晚上，我与一位穿戴漂亮的陌生青年在佩亚切维奇广场或者是约西波瓦茨碰头，我在伊利察四十九号一层的工会所在地见过他，他叫我去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②我要他找一个过夜的地方，他叫我去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由于那里可以过夜，我就去了。时间大约是在半夜十二点。房子在院子里，从东边从后面出入，我来到叫我去的那幢房子跟前，就被警察逮捕了。

^① 旧南斯拉夫时贝尔格莱德政治犯监狱，以对政治犯施酷刑出名，有“贝尔格莱德的巴士第狱”之称，南解放后已拆毁。——译者

* 摘自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写自警察监狱的信(见《选集》第二卷)。

^② 这一小节摘自约瑟普·布罗兹对审讯机构的供词。——原注

那个人约莫二十三、四岁，中等身材，我记不清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他刮过脸，穿一身深色服装。

我被捕时，从我身上搜出了一支自动手枪，上满了子弹，还有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记录上列举的那些笔记和东西。在查封的收据上有我的笔迹。

在五张收据上有布罗兹的签名，我以五金工人工会书记处的名义向玛丽娅·西美昂、乌尔沙·菲利宾、格奥尔吉耶维奇支付了数目标明的救济费，日期也写明了。这几张收据上有我的签名。

还找到了两张用铅笔写的证明，一张上是八十四加十六第纳尔，总共一百第纳尔，由帕尼奇签名。第二张由格奥尔吉耶维奇签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记不得了。我不可能知道帕尼奇和格奥尔吉耶维奇是谁，因为作为书记，来找我的人很多。

我曾欠佩罗·库尔蒂奇钱，我把钱寄还给他了，因此有汇款收据。希蒙·胡贝特的地址：科普里夫尼察，卡尼什街。他是那里的工人代表。

今年八月四日记录中列举的在我身上搜出的笔记本记有各种数字和字母，那是我自己对国内外政治形势所作的笔记。

自动手枪是我必要时作自卫用的，因为我作为工会干部经常出差。我没有持枪证，我申请的话，也不会得到。

我得强调指出，从本月一起我就不当工会书记了，原因是警察在搜捕我。

我的工资是两千第纳尔。

关于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那所房子，我所了解的情况已经说了，我想躲开不去佩塔尔大街的家里，因为我知道警察在找我。

我不清楚在我之前谁去过那所房子，也就是说，我在那里没有住过，我只是想在那里躲一、两晚上。

我不认识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的那所房子的房东，我也不知道，面目可疑的人、共产党人会去那里，会在那里聚集一批活动分子，从事非法印刷活动。我不知道是谁把炸药、炸弹运到那所房子，也不知道那里找到的步枪和手枪的子弹以及手枪的主人是谁，不知道我夜里走进那所房子被捕后，第二天早晨在那里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

约瑟普·布罗兹看明白了起诉书，他说：

尽管我承认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我不认为有罪，因为我认为这个法庭无权审理，只有党的法庭才有权。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承认我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和宣传共产主义，并一再指出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是多么不公正，这一切我都是在各种会议和同人的谈话中这么做的。我说不清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哪里举行的。一九二一年，共产党被解散，从合法变为非法，自那时以来，我就一直这么做。

主审人：你是否知道《国家保卫法》？是否知道《国家保卫法》禁止从事任何共产主义宣传？

约瑟普·布罗兹：我没有看过《国家保卫法》，不过，我知道，我的行为是触犯这一法律的。我认为，自然规律强于一个阶级为了压迫另一阶级而制订的法律。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主审人：关于炸弹和找到的那些书籍，你知道些什么？

* 摘自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对约瑟普·布罗兹第一次审问的记录（《选集》，第二卷）。

约瑟普·布罗兹：我是在十个月以前经库尔蒂奇介绍，认识安德里亚·博日奇科维奇的。我欠库尔蒂奇两千第纳尔，他要我把这笔钱交给博日奇科维奇，由博日奇科维奇把钱寄到达尔马提亚，寄给他[库尔蒂奇]，他被流放到那里。一九二八年六月，我向博日奇科维奇租了一间房间，一半供我自己住，另一半供受警察迫害，来到萨格勒布的我的同志们住。六、七两月，我付给他三百第纳尔。我在这间房间里住过三、四回。我把各种人送到他那里过夜，不过，这些人的名字我不想说。我知道在那里找到的共产主义书籍，我知道是我的同志们带到那里去的，这些同志的名字我不想说，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些书籍正好带到博日奇科维奇家里，我还以为，这些书籍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警察在那里进行了搜查，发现了这些书籍，我才知道，这些书籍带到了博日奇科维奇家里。我不相信在同一间房间里还发现了炸弹，我没有带去过炸弹，我不知道，这些炸弹或许是故意放进去的。我和我的同志们在博日奇科维奇家里没有干过什么事，博日奇科维奇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在被捕前几天，我让弗拉尼娅·诺沃塞利奇去博日奇科维奇那里，这是真的。我是偶然遇到诺沃塞利奇的，他告诉我，他从德国回来了，我就让他去博日奇科维奇那里。我承认，我的同志们通过可靠的途径、可靠的人送去了共产主义书籍，而由我负责转送这批材料。

主审人：你的笔记本上的一些记录是什么意思，例如 RI.25 B?

约瑟普·布罗兹：这是运送共产主义书籍的代号。我承认，发现的书籍只是我和我的同志们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散发的书籍中的一部分，这些书籍的包装同警察发现的那些书籍的包装是一样的。

公诉人：26L，80L是什么意思？

约瑟普·布罗兹：这是《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代号。这本书送往各地，但是是从哪里送来的，我不清楚。

公诉人：RI、RII、B是什么意思？

约瑟普·布罗兹：我不能说。

公诉人：关于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执行局决议，你了解什么情况吗？

约瑟普·布罗兹：关于南斯拉夫共青团，我一无所知，尽管南斯拉夫共青团是同党有联系的。我知道，南斯拉夫共青团也得到南共中央的《公报》。

公诉人：从你身上搜到的收据是些什么收据？

约瑟普·布罗兹：我当过五金工人工会的书记，从我身上搜到的收据跟工会有关，要么是我收会费的收据，要么是工会给被关进监狱的人的妻室的救济金收据。

主审人：你是如何被抓到的？

约瑟普·布罗兹：我被捕的那个夜晚，有一个人告诉我，让我去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我现在认为他是警察的密探。我去了那里，就被捕了。说警察在我身上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这是假的，是警察强加于我的。

公诉人：你的笔记中写有“党的领导对事件和SDU的政治态度的立场”、“改组支部和区”等字样，这是什么意思？

约瑟普·布罗兹：这是关于我要在南共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的笔记。

主审人：你上过什么学校？

约瑟普·布罗兹：我上过四年小学和两年平民中学，后来我去学手艺。学完手艺，我就去国外，后来参加了战争，被俄国俘获，成了俘虏。我于一九一九年回国，在别洛瓦尔当了四年机械

工人，后来到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到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干活，但是由于参加工人运动，总是被解雇。我是共产党人，因此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宣传：如果资产阶级继续掠夺人民，那就要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只有用武力来粉碎武力。我认为，炸弹是警察故意放的。

主审人：南共同莫斯科是否有书信联系？

约瑟普·布罗兹：有。我们同莫斯科有书信联系，因为我们是他们的组织。

主审人：你是否了解今年六月二十日以后散发的传单？这些传单号召人民举行暴动。

约瑟普·布罗兹：我知道这些传单，但是是谁起草了这些传单，我不想说。我没有起草这些传单。

公诉人：你曾遭到殴打吗？

约瑟普·布罗兹：我已经对预审法官说过，暗探安祖洛维奇把我捆得很紧，我的双手都发紫了。

公诉人：你为什么带着手枪？

约瑟普·布罗兹：我带着上了子弹的手枪是为了自卫，我没有持枪证。在警察局里，里马伊用拳头打我的头，又用椅子打我胸部，把我打伤了，我要求医生来看病，他们不同意。

主审人：你是否对博日奇科维奇说过，你将自首？

约瑟普·布罗兹：是的。

辩护人：警察是否也追捕拥护资产阶级政党的那些工会会员？

约瑟普·布罗兹：是的，警察也追捕他们。

辩护人：警察是否也追捕仅有共产主义嫌疑的工人？

约瑟普·布罗兹：是的。

辩护人：你是否也让受警察追捕而又不是共产党人的工人去

博日奇科维奇的住所?

约瑟普·布罗兹：是的。

辩护人：博日奇科维奇那里是否有胶版印刷机和打字机？

约瑟普·布罗兹：没有。

辩护人：对你的搜查是如何进行的？

约瑟普·布罗兹：是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没有提醒我，我可以反对搜查。

主审人：博日奇科维奇和埃娃·科普里夫尼雅克是否知道搜出来的材料？

约瑟普·布罗兹：他们不知道。

主审人决定当着警察和预审法官的面宣读约瑟普·布罗兹的口供。*

* 摘自法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对约瑟普·布罗兹及其同志们的主审会的记录(《选集》，第二卷)。

按照《国家保卫法》受惩办

这个社会对我是不公正的

我放弃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提出的关于判决无效的申诉，只要求撤销原判决，我仍坚持同一天提出的，现在仍坚持的上诉。鉴于这一上诉是针对已经作出的判刑，我谨宣布，我仍开始服刑。

刑法第六十一条具体地规定了减刑和减到最低限度。这一条并没有象克罗地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要求的那样对特殊减刑情节作这样的减刑规定条件，而只是说“找到可从轻发落的情节”。可见，这样的情节的多少与量刑是不相干的，特别是没有必要使从轻发落的情节压倒从严处置的情节。

作出判决的法庭没有尊重这两个法律之间的这一区别，因为如果尊重这一区别的话，就会从轻量刑，就会判处两年，而不致于象现在这样，判处五年徒刑。法庭只尊重一个从轻发落的情节，那就是部分承认。然而，我是全部承认的，对于象我这样一个真诚地、公开地出庭的人，是没有理由再指责他只承认一部分，又隐瞒一部分的。我绝对地全部都承认了。此外，法庭还忘记了尊重另一个从轻发落的情节，即无前科。诚然，我曾被奥古林法庭

判处，但是在作出现在的判决时，奥吉林的判决尚未生效，因此我没有犯前科。我是在十二月份，在奥吉林法庭的判决暂停生效，也即在现在的判决之后才获悉王室高级法院七人合议庭基本上批准奥吉林的判决，从七个月减为五个月的。因此，在宣布现在的判决时，我没有犯前科。

我认为，我给法庭的印象是，我不是堕落胡闹之辈，至少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我是那样一种人(对立的政治和 社会信念并不使人堕落胡闹)。根据第五十九条第四款，这也是从轻发落的情节，法庭未予尊重。

具体来说，本案涉及反国家、反社会罪。我认为，这个社会对我和工人阶级是不公正的。我所作的案是由于我有强烈的人性感，由于我对这个社会的侮辱和行动感到愤慨，我认为，这个社会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的。这是第五十九条第五款规定的应予从轻考虑的情节，作出判决的法庭又未予考虑。

如果象法庭证明的那样，维诺格勒大街的那间房间长期来一直受警察监视，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房间内的共产主义书籍未予使用，也就是说，我没有用来进行我本来可以进行的宣传，那么根据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五和第六款，这又是从轻发落的情节。如果法庭认为有证据证明是我放了炸弹，而我又未能使用这些炸弹，那么，又出现上述从轻发落的情节，法庭从未予以考虑。

所有这些从轻发落的情节使法庭能够比实际已经做的更加充分地使用刑法第六十一条的权利。

我是按照《公共安全和国家秩序保卫法》受惩处的。众所周知，这是一项特殊法律，并正是作为这样一项法律才得到承认的：它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的，众所周知的公开意图是只在一个短时期内有效。所以才能为法律规定的一些徒刑特别严厉这一点辩护。

但是，这项法律已经实行第八个年头了（前不久才予废除，并代之以新的《公共安全和国家秩序保卫法》），可见，它既不是特定的，也不是短时间的。因此，这就产生了这项法律如此严厉以及在实践中严格实施是否有理的问题。如果没有这项法律，我的案子根本不可能受惩处。仅仅是根据这样一种特定的法律，我的案子才获得了可予惩处的性质。根据这样的法律判我五年徒刑是过严了，因此也是不公正的。世界上和我国的情况有可能变化，以至于不再需要这样的特殊法律。也就是说，在三、四年内这项特殊法律很可能在我国不再生效。而我届时还在监狱里，根据就是届时可能已被废除，被公认为多余和不合现代精神的这样一项法律，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呢？因此，即使根据惩处的预防性目的，象现在这样惩处我也是不合适的。

我谨请崇高的王国巴昂^①高级法庭考虑以下这一点：我有十分充分的理由提出关于判决无效的申诉。我放弃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从宣布判决到送达判决我就等了两个半月，如果我再等这样长或更长的时间来等待七人合议庭作出裁决和进行新的讨论，我就得在预审监狱里白白浪费那么多时间。我既然已经在监狱里，我希望把我在押时间算作徒刑。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没有提出原来说过要提出的关于判决无效的申诉，如果我坚持申诉的话，我想，我是会成功的。理由是：诉讼和判决的根据是在维诺格勒大街的房间里发现了宣传共产主义的文章和武器。只有在这个事实得到证明，只有在那时，加上其他的条件，我们才能被判处。而这一事实未得到证实。法庭把警察的搜查作为证据，但是，警察

① 旧南斯拉夫一九二九——一九四一年时的地方行政单位为“巴昂辖区”，相当于省，其长官称为“巴昂”，相当于省长或总督。——译者

的搜查是在没有证人或者说没有男性证人的情况下进行的(判决书本身承认，搜查时在场的有两名妇女，其中一名是农村来的十五岁的女佣人)，可见，是完全违法的和违反当时的维多夫节宪法的。*未履行这样一些手续的搜查不仅不能有效，而且不应该有效。正因为如此，法律才规定了这些手续，作为对警察这样一个非司法机构的防范措施(法律甚至对于法院的调查也规定这样的防范措施!)。因此，似乎并没有或者说就是没有进行过搜查，没有证据可证明上述基本事实。既然法庭根据这样的搜查认为上述事实是有证据的，这就成了诉讼无效的重要依据。还有一个重要依据：我是因为炸弹和武器而被判处的。**犯罪事实**。根据法律准则，必须在最后审判时向犯人出示每一个**犯罪事实**。但是，在最后审判时却没有拿出炸弹(空炸弹!)，也没有拿出武器。判决书本身也承认这一点，或者说没有提出相反的说法。没有任何人，根本就没有人见到过我为之被判刑的那些炸弹和武器！这难道不是判决无效的根据？王国巴昂最高法院将立即看到这一点和其他的根据，并肯定会考虑不能处以这样长的徒刑，而对诉讼提出判决无效的申诉，这样的判决本来必然是会全部告吹的。

我谨请求光荣的法庭将这份要求撤销原判决的上诉连同有关卷宗送交崇高的王国巴昂最高法院，我请求最高法院给我减刑。**

* 摘自一九三五年三月所写关于共产党人服刑时的生活一文(《选集》，第二卷)。

** 摘自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约瑟普·布罗兹向萨格勒布的王国法院的申诉(《选集》，第二卷)。

对德尼索夫同志的谴责

愤怒地拒绝接受金钱

这里我仅谈一谈我一九二八年被关押期间的某些事实，我认为，这些事实已足够对这里所谈到的一位同志作出肯定的鉴定。

我本人是在一九二八年认识德尼索夫同志的，当时警察对我提出诉讼，尽管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他尽管在国家机关里工作，但却以各种方式为我们的一些被捕的同志效劳。警察把我关进预审监狱后，德尼索夫趁第一次在我所在的那一排牢房值勤时就来到我的牢房，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并问道：“有什么需要我传到外面去？”我当时需要把一些材料紧急送给在外面的同志们，这些材料与揭露出名的内奸、共青团员“农民”[尼古拉·佩特科维奇]有关，他当时占据重要位置。我把这些材料写成信，经由德尼索夫同志送出，他十分认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后来，在宣判了对我的判决之后，他作了准备并十分积极地帮助我越狱；德尼索夫同志给了我一把钢锉，来锯掉铁栅栏，我锯时，他替我看守。一九二八年，[安德烈·]赫布兰同志被捕了，从他身上搜出了有损他名誉的材料。德尼索夫同志后来从审查员的写字台里偷走了这份材料。

这里，作为例子，我只列举了一些事实，但是，除此以外，德尼索夫同志还帮了大忙。帮助我们这些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相互

保持联系，帮助我们这些犯人同在外面的同志们保持联系。

有人指责德尼索夫同志是为了金钱而这么干的，这不符合事实。有一次我给了他一笔钱，借口是给他买香烟抽。他愤怒地拒绝接受，这使我相信他不是为了金钱而这么干。他从外面的同志们那里拿到一笔给我的钱，以用来收买监狱里的一些职员。他想把这笔钱全部交给我，但是，我只拿了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都留在他那里，因为钱放在我身边有被发现的危险。他根据我的指示，把这笔钱用来办本来要办的那些事。

德尼索夫同志当时就对工人运动有兴趣。有时候，在夜里值勤时，他站在我的牢房前站上几个小时，听我给他解释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根据我的指示，他开始很出色地在监狱的其他宪兵中间展开工作，以便建立同情者小组。

他常常向我叙述他早年当宪兵的事；此外，他还告诉我，他被人怀疑是共产党人，因此而受到迫害，最后还被解雇了。他也想放弃现在的工作，并且已经找到了替私人干活的工作，但是，应我的要求，他决定留下来：我向他指出他可以给党带来的方便，因为他可在被捕的同志们和党这两者之间保持联系。

因此，关于德尼索夫同志，我能说的，都是一些最好的话。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给个人谋取好处，而是出于对工人运动的同情。对于这一点，我本人是相信的。在我逃跑的时候，德尼索夫同志政治上完全不成熟，唯有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生活在不允许他得到发展的环境中。只是同被捕的同志们的联系才唤起了他身上的无产者觉悟和参加工作的愿望。我认为，应该吸收他入党，并使他能够工作。*

* 摘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德尼索夫同志的材料（《选集》，第二卷）。

在莱波格拉瓦和马里博尔服刑

我们立即建立了组织

我得在这里强调指出，对于我们这些在服刑的共产党员来说，不存在真空，那里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工人和知识分子。我们懂得把牢房变为学校，变为党校。我们进行了斗争，进行了艰巨的斗争，才得到了权利：让我们好几个共产党员关在一起，而不是关在单人牢房里。我们不得不绝食，如果他们不让步的话，我们宁愿死去。当局不得不让步。当我们有可能聚集在一起，也即我们有好几个人关在一起时，我们立即开始组织小组。我们抓紧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情况很困难。我们得设法偷到自己的书。我们通过刑事犯人从仓库里把书偷出来，对他们的效劳以香烟作为酬报。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为了进行伪装，在一本马克思主义书本的前面附上几页常见的小说，例如《基督山伯爵》。如果有哪个看守来翻看，他会说：这是《基督山伯爵》，没什么。即使他看到有的地方谈到马克思和经济问题，他也会以为，这是某个基督山伯爵写的。我们就这样保存了自己的图书馆，尽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搜查。我们想方设法，把牢房真正变成学

校。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计划。

例如，我自己就学习语言。最初，我学习世界语，后来，我转而学习英语。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轮流当教员。我们自己得作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我们全都是自封的学者，要讲课不是一件容易事。例如，落实到我头上的是讲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我得承认，这个问题使我很吃力。你们都看到了，这一工作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服刑期满应当出狱时，我甚至感到遗憾，因为我没有完成计划。我要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就是这样，懂得把牢房变成学校。这对于我们大家从事今后的斗争，完成向我们提出的任务十分有用。

这里我简单地谈一下政治犯的状况和同志们之间的关系，不谈细节。我一九二九年二月来到莱波格拉瓦时，在那里只遇到两名政治犯：舒马诺瓦茨和洛潘迪奇，也就是说，加上我的两个同犯，我们一共是五名。舒马诺瓦茨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狱了，我们就剩下了四个人，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二月或三月，莫·皮雅杰、查基、格鲁博尔和契普契奇来到。我们都关在单人牢房里，但是我们每天可以碰头，因为我们被安排在几个工场里干活，特别是我可以同每一个人联系，因为我是监狱发电厂的电工。皮雅杰来后，我们就开始阅读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因为皮雅杰在翻译《资本论》，他有这些理论书籍。夏天，我记得是在一九三〇年六月或七月，从米特罗维察送来了两批犯人，其中有我们的三、四十名同志。他们的到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因为在新来的同志们中间有一大批人是被开除出党的或者由于在警察局或在法庭上的表现而在受审查的。由于新来的同志们大部分被安排在新楼里，我们命令他们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报告要求安排到旧楼里来，因为我

们想集中在一起。除七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这么做了，这七个人要么是不想这么做，要么是监狱当局不想放他们。人集中起来后，我们就着手建立组织，由于来自米特罗维察的同志们中间的那种糟糕的情况，这样做是极其必要的。选举了由三个人组成的地方委员会，其中有我。地方委员会进行了审查，吸收一些同志加入组织。在米特罗维察被开除的那些同志仍然留在组织之外。此外，地方委员会还通过举办训练班组织了教育工作。在组织之外的大约有五名同志。在这里，重要的是提一下，在被开除出党的人中有乔洛维奇：在米特罗维察，他被临时开除出党六个月，原因是他搞阴谋，也即不服从地方委员会（关于下跪问题）的一项决定，此外，他还写了一封不保密的信（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挑衅性的信），落到了监狱当局的手中。后来，又开除了几个同志，原因是他们反对地方委员会的一项决定，即未经地方委员会同意，任何人无权组织越狱，而他们暗中还是在组织越狱。地方委员会了解到这种情况，把有关人员开除出党。在被开除的人中，有一人是地方委员会的成员米洛拉德·佩特罗维奇，因为他老是同被开除的人〔如乔洛维奇〕保持联系，并受他们的影响，还把地方委员会的决定向他们通报。这里，我要纠正一个事实：开除这些人都是在会议上决定的。会上选出了新的地方委员会，因为前届地方委员会是临时的，新选的地方委员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维护党纪。会议的决定使一些同志，例如乔洛维奇和博列维奇，气得发疯，他们辱骂党，自愿到新楼去。我得强调指出，当时乔洛维奇受处分的期限满了，应该让他重新回到党内来，但是根据他对党的攻击，他终于被开除出党。

一九三一年春天之前，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由于党组织采取了巧妙的策略，没有同监狱当局发生任何冲突。教育工作

在很顺利地展开，同志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和谐。我得提醒一下，我从一九三〇年夏天起就可以不受约束地离开监狱外出，也就是说我在服刑一年多之后就可以外出，而这完全是特殊情况，因为犯人在服满一半徒刑后才有权利转到“间接服刑部”。但是，我能外出是因为我作为电工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监狱还向私人住宅等供应电力。当时的监狱长博哈切克是我的战友，我们一起被俘，因此对我很宽大。我可以充分利用外出的机会为党组织办事，在一定程度上还在监狱外从事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们同监狱当局发生了第一次比较重大的冲突。事情的经过是，莱波格拉瓦来了一名看守长，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官吏。他想实行某种新改革，也即整顿秩序，因为据他讲以及据当局安排在监狱里的密探教员科斯蒂奇讲，监狱里存在着名副其实的无政府状态，犯人，特别是政治犯有过多的“自由”。有一天，这个家伙把我们的一个同志推进了地下室，这个同志当时有病，但是监狱里的医生不承认他有病，尽管他发烧三十八度五。为此，我们举行绝食，以示抗议，而刑事犯也声援我们，以示团结，因为他们也有几个人因同样的事情被关进地下室。大约有一千二百名刑事犯参加，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八。这件事把监狱当局吓怕了，他们立即把莫·皮雅杰和米亚科维奇找去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也即把那位同志和其他犯人从地下室放出来，禁止从贝尔格莱德来的那个家伙实行的殴打。这时，刑事犯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们也表示支持。监狱当局这时请皮雅杰出面让旧楼里的人平静下来，要我去新楼，让那里的犯人平静下来，因为除非我亲自向他们宣布绝食已停止，否则新楼里的犯人是不会相信绝食停止的。这件事后来自然产生了影响，促使司法部下令把我弄到马里博尔监狱去服刑。这次绝食结束之后过了十四天，

司法部来了一名司长，要求对我和皮雅杰两人进行搜查，又过了十四天，我被突然送往马里博尔，同去的还有三个人：莱维、特拉伊科维奇和乔洛维奇，因为他们在新楼里经常同看守发生冲突。

我们来到马里博尔时，遇到了那里的四名同志：武约维奇、乔拉科维奇、科茨曼和布塔拉。当然，我们也被分别送进单人牢房，因为前面提到的四个人在单人牢房里已被关了十七个月了，他们曾进行长达十天的绝食，但无济于事。尽管受到严密的监视和彼此隔绝，最后我们还是商定，团结一致地和不断地提出抗议，要求把我们关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我们的要求实现了，因为监狱当局担心这一回不象第一次绝食那样了，现在比较难对付我们。我们关在一起后，立即建立了组织，着手进行教育工作、组织讲习班等。根据我的建议和莱维同志的建议，过了两个月，特拉伊科维奇同志和乔洛维奇同志重新被吸收加入组织，当然，条件是先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宣布今后不再重犯。不久，跟乔洛维奇又有许多麻烦事，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让他改正。在这件事情上，特别是武约维奇同志费了心，但是一无结果。乔洛维奇看到，他又将在党的会议上被开除，干脆发表了一项书面声明，宣布退出组织。从他以前和后来的声明来看，他说，他不认为监狱中的党组织是党组织。

马里博尔监狱里后来的生活和工作，我认为，可以从武约维奇和乔拉科维奇的报告中了解到。

武约维奇和乔拉科维奇两位同志出狱后以及科茨曼和布塔拉同志出狱后，又有四位同志进了监狱，先是采列的两名工人：一名被判两年，另一名被判三年。一、两个月后，又来了赫拉斯特尼克的两名玻璃工人。同先来的两人不同，这两名玻璃工人是很

优秀的产业工人，满腔热情地学习理论。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他们突然被带走，被送往米特罗维察，所有的政治犯都被关在那里，而我则又呆了五天，五天之后被送往奥吉林，在那里又被关押了四个月。

我出狱后，见到了维达科维奇同志，他对我说，米特罗维察的情况十分紧张。存在两派：工人和知识分子。工人以克拉什为首，而知识分子则以奥格宁·普里察^①为首。看来，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原则性的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个人的较量，而且看来是由于克拉什同志做法不策略引起的。克拉什是领导成员，大家都说，他不断地写一些“指示信”，往往由于措词不当而引起知识分子的不满。现在这种情况彻底改观了，因为有五十名同志被转移到莱波格拉瓦，其中大部分为知识分子和水平较高的工人。

在服刑期间，我们始终认为，监狱里的组织是外面的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监狱里的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应当设法给在监狱里的同志们和组织送去秘密材料：党的决议、各种决议和书籍。这将极大地有助于改善狱中同志间的关系，此外，特别重要的是，有助于培养同志，一旦他们出狱，就是了解情况的，便于工作。我跟莱波格拉瓦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可以把材料送到那里，送到同志们手里。

① 奥格宁·普里察(一八九九——一九四一年)，南共著名活动家、作家、翻译家。一九二一年加入南共，一九二七年任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委员，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任党报《战斗报》主编，一九二九年三月《战斗报》被查禁后，被判七年徒刑。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被乌斯塔沙枪杀。译有《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著有大批政论文章。荣获人民英雄称号。

——译者

博日达尔·阿季亚博士事件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
他是一个正派人

三个月以前，我在一号报[《文学家》]编辑部里偶然的机会会见了博日达尔·阿季亚博士，他后来说，他想跟我谈一谈。我就去找他，他向我谈了自己的经历以及现在向左转的原因。他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办的杂志[《自由》]的主编，这家杂志现已停刊。据他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二个半国际已经最终地被消灭了，或者说已经破产了。他认为，共产党的斗争手段和方法是正确的。他说，他同南斯拉夫社会党的领袖们不会再有任何共同点。在那里，他已经拆掉了身后的桥，他们对他也不再信任。他说，谁也想象不出那里有多少卑鄙龌龊的事。我向他问起米尔科·库斯·尼古拉耶夫，他说，尼古拉耶夫在被解职以后，十分潦倒，最后终于被社会爱国主义者收买过去。

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合法书籍还在攻击他，而现在没有任何理由攻击他。我认为，他这番话是想说：我们可没有攻击你。他说，他没有什么野心，他只是想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发表各种演讲做点有益的事。我则对他说，现在不必说大话，他还在尽可

能同他以前的社会爱国主义机关里的同伙们保持联系。不过，我还是作了安排，让我们的杂志不再攻击他。他可能对我们很有用，不过我们对他得讲究策略。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正派人，他愿意做要求于他的事。

赫布兰的儿子

找工作做

早在莱波格拉瓦时，我就采取措施，要尽可能把赫布兰的儿子送到国外去。赫布兰同志的最大愿望是不要让他的儿子也遭殃，而是希望把他的儿子培养成革命者。三个月以前，我曾去过赫布兰同志的姐姐那里，当时，他的儿子在萨格勒布，在找工作做，但是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不得不返回斯拉沃尼亚。赫布兰同志的姐姐对我说，让孩子出国没有什么障碍，她求我尽早把他带走，因为他生活很困难，有可能成为流氓无产者。他有十七、八岁。我想，可以把他送去上学。

关于格尔日蒂奇同志的妻子

我还见了格尔日蒂奇同志的爱人，她在萨格勒布，离我很近，随时可以去找她。她处境十分困难，没有工作，没有维持生计的手段，警察不让她在城里找到工作。她希望无论如何把她送出国去，但是萨格勒布的同志们不知道具体地对她说些什么好，此后，她简直就绝望了。我想，得把她尽早送走，也就是说，得通

过同志们告诉她，不久将出走，免得她做出些荒唐的事来。

奥雷什基的家庭

同样有必要为奥雷什基同志的爱人和孩子采取措施。她现在在斯雷姆当护士，但是她的孩子生活条件很糟。孩子放在酗酒的祖母那里，她待他不好。

勇敢无畏和坚定不移的榜样

往返于莱波格拉瓦和 米特罗维察之间

这里我简短地谈一谈我同莫·皮雅杰和莱波格拉瓦监狱中的其他几位同志见面的情景，以及跟他们在一起的一番经历。我是想比较详细地谈谈某些同志，特别是莫·皮雅杰同志，他在南斯拉夫各地的监狱里已经关了十年。我说各地的监狱，是因为皮雅杰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已经两度从米特罗维察被解往莱波格拉瓦，又从莱波格拉瓦被解往米特罗维察。当局之所以经常采取把犯人从一个监狱解往另一监狱这种做法，是因为当局认为，如果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呆久了的话，这些人会危及监狱中的秩序。伴随这种做法的是种种虐待，宪兵在途中作恶，同志们新到的监狱的当局也肆虐。兹拉特科·什纳伊德尔就是由于这种换监和遭受虐待而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的。请看在换监时，他们是如何虐待我们的同志们的！皮雅杰同志第一次来到莱波格拉瓦时对我说：“在米特罗维察，宪兵把我们带到监狱的院子里，开始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想在路上逃跑的话，他们将象打死兔子那样把我们打死。监狱长——米特罗维察屠杀共产党人的著名刽子手普希奇怂恿宪兵这

么干。一路上，宪兵不停地威胁我们，辱骂我们。我和我的三位同伴的印象是，宪兵确实打算杀害我们，然后宣布我们想逃跑。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时，这种做法很‘时髦’。我们到达莱波格拉瓦警察局时，已经是深夜了，离监狱大约有八百步。宪兵跟在我们后面，威胁说，只要看到有什么可疑的动作，他们就立即开枪。因此，我们是抱着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心情走完这一段路的，随时等着身后响起枪声或者背上挨一刀。”宪兵是奉残暴的当局的奴仆们的命令这么做的，让工人阶级的战士们体验体验临死的味道。莫·皮雅杰是同查基、格鲁博尔和契普契奇三位同志一起来到莱波格拉瓦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在莱波格拉瓦总共只有三名共产党员，因为我们是在军人法西斯独裁政权上台之前被判刑的，而后来的国家法庭把所有的犯人都送到米特罗维察。

莫·皮雅杰同志的到来使我们，特别是使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设法让他在监狱的发电厂里找到一份差事，我自己在那里当电工。在那里，我们在一起一直呆到我受罚被调往马里博尔监狱为止。在那里，我有机会了解我们这位同志的性格和生活，一九二五年，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而这全是由于当局有个怪念头，当局当时以为这么一判刑就会把斯捷潘·拉迪奇吓怕了，拉迪奇当时在周游欧洲，甚至还去了俄国。皮雅杰同志的徒刑后来减为十二年(去年，他由于唱革命歌曲而被判两年徒刑，因此，他总共得服刑十四年)。皮雅杰同志现在大约四十八岁，但是看上去要老得多，因为他在服刑期间遭受了很多折磨。早在大战前，皮雅杰同志曾在慕尼黑美术学院学习。后来，他在巴黎当艺术家，挨饿的时候多于吃饱肚皮的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马其顿，在一家中学里当美术教员，一度代理过校长职务。大战一结束，他就放弃了公职，放弃了绘画，作为共产党人，从事起新闻来了。一九二

○年，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南斯拉夫第一届记者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记者协会的第一书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全境的记者协会。他那支犀利的笔经常抨击“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内部的阶级敌人。他编辑报刊并且不倦地为各家共产党报刊撰稿。党和革命报刊被查禁以后，他继续工作，直到最后于一九二五年被捕为止，他因出版非法的党报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他来服刑时，并没有意气消沉，他不是啥事不管。他明白，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缺少什么，他看到有必要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需要对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最锐利的武器。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另一位同志的帮助下，他把《资本论》这本马克思的巨著译成我国文字，接着又译了《哲学的贫困》和其他一些作品。他的这些作品极大地帮助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一直到现在，他始终体面地履行自己共产党人的职责。

皮雅杰同志在服刑时也画画。监狱四周是高墙，我们设法让他到发电厂平坦的屋顶上去画画。他画了几张秀丽的风景画。从屋顶上没有什么好画了，他就画云。他画的云表明他确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这是他画的最好的一些画。在发电厂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机器运转时，他很爱惜机器。他常常表示想当一名工人，一名五金工人。他始终是一名久经考验的战士。对于监狱当局的任何不公正的行为，他都会大发雷霆，而置等待着他的纪律处分于不顾。有一次，监狱里的教员——他本是当局的密探，在监狱里负责检查信件——虐待一位年轻的同志，原因是这位同志在信里写了些不合这位教员心意的话。皮雅杰就去向这位教员交涉，两人发生了冲突，因为教员骂共产党员为匪徒。教员把两人都告发

了。监狱长发觉教员没有理，但他只想责备那个工人，皮雅杰提出异议，要求也惩罚他。当然，他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他被关进单人牢房。

在监狱中，有几位同志已经关了十四年。其中的两人是查基同志和斯帕索耶·斯特伊奇同志。由于一九二一年企图行刺国王，查基被判无期徒刑，斯特伊奇被判绞刑，但斯特伊奇后又被减免为无期徒刑。当局想通过骇人听闻的折磨，首先是在警察局里，在“格拉夫尼亞查”野蛮地折磨他们，后来又在监狱里折磨他们，从精神上把两人打垮。在米特罗维察监狱里，两人戴了七年的重镣，严格地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由于在监狱里继续受到折磨和虐待，这两位工人阶级的英雄精神上受了创伤。但是他们毕竟是充满激情的老战士，随时准备继续斗争。当局最骇人听闻的折磨也未能把两人打垮。查基同志大约六十岁。在进监狱之前他就是伏伊伏丁那无产阶级受人爱戴的著名领袖和战士。监狱里每一次举行绝食时，查基同志总是坚持到底。一九二七年，在米特罗维察举行了十五天绝食。一九三一年，在莱波格拉瓦举行了短时间的成功的绝食，第二次又举行了十六天绝食。这位年迈的无产者尽管体力上和精神上受尽折磨，情愿在斗争中死去，而不愿破坏绝食，他甚至拒不听从同志们要他进食的劝告，同志们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要他不参加绝食斗争。

斯特伊奇同志在米特罗维察已经关了十四年，当局不把他关到别的监狱里，因为当局认为，经过多年的骇人听闻的折磨，已经使斯特伊奇从智力上不对当局构成威胁。斯特伊奇在经受了不得不忍受的种种折磨之后，也确实变得精神错乱。例如，他老是想说服人人相信，他发明了一种专利，可以用雪来生炉子，这样人在房间里会感到暖和。除了这一专利外，他说，他还发明了

另外几种专利，都是用雪和冰。为什么斯特伊奇老是对雪和冰产生一些怪念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七年中他遭了多大的罪？戴着镣铐，关在最寒冷的天气里也不生火的冰冷的单人牢房中，他的双脚残废了。种种折磨和寒冷使他成了半疯子，致使他有病的脑子里老是出现一种假想：可以用雪和冰取暖。斯特伊奇同志毕竟还是活下来了，原因是他原先体力充沛。当然，现在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淋巴结核等病。自从许多党员同志前来服刑以后，他的脑子又慢慢活跃起来，特别是在同志们设法使他跟大家关在一起之后。在与同志们的不断交往中，从智力和体力上，他都开始慢慢恢复，但是在同志们举行了几次绝食斗争以后，当局又把他同刑事犯人关在一起。让精神错乱的共产党人变成健康人，对于这种事，当局当然没有兴趣。当局希望所有的共产党人都精神错乱，因此才通过精神和体力上的折磨，使同志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苦。

一九三一年夏天，从米特罗维察监狱一次就把七十名犯人押送到莱波格拉瓦来，其中有三十五名政治犯，也即共产党人。把他们转移到米特罗维察是因为他们闹事，抗议发臭的菜和坏了的面包。许多人因为吃了这种食物而得了重病。监狱当局经与内政部商量，把它认为最危险的一部分犯人挑出来，送往莱波格拉瓦。这批同志被关进运牲口的闷罐车里，戴着镣铐，一个连着另一个，但是一路上他们不断地唱革命歌曲。在每一个较大的市镇，特别是在火车停的时间较长的萨格勒布，从紧锁着的车厢里传出无产阶级最美好的歌曲：《国际歌》。铁路上的工人们停下步，露出兴奋的表情听着这首歌，听着被判了刑、戴着镣铐的无产阶级战士无畏地唱着的这首歌，而当时正是军人法西斯独裁政权最猖狂的时候，仅仅因为唱这样一首歌，当局就杀害了数以十计的英勇战

士或者把他们判处长期徒刑。宪兵们气得发疯，扬言要开枪，拔出刀来威胁戴着镣铐的同志们，但是他们遇到的是戴着镣铐的普洛米修士们的威严的目光，而不得不后退。

这批同志从米特罗维察来到后，只有七个同志的我们这一小批人十分高兴，当时在莱波格拉瓦我们只有这么些人。老朋友和在监外工作和斗争中的老熟人又聚在一起了。他们虽然都同外界隔绝，但是还是都希望能听到点新闻。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在外面，党是否还在活动？党是否经受住了军人法西斯独裁政权这一次的严重打击？当你了解到，党仍然存在，仍在活动，没有被战胜，也即没有被消灭，你就会觉得长期徒刑和折磨并不难熬，几乎觉得不难忍受。新来的同志中，几乎全都被判长期徒刑。赫布兰同志被判十二年，耶拉维奇被判十年，博列维什十二年，索拉里奇十年，佩特罗维奇十二年，格鲁博尔十二年，莱维十年，特拉伊科维奇十二年，达维多维奇十五年，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十年，阿莱克西奇十年，乔尔杰维奇十二年，久·普察尔八年，一九三二年绝食斗争期间去世的费斯蒂尼同志被判了八年，他的死亡主要归咎于监医。其他的同志们至少都被判了五年徒刑。判这样重的刑的标准完全是警方的指控，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赫布兰同志的案件。早在一九二八年九月，赫布兰同志就在街头被捕了。但是，鉴于从他身上没有搜到什么东西，他在警察局里什么都没有承认，警方把他一直关到一九二九年春天，才把他转交给国家法院。警方指控说，赫布兰同志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人，对于国家法院来说，这一说法足够了，法院判他十二年徒刑。诚然，赫布兰同志在萨格勒布无产阶级的队伍中确实是一名不倦的和真诚的战士。作为私人的一名雇员，他把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工人运动。他严肃无畏，在萨格勒布的工人运动中深得

好感。在人身自由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是无所畏惧的和不知疲倦的，在警察面前，在法院面前，在服刑的时候，他同样如此。他在法院面前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那种自豪的气概，主要是这个原因他才被判了重刑。由于他在服刑时也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那种自豪的气概，他已经戴了三个月的重镣。赫布兰同志是我们党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党员之一。今天，正在为我们党培养这样的战士。

在监狱里还有许多优秀的同志，他们将能对工人阶级作出许多贡献。在工人阶级的敌人面前无所畏惧的另一个榜样是制鞋工格鲁博尔同志。尽管受到折磨，他在警察面前表现得很坚强。尽管他什么都没有承认，法院还是判他三年徒刑。格鲁博尔同志发觉，法院简直是在做戏，是事先奉命作出判决的，于是他开始慷慨地高呼共产党的革命口号，为此法院又加判他九年徒刑，因此他总共得服十二年徒刑。我们的同志在服刑中多次显示了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坚定。我将在别的场合再列举一些例子，再来谈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服刑生活中的一些事件。*

* 摘自一九三五年三月谈共产党员在服刑时的生活的谈话。

出狱后恢复党的生活

同志们高兴地听取我的报告

我出狱以后，同萨格勒布的一些同志接上了头，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决议，要我前往国外，在走之前，我安心地到内地找个地方等着。我认为，时间不会长，我就局限于至少了解一下农村的情况。我就前往克罗地亚扎戈尔耶，在那里，我确实能够看到所能想象的最骇人听闻的贫困。后来我回到萨格勒布，在萨莫博尔定居下来（由于迫害，我无法在萨格勒布定居），从那里，我可以经常到萨格勒布去治病，并尽可能了解党的组织状况和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党作为一个组织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只存在彼此间没有联系的各个小组。有些同志一再说服我，说党“在活动”，他们主要是知识分子，而工人同志们则一再说服我，说党根本就不活动。他们主要是服完刑出来的一些同志，他们想投身于工作，但是有人告诉他们，出于地下工作的原因，他们应当留在组织外面，不然组织（根本不存在的组织）就会遭到破坏。当然，说这样一些话的通常是这些同志所找的知识分子。同我有联系的第三类“党员”是我的一些老熟人。他们过去跟我一起在党内工作过，当时是积极的，而这时却消极了，他们为了掩饰这种消极态度就批

评一切，既批评领导机关，也批评个别知识分子。他们说，坐在领导机关里的是一些知识分子，是坐在中央的知识分子使得全国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因此，他们声明，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不想工作，因为他们立即会被捕。几乎所有的同志，包括现在组成各个领导机关的那些同志或多或少都认为，在中央或者中央四周有内奸。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看法，后来我从一位同志那里了解到，在中央工作的是一些你可以充分予以信任的工人，但是我跟一起服刑的几个同志决心查核一下这种谣传，弄清楚党组织是怎么遭到破坏的。最后，我确信，有些纯粹是偶然的，而有人却说是自上而下地被破坏的，只是其他一些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事，对于我们萨格勒布的同志来说，直到今天都无法解释清楚。

有些同志认为有必要建立组织和领导机关，但是只有在弄清楚党组织遭到破坏不是来自上面，或者只有把内奸挖出来之后，才能同中央保持联系。但是，我设法使他们认识到这样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只要在国内是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去办的，就不大可能从外面破坏组织。

“五一”一过，我们五个同志（都刚出狱）^①碰头研究各种问题：建立组织和领导机关，萨格勒布的混乱状况的原因，关于“红色救援会”^②，关于文学争论，关于以前的组织的弱点以及原因（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存在两派：T和B），还有其他各种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临时地方委员会，临时地方委员会

① 从种种情况来判断，这五个人除约·布罗兹外，为：弗拉尼奥·克拉利、德拉古廷·佩特罗维奇、德拉古廷·马鲁希奇和斯尔贾·普里察。——原注

② “南斯拉夫红色救援会”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是作为南共领导下的地下组织建立的。它是“国际援助革命战士组织”的组成单位，任务是向遭受反动派迫害的人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原注

的任务是立即着手把各个小组联系在一起并整顿地方组织。会上还谈到有必要建立临时省委书记处，并且立即指定了两位同志，后来又找到了第三位同志来负责这一工作。地方委员会和省书记处中各有两位正在服刑的同志。

在这次会议上，我向同志们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是由可以予以充分信任的工人组成的，必须粉碎制造各种谣传和破坏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威信的做法，因为如果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没有威信——自下而上也是可以破坏这种威信的——就不可能建立起健康强大的党组织。同志们高兴地听取了我的报告和我对中央的看法，并且同意我的看法，因为在此以前他们都不了解情况并且受各种谣传的影响。当然，有些同志批判地看待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有同志批评中央在作决议和发指示时过分死板，因为不大了解国内的情况，不考虑有些事情能否贯彻执行，一句话，不大了解国内工作所遇到的困难。而这是因为中央即便派人到国内来的话，他得到的也是曲解的报告，因为他找的往往是自己并不工作的一些人，通常是找一些知识分子。此外，同志们指责中央支持国内的受权代表^①，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对党的下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表示不同意。同志们认为，中央应当通过国内现有的领导机关来贯彻执行党的全部指示和工作。说到党的工作，应当考虑到，现在确实象是中央同一大批个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保持联系，因为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有的这样的“受权代表”动辄抬出某个“上级机关”，而置当地的机关于不顾。

① “受权代表”是指中央委员会往往从国外派往国内各地的南共领导人。当时，在克罗地亚是由斯尔贾·普里察充任“受权代表”。——原注

萨格勒布组织内的现状

把各种各样自行组织起来的小组联系在一起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一个月以前，党组织有十九个支部，而在十四天以前找到了一个有五十名党员的自行组织的组织并同它接上了头，这个组织在纯粹的工人中心特雷什涅夫卡。当然，必须十分谨慎，并进行改组，因为同志们考虑到这样做有可能钻进个把奸细，这样一个小组有可能是警察组织的。最困难的是铁路工场，因为老党员不干了，理由是奸细活动来自上面，不过我们还是撇开了这些人，打进了这个工场，将建立由新人组成的组织。

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能够在各个下级领导机关里担任职务的能干的同志，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培养出年轻的新同志。

省 委

省委真正开始工作大约在六月中。省委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缺少经费，因为没有经费，省委无法开展工作，因为需要到各地去，不论是去恢复组织和联系，还是去整顿现有的组织。据同志们认为，党或者说中央提供给省委的两千第纳尔的预算太少了，省委无法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我也这样看)。应当设法搞到必要的经费。省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已长期不存在，而恢复联系和建立新组织的工作也将很难进行。

文学家之间的争论^①

制订明确的决议

我在服刑时就受同志们委托，同我们的文学家们联系，向他们转达服刑的同志们对于我们的社会文学界的争论感到不满。此外，他们要我进行调解，以平息这种争论。我在前面谈到的那次会议上谈了我的意图，地方委员会后来通知我，让我代表地方组织去找这些文学家。我首先去找一号报纸主编[《文学家》主编米兰·杜尔曼]，把正在服刑的同志们的意見和地方组织的要求告诉他：立即停止这种非同志式的论战，也即报上再也不登可能向围绕二号报^②或者说二号杂志[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今天》杂志主编]的那批同志挑战的文章（我得同时指出，一号报主编杜尔曼自

① 社会文学家之间的争论是一九三二年围绕艺术的含义和作用问题爆发的。一九三四年初，这场冲突达到了新的规模，当时克尔莱扎在《今天》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我的无聊作品的最新诅咒》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把反动派和反动报刊对他的围攻同A·B·C·（博戈米尔·赫尔曼的笔名）的意图和左翼文学（所谓的社会文学）从政治上和文学上对他的人格的抨击等同起来。——原注

② 一号，铁托指的是《文学》杂志^③，而二号，指的是《今天》杂志。——原注

③ 原文如此，本文中为《文学家》。——译者

已要求我去找克尔莱扎调停，说他停止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攻击文章)，不论克尔莱扎是否在自己的杂志上继续这场论战。此后，我去找克尔莱扎，他向我详细地说明了是如何导致彼此的攻击的。他认为，他根本没有责任，因为是一号报纸周围的人开了头，发表了《克尔莱扎往何处去?》的文章，这是诺维萨德巴昂辖区报纸①撰稿人〔博戈米尔·〕赫尔曼写的。他说，与一号报纸合作的“这些人”在文学上都是文盲，是一些没有能耐、没有气节的人，他们今天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可能滚到反动派的队伍中去。他认为，这样一些人没有权利称他为叛徒或者坏蛋，他从事社会文学已经有十六年以上的时间。使他愤慨的是，这些人现在卑劣地抽出他一九一九年写的一些诗，说成是他现在写的。他对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否有才干，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提出怀疑，说他们只是给我们的文学制造混乱。我把在服刑的同志们以及在狱外的同志们的意見告诉了他，并要求他不要再写文章，不要回答一号报纸，尽管一号报纸最近又写了一篇文章，形式是向克尔莱扎呼吁，但是据我认为，文章的结果并不好，因为从文章中看出来，要负主要责任的还是克尔莱扎。他回答我说，别的东西他不写，但是要写导致这场论战的经过，并且不加评论。但是，我要求他，在党就此作出决议之前，这也不要发表。后来，我又把一号报纸的几个人找来，到会的有杜尔曼、伊韦科维奇和容。我向他们谈了克尔莱扎的观点，谈了他为什么大发雷霆。他们承认，A·B·C·〔博戈米尔·赫尔曼〕的那篇文章《克尔莱扎往何处去?》很不妥当，尽管写的事實没错，而且是在经党同意后发表的。我问，他们是否将服从党就这件事作出的决定，他们回答说，将服

① 很可能是指《塞尔维亚马蒂察之声》。——原注

从，他们愿意同克尔莱扎合作，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包括克尔莱扎在内的编辑委员会，对立面中谁参加，由他选择，党的代表也参加该委员会。我又再次去见克尔莱扎，在此之前他曾答应我，他将邀请几个自己的合作者，但是我去时只见他一个人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和争论，我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他不愿跟这些人合作，不相信他们会服从党的决定。我对他说，我想最后弄明白，他到底想什么，是否要求赔礼，他间接地让我明白，他不反对在一号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我向双方都表明了，党将最坚决地反对有人——不论他是谁——继续在我们的文学界进行这样的攻击。没有就此事作出具体的决定，也没有公布，因为如果作出并公布这样的决定，就必须讲清楚对违反这一决定的人将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我反对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应该由中央来作决定。

以我之见，中央应该就这件事尽早以决议的形式作出明确的决定，制止今后在文学界出现这样的紧张关系，这样的关系对运动十分有害，因为敌人，特别是教权派在利用这一情况，他们在小册子中，在自己的报纸上已经谈到这一情况。我们在内地的同情者和同志们感到愤愤不平，他们问道：正当敌人的所有力量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时候，为什么偏偏现在出现这样的争吵呢？*

* 见萨格勒布组织的代表一九三四年八月的第一次报告的补充（《选集》，第二卷）。

农 民 问 题

不要光停留在许诺上

在扎戈尔耶我就看到，克罗地亚农民党作为一个组织根本就不再存在。农民听天由命，为了反抗当局，加入了“十字军”。^①神父们在农民中间大肆宣传，把自己打扮成民族英雄。农民和农村青年参加“十字军”并不是由于他们喜欢神父、信任神父，而是出于对抗的心理，出于仇恨贝尔格莱德而被迫加入“南方鹰社”。因为谁不参加“十字军”或“鹰社”，那就意味着他是反国家分子；农民受神父的影响，比之于受克罗地亚革命者或者共产党人的影响，使当局高兴得多。我同参加“十字军”的农民和农村青年交谈，发现他们不是出于信念参加的。到处都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行动？俄国是否会不久就开战，来拯救我们？”贫困达到可怕的程度，令人难于置信。除了扎戈尔耶，我还到过别洛瓦尔附近。我去那里是同前农民党的头面人物接触。这些人我过去就认识。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地下的革命农民运动。把农民团结起来，

① “十字军”是教权组织的成员，是在亚历山大国王独裁统治的第一年组织起来的，是作为“天主教行动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组织起来的，在萨格勒布出版《十字架》报。——原注

采取各种行动，由年轻的左派组成新的领导，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承认，只有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才能做到这一切，他们认为，这个克罗地亚革命党必须同共产党相结合，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塞尔维亚帝国主义，也即反对贝尔格莱德。他们要求我向有关方面转达他们的这一愿望。他们要求我们党能让他们派几个领导人去俄国，以便确切地就各种问题达成协议。他们不承认以《进化》杂志为中心的所谓领导，但是认为对待马切克博士应当十分讲究策略，要使他从特鲁姆比奇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因为他在农民中间始终还是一个有威信的人物。莱博维奇和别洛瓦尔的其他人向我谈了对马切克的同样的看法，姆拉登·伊韦科维奇博士和萨格勒布的其他左派也向我谈了这样的看法。别洛瓦尔的几位几次说，希望我们真正有所作为，不要光停留在许诺上，因为我曾表示，我一定会让我们党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不久就会得到消息。我当时还不知道党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在做工作。后来我才会见了派回国内工作的德拉戈·贝德克。当然，我立即把他派到别洛瓦尔，同那些人接上头。

在萨格勒布，我会见姆拉登·伊韦科维奇，主要是与他谈建立农民总委员会的事。他表示同意，并答应我，他将跟他认为是可靠的革命分子的一些人谈谈此事。第二次见面时，他说，他跟一些人谈过了，他们同意建立地下组织，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能够采取各种合法的形式来团结农民，他们认为这不可能办到，重点应放在建立地下组织。*

* 见萨格勒布组织的代表一九三四年七月的报告(《选集》，第二卷)。

工会的活动

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意外

我来到卢布尔雅那，同特科人员接了头，但在商定的时间里他没有来到商定的地点。我在他安排的那幢房子里等了两天，我觉得事情不对头，就去他的老家，在那里我获悉他被捕了。我还有一个接头地点，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当时认为逮捕的面比较广。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萨格勒布，寄希望于借助那里的同志能接上头并了解到卢布尔雅那的逮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萨格勒布，我会见了比斯特罗[斯尔贾·普里察]和亚奈克[马尔科·佐夫科]，地方委员会书记和省委书记以及青年团书记。我跟地方委员会书记详细地谈到中央和萨格勒布组织的关系。这一次，我口头上比较详细地谈了我书面已经向萨格勒布的同志们谈过的那些事。这位同志对我说，他们写了一封给中央的很尖锐的信，我要求他们不要以这样的形式发出这封信，而是加以修改，他立即表示同意。我要求让我看一下这封信，但是他对我说，无法很快拿给我，而我又急于返回斯洛文尼亚。我是在几天以前，即九月十九日在斯洛文尼亚得到这封信和中央的复信的。

我第二次到萨格勒布跟代表会议有关，但是遗憾的是我晚到了。责任不在于我，因为我一接到通知就动身了。

同一天晚上我会见了一名工会代表。据其他同志说，他在会上作了一个出色的口头报告，关于工会的报告。我跟他从晚上十点一直谈到凌晨三点，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们谈话的最后一个小时内还有一名党员参加，他在私人雇员工会工作。从这位工会代表的报告来看，只有纺织工业的“行情”较好，但是那里参加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却最少，同样，党的影响也弱，因为除了奥罗斯拉夫列以外，尚未打进这些企业。大部分工业部门的情况变糟了。

奥罗斯拉夫列的罢工是由我们的人领导的，并且胜利地结束了。斗争是从一个车间开始的，正当工人看来要屈服的时候，其他车间也举行了罢工。厂方一开始就让逮捕罢工委员会的人，并拒绝进行任何谈判。后来，其他车间投身于斗争后，厂方又同意谈判并要工人派代表。工人拒绝了，表示只要他们的同志们仍关在监狱里就不谈判，厂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投降。

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意外，而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位工会代表说，工人罢工胜利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组织抱消极态度。许多人干脆就离开组织。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有大批失业工人的城市里，失业工人经常威胁着在企业里的工人。因此，这些工人一旦在罢工中取得某些胜利之后，就拼命保住自己的饭碗，甚至不惜以脱离工会组织为代价，只求不惹怒厂主。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态度的结果是，厂主慢慢地又把他们在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夺回去。这意味着，工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不过，在我看来，工会负有很大的责任，罢工以后，工会也变得不关心起来了，没有充分地利用罢工的胜利来

达到在有关企业的工人中进行进一步鼓动的目的。

他还向我谈到五金工人工会萨格勒布分会的事：这个分会召开了大会，选举了分会新的领导，几乎是一致选出的，新领导是由最优秀的工人，也就是说由斗争性最强的工人组成的。但是，贝尔格莱德的工会中央严厉批评了这次选举，宣布这次大会无效，取消了分会的领导，另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甚至还要把分会领导的一个成员开除出工会。对此，工人们感到极大的愤慨。这位同志问我，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有些同志的意见是设法同贝尔格莱德求得妥协，把那位同志保留在工会内就行了。这位同志认为，如果达成这样的妥协，工人们会感到失望，他担心许多人会因此而脱离工会组织。我给他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在这件事情上，不要跟贝尔格莱德的工会中央达成妥协，即便他们把那位同志开除了也罢。在这件事情上，中央粗暴地违反了工会的规矩，践踏了会员的权利，置会员的意见和愿望于不顾，而想安插自己的人。其次，立即散发工会合法的传单，在传单上要最强烈地抨击中央，要求他们尊重会员的权利。不要去限制工人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情绪，而是要加强这种情绪。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们会同意我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寻求同工会的官僚们和解，而把会员撇开，是错误的。

斯洛文尼亚的代表会议

党内的团结是真正彻底的

我第一次去萨格勒布回来之后，立即同贝夫茨[爱德华·卡德尔]直接接上了头，他向我报告了代表会议准备的情况。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我总共同贝夫茨本人见过两次面，同贝夫茨和科斯[鲍里斯·基德里奇]两人一起见过一次面。我努力从他们的报告和各种声明来了解他们两人和斯洛文尼亚党的状况。我发觉，这两个同志尽管是知识分子，但却十分能干、积极而又忠于事业。他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提出的各种问题。科斯对工会政策和企业里的工作的了解简直使我感到意外。这两个人的缺点是——而这也是知识分子的通病——稍有成绩就过份兴奋，就估计过高；看不到可以利用来吸收新党员的各种可能性；到目前为止，他们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传单，而这意味着他们努力以此来弥补他们实际工作中所缺少的方面：在工人中间物色新人，在组织中造就工人骨干，特别是在卢布尔雅那，这是最弱的一面。他们两人身上有一个特点是我特别喜欢的，而这在知识分子身上并不常见，这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自我批评精神，能够接受批评，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病态的敏感。

尽管有种种缺点，他们还是做了许多工作，今天在斯洛文尼亞已经为在所有比较重要的地方加强和建立组织奠定了基础，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我认为，这次代表会议对于斯洛文尼亞党组织今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里我不想作详细的报告，因为你们会得到全部材料和同志们有关会议的报告，我只想谈一谈我在会上得到的印象，关于斯洛文尼亞党组织今后工作和发展前景的印象。考虑到筹备这次会议的条件，会议开得很成功。代表们对所有的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们在会上说，这次会议对他们有很大好处。讨论过程中向他们解释了在此以前他们所不明白的许多事情。

根据代表们自己的说法，中央在斯洛文尼亞有很高的威信，省委也是如此。在整个会议期间，没有人对中央进行任何攻击或者批评，尽管我要求同志们畅所欲言。斯洛文尼亞党内的团结是真正彻底的。*

* 摘自铁托一九三四年九月的报告(《选集》，第二卷)。

进入党的最高领导

了解国内局势

尽管在一九二八年的萨格勒布会议之后，派别斗争，也即左的和右的派别，遭到了严厉的谴责，但是在身处国外，与国内脱离的领导层中，派别斗争仍在继续。我不想谈到底围绕哪些问题展开了派别斗争；主要的是，一九三四年以前，政治局就更换了三次。我只能说，在最初几年，这一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原则的，当时牵涉到各种争论和民族问题，但是后来就成了完全无原则的了。由于派别斗争给国内的党组织带来了混乱，党组织和工人阶级建设性的工作和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瘫痪。一九三六年，我在共产国际担任南斯拉夫党的问题的政治报告员时，我就一再要求党的领导迁回国，要求共产国际取消对他们提供任何财政援助。因为这是造成派别磨擦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领导成员，也即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工资。当时的南共中央委员会，以第一书记戈尔基奇为首，大多数人坚决反对政治领导迁回国。特别反对这样做的是戈尔基奇，因为他知道，党的领导迁回国的话，他就没有机会继续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了。中央委员会，也即它的政治局的所在地大多是在维也纳。

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如何工作的？我于一九三四年被遴选进政治局，我记得，政治局同国内的联系很差，因为党的组织丧失了对中央的信任，它们认为，党组织之所以遭到破坏是由于在中央周围有内奸，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对的。有一件事情可以最清楚地说明当时的形势。我一九三四年出狱以后，看到由于对南共中央普遍不信任，形势很糟。克罗地亚省委不想同设在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因此决定让我去维也纳，看看身居我党领导岗位的是些什么人。我很快就回来了，我说服同志们，应当同南共中央建立联系，因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我是认识的，都是一些可靠的同志。

在斯洛文尼亚，我也觉察到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那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天，我被派到卢布尔雅那去筹组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我之前回国的一些同志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助长了这种不信任。

党的领导机关由于同党的组织没有联系，不可能了解国内的形势。因此就围绕形形色色的假设展开抽象的讨论，而这种假设跟国内的实际情况毫不相干。例如，一九三五年，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就当时南斯拉夫正准备举行的议会选举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当时的领导由于不了解国内的形势，当然就不可能对大选的筹备工作采取切合实际的态度。有几位政治局委员主张同所谓的联合反对派一起行动，另一些同志则主张南共独自行动，打出劳动人民党的旗号。联合反对派是由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马切克和拉迪奇的党、民主党、农夫党和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南共某些领导人想同这样一个联盟一起投入大选，但是领导这个联盟的马切克拒绝同南共在大选中进行任何合作。党的领导看到不可能同联合反对派采取联合行动，就向党员下达指示，

让他们投联合反对派的票。这样一项决定产生了很糟的后果。黑山和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的党组织拒绝接受让它们投联合反对派的票的指示。由于从身处国外的领导机关发来了自相矛盾的指示，南斯拉夫各地的党组织中出现了混乱。

这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极大不满，这一错误的政策和不擅于表明态度遭到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的尖锐批评。*

* 摘自《在贝尔格莱德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二十卷）。

第一次到共产国际

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 斯大林的路线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中央委员会决定让我去莫斯科，到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工作。这改变了原先要我去工会红色国际工作的决定。于是，在经过了十五年之后，我又到了俄国。这是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因为十月革命时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当年我途经列宁格勒。这次，我作为共产国际的干部被安排住在普希金广场附近高尔基大街上的“豪华”饭店里。我的办公地点在离红场不远的马霍瓦伊大街的共产国际总部。*

我一到，才明白是怎么一副局面。在共产国际里，给我的指示不是有关国内的工作，而是让我在皮克领导下的书记处里立即负责南斯拉夫……

当时在共产国际里的有经过莱比锡审讯之后来到俄国的季米特洛夫，有马努伊尔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在讨论一般问题时，我列席共产国际的会议，因为在讨论各国党的问题时，出席的只有

*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这些党的书记或代表。那时我发觉，对待我们的态度不大对头。其中必定有鬼。有一天，季米特洛夫问我：“瓦尔特，你说，你们那里到底有没有党组织？”我告诉他有。对此，他说，他得到的报告使他觉得在我们国内不存在党组织。原来，他们是通过在维也纳的领导来看待我们党的。而在维也纳，我们的领导人彼此相争，互相指责，说来叫人感到害臊。那时我对他说：“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不能根据维也纳的领导来判断我们党。在我们国内，在基层，存在党的组织，党员在尽其所能进行斗争，甚至牺牲了生命。我收到了报告，我知道这些人，他们是工人。但是，我得告诉你，我们国内的党组织对领导完全丧失了信任，因为他们认为，国外去人之后不久就有许多人被捕或者有的人一到国内就被捕，责任在于领导。国外去的人在警察面前表现很差，由于他们的缘故，一系列组织遭到破坏。由于种种这些情况，党组织对现在身居领导岗位的那些人丧失了信任，认为他们是内奸”。我的这番话使他大吃一惊，他感慨地摇了摇头。

不久，全体领导人都来到俄国，要解决南斯拉夫党的问题。来莫斯科的有：戈尔基奇、霍尔瓦廷（他立即被送到学院去了）、洛夫罗·库哈尔——“理查德”、乔皮奇以及由陶器工人德拉戈·佩特罗维奇和贝尔格莱德的一名五金工人组成的国内代表团。*

属于巴尔干国家书记处管辖的有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党。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进行领导，共产国际有好几个这样的按国家划分的书记处。问题先在这些书记处中讨论，然后再拿到共产国际会议上讨论。领导每一个书记处的是一名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巴尔干书记处的领导人是

* 摘自与《共产主义者》周报代表的谈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十二卷）。

威廉·皮克，我跟他很投机。我列席巴尔干书记处的会议，有两次讨论南斯拉夫问题时，我还列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我结识了许多著名领导人，例如：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奥托·库西宁、莫里斯·多列士、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何塞·迪亚斯等。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我有时去给列宁学校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的学员讲课，那里有一个班是培养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我们的共产党人在那里争吵得最厉害，当时的名声很坏。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及开始危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法西斯危险，使得全世界的进步力量，特别是各国共产党，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政治路线。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贡献，最初是通过在莱比锡审讯时的光辉表现，唤起人们警惕法西斯的危险，随后是通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在大会上力主工人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力主建立人民阵线。

我得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有优先权，因为是他们提出了人民阵线的问题，尔后这为共产国际所接受。我有机会从近处观察季米特洛夫的工作并目睹他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享有的威望。在巴尔干国家书记处和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了解了巴尔干各国共产党的状况。我了解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性质，了解为了克服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分裂，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问题在于要让以反法西斯为方针的力量组成的统一和强大的运动成为建立人民阵线的核心和支柱，作为团结和联合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同法西斯作斗争的一种形式。在整个这段时间里，

我仔细地留意代表大会的工作，我是作为南共代表团的成员和秘书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我特别记得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他的闭幕词，还记得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人、多列士以及其他法国共产党人的发言。法国共产党人当时是人民阵线主张的倡导者。这次代表大会开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的代表团经常开会并讨论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干部问题、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我国侨民的一些个人问题。代表团得到中央委员会这样的授权。代表团可以以南共的名义解决许多问题。

第七次代表大会给我留下特殊印象的有两件事，这两件事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共产国际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在共产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

首先，斯大林只露了一、两次面，坐在一根大理石柱子后面，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们称他为老板。当时是这么叫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共产国际执行机构的候选委员是如何选举产生的。我们党的代表团提名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而且是一致通过的。然而，几天以后，我们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弗拉迪米尔·乔皮奇要求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以便向我们通报，共产国际对我们提名的候选人不满意。乔皮奇说，这被认为是对戈尔基奇表示不信任——尽管戈尔基奇是投票赞成我的，被认为是对共产国际不信任，而共产国际对戈尔基奇是很信任的。会上决定，我们得改变这个决定，以便显示我们是一致的，瓦尔特，也即我，与戈尔基奇不存在任何矛盾。这个场面是令人难堪的，特别是对我来说，尽管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促成这样一个场面。

事情很清楚，共产国际里存在派别，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想使某个党内的这一方或那一方占据有利地位。这一次牵涉到戈尔基

奇，很可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马努伊尔斯基施加了影响，是他要求作这一变动的。我得说，这并非因为马努伊尔斯基有什么原因要反对我，我们后来熟悉了，相处甚笃。但是，当时我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在共产国际里没有什么声望。而当时共产国际对戈尔基奇却比较了解。

共产国际对我们党是有一定的看法的，这表现在我们的干部中没有一个人被选进共产国际的执委会。唯有戈尔基奇当选为候补委员。这实际上意味着南共在共产国际里站得并不很稳，而这是确凿的。那里的各种各样党的训练班、学校、大学里的学员之间的派系斗争肯定对此是有影响的。共产国际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一个很弱的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很可能是由于国内没有传来我们党正成功地展开活动的消息，尽管当时工人阶级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举行了规模越来越大的罢工，特别是在斯洛文尼亚，并且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民主运动。

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议会选举期间，人民自由阵线成功地展开了活动。罢工涉及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并扩展到南斯拉夫各地。共青团开始脱离宗派主义阶段，除了学生，越来越多地吸收其他阶层的青年，特别是工人青年参加。

对于我们以及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具有巨大的意义。这次代表大会大大改变了当时的政策，提出了新的斗争纲领。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执行得如何？向我们的运动提供的可能性利用得如何？我得说，这些可能性利用得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国内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立即回国投身于工作。即便后来有些代表回去了，也不能完整地理解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主张的重要意义，更谈不上本着这一精神

展开活动了。布拉戈耶·帕罗维奇是例外，代表大会一结束，他就回国，进行了一个月的工作，可惜，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南斯拉夫，因为那年年底，由于共产国际的干涉，也由于南共领导层当时的关系，他被排除出领导机构，再度被召回莫斯科。后来，他前往西班牙，在马德里牺牲了。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作出决定，让我也回到中央国内局工作。然而，这项决议未能贯彻执行，因为国内的组织遭到大破坏，共产党员遭到大逮捕，要我推迟回国。于是我就留在莫斯科。从一九三五年年底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国内逮捕了大约一千名共产党人。七十五个地方的大部分领导干部落到警方的手中。党的各个省委的几乎全体委员以及共青团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被捕了，党的特科被破坏。当局对我们运动的这次新进攻也延缓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在这一切情况中，最严重的是逮捕影响了南共中央的态度，南共中央当时设在维也纳。中央委员会中的关系尖锐化了，重新出现了小集团活动，甚至派别活动。党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时期的立场，重新出现了宗派活动等等，这清楚地表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真正意图未被理解。这特别表现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南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那时，共产国际再次进行了干预，废除了这次全会的决议并决定撤换南共领导。一九三六年八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对南共中央的工作进行了分析，还变动了领导班子。

征得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让我回国，在国内为在国内组成领导班子创造条件，由我接掌直接领导，并对国内党的工作负责。关于一部分领导转回国内的决定是我党最

优秀的干部的一项重大胜利，很早以前他们就提出过这个要求，他们一贯致力于彻底摆脱宗派活动，主张加强南共的团结和使南共独立。当然，回国的只是一部分人，我作为组织书记，在党的工作最多，我回国了，而政治书记戈尔基奇和两名委员则留在巴黎，从国外进行领导。

当然，我们致力于制订南斯拉夫革命工人运动自己的政治战略。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着手采取某些实际步骤。我们感觉到，要把党建成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新的战略策略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采取实际步骤。我明白：第一，我们必须让整个中央委员会从国外回来；第二，我们必须摆脱共产国际的庇护，必须不再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个控制一切的共产主义中心的指示并加以贯彻执行；第三，我们必须摆脱外界的金钱上的资助。在这一点上，我得到季米特洛夫的谅解。当然，要是我去问斯大林的话，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想用不多一点钱把我们套住。

我确信，领导必须同党员和劳动群众保持直接接触。因此，我公开地说，我们不再需要津贴，我们党自己会操心这件事，也即我们在国内可以得到金钱方面的支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使一个运动情绪低落的莫过于从外界得到钱。这样的援助只会使干部堕落，更不用说使干部依赖于给钱的一方了。

你们看，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后来从来不成问题。我们有钱来从事我们需要从事的事情，用来出版报刊。我们从前得到的钱是产生派别活动的原因之一，因为钱在上层分掉了，没有用于出版活动，没有用于出版我们的书籍，而是用于支付工资，而工资又相当高。我还记得，我进入中央委员会后，我的工资相当高，我以前当工人时从来没有拿过这样高的工资。如果以此作为标准

来衡量的话，身居国外，又拿高工资就划得来了，同时又不冒被警察卡住脖子的风险。

但是，我们坚决停止了接受外界的援助，终于让党的领导回到了国内。我们让党的领导回到党员、工人和青年中去，去参加他们的斗争，了解他们的愿望。我认为，走这一步是完全走对了。我们不仅以此来表示抵制从国外进行公式化的领导，反对教条和宗派主义的方法，而且我们使南共面向实际生活问题，面向本国各族人民和本国工人阶级。我认为，在当时，这是南共健康的核心作出的关键性决定之一，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斯大林的路线在共产国际中很快占了上风。国际无产阶级的这个领导机构变成了苏联政策的辅助机关。

事实上，自三十年代起，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就存在宗派主义的成分，这对各国共产党，也包括对我们党的工作和政策起了消极作用，特别是对侨居国外的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个别政治文件起了消极作用。这些文件往往是一些抽象的宣言，与实际状况毫不相干，因此不可能起到动员作用，不可能指导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当时已经看清楚，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能从外面，从一个总的中心来指挥。这实际上是我们同斯大林的冲突的开始，应该这么来看待。因为我们当时就致力于使我们的党独立，实际上进行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而且不仅是在国际上，也是在自身的队伍中进行这样的斗争。*

*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处于党的领导岗位上

返 回 国 内

我是在一九三六年深秋自苏联回国的，此前，我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会上提出并解决了撤换旧的领导和组成新的领导的问题。同时，我提出了一项建议：如果我们想取得成绩的话，南共政治局不应再呆在国外，而应在国内。主持这次会议的季米特洛夫赞成我的建议，但是其他成员，马努伊尔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反对全部接受这一建议。建议只是部分地被采纳，也即政治局的一半成员在国内，而以政治书记戈尔基奇为首的另一半留在国外。我当选为我们党的组织书记，我可以在国内工作。

我经过波兰先到了布拉格。一路上没有冒什么风险，因为我很容易就到了那里。在布拉格，我首先得清算老的领导，把工作得很好的一些同志派到西班牙去，而把另一些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来，我前往维也纳，在那里逗留了一个短时期，一九三七年春我来到萨格勒布。

在萨格勒布，当时我的接头人通常是斯特凡·加洛加扎。通过加洛加扎，我跟萨格勒布的同志们，跟拉德·康查尔^①和其他

^① 拉德·康查尔（一九一一—一九四二年），南共著名活动家。一九三四年加入南共。一九三六年由于从事工人运动而被捕，被判一年徒刑。

一些人接上了头，而通过他们，又跟贝尔格莱德的同志们接上了头。在那里，我认为可以依靠的第一批同志中，在贝尔格莱德的有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共青团书记洛拉·里巴尔，而在萨格勒布，则有拉德·康查尔。我还跟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同志们接上了头。我记不起来，跟我接上头的斯洛文尼亚的头一批同志是哪些人……卡德尔同志当时还在国外。

特别重要的是，在最初一个时期，领导要在萨格勒布，因为萨格勒布比起贝尔格莱德来是警察难于打进共产党人队伍的一个中心，贝尔格莱德有能干的警察，他们懂得派内奸打进共产党人的行列，因此，早在一九二八年，在我们党内就发现了由贝尔格莱德警方派进来的一系列人。我之所以呆在萨格勒布，还由于在那里我可以安全无虞，因为我了解那里的人，他们对我是无条件忠诚的，我可以化装后秘密地走动。这使我可以比在南斯拉夫任何一个地方更加有效得多地工作。

关于整顿党，把形形色色的分子清除出党的问题，当然，我不可能都在萨格勒布解决。这项工作，我主要是在巴黎进行的，因为我在萨格勒布呆很短的时间，立即往回走，到国外去，到巴黎去。我主要是在巴黎跟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工作。在巴黎，我可以更多地从事考察出狱的人的工作，从事清除形形色色的内奸和派别分子的工作，我在去巴黎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兰科维奇^①、洛拉·里巴尔、拉德·康查尔、约西普·克拉

一九三九年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一九四〇年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克罗地亚组织首批游击队。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被法西斯占领当局杀害。荣获人民英雄称号。——译者

①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马尔科（一九〇九—一九八三年）。一九二八年加入南共，曾任南共青年团塞尔维亚省委书记，一九三七年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三年后历任南共中央组织书记、最高统帅

什、弗朗茨·莱斯科舍克等人，有一系列同志可以根据我的指示继续在国内做工作。我经常在国外，我多次从萨格勒布去巴黎，又从巴黎返回南斯拉夫。一九三七年，我三次返回南斯拉夫，随后又离开。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同样如此。我可以说，从一九三七年起，自从我们开始对党加以清理，自从我们开始在工人中间展开有力的宣传，很快就显示了明显的成绩。*

我采取另一种策略

一九三六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工作。我的任务是先去维也纳，然后回国，在国内领导党的工作，同时由我在新领导中负主要责任。

在维也纳，在原来的领导机构中只剩下了：塞尼科〔弗拉迪米尔·乔皮奇〕、安德烈〔斯捷潘·茨维伊奇〕和穆克。在我抵达维也纳之前，其他成员都被警察逮捕了：奥斯卡〔卡尔·胡多马利〕、瓦利奇〔沃朗茨·普雷日霍夫〕、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比斯特里〔斯尔贾·普里察〕、马鲁希奇、共青团书记多布里奇〔鲍里斯·基德里奇〕以及共青团中央委员弗拉达〔卡尔·卢特尔〕。根据共产国际给我的指示，我解除了塞尼科和安德烈的职务，派他

部成员。解放后历任内务部长、副总理、副总统等职，并在历次党代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一九六六年七月，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和南斯拉夫议会决定，因其“滥用保安部门，妨碍发扬社会主义直接自治民主”而将其开除出南共中央和南共联盟并解除其全部公职。检察部门曾提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为铁托所撤销。——译者

* 摘自对战前地下工作的回忆(《言论集》、萨格勒布，一九五九年版，第八卷)。

们去布拉格。

过了将近一个月，戈尔基奇到了，他向我们宣布已任命了以他为首的新领导：戈尔基奇、瓦尔特[铁托]、罗任科[罗·乔拉科维奇]、里赫特[斯·茹约维奇]^①，而在国内则有斯洛文尼亚工会领导人莱斯科舍克同志。戈尔基奇说，他自己被任命为书记，享有否决权。我表示同意，但是我感到奇怪和不理解的是，他怎么享有否决权？

根据戈尔基奇的指示，十二月初，我短期回国，任务是准备动员志愿人员去西班牙，并消除与斯洛文尼亚同志们的冲突。

斯洛文尼亚有省的领导，许多地方存在党组织，但是斯洛文尼亚的同志们中断了与南共中央的联系，原因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奥斯卡的错误，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奥斯卡作为中央组织书记把联络员一位十六岁的姑娘叫到维也纳去，回国时她在边界被捕了，由于害怕，她全招认了。在她身上搜出了有关青年合法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指示。为此，党和青年团的一系列同志被捕了。合法的青年报纸《青年信使报》也遭查封。

这件事使得斯洛文尼亚的同志们十分愤怒。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不健康分子利用了这种情绪，来反对中央和党，要求斯洛文尼亚共产党脱离南共。

我抵达斯洛文尼亚后，即与领导人开会，在这次会议上彻底消除了冲突。我向同志们谈了，他们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不

① 斯雷滕·茹约维奇—茨尔尼(一八九九—一九七六年)，一九二二年加入南共，至一九三七年任历届南共中央委员。一九四一年参加南人民解放斗争，为塞尔维亚游击队总司令部司令，最高统帅部成员。解放后任联邦政府财长、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八年因赞成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而被解职。后曾任南经济研究所所长、《战斗报》新闻出版社经理。——译者

对。

在萨格勒布，我发现警察把党的组织和领导彻底搞垮了。

我没有象以往那样下决心重新建立新的领导，而是决定等等，等把警察可以利用来找到新领导的线索全部中断之后再说。尽管我有可能建立新的省委，我还是采用了另一种策略：我为每一个部门规定了合法的工作形式，指定一位或几位同志充当这项工作的领导人，而他们必须同我保持直接联系。例如，我为工会指定了工会委员会，在工人党里指定了一个发起委员会。

我完成了在萨格勒布的工作之后，前往达尔马提亚。在达尔马提亚，我同丘利奇和特雷乌尔西奇同志接上了头。从达尔马提亚我直接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我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抵达布拉格的。我向戈尔基奇汇报了工作完成的情况。

八天之后，我肩负着领导党的工作的任务回国。我得筹备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三月份，我又被叫到巴黎汇报情况。我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我曾被派到维也纳和布拉格，去整顿特科。完成这项工作后，我又到了巴黎，作了汇报，我又回国，在国内一直呆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三七年，我在国内总共呆了七个月。

在巴黎的情况

我没有把任何人遴选进政治局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接到通知，让我火速前往巴黎。在那里，我获悉，戈尔基奇被紧急召回共产国际，由我担任党的书记的职务。当时在巴黎的全体同志都表同意。戈尔基奇离开巴黎时，他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罗任科[罗·乔拉科维奇]同志。罗任科同志开始时担任组织书记的职务。后来，戈尔基奇指定里赫特[斯·茹约维奇]为组织书记，而罗任科任《无产者报》的主编，同时又是戈尔基奇的助手。至于我，我负责国内的工作。戈尔基奇把工作交给了罗任科，说他对罗任科最信任。开始时，我有点动摇，是否接掌这一负责职务，但是，当我看到，许多同志对罗任科不信任，而且罗任科本人也建议我接任这一职务，于是我就担负起这一职务。

在巴黎，除了中央委员罗任科和里赫特之外，还有以下同志：佩特罗夫[伊万·克尔恩德利]，他是侨民报纸《移民信使报》的主编。^①此外，还有获释后从维也纳来到巴黎的一些同志：南

① 此处原文似有脱漏。——译者

共中央委员瓦利奇、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南共中央委员日列扎尔、南共中央委员奥斯卡、共青团中央委员弗拉多。除了这些同志外，还有比斯特里[斯尔贾·普里察]同志、中央打字员伊冯[哈布林]同志以及掌管我们在巴黎的书店的弗拉多[日沃因·帕夫洛维奇]同志。

我要求在巴黎的其他同志严守纪律，等待共产国际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已经知道戈尔基奇被捕了。

我没有把任何人遴选进政治局，因为我知道，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没有权利这么做，但是有必要的话，我总是邀请其他同志列席领导机构的会议。

罗任科严守纪律，但是他难于忍受我对他的不信任。里赫特一直是严守纪律的，佩特罗夫也是如此，但是对我帮助最大的是瓦利奇，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工作。多布里奇[鲍·基德里奇]同样严守纪律。

一九三七年秋天，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没有等共产国际回复，就把罗任科派回国工作。待我接到回复，说不能把罗任科派回国，我又立即把他从国内召回，他在国内只待了十四天。

在财务问题上，需要有所行动，因为自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起，我们就没有从共产国际得到任何资助。我于一九三七年秋天给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我们的同志们写了呼吁信，呼请他们组织对我们党的支援。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曾几次收到那里寄来的两百至二百五十美元，但是这一切实在太少了。在巴黎，连我自己都无法维持生活。

我跟巴黎的同志们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取消领导机构。我自己承担了这件事的全部责任，我动身回国，以便在共产国际解决我们的问题之前组织起一个临时领导班子。

我在国内逗留了两个半月，应共产国际之召我才离开国内。在这两个半月时间内，我做了以下工作：

我是在联合工人工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个月到达的。我跟工会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准备了我们的同志们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我们的整个策略和路线。四月二十日^①，我参加了斯洛文尼亚的党代表大会。我改组了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因为有两名中央委员——戈罗娃和格雷戈里奇——被捕了。我跟工人党发起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筹备了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六月十六日举行。^② 我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同志们一起准备恢复那里的党组织和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于七月份举行。我曾前往塞尔维亚，与同志们商谈我们对付德拉戈柳布·约万诺维奇和联合反对派的分立主义活动的路线和策略。我组织了与一些同志、斯洛文尼亚的几名中央委员、克罗地亚的几名中央委员、塞尔维亚党的领导中的两名成员的会议。我从这三个地方的领导机构中，组成了应付日常问题的临时领导。

尽管国内存在种种困难，我们党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而是在于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表现出了巨大的自我首倡精神。我对同志们说，不要每一件小事都等待中央作出指示，他们必须自己大胆地去解决各种问题，尽管在这么做的时候，有时候会犯错误。*

① 应为四月十七日。——原注

② 这次代表会议是在一个月之前举行的。——原注

* 摘自瓦尔特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致南共的报告(《选集》，第四卷)。

改组与巩固党

人人互不信任

我第二次回国[一九三六年底]要完成的任务大体上有如下几项：

- ① 征求负责领导工作的党的积极分子的意见，即召开全国会议，讨论改组党组织的问题以及按照我们发给你们的建议的精神和本着我们党一月决议和宣言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工作的可能性；
- ② 消除和纠正斯洛文尼亚党组织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不正常态度；
- ③ 调查青年组织的状况，并尽可能地在国内建立青年的领导机构；
- ④ 尽可能地调查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工作情况和工作，至少是调查三个主要省的情况和工作；

⑤ 帮助和监督“出国旅游”[志愿人员去西班牙]。

尽管我在国内不是象最初预料的那样呆一个月，而是呆了整整三个月，但是，我仍未完全按照我回国前的设想全部完成任务。我要马上提醒一下，“旅游”^①花去了我许多时间。恰巧在这时，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随着特科主要负责人的被捕，萨格勒布党组织也逐渐地遭到了破坏，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即直到今年三月才结束，除省委垮了而外，整个地方委员会和两个区委也垮了。由于不仅在萨格勒布，而且也在贝尔格莱德，某些具有合法身份的积极分子通过党的非法机构而使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我们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也就是说，普遍相互不信任，特别是对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信任，有埋怨情绪，许多党员，尤其是斯洛文尼亚以及萨格勒布等地的党员认为，中央委员会要对党组织遭到破坏承担主要罪责。而某些不健康分子又助长了这样一种趋势，他们在我们党内几乎在所有比较大的地方都有，这些人通常是些进行政治投机的知识分子。在斯洛文尼亚，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达尔马提亚的一些党员，在他们还不了解我是干什么的时候，竟然把我本人看成是内奸。甚至一些同我有私交的非常有名的和杰出的同志断言我是个信得过的人，居然在此之后，还不相信我。自然，这种情况是由那些不健康分子制造的某种倾向造成的，这些人在我们党内开始搞阴谋，因而害怕监督，害怕追查。

由于存在这样的情况和缺少特科机关，以及由于上述种种原

① “旅游”是指派遣去西班牙的志愿人员。——原注

因，我没有（除斯洛文尼亚外）能召开有组织的会议，而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请来一至三个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我总共同全国各地担负领导工作的大约三十名积极分子谈了话。

在斯洛文尼亚的工作

消除一切分歧

我一到斯洛文尼亚，就立即同斯洛文尼亚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去斯洛文尼亚，首先是为了组织“旅游”[派遣志愿人员去西班牙]为因，到那时他们在这方面尚未做任何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得相当艰难，相当慢。最后，我怕整个事情告吹，决定自己负起全部责任来，亲自召开了会议，会议进行得很好。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和我们的新政治局委员。

我过去在同斯洛文尼亚的个别同志交谈中就已发现，他们自己已开始认识到，他们走错了路，在这次会议上，这一点尤为明显，他们在会上拒绝为卡塔琳娜[玛丽娅·维尔芳]写给共产国际的信承担责任，因为他们说，他们既没有写这封信，也没有怂恿写这封信。我具体问他们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犯了什么错误？他们对这个问题能够作出的全部回答是：①中央委员会对斯洛文尼亚党组织的最近遭破坏负有责任，因为一位中央委员(奥斯卡)[卡尔洛·胡多马利]把一位少女叫到维也纳，叫到他身边去，而这位少女在回来的路上被捕了，于是把她知道的情况全都说出来了，在她身上搜出了合法和

非法的材料，此后党组织的合法工作也遭到了破坏；②中央委员会派来传达指示的各种各样的特派员对党的决议或共产国际七大的路线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因此，在党的干部和青年当中引起了混乱。斯洛文尼亚的同志主要是对奥斯卡、弗拉多和弗朗策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我问他们是否了解：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最困难的日子里，正是中央委员会在各个方面给了斯洛文尼亚党的组织以最大的帮助，他们在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时承认对此有所了解，但是只是对一九三六年的工作方法有意见。我向他们解释了卡塔琳娜那封反党信的意图以及那封信在共产国际造成的恶劣印象，他们感到很不是滋味，说他们与此信无关。

我向他们扼要地说明了新决议和宣言的内容、我们在组织方面的建议、领导方式以及关于党的领导机构今后将设在国内的决定，他们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举双手欢迎。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希望尽快消除这种令人不快的局面，尽快在他们同南共中央委员会之间建立起正常的关系。他们表明，他们认为一切分歧都已消除，今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自然，我毫不迟疑地作了自我批评，谈到了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以及中央委员会对其成员的行动所负的责任。

平民阵线。平民阵线的领导班子由四人组成，其中两人是我们的人。在盟友当中，库科瓦茨特别受到大家的赞扬，都说他不仅聪明，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如此，而大家说隆查尔高傲自大，有想当领袖的强烈欲望。平民阵线的工作是，在小地方和农村不断召开各种各样的追随者会议，这种会大多是在星期日和节假日举行的。我们通常从大学生和知识界把支持我们的人派去参加这些会议，作报告，因为盟友没有这样的人。支持平民阵线的人不断增多。从科罗舍茨的党(现在叫南斯拉夫激进会)加入平民

阵线的人尤其多，因为大部分人不同意科罗舍茨的政策，特别是不同意当局在斯洛文尼亚最近的市镇选举时所采用的方法。

在此期间平民阵线的机关报《大地》仍未出版，但是他们答应在一个月之内复刊。马里博尔出版了人民阵线的机关报……[《独立报》]，为资助该报出版，找到了某位赞助者，捐给了该报六万第纳尔。

在克罗地亚运动的领导机构和斯洛文尼亚平民阵线的领导机构之间关系不是太好。马切克周围的反革命领导人，也许还有马切克本人，不希望斯洛文尼亚存在某个独立的平民阵线，而希望出现一个将成为马切克的运动的组成部分的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平民阵线，因为工人阶级是作为平等的政治因素参加这个阵线的。同志们说，萨格勒布印了大约一万张准备在斯洛文尼亚散发的传单，其中对共产党人作了最激烈的攻击。斯洛文尼亚人把大部分传单都销毁了，并回答说，在斯洛文尼亚没有工人，就没有平民阵线，因为没有工人，平民阵线就毫无意义了。但是，马切克运动的领导这时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他们把自己的代表派到斯洛文尼亚的农村去，派到贝拉克拉伊纳和梅久穆尔耶去，在那里企图避开平民阵线建立自己的单独的组织。但是，斯洛文尼亚平民阵线将予以抵制，因为斯洛文尼亚跟克罗地亚一样，有自己民族和文化的需要；斯洛文尼亚同样必须把本民族所有民主力量组成一个阵线，为争取斯洛文尼亚的民族解放，为争取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民主和权利而斗争。虽然如此，斯洛文尼亚平民阵线仍希望在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作为代表斯洛文尼亚全体人民利益的一个平等的政治力量同克罗地亚运动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斯洛文尼亚的工会运动搞得相当不错。特别是在去年罢工取

得胜利后，工人对工会组织的兴趣增大了，阶级工会的影响增大了，这一点在今年选举工人代表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几乎在各地我们的人都当选了。斯洛文尼亚在行动上的一致颇为牢固。斯洛文尼亚全国一致行动委员会仍然存在并在活动。例如，在耶塞尼察，一月份工人和厂方发生了争端，原因是厂方想往劳资合同中加一条，即一旦发生罢工，劳资合同不再有效。在这个工会里有三个工会组织的会员，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我们的会员，但是我们的人还是决定这么办：召开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由我们的组织领导，再召开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由另一个组织领导，召开第三次全体职工大会，由第三个组织领导，但是每次职工大会所有工会组织的会员和负责人都出席。

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仍始终对以下事实耿耿于怀，即我们的一些同志在群众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威信。例如，他们想强行把L[莱斯科舍克]开除出社会民主党。他们想开除他是因为他不服从纪律。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从贝尔格莱德向各地方组织散发了一份传单，传单激烈攻击共产党人，要求身为主席的[莱斯科舍克]在这份传单上签字，但是他拒绝了，因此他们对他恨得要死。

可见，从我得到的上述情报中可以看出，斯洛文尼亚的情况毕竟还是最好的。党组织是完整的，同地方保持着联系，省委完好无损等等。在他们那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仍然相当模糊，例如，把统一工人党同平民阵线混为一谈，反之亦然。应当帮助他们，我相信，到他们那里去的同志会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至于说为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建立举行盛大“婚礼”[代表大会]的事，我当时就同他们商量好了：在两个月内举行，但是我认为，必须审慎行事，以免出漏子，因为对党和中央委员会的信

任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恢复，即避免因中央委员会或者个别中央委员的罪责而可能出大漏子。人们有理由指望我们使安全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特别是就方针而言就更是如此了。不过，他们说，他们知道，就是从事合法活动，也可能被捕，但是，他们说，如果不能证明他们同党的某个非法机构有联系，那么他们在警察局，在法庭上的表现就会是另一副样子。*

* 摘自铁托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报告(《选集》，第三卷)。

青年问题

必须进行改组

我为了“旅游”[派遣志愿人员去西班牙]事宜第一次在国内逗留时就已注意到青年当中存在相当大的混乱。我第二次去国内时给我的任务是研究青年问题，可能的话，加以整顿。人们纷纷抱怨，特别是就萨格勒布的青年组织而言，说在改组青年组织的过程中产生了混乱，谁也不再听谁的。菲利普[斯特凡·米特罗维奇]在改组工作刚刚开始时就被捕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上述情况的产生，但是，据我听到的情况，菲利普也操之过急了。他们解散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解散之后，这些被解散的青年人不知干什么，如何干。

萨格勒布解散了共青团地方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把拥护党的人吸收入党了，而其余的青年则任其自流，纪律十分松弛。有的人说，“我再也不听别人的话了”，“干吗要让那些自封的人命令我干点什么？”等等。对那些已被吸收入党的青年采取了如下办法：例如，在医学院，青年党员选举了三名党员作为支部委员，这样做是对的，可是，其余的青年党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有让他们分头参加某个群众组织。

的确，改组的工作必须进行，应当进行，但是为此需要作好各种准备，也即应当知道，我们的这些青年将在什么地方找到工作。克罗地亚农 民党在萨格勒布大学里也许有二十名左右成员。他们对团结青年毫未表现出任何主动性。教权主义者和弗兰克分子则在农村和城市拉拢青年。遗憾的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指出，左翼青年的大多数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而大多数青年农民和青年工人尚未被争取过来。

我们同莱奥·马特斯和伊沃·洛拉·里巴尔商定：青年的合法领导由领导各群众组织的，无论是大学的，还是其他地方的群众组织的青年组成。《青年之声》仍然是指导克罗地亚青年的报纸，在各地建立《青年之声》分支机构，它将同时是有关地方的青年运动的领导机构。

为了消除教权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影响，应当努力在所有的乡村和地方建立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的青年组织，而且这应当成为我们的青年同志工作的主要场所。

由于在贝尔格莱德，在大学里建立了反法西斯青年阵线（根据共同行动纲领，加入这一阵线的有两千多名青年，有左派人士、民主人士、农夫党人和激进党人，等等），因此，我们在萨格勒布也达成了协议：同所有民主青年组织也建立这样一个团体。

由于我在萨格勒布建立了青年学生的合法领导机构，我还建立了完全合法地进行工作的临时中央领导机构，参加这个机构的有：莱奥·马特斯、伊沃·洛拉·里巴尔和鲍里斯·克拉伊格尔。斯洛文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应当各自确定派一人参加。我下达了明确的工作指示，同莱奥·马特斯和伊沃·洛拉·里巴尔就避免进行任何非法的工作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 摘自铁托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报告（《选集》，第三卷）。

萨格勒布党组织的情况

人们没有睡大觉，而是在干工作

我发现萨格勒布党组织的情况很糟。上面我已提到，恰恰此时萨格勒布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尽管党的基层组织几乎大部分仍然是完好的，因为警察只破坏了省委、地方委员会和第二区委的领导机构，但是，为了谨慎起见，我仍不想建立新的委员会，因为弄不清，谁是警察留下来的“种子”，其次，因为我认为，这次应当在挑选和考验干部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地进行这项工作。

我在萨格勒布总共同大约十四名积极分子谈了话。这些人的情绪非常坏，特别是在十一月那次组织遭到破坏之后，发起委员会的有合法身份的人也牵连进去了。人们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动摇；有人指责说，具有合法身份的和非法身份的积极分子的命运全都掌握在几个不成熟的，未经过考验的“学生”手中。我有机会同来自帕克拉茨的一位党员同志谈话，他非常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们那里的工作情况。他们有地委，但是他们把全部工作都置于合法的基础上。他们不仅在地方上有统一工人的委员会，而且在乡村也有。他们同拉迪奇分子一起参加选举。在

区政府里有三个我们的同志，他们在区里和在选民当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们通过区得到了现金帮助，建立工人图书馆。他们在工会里的工作作得很好。一句话，人们没有睡大觉，而是在干工作。他们自觉地和尽力地工作，但是我得提一提，我对他们对各种问题的正确理解简直感到惊讶，尽管他们手头并没有任何指示；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比在大城市的那些人要正确，正确得多，而大城市里的人高谈阔论，没有多大用处。

工会的情况要好得多。之所以要好，是因为工会里确实有一批人多多少少在独立地工作。克罗地亚的工会组织又发展起来了。那股转入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的带有威胁性的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在工人们已加入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的许多地方，他们对克罗地亚工人工会领袖的工会政策感到失望，于是回过头来参加自己的阶级组织，或者违背领导的意愿，同统一工人工会的工人合作。特别是在“蒂瓦尔”电车制造厂的工人当中，以及其他大企业选举工人代表时，对克罗地亚工人工会领导的工会政策的不满表现得尤为强烈。萨格勒布的电车工人曾向克罗地亚工人工会及其领导建议，在选举中共同行动，但是他们对此连听都不想听；于是我们的人单独提出了一份名单，这是出于以下考虑：这份名单可以争取所有的工人以及那些可能既不投票支持克罗地亚工人工会，也不投票支持统一工人工会的人。如果考虑到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的宣传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威胁，因为这是市里的企业，那么，这确实是很大的胜利，因为我们只差两票就得到了半数的票。

根据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说，估计工会今年夏天要举行较大规模的罢工。他们的想法是，有可能动员十二万多工人参加罢工，也就是说，不是零零星星地罢工，而是采取比较大规模的行动，

因此，需要外来的物质援助，因为国内不可能筹集足以使这样一次大规模的罢工取得成功的大量资金。自然，我没有向他们作任何许诺，而是向他们建议，现在就为全国范围的联合行动进行准备，并确保这一行动取得成功，并借此机会利用向他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而去年的斗争和相互声援的例子部分地表明，是有这样的可能的。只是这次需要组织得更好并且扩大到全国。选举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央行动委员会。为此我们已商量好：在复活节举行一次来自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卢布尔雅那以及斯普利特的领导人的小型会议，就各种问题，例如工会内部的关系取得一致意见。

萨格勒布的文化工作

我最喜欢斯特万·加洛加日

萨格勒布有一个教育委员会，围绕这个委员会有文学和知识界的大约五十个各方面的青年。到现在为止他们尚未有组织地进行工作。我得到了他们送来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对我们党，即党的领导根本不关心这个领域的工作，不向这个领域的工作提供物质援助等等表示不满。在这份报告中，他们简要地阐述了应当如何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的意见，后来我们就此具体地进行了商谈。他们建议：①根据工作门类多的需要扩大这个委员会（委员会现总共有四人）；②明确规定各个委员负责各项工作的职责。这些工作是：

出版书报和杂志：1) 政论文章；2) 纯文学作品；3) 经济文章和作品；4) 各种专业性的文章和作品。

团结各种自由职业者：1) 建筑师；2) 医师；3) 律师等等。

该委员会迄今为止主要是出版各种小册子和书籍。最近定期出版反法西斯报纸《世界大事》。他们需要物质上的援助，以便能出版一份文学杂志，这样通过这份杂志可以团结青年作家，要不

然，这些青年作家就会在教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作品。此外，他们要求，保证使他们能定期从国外得到最新和现实性最强的作品，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即把这些作品翻译出来，由自己的出版企业“新书”出版社出版。

《农民思想报》也是在他们的控制下出版的，而出版这份报纸的是一些年轻的拉迪奇分子，他们曾同我们的人一起坐过牢，例如鲁普契奇、弗朗内基奇等等。这确实是一份极好的农民报纸，但也是一份反法西斯的报纸，在农村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份报纸。

我还找一个人谈了话。在我向他说明了我们改组整个工作和领导机构的原因之后，他同意进行合作，可是在他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一种老毛病：不管你问到谁，他都说不行。

我最喜欢斯特万·加洛加日，虽然他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我听说他工作很积极，尤其是要出版什么小册子，或者什么书时，他更是办事机灵。他出版了曼[奥古斯特·采萨雷茨]写的书，总共有六千册，他得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印张一印张地把印好的书偷走，然后换个地方装订。警察局气急败坏，这本书竟在萨格勒布到处出现。

不要怕承担责任

凡是听取我阐明这次改组的实质和领导机构体制的人都同意这么做。大家都认为，这在今天的情况下确实是最好的办法。我注意到，这个消息对他们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人们又开始有信心了。由于这一消息在萨格勒布，在我们的干部当中相当广泛地流传开了，因此我听到了各方面的反响。

我同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三位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是米洛万·吉拉斯、久罗·斯特鲁加尔以及武基察·米特罗维奇。我最先见到米·吉拉斯，他告诉了我几个情况，从这些情况中我无法对他们的工作得出某种印象深刻的概貌，这也许是因为那里恰恰没有开展什么特别的活动因而工作也就没有做出成绩的缘故吧。

有过一个发起委员会，但是人员不全，因为有些人被捕了，例如，泽姆里奇[米尔科·托米奇]，而帕夫莱·帕夫洛维奇则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什么也不愿干。

吉拉斯建议，吸收年轻人参加委员会，因为工作要取得更大的成效，就需要新生力量，年轻人腿脚勤。他说，要出版什么政治性杂志，绝对不可能，因为他说，书报检查机构甚至把民主党派的报纸《回声报》也给查禁了。我们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出版一份杂志，因为这毕竟容易通过些。

人民阵线的工作进展缓慢。我们的人同日夫科·托帕洛维奇的接触中断了，他们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托帕洛维奇的行动，即吸收工人参加民主的反对派，即联合反对派。他们反对日夫科在联合反对派中代表联合劳动人民党，“因为他想戏弄我们”。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立即同日夫科和其他同志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谈判，一月声明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我还在国内时就得到消息说，谈判已重新开始。

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患有一种不可治愈的通病，这在塞尔维亚的同志们身上尤为明显，这就是，他们总是断言，社会党人“确实一点不起作用，因此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发现，我们的同志只是出于纪律性才迫不得已去接近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出于信念，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米洛万·吉拉斯同志对不遵守纪律的情况感到十分恼火，不

守纪律给工作造成许多损失。他要求严厉惩处那些不守纪律的人，以便树立担任负责职务的人的威信。总的来说大家都对威信这个问题感到头痛。

关于改组的方案，三个人都认为非常好。他们说，应当立即把合法工作同地下工作分开。米洛万·吉拉斯要求，党的下级组织不得发号施令，而是仅对执行党的路线进行监督。为此领导工作和指示应由固定的人口头传达。

久罗·斯特鲁加尔和武基察·米特罗维奇实际上在此期间领导党的工作。无论是省委，还是地方委员会人员都不全，省委和地方委员会都各自只有两位同志，但是合法工作仍在进行。因为人们是独自进行工作的。我的态度跟在萨格勒布一样，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建立省委和地方委员会。

我同达尔马提亚的省委书记谈过几次，那里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最好的。那里对待领导的态度也是最好的。省委的人员齐备，同自己在达尔马提亚的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

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 和克罗地亚共产党

我们明白，我们将达到目的

我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谈过召开克罗地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事。今天我愿意也许稍为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们知道，那时是非常困难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民族仇恨日益严重。拉迪奇分子开始同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称兄道弟，于是，自然在农民群众的队伍里出现了波动，他们丧失了对领导的信任。但是，同时，在议会里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不幸事件，拉迪奇以及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某些领导人被打死。

事后，群情激愤，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特别是克罗地亚农民和塞尔维亚农民之间的冲突和仇恨进一步加剧了。共产党那时刚刚开始恢复和发展。但是，党仍然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声。一九二八年，共产党员的鲜血洒在萨格勒布的大街上。工人阶级并不强大，而且迷失了方向。在工会里，在统一工人工会和各个独立工会之间也普遍出现了分裂。实际上，南斯拉夫在政治上分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共产党尽管当时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大屠杀，遭到

亚历山大国王的以及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者的大屠杀，还是存在下来了，而且得到了加强。

我们那时就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的问题开始进行磋商，因为情况表明，如果共产党忽视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工作，那么它也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在我出狱后，我们在维也纳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我们深信，是该我们有所作为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使党接近工农群众，我们必须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为了确保取得这种团结，我们决定参加统一工人工会取消独立工会，尽可能地壮大党的队伍。我们很清楚，只有我们正确地处理好民族问题，我们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在维也纳，我们商定：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代表会议作出了决定：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为此，我亲自在中央委员会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你们看，我们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这就是在那些关系重大的日子里我们所做工作的结果。*

一九三七年，实现了关于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范围内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的决定，这一决定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就作出了。这一决定是在多年的派别斗争，特别是党的领导机构中的派别斗争已告消除，以及南共相当迅速地不断巩固的时候实现的。党不断巩固使我们党在即将发生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全国关系重大的事件中能够起革命先锋队的作用。党之所以不断巩固是因为从党的组织中清除了派别分子、奸细、动摇分子以及一切可疑分子。曾使党组织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党组织的团

* 摘自庆祝克罗地亚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讲话（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战斗报》）。

结遭到破坏，工人阶级同其先锋队的联系被切断的思想上的混乱消除了。我没有必要特别强调指出把党的领导机构迁回国同基层组织建立直接联系以及在党员的队伍中恢复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遭到破坏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了，并不断壮大，而且建立了新的组织。与此同时，党展开了有力的政治活动，揭露反动政权的内外政策，利用当时关系到工人阶级以及各民族和社会上受压迫的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的问题，把所有进步力量动员起来。

克罗地亚共产党、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以及稍后，马其顿共产党的建立是南共在民族问题上执行正确路线的必然产物。

当时我们很清楚，南共能否完全巩固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党能否尽快地建立，如果我们想使党不仅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还要领导各族人民争取实现民族平等的斗争并尽量获得各族人民群众的信任的话。

因此，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民族方面的，因为，要不是这样的话，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在群众中产生什么较大的影响。群众受到各种民族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蛊惑人心的宣传的影响，这些政党利用所谓争取实现民族平等的斗争来同贝尔格莱德的霸权主义政权讨价还价。

第二，这几个共产党的建立使得更迅速地培养和教育民族干部的工作得以进行，民族干部更了解本民族的特殊情况和问题，更了解本民族的人的心理。

第三，在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特别是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情况表明，由一个中心是不可能成功地进行领导的，需要各地的领导尽可能地独立行事。这在国家被占领时期，在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有好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情况很快就表明，这一决定是多么正确，多么有道理。党的组织表现出了很高的革命热情，而且不断壮大。根据在反对当局的残酷恐怖统治和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到那时为止所显示的英雄业绩来看，克罗地亚共产党已向克罗地亚人民表明，它是自由和各族人民平等的捍卫者，是主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因此也主张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团结友爱的倡导者。克罗地亚共产党不断阐述必须解决民族问题，因此对克罗地亚具有民主思想的公民，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农民群众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越来越同各种政党进行蛊惑宣传的领袖们疏远了，而共产党越来越赢得他们的好感。这是当时克罗地亚共产党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由于这一切，克罗地亚共产党的建立称得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实际上称得上是克罗地亚，乃至南斯拉夫全国工人运动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克罗地亚工人运动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了，组织上更加巩固了，政治上更加强大了，为在对我国生死存亡的日子里发挥巨大的作用作好了准备。*

在克罗地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我作了关于克罗地亚共产党建立的意义的报告。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和二日在萨莫博尔附近举行的。我在宣布克罗地亚共产党建立的宣言中强调指出，克罗地亚共产党的建立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多年斗争的结果，南共不仅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明确写上主张民族自由以及各族人民平等和友爱的思想。宣言强调指出，工人的利益和克罗地亚人民的利益之间是不会有

* 摘自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举行的庆祝会上的讲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二十卷)。

矛盾的，因为工人是本民族的一部分，工人极其关心使人民得到自由，确保人民得到发展，人民的传统和文化中一切美好的和先进的东西受到尊重。我接着强调指出，我们在为实现这些理想而斗争的同时，还要同民族狂热和沙文主义进行斗争，因为我们懂得，只有同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友爱相处，进行合作，才能确保克罗地亚人民取得真正的进步和自由。

这一年年中，我建立了以洛拉·里巴尔为首的南共中央青年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南斯拉夫共青团和青年运动进行组织整顿。当时我还制定了南斯拉夫共青团工作指南，指出了共青团发展成为青年运动的战斗核心的途径。

八月上旬我收到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两位同志从巴黎的来信，要我立即去巴黎，巴黎当时是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我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抵达巴黎。他们对我说，戈尔基奇应召已前往莫斯科，不久便在那里被捕了。共产国际已将此情况通知了我，同时委任我领导政治书记处。于是我实际上成了总书记，承担起负责全党工作的全部责任。*

*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解决南共内部的危机以及 南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

我变得身无分文

我几次向威廉·皮克不仅写信，而且还发去电报，请求他帮助我们，并就各种问题^①向我们提出建议。我还请求他设法使我们的问题尽早解决。^②他们总是答复说，要我们等等，我们的问题总会解决的，我们会得知全部情况的。我不断要求他们同意让我本人回国一趟，或者至少允许我派别人回去，因为国内的情况已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刻不容缓要求有一个有权威的知心人回去，况且国内的人也十分坚决地要求有一位这样的人回去。

自从去年八月我离开国内之后，尚无一个人去过那里，因此，十二月，由于我老是得不到通过电报发给共产国际的回答，我便派好友罗任科[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去国内，我又不得不立即把他召回来，因为威廉要求这么做。

① 这里指的是解决巴黎流亡共产党人当中以及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当中的派别活动问题。——原注

② 在铁托这封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批了一句：“请皮克同志和科拉罗夫同志阅，以就所提问题火速作出决定。三八年，四月八日。格·季·”。——原注

尽管八个月我没有得到任何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但是我仍然想尽办法，力图使国内的公司[党]不受各种冲击的影响。我从政治上提出忠告，送去了最后的资金，只是想使公司不致于受到威胁。现在我留在这里，身边没有分文。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同国内保持联系越来越困难，也不能及时地提出忠告，给予帮助。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特别是由于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我决定取消这里的中心，留下一个代表处。我把斯塔诺耶[斯雷滕·茹约维奇]派到西班牙去工作，把瓦利奇[沃朗茨·普雷日霍夫]留在这里担任代表处负责人。必要时，由佩特罗夫[伊万·克尔恩德利]和罗任科协助他。但是，这不是有权作决定的机构。我则亲自去国内，我想把国内的负责人组成一个临时的中心。除我以外，当时国内还有两名中央委员和一名候补中央委员。此外，国内有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借助这些人的合作，我将成立一个临时领导班子，其任务将是，在目前困难的日子里就地领导我们公司的业务，直到你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为止。

季[米特罗夫]朋友，我们大家，特别是我(现在我要在现场工作)意识到我们作出这一决定对你所承担的责任。但是，立即执行这一决定是符合我们公司和KI(共产国际——译者)的利益的。可以预料，南斯拉夫将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我们公司的信誉已极大地提高，公司的业务大大地扩大了。公司的人员增加了很多，因此，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人们越来越坚决地要求把公司领导机构设在国内。不幸的只是，我们没有资金，所以我只好把中央机关报停止出版了。同样，我们国内的某些合法报纸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因为我再也帮不了它们的忙。这些报纸财政拮据的主要原

因往往是书报检查机构采取的措施。我想在国内为中央机关报的出版筹措必要的资金，这份报纸将在国内出版，自然，销路一定非常好。

季[米特洛夫]同志，我希望你也会同意这些措施。我将竭尽全力把中央迁回国去，我之所以能够确定这一方针，是因为我了解你的观点，你早在一九三六年秋就提出应当把领导机构迁回国。这是你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时说的。当时国外的中央出现了不健康的现象，小集团斗争的现象，这一点也起了重要作用。而现在更加有必要这么做了，因为存在严重的政治局势和有爆发战争的危险。

我们的问题过久地迟迟不解决导致了我常常向朋友威廉预告过的那种情况。现在我的担心应验了：某些急不可耐的和不健康的分子将利用这一困难的局面，尽管我一再呼吁，要他们遵守纪律，等待你来解决问题。遗憾的是，这样的人这里就有两个，这就是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和奥巴罗夫[拉布德·库索瓦茨]，他们发表了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言论和采取了违反党的原则的行动，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他们还向国内发指示，从而造成了混乱，可能给公司带来严重后果。

同时，我得强调指出，他们的这一态度是得到法国朋友[法共中央]的某种支持的，法国朋友采取的保留态度增加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孤立这些人的困难。日列扎尔是负责流亡分子工作的领导人，但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我把他撤换了。奥巴罗夫负责“旅游者”[去西班牙的志愿人员]的工作，由于他利用职权给公司造成损失，我也只好把他撤换。

季[米特洛夫]同志，我已几次就重要政治问题征询您的意见，但是毫无回音。你从我们公司就奥地利被占领发表的公报和声明

中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方针，这一方针包含有相当多的新精神。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是因为希特勒军队出现在我们的边界上，也由于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所起的作用及其亲希特勒的政策在我国所造成的形势。

我再次强调指出，我充分意识到我所作出的决定以及在你的面前所承担的责任的重要意义。因此我请求你迅速给我答复：是否同意我采取的措施和我作出的决定。我还请求你采取紧急措施，因为这关系到拯救我的家庭[党]。*

* 摘自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自巴黎致季米特洛夫的信(《选集》，第四卷)。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只有我去现场

在我动身来这里前，我曾从巴黎写过一封信，信里我阐述了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动身前，我曾就德国并吞奥地利发表过声明。因此我也必须赶紧到现场去，因为那里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事需要解决。我从巴黎写给你的那封信中主要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把中央迁回国内。在你解决我们的问题之前，在国内建立临时领导班子。在巴黎只留一名代表，即瓦利奇[沃朗茨·普雷日霍夫]。什瓦尔茨[斯雷滕·茹约维奇]到安德烈耶夫[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那里去，而罗任科[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则留在巴黎等待你的决定。

只有我一人去现场。我将设法采取最必要的措施，使公司[党]内不致于出现混乱，在对于公司来说当前艰难的时刻，我将尽力保护公司，使之不受某些不健康的分子的各种冲击和企图的影响，这些人已发展成搞派别和集团。你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出现各种所谓的好心人，他们自认为是“救世主”，而正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病态野心，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损失。这在今天尤其危险，因为必须[十分]小心，以免各种托洛[茨基]分

子和公司的其他敌人打入公司，进行活动。

国内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们的工作和公司[党]的威望还是得到了很大发展和提高。最近在建立工会的团结等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在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地方同民主党派建立了极其密切的合作。我们有优秀的干部，他们是根据七大的路线在各部门的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宗派病越来越没有市场，人们越来越理解今天的任务和需要。公司[党]的干部并没有被烦恼的事缠住。我请求你全力使我们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没有来自你的任何道义的，政治的和物质的帮助，要在这动乱的时刻进行工作，是很困难的。我完全了解局势，正因为如此，我要坚持到最后，作出一切努力来拯救公司，完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季[米特洛夫]同志，鉴于不能排除我可能遇到不测，我想在这封信里提出我的某些观点，哪怕是简要地谈一谈也好，本来我想，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将口头向你阐述。

第一，我认为，领导机构设在现场，是目前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企图使中央留在国外的任何建议或想法对于我们公司[党]好处甚少，或者说没有任何好处。第二，我认为，应当考虑由国内的人建立一个中央。但是，鉴于国内我们的人政治经验太少，应当吸收国外的两个，或者最多三个人参加中央，但是，应该吸收这样的人参加，他们要作好准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而且能够运用自己的威望确实为公司谋利。第三，我认为，中央应当由大多数忠诚的工人组成。在国外的知识分子中，我可以推荐的只有两个人，即塞尼科[弗拉迪米尔·乔皮奇]和安德烈耶夫[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他们已表明准备为公司而献身。

对干部领导才能的考验，我认为应当考虑到每个人的各种情

况，如果某人有意识地帮助并参与了那个人的有害活动，我认为，此人迄今为止给我的公司造成的损失最大。应当对所谓的“安全监视员”和野心家多加小心。这些人已经常出现，指责所有的人都是“戈尔基奇分子”，尽管他们过去自己就围着戈尔基奇转，拥戴戈尔基奇。我认为，真正的戈尔基奇分子非常少，可以很容易地把他们孤立起来，而不会对公司造成较大的损失。具体谈到一九三六年秋被任命参加以戈尔基奇为首的领导班子的那些人，我认为，总的来说，任命这些人参加领导班子是错误的。例如，罗任科[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我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太早了。虽然他坐了十二年左右的牢，他毕竟没有在外面工作的任何经验，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他本来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人。我认为，罗任科曾受到戈尔基奇的影响，不过更多是无意识的，关于这一点应当让他本人谈谈。我认为，在将来的班子里，对于乔拉科维奇根本不予考虑，但是如果把他干掉，不让他在家[党]里干点工作，那将是一个损失，如果你那里不反对他的话。*

* 在米·戈尔基奇被召到莫斯科去之后，我应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的要求，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从国内抵巴黎。在我作了初步的交谈之后，我就注意到了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不健康现象，特别是伊·马里奇身上的不健康现象。他伙同另一个集团立即开始进行派别活动，逐渐建立起一个派别中心，企图控制党的领导机构。不仅如此，一九三八年，我们在共产国际中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党的领导班子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伊·马里奇竟然自封为党的书记。他那一伙人开始指责前领导机构所有的成员，特别是指责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说他们两人是戈尔基奇分子，还怪罪我同戈尔基奇分子合作，庇护他们。我们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监狱里的情况，并作出撤销P·米莱蒂奇职务的决定，马里奇向我和共产国际写信，再次谴责乔拉科维奇、茹约维奇和克尔恩德利。同时，他表示只要上述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就拒绝会后在中央委员会合作共事。而当我在共产国际作出决定（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那封信）之后继续让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留在南共中央

什瓦尔茨[斯雷滕·茹约维奇]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群众宣传员，为人谦逊，随时准备进行任何工作，但是他也过早地走上了这一岗位。尽管他不象罗任科那样受到戈尔基奇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他毕竟无所抵制。本来他对戈尔基奇了解得最少，因此如果把他看成是戈尔基奇的人，那是不公正的。但是，恰恰由于他过分盲目地相信这个人，所以他有可能变成戈尔基奇的人。自然，现在他本人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第四个领导成员经常在国内，他从未见过戈尔基奇；他就是斯洛文尼亚人莱斯科舍克，是一位深得人心的，忠诚的工人战士。

第五个人就是我。关于我自己，我这次什么都不想谈，最好是让别人去谈吧。我只能说一点：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而只是公司[党]的人，今后我也仍然是这样。

现在在巴黎担任负责工作的人有：瓦利奇[沃朗茨·普雷日霍夫]，不是戈尔基奇的人，他是公司[党]的一位忠诚可靠，富有牺牲精神的干部。他在当前困难的时刻给我的帮助最大。

奥巴罗夫[拉布德·库索瓦茨]是位相当勤奋的人，如果在一个得到你支持的领导机构的领导下，他会十分出色地完成某项工作，但是不能独立处事，而是要在一个坚强的领导机构的指导下才行。而他在目前情况下表现得很糟，特别是在涉及派别倾向和小集团倾向时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已写信告诉过你。他在

政治局工作时，马里奇又向格·季米特洛夫写信。马里奇就是这样搞派别活动，使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变得更糟的。

至于说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我让他们两人留在南共中央政治局里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底，直至我决定取消在国外的领导机构，在国内建立临时领导机构为止。（约·布·铁托注，见《选集》。）

国内名声很糟，因此不能考虑让他担任领导职务，虽然他有这样的欲望。

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在达尔马提亚很出名，政治和理论修养都很差。他更多地是个带有大量小市民残余思想的“乡巴佬”，但是，据我看，他对公司怀有特有的忠诚。

赫尔内特(奥斯卡)[卡尔·胡多马利]由于四月全会上的冲突于一九三六年被撤职，从奥地利监狱放出来一年之后受到了预防性的严重警告处分。他非常能干，也很勤奋。他是个工人，应当帮助他纠正错误。到现在为止他的表现不错。他过去经常反对戈尔基奇的阴谋诡计。

我再次强调指出，假若又成立由原班人马组成的领导班子，那将是件糟糕的事。应当建立由国内经过考验的忠诚可靠的工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再加上一、两个经过考验的知识分子。*

我们党采取非常积极的行动

我在巴黎这里已呆了一个月了，是应你的要求来巴黎的，以便接着上路，到你那里去。尽管我一到这里后不久就报告了，好让人给我准备好上路所需要的一切，可是，直到今天我仍在枉费心机地等待准许入境的通知。我们家[党]里的情况要求尽早尽快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因此，我请求你竭尽努力使我得到入境许可。

我在现场现在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现在必

* 摘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信(《选集》，第四卷)。

须实施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措施，无论是与国内总的政治形势有关的，还是与我们家庭目前情况有关的措施。我在现场呆了两个半月，走访了所有比较重要的地区，但是应你的要求，我必须迅速前来这里，因此未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我在现场逗留期间办了下列几件事：

① 召开了统一工人工会各阶级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工会在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问题上表现了完全的一致。各项决议一致通过。选入统一工人工会新的中央理事会的有工人阶级左翼的八名支持者，即三名选入执行委员会，五名选入全会。详细情况我将面告。大会在对待没有阶级性的工会（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等等）的态度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认为应当同他们达成行动上的一致。（与此相反的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人在举行代表大会之前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工人工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的和左派的报纸——应被看成是正式的报纸，再不允许相互攻击，而应进行同志式的，讲原则的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再不许攻击苏联。大会作出决定，反对把左派人士开除出工会，过去已被开除的人必须重新被接纳入工会等等。在具有阶级性的工会运动中之所以取得十分出色的成绩是由于我们的同志工作做得好，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的其他细节我将面告。

② 代表大会开完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立即与我们的同志举行了联席会议，就在政治方面采取统一行动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双方达成协议：共同采取政治行动，以及共同对付联合反对派等等，但是应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不得把这一协议公诸于众。请你注意这一点！

③ 在我所在的城市里（合法地）召开了工人党发起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斯

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代表。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后工作的若干重要决议。这个工人党应当代表谁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澄清。会议选举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并确定了省的领导机构。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详细情况我将面告。

④ 四月份召开了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代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首先是因“德国吞并奥地利”而召开的，会议作出了关于同希特勒的影响及其对斯洛文尼亚的渗透作斗争的若干重要决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斯洛文尼亚党出版了两本小册子并发表了声明，告诫人民警惕希特勒渗入的危险。在团结斯洛文尼亚各社会阶层反对希特勒方面，斯洛文尼亚党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⑤ 根据南共中央今年三月声明的精神，我们党在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反对希特勒渗入南斯拉夫方面采取了十分积极的行动，这一渗透活动由于斯托亚迪诺维奇的罪恶政策而加强了。为了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反对希特勒的渗透，我们特地为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的农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情况是正常的，健康的

斯洛文尼亚由于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相当好的领导干部，因此党内情况已得到整顿。今天，斯洛文尼亚党同各地建立了联系，也就是说，在所有比较重要的地方都有党的组织。

在克罗地亚，存在中央委员会，是在去年克罗地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我们现在对领导实行了改组。

在塞尔维亚，有省的领导机构，但是参加领导机构的是些年

轻人。这一地区非常需要有能力的人和干部。不管怎样，在塞尔维亚内地各地都有党的组织，同其他地区相比，党的威信以及党同其他党派的合作是最出色的。

黑山有省委会，然而，那里的情况并不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不健康分子在施加影响。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终于在比较重要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本来要举行一次代表会议，以便最后选出波斯尼亚的领导机构。然而，由于我的出走，代表会议推迟了。

在伏伊伏丁那，有省的领导机构，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有党的组织。就党的工作而言，那里的党组织属于工作做得最出色的组织。

最近一年来，除塞尔维亚，也就是去年秋天在尼什的那一次之外，党组织没有遭到什么大的破坏。萨格勒布的党组织今年三月遭到的那次破坏是当局寻衅所致，遭到破坏的只是负责组织志愿人员去西班牙的特科机关。该机关的领导人是一个受雇的奸细，他是由佩特科·米莱蒂奇从监牢里作为可靠的人推荐来的。此人现在已经被彻底揭露，目前正在这里的南斯拉夫“密探局”^①里卖命。今年六月，斯洛文尼亚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对此负有罪责的是一位前政治犯，此人出于派别的原因给佩特科·米莱蒂奇写了一封信，谈党的代表会议，举出了六个人的名字。这六个人因此而被捕，但是党组织遭到的破坏没有进一步扩大。比尔克[爱德华·卡德尔]又被捕了，比尔克被捕前已取得了合法身份。

除达尔马提亚的党组织外，所有的党组织里的情况都是正常的，健康的。达尔马提亚的党组织里存在着两派，挑起两派争斗

① 指效法俄国“密探局”的南斯拉夫政治警察。——原注

的是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

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里的情况仍很混乱。以皮雅杰为首三分之二的人是守纪律的，服从决定的。三分之一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因在阶级敌人面前表现差而被开除出党的，还有几个知识分子，为首的是佩特科·米莱蒂奇)干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并对党进行攻击。莫沙·皮雅杰把这帮人称为罪恶昭彰之徒等等。这帮人在巴黎这里得到日列扎尔和奥巴罗夫[拉布德·库索瓦茨]的支持。我已使狱中的斗争局限在那里，不使其波及监狱外面的党组织，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党组织都发表了措词极其尖锐的声明，谴责佩特科·米莱蒂奇集团企图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关于狱中情况的材料，我早已送给你们了，而这件事的全部情况，我也将面告。

我仍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 依靠国内的干部

我在国内建立了一个临时领导机构，负责处理当前的工作，这个领导班子由斯洛文尼亚的几名中央委员、克罗地亚的几名中央委员以及塞尔维亚的几个党员组成。临时领导机构中有三名南共中央委员，他们是在一九三四年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选举出来的。我同这个领导班子开了一次会。领导成员各自都在自己的省里。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许多重大的决定，这些决定在你解决我们的家庭问题之前将一直有效。会议决定：在国内出版《无产者报》，但是由于我的出走，这件事推迟办了。在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因为缺乏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从你处已整整一年未得到任何帮助，而过去不是采取就地获取资金这样的方针的。

季[米特洛夫]同志，迄今为止，我们不仅使党未受到更大的震动，而且还在工作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国内有忠于党和共产国际的健康分子。然而，如果让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那将是危险的。在侨民当中情况十分不妙。我回国时，撤销了罗伯尔特[库索瓦茨]和日列扎尔的职务，原因是他们搞派别活动。然后，在我走后，这里的兄弟党却把日列扎尔请去，授权他在我们的流亡者当中进行工作。他滥用了这一情况，到处说他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说什么不存在领导机构，因为他谁也不承认。他在南斯拉夫留学生中所作的工作完全是破坏性的，宗派性的，会对国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因为这些学生常回国。是谁让他重新做这项工作的？也许是博格丹诺夫吧？他去南方时曾同日列扎尔和罗伯尔特谈过话。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同我商量？因为我当时还在这里。假若帮不了忙的话，那么至少也不该制造混乱。在你把问题解决之前，我不会干预这里的侨民的事。我让这里原有的领导机构不要管这件事，大家都同意这么办。现在大家等待着你的决定。关于其他所有政治问题以及其他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这里非常之多），我将向你作口头汇报，或者，如有必要，我将就此提交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

季[米特洛夫]同志，请你表明态度，以便使我们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如果没有必要让我到你那里去，那么请你让我回国内，以便尽我所能给予帮助。假若不相信我的话，那么必须任命另一个人，并向他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但是，不应该从这批腐败的流亡者当中任命任何人。我感到对国内的党负有巨大的责任，我再也不能在这里闲着无事干了。

我仍坚持认为必须依靠国内的干部，领导机构必须下去，必须设在国内，接受党的监督。

不久前我曾通过瓦尔德斯[约西普·科皮尼奇]送去了有关国内情况的几份简短材料，主要是谈党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现在我进一步提供有关政治形势以及各政党之间力量对比的材料。*

* 摘自一九三八年七月自巴黎致季米特洛夫的信(《选集》，第四卷)。

政治形势

起主要作用的是我们党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以及在斯托亚迪诺维奇及其大臣们越来越频繁地访问柏林和罗马之后，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感到斯托亚迪诺维奇政权正在执行越来越反动的方针。最明显地感受到这一压力的主要工人阶级。由于斯托亚迪诺维奇政权执行反动方针，不久前《工人报》（克罗地亚统一工人工会的报纸）被查禁，这份报纸已发行近三年，发行量达一万四千份。《工人报》查禁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份报纸。然而当局不准发行。被查禁的还有左派工人的其他报纸。在斯洛文尼亚接连查禁了三家左派工人的报纸。在萨格勒布，《文化》杂志被查禁。当局不准报刊发表谈论现政权的对外政策的文章。全部反对派的报刊只能刊登《阿瓦拉报》发表的东西，即只准援引政府报刊上的东西。在野党的报纸不准对斯托亚迪诺维奇的盟国，即希特勒政府和墨索里尼政府作反面的报道。

同亲法西斯主义对外政策的斗争主要是通过口头途径以及借助半合法和秘密的小册子进行的。

人民群众反对这样的政策的运动首先是在德国并吞奥地利之

后日益壮大起来的。今年三月我们的告人民书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我们的口号是：“紧密团结所有民主和爱国人士，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挺进，同希特勒的同盟者斯托亚迪诺维奇进行斗争”，这一口号不仅在整个工人阶级当中，而且也在大多数在野党当中，甚至还在南斯拉夫激进会（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党）一部分会员当中以及南斯拉夫民族党（耶夫蒂奇的党）的部分党员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在斯洛文尼亚，在普图伊建立了反希特勒宣传的统一委员会。南斯拉夫民族党、南斯拉夫激进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这个委员会里合作共事。领导该委员会的是普图伊市市长。此外，还在其他各地建立了保卫斯洛文尼亚不受希特勒宣传影响的各派统一委员会。在这一工作中特别积极的是青年，他们几乎全都围绕这个问题团结起来了。在这一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我们党，党把同希特勒所代表的危险进行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斯洛文尼亚共产党针对希特勒的宣传迄今为止已在斯洛文尼亚发行了三本小册子以及许多传单。开始时内政大臣科罗舍茨企图阻止这一运动，妨碍我们党的主动行动。然而，他不仅遭到了工人阶级和在野党人士的抵制，而且还有支持自己的人的抵制。迫于斯洛文尼亚人民的压力，当局不得不在斯洛文尼亚采取某些措施，反对在斯洛文尼亚搞希特勒式的厚颜无耻的名堂——悬挂德国的卐字旗，法西斯式的致意方式等等。

我们党的声明也在塞尔维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塞尔维亚散发了五千多份声明，成了工人阶级和在野党派进行统一合作的基础。

在克罗地亚有人指责我们声明中提出的方针，责怪我们没有把首先解决克罗地亚问题作为在保卫南斯拉夫方面进行合作的先

决条件。此外，有人认为，向南斯拉夫激进会和南斯拉夫民族党中的正直成员发出呼吁，是不对的。这种宗派主义的观点甚至连我们党的某些党员和克罗地亚的某些负责人也有。

我们党除了同希特勒的宣传和希特勒在南斯拉夫的影响进行斗争外，还采取主动，动员舆论声援捷克斯洛伐克。同时我们党要求南斯拉夫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遭到进攻时公开表示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组织了示威游行，并举办了讲座，声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这些活动的不仅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民主反对派的代表，而且还有支持执政党和南斯拉夫民族党的许多人。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特务就涌向斯洛文尼亚。他们首先在农民——不仅在边境地区，而且还在内地的农民当中，散布各种各样的荒诞说法，说什么今天在德国，以及在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应有尽有，东西全都很便宜，再也没有失业的人等等，说什么今天在德国工作有的是，而且愿意离开斯洛文尼亚的人也容易找到工作。德国银行在斯洛文尼亚开设的分行掌握一笔现金。这些分行现在发放低息贷款。德国人借助这种贷款从斯洛文尼亚农民那里购买土地，特别是向住在边境地区的农民购买土地。马里博尔周围和科切夫耶的德意志族农民被招募到德国去工作。过了几个月他们穿得笔挺地回来了，以此来扩大法西斯在当地的宣传。最初斯洛文尼亚农民对这一宣传信以为真。他们说：“要是现在希特勒到我们这儿来，那么从普图伊到汉堡将通行无阻，就象战前那样，我们又可以出去工作了，挣很多的钱。”由于斯洛文尼亚所有爱国志士都动员起来揭露这样的宣传，所以这样的幻想逐渐消失了。

在伏伊伏丁那和斯拉沃尼亚同样可以感到希特勒在德意志族人当中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和宣传。

共 产 党

必 须 十 分 警 觉

关于共产党的工作上次我已写信谈过了。这次我只报告几个新情况。几天前召开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党的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这个省的党的领导机构。经过了也许是十五年多的时间，这个重要省份今天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和重新建立的组织。该省是南斯拉夫重工业最发达的省份。此外，黑山也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从报告来看，在这次会议上P·米莱蒂奇的破坏活动和派别活动受到了谴责。

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各省都有了党的组织，都与领导机构有了联系。只是在马其顿，这件事尚未办妥，虽然那里有地方组织，然而，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同省的领导机构也没有联系。那里的条件也非常有利，但是没有马其顿土生土长的领导干部。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月前召开了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全会。在全会上同达尔马提亚的中央委员发生了分歧。我尚无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全会的书面报告，但是我得提醒一个情况：在达尔马提亚的一些比较老的同志身上存在着相当不健康的倾向。例如根据到这里来的一

位青年代表的报告，这些达尔马提亚的同志几乎把党取消了，把整个工作全部推给“工人党”去做，他们认为工人党将取代共产党。

达尔马提亚的领导同志完全目无纪律，这是个众所周知的老问题。但是最近情况更糟了，原因是个人，诸如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从这里向国内散布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们号召党员不要服从南共中央的任何决定，因为南共中央里的人全都可疑等等。日列扎尔通过他家里的各种关系，向国内发指示，声称他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来领导党。我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制止这种有害的做法，尽管这种做法在党的组织里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我们党近一年来所处的这一困难局面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的人身为党员给党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因此我必须强调指出，必须好好地清理一下我们的党，把那些混进党内的各种异己分子从我们党内清除出去。

由于我们党的积极分子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南斯拉夫的形形色色的托派分子的活动，没有一次是扎下了根的。不过，还是必须十分警觉，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健康分子从内部来毒害我们党。

再谈地下工作

我觉得整个事情令人可疑

我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回到国内。我同党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磋商，于五月初组成南共临时领导。

进入领导班子的有：爱德华·卡德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米哈·马林科、约西普·克拉什、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米洛万·吉拉斯，后来还有伊万·米卢蒂诺维奇、拉德·康查尔、莫沙·皮雅杰等人。在国内建立南共新领导意味着在内部巩固党和消除派别活动一切残余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新领导立即同各省的领导和全国其他下级领导建立直接联系。新领导组织了党的特科机关和党校，以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当时，青年问题也处于注意的中心。我们致力于使共青团成为南斯拉夫全国广泛的青年运动的核心。在这件事情上，中央青年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八年起任共青团书记的伊沃·洛拉·里巴尔干得很成功。洛拉是一位很有才赋的青年人，是一个成长迅速的革命家。在工作中，他帮了我很大的忙。

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澄清关在米特罗维察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之间的事情。这里涉及到的是米莱蒂奇的严重

的派别活动，这种活动给我们党的队伍制造了分裂。佩特科·米莱蒂奇是黑山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很狡猾的宗派分子，他在服刑期间，通过种种手法，把一大批犯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党员拉到了自己一边。他制造了一种局面，使得这些青年人起来反对老同志。

他当时很出名。在西班牙，甚至有一个连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美国进步报纸在谈到他时，把他当成是共产党的著名英雄。我觉得整个这件事令人可疑。我之所以怀疑他，是因为他想把老革命家莫沙·皮雅杰这样一些我们最优秀最有功的同志干掉。

后来，我也被召到莫斯科。戈尔基奇走了，在莫斯科被捕，几乎所有南斯拉夫人都被捕了，因此，当我到那里时，除了乔皮奇和塞尔维亚的一名教员外，找不到任何人。我在莫斯科心情很沉重，因为他们什么人都怀疑。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不跟任何人交往；我学习并在共产国际工作，往返于共产国际和“豪华”饭店，别的地方，哪里也不去。可以说，这是我出于自愿与世隔绝。我想尽量利用机会，因为在那我有许多书可看，以弥补在服刑时所短缺的东西。我同任何人，包括我们的人在内，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这一点恰恰救了我，使我没有被列入依次被捕的那些人的名单。

在莫斯科，我领受了一项任务：翻译《联共(布)党史》。乔皮奇、我和另外一人我们三人组成一个编辑小组。但是，在搞完了第一章之后，他们两个被捕了，只剩下我一人来译这本党史。我夜以继日地足足干了三个月。排字的时候，我得去印厂。这件事完成之前，他们不放我走。我完成这项工作后，于一九三九年经由土耳其回南斯拉夫了。

我在莫斯科时，以后来的保加利亚国防部长，当时的监察委

员会巴尔干分部主任达米扬诺夫为首的一批保加利亚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设法把佩特科·米莱蒂奇从南斯拉夫搞到莫斯科。这件事使我感到奇怪。米莱蒂奇到时，我并不知道，而是俄国党的一些同志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说，他在写报告反对我，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米莱蒂奇，我本人并不认识他。*

公共汽车里坐的全是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和干部，行驶过程中，我看一个身材瘦削、脸庞细长的人，他的一只手握着吊把，手掌上滴着血。我觉得有点面熟，但是我想不起来他是谁。我当时想：用受伤的手指去握吊把，有血不擦去，这算什么样的“英雄”！我到干部处去见那个保加利亚人，他才告诉我，佩特科·米莱蒂奇在莫斯科。我立即想起了公共汽车里的那个人。

第二天早晨，我去共产国际，在走廊上遇到了干部处处长，一个俄国人。他留住我，对我说，佩特科正在写东西反对我，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不过我不用担心，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又去找那个保加利亚人，他装作是我的好朋友，却蓄意谋害我。我见他十分高兴。他对我说，待佩特科·米莱蒂奇交了自己的报告，要对整个这件事加以讨论，我可以出席。我说：“我当然要出席！”第二天，我到后，那个俄国人立即告诉我，佩特科·米莱蒂奇已被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就掌握了米莱蒂奇向警方谈的一切，让他有几天时间来写，看看他写些什么。那个俄国人知道这一情况，因此当我们第一次在走廊里遇到时才那样冲着我微笑。我问他：“米莱蒂奇的报告呢？”他挥了一下手，说：“逮走了他，也拿走了他的报告！”我心满意足地立即去见那

* 摘自对战前地下工作的回忆（《言论集》，第八卷）。

个保加利亚人，我见他又是很高兴。我望着他，而他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佩特科已被捕。我告诉他：“米莱蒂奇被带走了”。听了这句话，他跳了起来，脸色煞白，吓得有半个小时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是把米莱蒂奇弄到莫斯科来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

后来，兰科维奇同志作为内务部长接管了所有档案，才发现米莱蒂奇实际上已被警方收买，他全都出卖了，使许多人受了害，警方设法把他打扮成共产党的英雄，这样使他更便于为警方效劳。**

当时，我们的许多人（在莫斯科）都被捕了，几乎没有什么人未被捕。我也差一点遭了殃。

在这一切过去之后，我去见季米特洛夫。我向他提出，领导最终应当呆在国内，再不能留在巴黎。季米特洛夫问我：“什么领导？瓦尔特，只剩下你了，你应当回国。你是幸运的，对党来说也是幸运的，至少你留下了，因为已经在谈论解散南共。”当时，波兰党已被解散。***

* 摘自与《共产主义者》周报代表的谈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十二卷）。

** 摘自对战前地下工作的回忆（《言论集》，第八卷）。

*** 摘自与《共产主义者》周报代表的谈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二十二卷）。

清 洗 问 题

我 也 受 到 指 控

我想谈一谈斯大林主义的清洗。我已经说过，在那里，南斯拉夫共产党一系列领导人被捕了，他们被控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和叛徒。在清洗中被捕、被审判并被干掉，或者在监狱中销声匿迹的有：菲利普·菲利波维奇、卡米洛·霍尔瓦廷、科斯塔·诺瓦科维奇、久卡·茨维伊奇和斯捷潘·茨维伊奇、拉德·武约维奇和格尔古尔·武约维奇、姆拉登·乔尼奇、安东·马夫拉克等人。他们的悲剧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是在被控犯了从未犯下的罪行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下被驱向死亡的。当时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甚至我们整个党受到指责。所有这些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都已为苏联司法审讯机关死后恢复了名誉。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我党成立五十周年时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向他们表示了应有的敬意。

当时，连我都拿不准，有朝一日他们是否也会把我抓起来。他们之所以没有逮捕我，我只能感谢季米特洛夫，他以前就信任我，认为我身为总书记，应该对南共承担起全部责任来。进行这些清洗的原因当时不象现在这样清楚。我在共产国际及其机构里，

为许多同志说了情。我对他们说，某某同志是个优秀共产党员，而他们却厉声地回答我说，他是托派、间谍、帝国主义分子，等等。他们几乎怀疑每一个南斯拉夫人，认为都是托派。

有人向监察委员会控告我是托派。我的所谓属于托派这件事有我所翻译的《联共(布)党史》中的一句话可资“证明”。控告我的是一个年轻人，南斯拉夫奥西耶克的德意志族人，他不跟我们一起工作，而是在德国党里工作，但老是插手我们的事情。当时，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主席弗洛林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我说，一切都会搞清楚，他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博扎·马斯拉里奇也作了很大努力，因为我们一起一再解释，我的译法不是托派的提法。最后，我终于为自己解脱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我被要求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作汇报。我谈了整个形势，援引了我写的报告。当时总的形势，欧洲的形势和世界形势，十分严重。当时正值慕尼黑投降事件时期，这意味着西方列强在希特勒的要求面前作了让步。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被牺牲了。帝国主义殖民势力鼓动希特勒反苏。同时，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破坏了小协约国联盟。希特勒无耻地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欧洲却保持沉默。然而，在南斯拉夫，对于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人们报以强大的示威，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广泛的行动。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的抗议是你们都知道的，而这样的抗议，在萨格勒布也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报名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希特勒。遗憾的是，捷克人自己不想打。

有鉴于这样的国际局势，有鉴于法西斯发起了越来越明显的攻势，可以感觉到，共产国际对南共的态度有所改变。从我的一些报告以及从每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出，一场受党的决定性影响的民主和反对派强大的反法西斯运动正在南斯拉夫展开。这是令人

鼓舞的，同时使人相信，共产国际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运动。对于我来说，格外重要的是，我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报告中，从国内送来的报告中看到，南斯拉夫国内党的临时领导是团结的，他们不断发表宣言，正在充分展开活动。这是有巨大意义的。对我们党的态度确实逐步开始改变，十月间我已能断定，南共被解散的危险已经消除。这时我已有把握不会把我们解散，正在恢复对我们党的信任。十月中，我在致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看法，并表示希望尽早回国。然而，他们始终没有放我走。我同季米特洛夫谈了话，但是我一直得等到十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讨论关于我们党的几个文件。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政治书记处开会。那时，我在国内组成的南共领导才最终得到确认，所做的工作才得到承认。我得到委任，从这个领导班子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制订把一切派别活动残余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的措施，以及还要办其他一些事。我们商定，过一段时间，过三、四个月，我再到共产国际来。

我说，在这段时间里，伊万·卡拉伊万诺夫帮了我很大的忙。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同时他主管莫斯科的出版企业、外国报刊等。他除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之外，还在共产国际的机构里工作。我向他抱怨，正当我应当呆在国内的时候，他们这样长时间让我呆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天，他建议我给斯大林写一封信。我说，不写，他不知道我这个人更好。因此，我没有给斯大林写信。

当我看到对南共的信任已经恢复，我就在给爱德华·卡德尔、沃朗茨·普雷日霍夫、洛拉·里巴尔的信中告诉他们，我们的事情已经在“祖父”——当时我们是这么称呼共产国际的——那里得

到有利的解决。我估计不久就能回到南斯拉夫。然而，我在莫斯科又足足干了两个月。后来，我到了巴黎才知道，我在共产国际呆了这么久在巴黎和在南斯拉夫国内都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形形色色的派别主义的流言又开始出现。

继续有人在散布一些令人惊恐的消息，谈论我的失踪，谈论共产国际还没有任命领导机构，说什么实质上并不存在南共。这些流言甚至使得当时在巴黎的一些好同志，一些优秀的革命家也开始动摇。然而，正在这时，我们终于胜利了。季米特洛夫给法国共产党写信，要他们支持我们实施消灭派别活动和加强新领导的措施。这是因为在此以前，我们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几乎已经中断。

我们在西班牙的同志们也感觉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情绪十分沮丧，在那里，把他们看成是面临被取消的一个党的派别分子。有一些文件里甚至谈到，我们党已被取消，因此在共产国际正式确认我们党还存在并已经巩固之前，不愿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从尼古拉·科瓦切维奇寄自加拿大（他在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工作）的来信中，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在回复我的一封信时说，不信任还没有消除。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离开莫斯科，经由斯德哥尔摩到达哥本哈根，又从那里乘飞机到巴黎。在我回来以后，我们就更坚定有力地继续为党的团结和把派别分子清洗出去，为巩固党的队伍以及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保持联系而斗争。在巴黎，我遇到了从布拉格来的鲍里斯·基德里奇，他对于戈尔基奇所奉行的政策感到十分失望。基德里奇成功地致力于粉碎派别集团的工作，特别是在南斯拉夫的留学生中间，在巴黎有许多南斯拉夫留学生。在这方面，他给了我很大支持。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所

接受的一切任务，他都完成得很好。在巴黎，我又遇到了韦利科·弗拉霍维奇，他从西班牙来，他在那里失去了一条腿。我在共产国际里向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同志打了招呼，让弗拉霍维奇当南斯拉夫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

我在巴黎办完了事，就可以动身回国了。我先把党的材料和南共中央决议草案送回国。我在莫斯科起草的决议草案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已被通过。这个文件对我们党内的情况作了分析，确定了今后的任务。现在得由我们中央委员会来通过，因为我们中央委员会也有权。应当把它交给党员，以此来加速巩固党的工作。共产国际还决定，由我们发表一封致南共党员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我们将向党员介绍领导班子中所发生的事情，并号召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党的团结，并在一切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工会和青年中，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提出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尽可能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一般的政治教育。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党是一个骨干党，是由革命者和战士组成的，他们以自己的觉悟和实际活动站在前列，并成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榜样。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回国后立即写成的公开信的实质。采取训练党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很清楚，战争已临近，我国革命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党在多大程度上是作好准备的，取决于党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活动，实现党的路线和任务。

三月，我返抵国内。中央委员会立即开会，会议开了整整四天。我作了报告，汇报了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关于我们党的问题解决的经过。我们通过了决议和公开信以及就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发表的宣言。同时，我们商定，巩固党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召开一次全国各地党的领导干部的会议。我立即投身于筹备这次

会议的工作。我得去贝尔格莱德，去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完成我们所面临的任务。

同时，我们加速致力于《无产者报》的正常出版，该报已经有几年没有出版了。重要的是加强思想工作，要让每一个党员和同情党的人都了解形势、问题和任务。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之所以提高，特别是由于我们党在捍卫国家这件事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是由于我们党继续大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对民族问题的解决采取了正确的观点。那就是始终一贯要求各民族享有自决权，要求各民族平等，而这是各民族把南斯拉夫看作自己共同的祖国并准备捍卫它，使之不受咄咄逼人的法西斯威胁之害的条件。

三月会议之后，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之前，我们还举行了三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六月初，在斯洛文尼亚的什马尔纳山麓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到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来位同志。我们还采取了措施来恢复和巩固全国各地的领导。在什马尔纳山麓举行的会议具有巨大的意义。会上，各地的领导人坚决谴责任何派别活动和小集团活动。

会议强调了扩大党的队伍和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意义。会议特别强调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正直的和有名望的人。我们争取的是，使党首先依靠无产阶级和有民主思想的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前途同党的政策和党的性质、同人民的切身问题联系起来，一句话，首先要依靠确实把党看成是自己的组织的那些人。于是，党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党的力量比党员的人数大得多。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最初有六千党员，后来有了八千党员，而大战爆发时，我们已经有一万两千名党员。在一年时间内，党员的人数翻了一番。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再次得到通知，让我去莫斯科，这是以

前商量好的，但是考虑到任务繁多，局势严重和战争临近，我要求推迟前往莫斯科。因此，我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初才动身。八月底，我经过巴黎抵达法国勒阿弗尔港，在那里，我登上了去列宁格勒的西伯利亚号轮船。

我在赴苏途中，在西伯利亚号轮船上遇到两件大事！我获悉苏联和德国之间签署了条约，后来又获悉围绕波兰的革但斯克走廊局势紧张，最后获悉希特勒进攻波兰，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我于九月初抵达苏联。我一到莫斯科，就去共产国际。现在情况变了。头两天我就见到了威廉·皮克，我得到了写一份报告的任务。时局是敏感和微妙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苏联同德国签订了协议，我们应当奉行什么样的政策？情况是，一方面，爆发了战争，而另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法西斯国家之间存在条约。这使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

我记得一个插曲。马努伊尔斯基把若干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召集在一起，给我们一项任务，让我们根据当时的局势，各人为本国写一份宣言，规定活动的方向。我的出发点是一些十分明确的原则。我认为，希特勒想通过签订条约，使苏联在他行将在欧洲进行的征战中保持中立，而苏联则希望能为自己确保较长时期的和平。我认为，这不应当对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大的影响。

我的出发点是，对于进步人类来说，法西斯主义仍然是主要危险，我按照这一想法一夜功夫很快就把宣言写好了。第二天，当我们到共产国际去见马努伊尔斯基时，唯有我带着写好了的稿子。别的人不是空着手就是只提出了一些论点。谁也不知道对于签署条约一事如何来措词。有些人不知所措，不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我念了我所准备的宣言，马努伊尔斯基感到高兴，说我干得很好。

大家都担心犯错误，而当时犯错误意味着进卢边卡监狱。我看到，我们现在在宣言中不必提到苏联，这是马努伊尔斯基对我们说的，他同时强调：写对你们国家人民的危险，准备法西斯发动进攻，因为你们应当斗争，而不是现在去做苏联所做的事。

我认为，十分有益的是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有正确的立场。为使我们了解情况，马努伊尔斯基又说，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协议是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我们中每一个人都向本国人民负有责任，必须采取一切步骤使人民准备好进行抵抗，如果法西斯一旦发动进攻。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共产国际并不要求各国党都必须一丝不苟地奉行苏联同希特勒达成协议的政策。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标志，表明苏联有理由签订这样的协议，寄希望于能够比较长久地排除威胁着它的危险，而事实证明这是幻想。然而，稍后，当局势进一步紧张——对芬战争，与英法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关系发生危机——苏联党的领导、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的观点改变了。

那时，在评价国际局势时，又反映出斯大林的老观点：主要的不是反法西斯，而是应当回到所谓的阶级对抗，回到“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回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正当希特勒的军队在改变欧洲的地图，法西斯正猖狂进攻的时候，我觉得，奉行无视民族利益和无视捍卫独立这样的政策，可能是致命的。

再次上路返回祖国

斯皮里敦·梅卡斯的护照

我在共产国际办完事后，本应立即回国，但是我未能成行。我得了感冒，发高烧，只好躺在病床上。病一好，一九三九年底，我就上路返回祖国。我乘火车到敖德萨，然后乘轮船去察里格勒。^①由于战争，我无法按原路回西方，我决定经由土耳其回去。*

我从俄国回国时，乘的是一艘土耳其船。有意思的是，我在船上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我有一张加拿大护照：工程师斯皮里敦·梅卡斯。船一到伊斯坦布尔，有自称是土耳其记者的几个人把我包围上了。他们对我说，从俄国来的人可以对这个国家提供十分有意思的材料，他们请我谈谈自己的印象。我说，我不是俄国人，而是住在加拿大的南斯拉夫人，是作为负责兴建工厂的一家加拿大公司的代表访问俄国的。土耳其记者对此不满足，他们向我提了一些问题：俄国工人的工资有多少？生活水平如何？生活条件如何？我对他们说，我是专家，对这些事未予注意，我自己得到的钱不少，是用美元支付的。记者们表示谢意后就走了。

① 察里格勒系“帝都”之意，即伊斯坦布尔。——译者

*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此后，事情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我已经说过，我拿的是加拿大护照，我买了去纽约的船票。由于船是从那不勒斯启航的，我得走陆路。实际上，我是要在南斯拉夫下车，但是我需要保加利亚的签证。保加利亚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里的人对我说，我首先得获得南斯拉夫的过境签证，然后，才能得到保加利亚的签证。我离开领事馆时，听到保加利亚官员们在议论：“从名字来看，这个家伙不是加拿大人，而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谁知道负有什么复杂的使命。”

由于办理签证手续遇到未料到的困难，我不得不在伊斯坦布尔逗留了三个月。我得到签证后就动身去南斯拉夫，并在萨格勒布下了车。几天以后，我在萨格勒布一家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说：“雷克斯号轮船（我本应乘这条船走）在直布罗陀为英国当局所扣留，因为船上有一个名叫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可疑人物。美国乘客对这一行动提出抗议，因为船因此而可能晚点。”而我那时已在南斯拉夫……*

* 摘自向安那托里亚通讯社编辑发表的谈话（《言论集》，第八卷）。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我们使党准备好迎接伟大的事件

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于一九四〇年举行，在此以前我国各地都召开了党的一系列会议，因此，我认为，第五次代表会议是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一百零五名代表，加上工作人员，总共为一百一十人。这次代表会议可以说是在警察的鼻子底下举行的，这证明了我们党已经把形形色色的奸细和代理人都清洗了。会议开了几个白天和晚上，通过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决定，这些决定不仅对动员党员，而且对于使广大阶层准备好迎接行将发生的事件，都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一次会议充分显示了南共队伍的团结。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召开一次具有代表大会性质的代表会议，而没有发生任何磨擦、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斗争。同样，这是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有那么多的代表出席一次会议。简言之，这次代表会议标志着一个阶段——巩固党、消灭派别和集团的时期结束了。最后，这还意味着一个革命组织的独立，这个组织当然同共产国际保持紧密的联系，同时又摆脱了妨碍南斯拉夫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发展的一切坏分子。

关于在萨格勒布郊区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无论是在开会期间，还是在回去以后，没有一个参加者落到警察手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举行党的代表会议的同一幢房子里，会后立即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党的训练班。然而，警察根本就不知道那里在干些什么。警察想都没想到，来自南斯拉夫各地，包括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几十名共产党领导人竟然在这幢房子里逗留。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表明，党的巩固已告完成，党已经准备好迎接后来发生的事情。第五次代表会议以后，党越来越壮大，向广度发展，特别加强了在青年和妇女中的影响。同时我们很成功地加强了人民阵线，发展了反法西斯斗争。^{*}

我在波德斯雷达我姑母家里的牲口棚里写报告，我呆在棚顶的小楼上，躺在干草上作笔记。突然，我看见有一条蛇直向我游来。我设法躲开了，但是，从此我再也不到顶楼去了。请看，我们当时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下写报告！^{**}

在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要在国内第一次召开代表会议，又有那么多人参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亲自掌管整个这件事。我的主要助手是拉德·康查尔和萨格勒布的其他一些同志。代表会议应当在萨格勒布举行，因为在我看来，在那里最容易组织。我自己查看了四周，找一幢开会的房子。我曾去斯洛文尼亚，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交界处，租了一个葡萄园和房子，我本以

* 摘自在贝尔格莱德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二十卷)。

** 摘自与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代表的谈话(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战斗报》)。

为可在那裏开会，但是后来我转到别的地方，因为那里房子太少，来那么多人，无法掩护。最后，我决定在萨格勒布的杜布拉瓦租一幢房子。这幢房子现在已变成了博物馆。我们在那里工作，我、卡德尔和其他同志为会议作准备。*

依靠青年人

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南斯拉夫共青团的队伍中大约有二千五百名青年人，主要是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共青团组织的大多数领导人是党员。

就党的工作而言，我作为萨格勒布地方组织的书记，对于青年是十分满意的。青年承受了最大的重担。不是指思想工作的重担，而是指日常工作的重担：散发传单、担任通讯联络以及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你们问我，是否认识南斯拉夫共青团先后七任书记？我大概都认识，都见过，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米希奇、奥雷什基和德贝利亚克，他们都在工会里工作过。他们都是有觉悟的共产党人，他们从不屈服。

如果我们看一看战前的共青团，我们就会看到，共青团充满了革命精神。共青团所考虑的只是同现存制度，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有的时候，青年人在这方面显得缺乏耐心。他们力图成为非团员的榜样，因此在自己个人生活中往往奉行禁欲主义。他们对于不道德的事情是很严格的，他们很注意学习，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们准备作出牺牲，准备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工作。我

* 摘自一九五三年五月与萨格勒布电台编辑的谈话（《言论集》，第八卷）。

还得补充一点，对于当时的青年来说，不存在“干不了”这几个字。不论有什么样的任务，他一定去完成，而不管他本人会遇到什么不测。^{*}

她派了儿子来找我

在工会工作中，妇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战前的南斯拉夫，妇女得到的工资比男子少。在我当南斯拉夫制革工人工会书记的时候，我走遍了各种各样的成衣厂，男女工人工资差别之大给我留下极坏的印象。例如，就我所记得的，杜加雷萨纺织厂的女工，每小时拿到两个第纳尔，连男工的工资的一半都不到。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妇女不仅不平等，而且受到骇人听闻的剥削。

我还记得当时的许多事情，记得妇女是如何积极参加示威游行、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的，特别积极的是还没有成家的青年妇女，但是有家庭的妇女也帮助我们。例如，她们为受警察追捕的同志找房子住。我在萨格勒布就不得不住在五个不同的地方。我有可能藏在有家庭的党员家里。

一九四一年，当乌斯塔沙^①同德国人一起来到克罗地亚，我差一点落到他们手里。一位妇女派她的小儿子来找我，通知我别

* 摘自一九五九年五月八日与《青春报》代表的谈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十二卷）。

① “乌斯塔沙”（又称“乌斯塔什”），原为“揭竿而起者”之意。系克罗地亚右翼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的反动组织，鼓吹克罗地亚独立，主张从克罗地亚赶走塞尔维亚人和其他民族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与德意占领者勾结的反动武装，残害南共领导的大批游击队员和平民百姓，罪行累累，其首领为安特·帕韦利奇。——译者

回家，因为乌斯塔沙正在家里等我。他到处找我，最后在萨莫博尔车站找到了我，我当时已买了车票上了车。我认出了这个孩子，跳下车来。他对我说：“你别回去，那里不干净。”我听后，就大声地说：“我明天去！”*

* 摘自对《今日妇女》杂志主编提问的答复（《言论集》，第十二卷）。

在 革 命 的 烈 火 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

南斯拉夫被占领

人民已看到他们面临的局势

在维也纳作了短暂逗留之后，我便动身去莫斯科。当时已很清楚，西方将发生战争。如前所述，奥地利已被并入第三帝国。某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始终还在投机，竭力使法西斯主义的攻击矛头转向苏联。遗憾的是，许多进步人士，乃至某些共产党人，尚未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威胁世界的种种危险。

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我正好在莫斯科。当时我们在共产国际举行各个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措施。自然，我们认为这是苏联的策略，为的是争取尽量多的时间。我认为，斯大林本人当时也认为可以把这样的危险推迟一段时间，而使苏联能够比较充分地作好准备和得到加强。遗憾的是，事实表明，这是幻想。法西斯分子是不可信赖的。

我们当时在共产国际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各党应当干些什么。马努伊尔斯基主持了这次会议，他要求我们每个人以本党和本国的名义写一项宣言，然后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困难。我的许多同志已在那裡被捕，可以

说，我是孤家寡人。不过，我还是写了这样一个宣言。这是一九三九年夏末的事。

那时我们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等召开了系列党的代表会议。这些会议讨论的主要题目是，在一旦遭到法西斯侵略和占领的情况下，我们将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准备武装斗争，与此有关，进一步加强党，建立人民阵线等等。

我可以说，我国的革命情绪早就表现在支援共和西班牙上，我国大批志愿人员去西班牙，而现在则进一步高涨。在围绕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期间，我国成千上万青年表示准备作为志愿人员帮助这个国家。当法西斯主义危险也笼罩在南斯拉夫上空时，我国的大学自愿组织了军训，大批学生参加了军训。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高涨的革命热情一九四〇年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萨格勒布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中表现了出来。这一切都是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坚持不懈和有组织地进行工作的结果。

我们做这些准备工作是从不间断的，而且具有明确的目的。因此，说什么我们的武装斗争是自发兴起的，一切都始于苏联遭到进攻的那一天，所有这些说法——后来散布的，战后还在散布——统统是不正确的。我们早在此之前很久就作好了应付我们深信会发生的事变的准备。因此，我们党是有准备地迎接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的。

早在大约一九四〇年冬，我们就决定，必须尽量同军队建立联系，在军队里，特别是在军官当中物色人。我作为党的总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米塔尔·巴基奇，因为他同军队中的某些军官有联系，让他担当这一角色，使这些人同党取得联系，尽可能地

从军队内部着手工作。

(一九四一年)四月战争(只持续了十天)爆发前夕，我们正在萨格勒布，我们采取了步骤来同军队建立联系。我们两次派以约西普·克拉什为首的代表团去兹林斯基的兵营，要求提供武器来武装工人，抵抗进犯南斯拉夫的敌人。集团军——我记得是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奥尔洛维奇拒绝提供武器。差一点把代表团团员抓了起来。仅仅过了几天，德国人就开进了南斯拉夫，接着乌斯塔沙上台了。

正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德国人开进萨格勒布的那一天，我们召开了会议，讨论军事问题。我在会上作了报告，谈了到当时为止我们已取得的成绩。会上决定建立军事委员会，并决定由我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参加军事委员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同志。我记得，例如，军事委员会里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是布兰科·克尔斯曼诺维奇。^①此后，在全国所有党的领导机构里都建立了军事委员会。

在此期间，党大大地加强了。同年七月，党已有一万两千名纪律严明的好党员。还有大约四万名组织严密的，以伊沃·洛拉·里巴尔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我们努力吸收尽量多的新成员来加强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我们还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努力把所有进步人士，所有爱国同胞都争取过来。我们同反对党的某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商谈合作抗击敌人和进行共同斗争的问题。例如，同所谓反对派集团^②的代表伊万·里巴尔，同独立的民主党人以及其他建立

^① 布兰科·克尔斯曼诺维奇(一九一五——一九四一)一九三六年入党，一九四一年牺牲，人民英雄。——译者

^② 伊·里巴尔博士是所谓民主党左派的代表。——原注

了接触。

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发生的大规模示威中得出的经验也促使我们这样做，那一天贝尔格莱德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的群众走上街头，欢呼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的下台。当时的情况已表明：大多数人民是坚决反对投降政策的。

如上所述，南斯拉夫共产党早在南斯拉夫被占领之前就已看到了逐渐临近的危险，并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便有准备地迎接事变的到来。

南斯拉夫被占领后我们即开始牵制活动——爆炸各种设施、烧毁军用小汽车和运输弹药的卡车、转换德国人设在十字路口的路标，德国人通常因此而迷路。这些活动妨碍他们东进。可见，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已进行这样一些牵制活动了，我们明白，接着就会轮到苏联了。因为，德国军队从巴尔干，越过罗马尼亚，不断向苏联推进。

我们也提醒过苏联。例如，我曾同苏联武官会晤过，告诉他，德军在向他们的边界推进，我可以肯定德军将进攻苏联。我是从萨格勒布的一些“共济会会员”那里得知这一情报的，他们了解这一情况。我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说，应当对此认真对待。武官告诉我，德国人要他离开南斯拉夫，他说，他们赶他回国。我说，您还需要什么！这就是进攻苏联的前奏。

我们认为，由于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举行普遍起义最有利的时机来到了。当时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起义，抗击占领者。在这之前，希特勒已把其主力部队从南斯拉夫和希腊抽走。实际上，意大利人在南斯拉夫尚有主力部队。当时在南斯拉夫的还有鲍里斯的保加利亚军队和霍尔蒂的匈牙利军队。更不用说卖国贼

了，他们开始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人民已看到所面临的局势。这是号召起义的合适时机。起义扩大到全国，我们很快就建立了游击队。^{*}

* 摘自文章《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一九四一年塞尔维亚 人民起义

英雄奇迹

南斯拉夫被占领时，我和同志们正在萨格勒布，我们目睹德国人开进萨格勒布，乌斯塔沙兜捕爱国人士和其他一些事。自然，我们也目睹了南斯拉夫军队的十分迅速的失败。但是，正是由于在德国人和乌斯塔沙开进萨格勒布之后我们不可能留在这里并从这里领导我们党今后的行动，同占领者进行斗争，因此，我们迁往贝尔格莱德，尽管贝尔格莱德遭受了严重的创伤，破坏得很厉害。当时我们在贝尔格莱德进行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贝尔格莱德暂时受到了削弱，我说暂时，是因为那里尚未建立某种政权。南斯拉夫政府跑了，而占领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组织的伪政权，能够起镇压同占领者作斗争的人的宪兵的作用。

我们是五月初迁往贝尔格莱德的。一部分同志，拉德·康查尔等人仍留在萨格勒布。于是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准备。我负责联络——当时同我联系的有伊万·里巴尔博士以及一些来自所谓反对派集团的人（独立的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人），以便了解他们对同占领者斗争有什么看法。他们同意我们对整个局势的观点。

出于形式上的种种考虑，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立即着手争取尽量多的非党人士，即进步的民主人士，尽管我们知道，斗争正是由最优秀的部分——共产党人开始进行的，他们已对此作好了准备。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已考虑到，斗争的重担不能只是由共产党人来挑，而是我们必须把这付担子让尽量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挑。我们当时在贝尔格莱德散发了告人民书，尽管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没有违背对苏联的义务，那时苏联还同德国人订有互不侵犯友好条约。我们发表告人民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早在一九三八年初，奥地利被占领时，在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第一个表明了态度。我们第一个发出警告：法西斯主义力量将进一步扩张，将继续进行侵略。我们还在共产国际内部主张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投入今后不可避免将会到来的斗争。可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竟没有一个党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站出来讲话，原因是所有这些党都对共产国际俯首听命。除非共产国际发出指示，否则它们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而苏联领导人则又小心翼翼，不愿采取任何可能激怒德国人的行动，因为，他们还总是以为在他们同德国人订立条约以后德国人是不可能进攻他们的。我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在德国进攻前几天，我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在贝尔格莱德会见过苏联一位参赞，即武官，我对他说，我认为现在从塞尔维亚撤走，向匈牙利边界进发的军队将开赴苏联。他说，他很难相信这一点。他们在德国人进攻大约十四天前仍不相信德国会进攻他们！也许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德国人为了安全而采取的战略行动。

我们当时发表的告人民书是同我党的路线一致的，我们将无

条件地抵抗占领者，不论它有多么强大，我们决不屈服，我们决不让我们国家束手任人奴役。

我们把一九四一年四月南共中央的决定通知了莫斯科。莫斯科对此颇为怀疑，因为它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因为它不相信我国共产党在人民当中有着某种特殊的影响。莫斯科认为我们的这份告人民书对苏德关系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尽管看来，德国人曾向莫斯科抱怨过南斯拉夫人的不屈服态度。他们援引了我们告人民书中的一句话……

七月四日，我们又讨论了局势。但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如上所述，我们同里巴尔的前反对派集团就采取共同行动问题还在举行会谈。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想单独采取某种冒险主义行动，因为，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几个月之内就会失败，只会给人民带来损失。我们的路线是：一开始就建立——哪怕是慢慢地，而是稳妥地建立——长期抵抗占领者的基地。我得说，我们并没有象南斯拉夫许多人那样抱有幻想，他们以为德国人对苏联的进攻一个月内就会结束，俄国人将摧毁他们。我们没有抱这样的幻想。后来，秋天，我们就已看到，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因此，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了同占领者进行一场长期斗争的方针。

在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发表了告人民书之后，以及在开了又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我们派了几个同志到各地去。他们去了舒马迪亚、塞尔维亚东部等地。我记得，我们派了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格鲁洛维奇、茨尔尼[斯雷滕·茹约维奇]以及另外几个同志去……科查·波波维奇去马契瓦，组织游击队……一句话，我们马上把人派出去了，在地方组织和当地同志的帮助下，着手组织武工队和游击队……

幸好，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了把人派出去的方针，而不同于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这些国家认为，应当把主要斗争放在城市，而不是放在农村进行。面向农民，面向内地，这是我们的路线。这是可以承受长期斗争的因素。当时这种局势在我们这里已成熟了，所以，幸好我们把我们的人派出去，而这样做使我们后来得以使游击队迅速发展，并且，使我们得以把那些来自城市的人，思想上有准备的人，以及经过考验的战士等等不断派到那些缺乏政治上经过充分锻炼的人的地方去。

我们在沃日多瓦茨^①后面的那幢房子里决定，我们全部转移到解放区去。我们是在那里从贝尔格莱德领导斗争的，外面的消息一直定期地传到贝尔格莱德。那时我们已把兰科维奇救了出来……他又在严酷的地下环境中，通过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同志进行工作。他们得到情报之后，就派人把情报交给我，而我在奈纳多维奇的家里第一次开始发布最高统帅部的公报。

塞尔维亚全境的特别通行证，我都有。我研究了，我们将在什么地方发动我们的主要攻势。我查看了塞尔维亚的地形图，发现对于我们最有利的地形是塞尔维亚西部，无论是对于确定我们斗争力量的方向，还是组织我们的游击队和建立某些解放区来说，都是极其有利的。的确，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会这么快就建立起这么大片的解放区。我之所以选择塞尔维亚西部，首先是因为那里山峦起伏，森林遍布，其次是，那里有斗争的传统，众所周知，那一地区的人对任何占领者都给过强有力的反抗。在贝尔格莱德，我们发布了最高统帅部的几份公报，最高统帅部是由我们几个人组成的。说实在的，我在奈纳多维奇的别墅里是孤单

① 沃日多瓦茨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山丘，那里的地势较高。——译者

单的一个人，既没有任何设备，也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那一小张纸，开本非常小的最高统帅部公报却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地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人们看到，我们南斯拉夫的斗争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而且具有由中央指挥的统一行动。

后来，我们决定到瓦列沃周围的已由游击队解放了的地区去，因为游击队在贝拉茨尔克瓦^①打响了第一枪之后已迅速地壮大了。当时我们有几个人。我记得，有我、兰科维奇、洛拉·里巴尔和伊万·米卢蒂诺维奇。

我们通知了所有的同志，并决定召开会议，即在斯托利策的克鲁帕尼召开军事和游击队会议之后，我们就前往斯托利策，在那里我们住在一所房子里，等着所有的同志都到齐。我得说，出乎我的预料，能够来参加会议的竟有斯洛文尼亚的同志，这令人极为高兴。

我认为，在斯托利策召开的军事和党的会议^②是我们举行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会议之一，在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一些意义极其重大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建立最高统帅部。我们还决定建立克罗地亚总司令部、斯洛文尼亚总司令部，等等。会上，我

① 这是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塞尔维亚起义开始。——原注

② 斯托利策会议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成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和伊沃·洛拉·里巴尔）以及各民族的军事和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表（塞尔维亚为斯雷滕·茹约维奇、菲利普·克利亚伊奇和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克罗地亚为拉德·康查尔和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斯洛文尼亚为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和米哈·马林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和斯洛博丹·普林齐普·塞利奥），还有塞尔维亚西部一些游击队的司令（科查·波波维奇、兹德拉夫科·约万诺维奇、德拉戈伊洛·杜迪奇和奈博伊沙·耶尔科维奇）。——原注

们还分析了整个国内政治形势，而且还就我们所知，分析了国际形势。会议还就战争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多数人当时就认为，战争将进行较长的时间，这一点为大家所接受。

最高统帅部决定，向乌日策进发，(乌日策已落入我们的手中)并把最高统帅部设在乌日策，以便使乌日策成为政治的和军事的领导中心，因为那时已建立了大片解放区。我们乘坐一辆小汽车前往，也就是说，我得到了一辆汽车，是科查·波波维奇送给我的，是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一辆高级轿车。有些人乘卡车，我们大家都经过柳博维伊的猫石峰，向乌日策方向前进。自然，我们在乌日策很容易地就安顿下来了，因为，该市破坏得不很厉害。我们在国民银行的大楼里安顿下来。这家银行当时存有大约六千万第纳尔，其中约有一千二百万银币，四千八百万纸币。那时第纳尔仍通用，于是，我们可以用这笔钱来支付应当支付的费用和用来供打仗之用。

在乌日策，我们掌握一些工厂，有皮革厂和纺织厂，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人们提供一点穿戴。我们还有一家兵工厂。的确，德国人把兵工厂炸坏了，但是，我们很快就把那些尚未炸坏的(而大多数机器都未炸坏)机器搬到银行里，搬进地下金库里，在那里我们装配了一座设备齐全的兵工厂。兵工厂开工了，任务繁重。每天生产大约四百支至四百五十支步枪，还生产弹药。

当我们在乌日策安顿下来之后，便开始认真地思考建立人民政权的问题。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全部旧政权。对旧政权的摧毁是如此彻底，以致给我们也带来了损失，因为，许多档案和地籍都烧毁了，而本来是不该把什么都销毁的。

在乌日策发生了对于我们全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切。乌日策

和整个这片解放区被称为“乌日策共和国”。我认为，这不无缘故。这一切都是确切的。因为，的确，在乌日策建立了人民政权，诞生了革命军队，在这里我们的游击队也已不是普通的游击队，而是经过良好军事训练的营、连和排了，配备有机关枪，还有一、两门火炮和其他武器。

乌日策对于全国进行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提高了人们的士气。在旧南斯拉夫垮台之后，出现了到那时为止曾是潜伏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在迅速地发展壮大。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也未能对一九四一年那段乌日策时期的重大意义给予充分的评价。^{*}

* 摘自一九五三年七月铁托就七月七日塞尔维亚人民起义日之际同贝尔格莱德电台主编的谈话(《言论集》，第八卷)。

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谈判

他们出卖了我们

在此期间，德国人开始在塞尔维亚发动攻势。他们运来了新的部队，并同卖国势力^①一起，从沙巴茨地区向我们解放区的部队发起进攻。我们的部队边打，边撤，从策尔、亚达尔后撤，然后撤到克鲁帕尼。我们在克鲁帕尼一直坚持到德国人离我们非常近为止。战斗在沙巴茨、上米拉诺瓦茨至克拉列沃长达一百公里的地区进行。

当时我们想，我们将在佩茨卡地区坚持比较长的时期，于是我号召马契瓦的人民，把牲口和粮食往这个方向撤，因为我们当时需要粮食。我得说，我对农民用牛驮和马拉井然有序地把粮食送进这些山区感到惊讶。

这表明，全体人民，这些农民同我们的斗争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切特尼克的宣传家们到老百姓中间去劝他们不要参加斗争，不要跟共产党人走，因为，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人要干这干那。

① 指塞尔维亚卖国政府的头目米兰·奈迪奇将军组织的军队。

——原注

他们散布了有关我们的各种流言蜚语，目的是让人民仇恨我们。但是，他们未能得逞。

十月二十六日，斯托利策会议之后一个月，我到拉夫纳山的布拉伊切去了，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再次举行会谈。我试图再次劝说他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然而，德拉扎顽固地认为，进行斗争的时候还未到来。这天夜里都是在紧张的会谈中度过的。会谈过程中，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要我们向他提供武器，枪支，一旦需要，他们好进行抵抗。我当时答应从乌日策给他们送去一千二百支新枪，我们向波斯尼亚和要求枪支的其他地区提供的枪支都是从乌日策送去的。他还要五百万第纳尔。枪，我是给他了，是五百支；钱，我没有给，因为没有机会给，原因是，他们首先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实际上，我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同德拉扎举行这次会谈的。跟我同去的有斯雷滕·茹约维奇和米塔尔·巴基奇。

当时，除了奈迪奇分子和廖蒂奇分子外，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已开始同占领者勾结。因此，我们去进行这次谈判，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还是去了，目的是为了防止流血，因为，我们已同切特尼克发生了几次冲突。我的出发点是，即便他不愿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那至少他也不要向我们进攻。因为，德军已沿着广阔的战线向乌日策挺进了。

当我还同他们会谈时，他们就对我设置好了圈套。我事先也估计到了这一点。我带了大约三十名游击队员，分乘两辆卡车。虽然所有的人都全副武装，携带着机关枪和自动步枪，但毕竟只有三十来个人。而在那里，在布拉伊切，却有许多切特尼克。乌日策波热加已在切特尼克之手。几天前，我们的舒马迪亚第一游击队司令米兰·布拉戈耶维奇在那里被他们打死了。

当我们在回来的路上，抵达乌日策波热加的桥头时，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一些切特尼克和宪兵，他们喊道：“站住！”我们停了下来。于是他们对我们说，我们不能过桥，必须返回原路，因为没有得到上校的准许。我们回到了一个兵营，里面住满了切特尼克，个个也都全副武装。我们只好等在那里，不知道等什么，等谁。我自己更是恼火，想下车，提抗议。这时，茹约维奇从车里跳下来，说：“你们在干什么？我们要直接找德拉扎上校，他同我们已达成了协议。你们的司令官在哪里。让他到这里来。”过了半小时，来了一位少校，表示歉意。他说：“先生，对不起，我同上校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我们等过桥的时候，他们把安在桥上的地雷拆除了，好让我们过桥。

然而，只过了几天，更确切地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日，切特尼克就向我们发动了全面进攻。一方面，从科谢里奇进攻，另一方面，从特雷什尼察进攻。从两面向我们夹击。在特雷什尼察，由青年们打了一场大仗，粉碎了切特尼克。我们首先打死了切特尼克的头目拉契奇。接着，当切特尼克从四面八方进攻时，一场主要的战斗便在乌日策波热加展开了，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的兵力肯定五倍于我们。因为，我自己只有两百名青年战士，还有一些工人。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我们的人数，但是，比他们少得多。不过，我们的武器不少，还有火炮和机关枪，所以我们把他们打得很惨。他们再也没有重整旗鼓。在乌日策波热加，我们的人接着转入向布拉伊切方向进攻。当时我们已接近拉夫纳山，已走了一多半路程。但是，我得到了情报，说德国人开着坦克已攻入布科夫。

德拉扎不知道德国人已攻入了布科夫，否则，他不会苦苦哀

求。他被我们的三支队伍包围了，他派来了一个军官，即米洛拉德·米蒂奇，来请求停火，要我们别再前进，要同我们达成协议。我第一次拒绝了。但是，当传来有关瓦列沃形势的消息，说德国人离我们越来越近，那位军官第二次来到，哀求我们停火时，我同意了停火。我很清楚，切特尼克当时为什么感到走投无路，因为，我们从腹背向他们猛烈进攻，把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顿。我命令停止向布拉伊切射击，同时通知我们的部队和各级指挥员：德国人已攻入布科夫，现在我要向乌日策方向前进，我们不能同时在两个方向作战，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部队调去打德国人。情况就是这样。停火了，切特尼克后撤了。我把部队的主力调向科谢里奇、布科夫，而一部分调向巴伊纳巴什塔。

十一月十八日，我们的代表同切特尼克的代表又进行了谈判。当时我们虽然形式上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和合作的协议。但是，协议达成之后，切特尼克并没有遵守过协议的一款一条。在达成协议之前，他们就已出卖了我们。例如，在克拉列沃，他们放弃了自己那部分阵地。因此，同切特尼克的这一合作告吹了。*

我说：不应等待

我们的力量在于人民。我们的力量不仅仅存在于一批人，而是恰恰存在于全体人民。这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这就是使我们得以坚持下来的力量，使我们充满不可战胜的信心的力量。

一九四一年，在南斯拉夫，在塞尔维亚，有些人想轻而易举地

*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文章《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军事著作》，第五卷)。

就取得荣誉，于是钻进森林，在那里坐等战争结束，然后再以解放者的面貌出现。在那个所谓的英雄的时代，为首的就是臭名昭彰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我在一九四一年曾同他举行过会谈。我是在我们已在塞尔维亚西部广大地区向占领者的大股力量展开大规模的战斗的时候到他那里去的。他当时在我们的解放区自由行动，走村串庄，建立了自己的切特尼克部队。我们那时未把我们和切特尼克加以区别。我们说：谁愿意参加切特尼克，就让他去好了；谁愿意参加游击队，就让他到我们这里来。然而，他们却说：谁参加切特尼克，就用不着打仗；谁想参加游击队，那就得勒紧裤带打仗。我在斯特鲁加尼克想向他伸出和解之手，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未能把他争取过来，未能使他同意采取行动。甚至在今天，国外有些人还在说什么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首先进入森林的。不错，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首先逃进森林的，而我们留在了城市，当时在城市里住有大量的居民和德军。我们在城里制定了今后作战的计划。我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米哈伊洛维奇首先躲进森林藏了起来；而我们是带着已制定好的计划进入森林的，我们决心从森林出发开始作战。我对米哈伊洛维奇说：“不要等了，因为，占领者会把我们消灭的”。他回答说：“不要去同一夜之间打垮了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那样一支军队打仗。要是我们抵抗的话，那塞尔维亚全体人民都会被消灭”。我对他说：“塞尔维亚人民只有斗争，才能得救。”我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在我们会谈前几天，正如米哈伊洛维奇的人在法庭上所说的^①，有一个盖世太保分子，德军

① 这里指的是—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六日，南斯拉夫军队最高军事法院在贝尔格莱德审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拉夫纳山组织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机构的成员。——原注

司令部的代表到了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我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否则我就不会去同他会谈了。我们继续战斗，解放了克鲁帕尼、洛兹尼察、乌日策波热加、乌日策、恰恰克、上米拉诺瓦茨以及其他地方，一直到桑贾克的一大片地区。然后，我又想同德拉扎会晤。我为了举行这次会晤邀请他走近一点，到他地盘的边上举行，德拉扎的地盘包括三至四个村庄以及拉夫纳山。他的人声称，德拉扎病了。而我们的同志反对我到他那里去，因为当时切特尼克已开始杀害我们的同志了。我说，“我要到那边去，因为我必须去，再试试能否制止自相残杀，不让德拉扎跑到奈迪奇那里去。”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投靠奈迪奇了。会谈时，我答应向他提供我们的乌日策工厂生产的两万五千发子弹和五百支枪。这些东西他都得到了。可是他不想接受我们提出的各条要求，这些要求你们肯定都知道。他只想得到枪、弹药和钱，并达成我们互不进攻的协议。那知，我们谈判完回来，切特尼克就向我们公开发起了进攻。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在乌日策波热加把他们的胡子兵打得稀里哗啦，把德拉扎赶进拉夫纳山。要不是他的代表米蒂奇当时来到司令部向我们苦苦哀求，我们那时就把德拉扎的军队消灭了。我们当时没有消灭他们，是犯了一个错误。*

* 摘自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泽蒙举行的被俘的前现役军官大会上的讲话(《言论集》，第二卷)。

“乌日策共和国”结束

我们的预感应验了

临近十一月底，形势越来越糟。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军开始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广大地区的解放区发动攻势，即开始实施德军司令部所谓的“乌日策方案”。这实际上是，德军在卖国贼军队的配合下，两个月来在塞尔维亚西部和舒马迪亚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攻势的继续和结束阶段。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以极其强大的兵力从好几个方面向乌日策进攻，以便摧毁解放区和消灭解放区的游击队。

尽管我们的部队在四面八方对德国的摩托化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却不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叫人难受的消息。我们获悉：留博维亚失陷，德军呈半圆形，从留博维亚、瓦列沃、上米拉诺瓦茨和克拉列沃地区向“乌日策共和国”腹地，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进攻。

今天，德军发动攻势的第三天，前线向我们报告：德国人已从克拉列沃突破，向恰恰克挺进，接着我们又得到消息说，从瓦列沃进攻的德军已占领了瓦列沃——乌日策这条道路上的重要山口——布科维并向科谢里奇进攻。对德国人来说，从那里到乌日

策就不远了。我们的部队(大约有来自舒马迪亚第二支队、瓦列沃支队和乌日策支队的六个连)无法守住阵地，无法阻止在飞机、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发起进攻的力量要强大得多的德军。在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方向上，防线被攻破了，而我们没有充分的把握，我们的部队是否有组织地撤退了，并在新的阵地上建立了防线。我们担心，德国人可能会继续使用屡试不爽的楔形队形进攻，继续迅速地推进，直逼乌日策。

我们的处境变得艰难了，因为切特尼克放弃了阵地，而且大部分加入了德军和卖国贼的军队，他们就是这样公开叛变的。当天晚上，十八点，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收听了伦敦电台的广播，广播员以娓娓动听的声音说，在南斯拉夫“德拉扎·米哈伊洛夫的英雄部队”如何“同敌人进行不断斗争”，英国人民如何“钦佩这一斗争”。

我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乌日策十之八九坚持不了多久了，不久，也许三、四天内就会失陷。因此，必须赶紧继续把武器、弹药、粮食、装备、现金、印刷厂、宣传材料全部撤走。撤退工作大部分是通过通向兹拉蒂博尔方向的公路进行的，为的是，有必要的话，可以继续往后撤，撤到桑贾克，因为，据我们估计，在桑贾克已有黑山的强大游击队。根据我们以前的命令，黑山和博卡游击队总司令部应当把这批黑山游击队调往塞尔维亚。

撤退伤员的工作，我们早就开始了，可是，情况表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可能使这项工作无法顺利地进行。我们早在十月底就下命令：在乌日策四周的兹拉蒂博尔山上作好准备，安置伤员，因为山上有不少旅游设施。然而，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开始从乌日策首先撤走重伤员，在此期间，乌日策的兵工厂发生了一次大爆

炸，许多工人被炸死炸伤。必须尽快把负伤的工人撤走。由于从前线每天都送来几十名伤员，情况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把如此大量的伤员全部转移到兹拉蒂博尔山上。我们只有三辆卡车，一辆大轿车和一辆救护车，加上几辆普通的马车和四轮大马车，这大体上就是我们可以用来运送重伤员和重病号的全部运输工具。我们很快就损失了那辆大轿车，因此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在从兹拉蒂博尔回来的途中，大轿车滑下了山坡。

多亏医务人员（戈伊科·尼科利什、德扬·波波维奇、久罗和尤尔卡·梅什特罗维奇等大夫）和驾驶员的杰出努力，撤退工作虽然遇到了种种困难，毕竟还是顺利地展开了。由于天气严寒，伤员们往往没有衣服，就只裹着被单或者毯子，用卡车和马车运走，然后安置在帕利萨德和克拉列沃沃达的一些住户、别墅和咖啡馆里。我们当时认为，要是我们把伤员转移到兹拉蒂博尔山上，那他们就保险了。我们当时以为德国人是不会来到那里的。遗憾的是，事态很快就表明，我们估计错了。

从乌日策撤退的工作是由米塔尔·巴基奇领导，在人民解放政权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大量的粮食、装备和其他物资分藏在山村里和山里的羊圈里，免得落入德国人之手，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一地区，老百姓也可以享用。我们手头有大量缴获的现金（五千五百万第纳尔，其中有一千万银币），于是我们决定，把现金全部撤走。这么多钱装了一卡车，总共一百零三箱，每箱重六十公斤，转移到帕利萨德去了。

我们怀着痛苦的心情期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看来形势没有任何希望变好，就这样度过了一夜。虽然我们事先采取了措施，在乌日策近郊阵地上组织抵抗，但是，我们并不抱幻想，并

不认为乌日策这个我们仍在塞尔维亚土地上坚守的最后一个城市我们还能长期地坚守下去。

我们的预感应验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我就得到了新的情报，使人毫不怀疑，乌日策就要失陷了。德国人从四面八方不断地进攻，接连不断地粉碎沿路分散后撤的游击队不那么特别有组织的抵抗。这一天恰恰克也失陷了。

科谢里奇方面的战事发展不利的消息使我尤为不安，我原以为，我们阻击那个方向敌军的部队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因为他们在布科维山脊上的防御阵地非常有利。然而，经过激烈的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十四点钟，德国人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占领了布科维，开进了科谢里奇，从而打通了通向波热加和乌日策的道路。

当我们获悉，从留博维亚开出的德军纵队，通过罗加契察，向巴伊纳巴什塔和乌日策进发时，我们更加感到不安了。在这个方向，我们没有强大的兵力，因此，德国人有迅速地，也许天黑时就攻入乌日策的危险。必须赶快进行阻击。由于没有别的部队，我们派了由乌日策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个工人营，去迎战德军纵队，工人营同波萨瓦支队的几个连一起，占领了卡迪尼查山上的阵地，还给这支队伍配备了一门山炮。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加速撤退工作。这样，最后一批伤员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撤离了乌日策，我们还撤走了我们的印刷厂，以及已印好而尚未装订的《联共(布)党史》。

设在国民银行金库里的最高统帅部，这一天工作照常进行，没有停顿。几乎随时都有传递消息的通讯员、当地部队和指挥部的首长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要求指示，要求增援。我们还通过电话同尚未落入德国人之手的地方取得了联系。有一次，

从科谢里奇有人打电话来说：“没事了，部队可以返回营地了”，因为，据说“危险已过去了”。这个人很可能是个德国人或切特尼克，他企图使我们上当，以便德国军队长驱直入乌日策，弄得我们措手不及，他做得太明显不过了。

黄昏时，佩拉·斯坦鲍利奇^①和科查·波波维奇^②抵达了最高统帅部，他们曾同切特尼克谈判。与他们同来的还有英国少校赫德森^③，如他所说，他来是为了取走自己的电台，然后返回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也正如料到的那样，这次会谈，象前几次会谈一样，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这次，切特尼克也拒绝握住我们伸给他们的合作之手。其实，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他们的了，因为他们的首领已决定最终地无可挽回地走上背叛的道路。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是在乌日策解放区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一夜未合眼，守候在电话机旁。

十一月二十九日，天亮了。清晨天空灰蒙蒙的，预示着这一天将是十分严峻的一天。飞机几乎不停地在城市上空盘旋，扔炸

① 佩塔尔·斯坦鲍利奇(一九一二—)，一九三五年加入南共。战时曾任塞尔维亚游击队总司令部司令。战后历任塞尔维亚总理、联邦政府总理、联邦议会主席等职，现为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共和国主席团成员。曾荣获人民英雄称号。佩拉为佩塔尔的昵称。——译者

② 科查·波波维奇(一九〇八—)，早年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三三年加入南共，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战时历任游击队支队司令、无产者第一旅(师、军)司令、塞尔维亚总司令部司令、第二集团军司令、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战后历任联邦政府外长、南副总统等职。曾荣获人民英雄称号。现为联邦会议成员。——译者

③ 杜安·赫德森系英国情报员。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〇年作为矿山工程师曾在南斯拉夫工作过。从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初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里工作。一九四四年三月从游击队的解放区前往英国。——原注

弹，用机关枪扫射。我们的高射机枪向飞机开火，但是一架飞机也未击落。于是我，还有几个同志用自动步枪打飞机。我们站在最高统帅部后面的小土岗上的混凝土掩体旁，把自动步枪贴近墙，向低空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开火。

传来消息说，德国摩托化纵队已开向乌日策。在乌日策市前面的阵地上，在茨尔诺科萨和卡迪尼雅查的山顶上，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这是设在乌日策市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能否守住？能守多久？我们心怀疑虑。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战士决心勇敢战斗，全力以赴牵制敌人，不让敌人迅速攻入乌日策。可是，这是否足以阻止在飞机和火炮的全力支援下发动猛烈进攻的摩托化纵队呢？

乌日策守不住，对此我没有抱幻想。但是，我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攻进来，因为我认为，我的命令将得到执行：在公路、沟渠和桥梁布雷并加以破坏，从而阻止德国摩托化部队前进。我在此之前就命令一位军官，一位几天前到我们乌日策这里来的中校在通向乌日策市的所有入口处，特别是从科谢里奇通向乌日策的那条公路上布雷，这是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入乌日策市的北部。

我们期待着从阵地上传来新的消息，怀着这样的心情度过了上午头几个小时。大约十一点钟，我得到消息说，科谢里奇上面的茨尔诺科萨山上的防线攻破了，德军已攻入卢日尼策河谷，从那里继续进攻，部分队伍开向波热加，主力部队开往乌日策。我得承认，我们未料到这方面的敌人如此迅速地攻破了防线。遗憾的是，情况表明，茨尔诺科萨的守卫者，二百一二百五十名战士未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作了估计，认为是撤离乌日策的最后时刻

了。在我之前，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里巴尔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其他一些同志都走了。奉命守卫乌日策市以南阵地的部队也开走了。

几乎是在最后的关头，当德军已经接近乌日策的时候，我才离开这个城市，登上一辆汽车，开往兹拉蒂博尔。跟我一起乘坐这辆车的有赫德森、乌日策支队政委米林科·库希奇、报务员韦利科·德拉吉切维奇和我的警卫员博什科·乔利奇。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前停了车，下车后遇到一些战士，其中有洛拉·里巴尔。我突然转向赫德森，并对他说：

“你听着，你说说，现在是谁在同德国人斗争？是我们还是切特尼克？”

我没有得到答复。他看上去很平静、漠不关心的样子，显得他四周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

我们沿着一个山脊走，看到在我们脚下的公路上，德军步兵下了卡车，立即排成射击队形，从公路两侧往山上爬。局势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更糟糕的是，飞得很低的飞机无情地扫射这片地区，常常迫使我们躲起来。

我心想，飞机已经发现我们，不断地用机枪扫射我们所在的这条乡间小道。

突然，德拉吉切维奇发现德军士兵扛着机枪正向我们走来。他们很近，距离我们一百米左右。德拉吉切维奇惊恐地提醒我们，跳起来，开始穿过矮树丛逃跑，我们三人也跟着他跑了起来。赫德森跑得很快，我也跑得不慢，尽管我穿了很重的皮上衣，挂着望远镜，还佩着一支大毛瑟枪和别着一枚反坦克手榴弹。为了跑起来轻松些、快些，德拉吉切维奇甚至把斗篷和手枪都扔了。

我们的出现或许使德国人感到意外，他们没有立即开火。我

们跑了一段路之后，才听到身后响起了枪声。我拼命跑，子弹在四周开花。我心里想：完了，这下完了！我们走运的是，晚秋时节白天短，夜幕和晚间的雾气大大减弱了能见度。突然，我一边跑着，发现身后响起了一发闪光弹。最初，我想德国人是为了照亮这片地区以便能够更准地向我们开火，但是马上我又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这是一颗火箭弹，告诉步兵在什么地方停下。

我是对的。德国人在离马奇卡特村不远处停步不前了。

我们稍作喘息后，放慢了步子，沿着乡间小道，向查耶蒂纳走去。一路上把我所遇到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很快我就收集了大约三十名战士。我们坐在一个小树林里稍事休息。

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听着！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指挥过这样小的部队，现在，你们归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中的任何人不得做任何事情。”

就这样，那天晚上，我成了游击队的一个排的排长。很可能，没有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过这样的遭遇。而在我们的游击战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向导，走了好几个小时。临近午夜时，我们看到有亮光。我们走近才发觉从一座房子里传出歌声。我断定，这是切特尼克，他们正为游击队的失败而在表达自己的高兴心情。我的战士中有人建议袭击他们。

我说，“不，我们不袭击他们，我们得往前走，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经过艰苦的行军，我们到了查耶蒂纳。在那里，我们搞到了一辆卡车，很快不知从哪里又开来了第二辆。我们乘上卡车，开到帕利萨德。在贝尔格莱德的律师帕夫洛维奇的别墅里，我找到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心神不定，

因为都担心我已牺牲。

我几乎快站不住了。我一坐下，就疲倦得不得了。对大批伤员的命运深为担心，使我在沉睡之前告诉他们：

“同志们，你们听着！赶紧撤退伤员，今晚不会，但是明天一早，德国人就会来到这里。”

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后来，我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获悉，那天晚上，在德军第三百四十二师司令部里，举行了各团团长和独立部队指挥官会议，分派了第二天“在乌日策以南追击敌人”的任务。

艰难辛苦、令人沮丧的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对于我们大家，对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来说，这一天有可能成为致命的一天。我自己可以说，差一点被打死在扎布奇耶村和留巴涅之间的那条泥泞的乡间小道上。最高统帅部和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都幸免于难：卡德尔在马奇卡特村遭到猛烈的轰炸，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几个人牺牲了。兰科维奇和吉拉斯在贝拉泽姆利亚附近，也遭到轰炸，在坦克炮火下死里逃生。洛拉·里巴尔也是在严峻的形势下，在最后关头才保住了性命。他还没有到达，但是据说，他同德拉甘·帕夫洛维奇·希利亚一起在德国人鼻子底下逃跑了。

整整一天都在匆匆忙忙地撤退来自各个支队的人、伤员、难民、武器和物资。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是有组织地在工作，不如说是自发地在干。尽管条件困难、不利，在作出超人的努力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撤退伤员这一工作中，跟军队一起撤离的乌日策及其四周地区的妇女表现突出。印刷厂和《联共(布)党史》一书的铅字也用牛车运走。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伤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这本书，这

是我们党组织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尽管我们累得快站不住了，我们没有时间喘口气，因为要办的事太多，要解决的问题数不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的工作缺乏组织性，有很大的自发性：部队沿途到处都有，在后撤，把他们集合起来了，往往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伤员都是匆匆忙忙撤走的，几乎是在德军坦克开到前不久才撤走的；难民情绪低落，惊恐不安，使得情况更加混乱。

我们在晚间召开的最高统帅部会议上研究了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这一切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我们总共四个人开会：卡德尔、吉拉斯、茹约维奇（他受了重伤）和我。兰科维奇和里巴尔还在乌瓦茨河的彼岸，跟从各条战线上撤下来的部队在一起。

在会上，我们决定，尽早整顿秩序，对部队实行政改编、予以加强并派到阵地上去，对伤员和难民加以照顾，组织好供应等事项。

在最高统帅部的这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决定，立即派几位军事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到塞尔维亚西部去，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接上头并改编和加强这些部队。我们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以下同志：南共省委委员、塞尔维亚总司令部成员米尔科·托米奇、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总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格鲁洛维奇和弗拉达·泽切维奇神父。跟他们一起回去的还有乌日策地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武科拉·达比奇、维托米尔·奇沃罗维奇等人）。跟这批人一起走的还有赫德森上尉，他表示希望回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据说是向他施加影响，促使他同游击队和解。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并允许他把电台带走。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由于我对同德拉扎达成协议与和解的可能性存有幻想，因为我完

全清楚，切特尼克已经最终地和不可挽回地替占领者效劳去了，而是简单地由于我不想使同英国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在科卢巴尔营的一百名左右的战士组成的一个连的护送下，这批人第二天晚上就动身去塞尔维亚了。几天之后，我们又把人数更多的一批人派回塞尔维亚。

派部队进塞尔维亚，这在当时是冒很大风险的。我们的这个决定不是深思熟虑的，我同意了这个决定，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我得承认，我之所以同意这一决定，是由于有几位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无论如何派部队进塞尔维亚，据说，我们不应该把这片土地空出来，必须保卫人民，不受恐怖统治之害。战士们到了那里之后，占领军、奈迪奇分子和切特尼克不断象追捕野兽似的围歼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保卫人民呢？他们在哪一个村庄都站不住脚，到了冬天，他们几乎全部被消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夕

不吝惜弹药

十二月十二日晚，负责桑贾克作战的黑山支队司令阿尔索·约万诺维奇^①前来见我们。这是我与他的第二次见面，他不久就成了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我的亲密助手。我是在十月份才认识他的，他当时跟米塔尔·巴基奇、赫德森上尉和扎里伊·奥斯托伊奇少校一起来到乌日策。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坏，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生气、能干、有军事教养的人，作为总参谋部军官，他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特别是在完成司令部作业、计划、组织和实施战术行动方面，令人遗憾的是，在战略问题上，他几乎一窍不通。

我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通，他一声不响，没有说一句辩白的话。

我告诉他，我们决定组建无产者第一旅，他的支队中的两个

① 阿尔索·约万诺维奇（一九〇七—一九四八），南人民军上将，原为旧南斯拉夫军队军官，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战时任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战后任南人民军总参谋长。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赴苏学习，回国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开除南共后，约支持情报局决议，逃往国外，在南罗边境被击毙。——译者

营将被编进该旅，我命令他的部队解放鲁多，我们将在鲁多组建无产者第一旅。

我一直在考虑，或许调他到最高统帅部来当参谋长是合适的，尽管关于这件事当时我没有对他说过，也没有对其他同志说过。独立地去完成任务，去指挥部队，他显然是不胜任的，普列夫列一仗最雄辩地表明了这一点。然而，我当时认为，从事司令部的作业，贯彻执行我的想法和决定，他将是胜任的。我们最高统帅部里十分需要有军事知识的人，而除我以外，别人甚至连地形图都看不大懂。令人遗憾的是，我的期望后来落空了，因为后来的情况表明，他连这一职务也胜任不了。

十二月十三日，兰科维奇和里巴尔从罗多伊尼亚来到弗尔尼亚克，同我们会合。

第二天，我们都呆在屋子里，出乎我们意料，意大利人来了，我们差一点都遭了殃。一部分原因是天气寒冷，另一部分原因是近来比较平静，我们放松了警惕性。我们估计，意大利人从普里耶波列出来的话，不可能奇袭我们，因为在普里耶波列附近有我们桑贾克的一个连。

然而，结果是我们错了。在十二月份的那个寒冷的清晨，意大利人离开普里耶波列，不受阻碍地开到了弗尔尼亞克村。米莱舍夫指挥的那个连的警卫排看到敌人就后撤了，而没有向我们报告。

我们当时在屋子里。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伤员：茹约维奇和克利亚伊奇。他们两人躺在一张床上，一直在谈论什么问题。一名警卫战士进屋时，我正好醒来，他走近我，悄声说：

“外面有情况。下面听到有敲门声。”

我没有惊动别人，我走到屋外观察，看看有什么情况。天刚

破晓，半明半暗。雾气减弱了能见度，一开始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由于什么都没发现，我生气地放下望远镜。在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才看到，有一队人马正从下面往上爬，直向我们走来。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这支队伍，吃不准这是我们的部队还是敌人的部队。

我再仔细看，发现有人披着披肩。糟了，是意大利人！

我飞奔进屋，嚷道：

“走，快走！意大利人来了，就在屋子附近！”

所有的人一转眼都起身出了屋。

意大利人已经在附近。而我的那匹马——一匹漂亮的英国良种赛马——已备好鞍，因为我本来打算那天一早要骑它。鞍子上还挂着我的皮包，里面有一台照相机。

我冲着饲养员嚷道：“马！把马牵来！”他立即去牵马，但是被迫回来，因为意大利士兵已经到了马附近。

我们的处境不令人羡慕。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营在科萨蒂察，而大部分由青年人组成的乌日策连在德雷诺瓦，离我们大约二、三公里。我们几乎被切断了。我派通信员去找那个连，同时我们准备战斗。我们占据了公路上方的隐蔽处，从栅栏、井架、仓库、墙角的后面，朝着敌人的方向开了火。一时，我们把意大利人弄得张皇失措，我们得到了时间重新组织起来，我们相互掩护，朝北撤，撤向一座小树林。

意大利人用迫击炮打我们。*

我们往上撤，我们刚走不多远，就看见乌日策青年连赶来了。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赶来了！必定是跑着来的。

* 摘自约·布·铁托：《战时回忆录》（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十二日、十九日、二十六日和六月二日，《前线》杂志。）

我对他们的连长留比契奇——当时是个青年人，现在已是将军——说：“占据这里的阵地，打退意大利人！”我虽这么说，但我明白，两个营的敌人在对付由青年人组成的一个连。他们都很年轻，几乎还是孩子，但是他们把意大利人打退了。

我们的这些青年人作战很英勇。各种口径的掷弹筒、机关枪和步枪，都开了火。意大利人也不吝惜弹药，因为弹药他们有的是。我们的战士弹药不多，但是他们瞄得准。^{*}

* 摘自一九五九年五月八日与《青春报》代表的谈话(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二卷)。

建立无产者第一旅

我问战士们有什么想法

我们没有顶住敌人的第一次攻势。就我们游击队的建制而言，我们当时只有游击支队，下分小队，但是同时已经组建了营。例如，瓦列沃支队已经划分为营。而克拉古耶瓦茨支队，也即舒马迪亚支队，以及克拉列沃支队也已有营的建制，尽管不这么叫。

敌人发动第一次攻势时，我们的一个基本弱点在于我们当时没有集中的指挥部。最高统帅部必须逐个指挥每一个支队。不存在可以自上而下传递命令的军事单位，也就是说上下联系不够，缺乏协调。尽管战士们是英勇的，是作了努力的，这个弱点严重影响战斗的结局。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当我们从塞尔维亚撤退到桑贾克的时候，我开始考虑今后的作战方式，考虑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建制。

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来建立大部队，我们也没有时间来等待建立起那么多支队和营。我考虑，我们还是得着手建立具有正规形式的部队，即使人员少一些。我们建立了无产者第一旅，作为完成战略性任务的作战部队，把它作为进一步建立正规军的核心。我当时的目标是建立几个旅，关于师，当时还没有想过。

我们的部队撤离塞尔维亚时被打散了，但是各个支队多多少少还是在一起。克拉列沃营位于科萨蒂察。伊巴尔矿工连在这个营的编成内。克拉古耶瓦茨支队和贝尔格莱德支队位于诺瓦瓦罗什。我和最高统帅部搬到了德雷诺瓦，我们的部队还都在后面。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总共只有八名警卫。此外，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受了伤的茨尔尼[斯雷滕·茹约维奇]和菲恰[菲利普·克利亚伊奇]。我当时在考虑给这些部队以什么样的称呼。塞尔维亚的情况表明，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更乐于在家乡作战。我注意到，从塞尔维亚撤退时，撤离的大多数是工人。在贝尔格莱德支队、克拉古耶瓦茨支队和克拉列沃支队中，大多数人是产业工人，尽管那里也有一部分最觉悟的农家子弟。于是我决心组建旅，并给予无产者的称号。

有一天，我前往科萨蒂察，去看望在那里休整的战士，并同他们谈谈，看他们有什么想法。我问他们：同志们，你们现在懂得了我们斗争的实质，你们是工人，你们懂得我们的斗争必须具有革命斗争的性质，我们的斗争不只是解放斗争。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必须挑起最重的担子，工人必须作出最大的贡献。因此，我想，我们应当建立无产者旅。你们是否愿意加入无产者旅？无产者旅将有铁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必须建立在你们的觉悟的基础上，那就是你们不仅是为反对法西斯而战，而且是为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战。

这时，后来当上了将军，在解放时去世的帕维契奇上尉对我说：统帅同志，我是伊巴尔矿工连连长，空军上尉帕维契奇(他曾是旧南斯拉夫军队军官)，请您允许我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无产者旅，这有什么意义？

作为旧南斯拉夫军官，关于无产者，他听到过许多说法，说

他们是破坏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他是一个爱国志士，但是由于他以前所受的教育，他无法理解。我回答他说，我们现在团结的不只是无产者，不只是工人，而是南斯拉夫所有的爱国志士。在无产者旅中，现在在这个第一旅中，以后在第二旅和接着建立的其他旅中，将不只是有工人，也有农民和其他爱国志士，但是工人将成为这些旅的核心。由于他们能够最深刻地理解斗争的实质，在这场斗争中，他们理应起主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必须表现出是最坚韧不拔的，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斗争，而且也是为农民，为解放全体人民而斗争。我说了，我们将给这些部队以无产者的称号，因为这使每一个战士有义务作出最大的努力，有义务作出榜样，让人看到应该如何战斗。我们现在建立的是正规部队，而不是游击支队，是派到哪里就去哪里的部队，而不是地方游击队。因此，它们将在各地作战，将在没有举行起义的地方作战，同时将播下友爱和团结的种子，因为在这些部队里有塞尔维亚人，也有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民族。帕维契奇上尉说，“好，既然是这样，那我赞成！”

最高统帅部位于诺瓦瓦罗什，我们开了会，决定尽早建立无产者旅。同志们一致同意在鲁多镇完成这项工作。

鲁多是继乌日策之后，我们能让战士们稍事休整的第一个城镇。当时，黑山的两个营也已赶到鲁多。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我们的部队在鲁多集合，我向他们解释，无产者第一旅将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战斗前景如何。

在整个战争时期，无产者第一旅始终同其他无产者旅一起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它走过的道路是光荣的。无产者第一旅的建立表明这是我们的一个很成功的想法。无产者第一旅是我军的胚胎。*

* 摘自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就南斯拉夫军队建立九周年与米兰·日日利少将和米洛拉德·亚乌科维奇少校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五卷)。

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应当让人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
和以什么方式开始干起来的

在我们后来占据福查之后，我发现有些战士既不想当游击队，也不想成为切特尼克。我就说：称他们为志愿军！本着这一意思，我遂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发布了关于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的命令。早在一月上半月，我就开始考虑这件事。我们到达亚霍里纳时，就建立了第一志愿支队。

早在一九四一年，我们在希特勒的欧洲堡垒里建立了解放军并有一支人数不少的军队。在全国，我们大约有八万名战士。

当时，我们已经同全国各地的指挥部建立了联系，因此，我们对于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是比较了解的，可以做到统一指挥并下达任务。当时起义正席卷越来越多的地区，变成一场人民解放战争。我们一九四一年时就是如此，应当让人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开始干起来了。谁都无法否认我们的这些事实。

在敌人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在波斯尼亚东部发动第二次攻势之后，我们的主力部队突向南方，解放了以福查为中心的一片新地区。我们利用在福查的这段时间来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和人民新

政权。当时确定了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性质和职责，明确指出，这些原则适用于全国。同时，在我国的其他地区兴起了武装斗争，建立起游击队的新部队，扩大了解放区。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觉察到我们的人民解放运动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占领军的威胁，于是协调了行动，第一次计划进行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在卖国贼的大力帮助下，发动了第三次攻势。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战斗，直到一九四二年年中。但是，我们不仅击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而且还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几个新旅。

同时，在波斯尼亚西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亞除了已有的部队外，又建立了一批新旅和别的游击队队伍。我认为，环境对于在这些地区进一步扩大武装斗争十分有利，于是我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底决定离开泽伦戈拉，向波斯尼亚西部进发。当时跟最高统帅部在一起的主要是几个无产者旅。在八、九月的这次进军中，我们摧毁了敌人的许多据点，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同那些地方，首先是同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亞克拉伊纳的游击队联络上了。我们的到来，使已有的解放区大为扩大。十一月初，我们到当时为止最大一次集中了兵力，解放了比哈奇，使它成了这个大解放区的中心。战后，我从审阅德国档案的历史学家那里获悉，德国人把这个解放区称为“铁托国”。

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和游击队的壮大，对游击队实行改组的条件成熟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组建了头八个师，其中有五个师编入头两个军，而其他三个师直属最高统帅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这个称呼改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

*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和展望》(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游击队的海军

我们只是发布了命令，
作了指示，仅此而已

一九四二年夏天，最高统帅部率领几个战无不胜的无产者旅，从黑山到达普罗佐尔——利夫诺——格拉莫奇地区，廓清了从科尼茨到格拉莫奇的整个地区，格拉莫奇是在几天之前解放的。

最高统帅部设在格拉莫奇，要各地的领导同志前来接受新的指示并汇报当地的局势。达尔马提亚的一批同志来到了格拉莫奇。

跟这批同志一起来的有当时的上校，现在的将军什科尔皮克和他的儿子，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小什科尔皮克很年轻，对于如何成功地在海上骚扰占领者，有各种各样的计划。开始时，我觉得他讲的话并不使人觉得很令人信服，但是，当我同他具体地探讨各种技术上的可能性时，我觉得，是在游击斗争的这个方面夺取胜利的时候了。

我们立即下达了命令，建立游击队的海军。任命了司令部人员，确定在波德戈拉设立基地。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其余一切就都是下面的同志的任务。

在物质方面，最高统帅部能向我们的海军战士提供什么援助呢？什么都提供不了。最高统帅部只是发布了命令，作了指示，仅此而已。其他一切就听凭我们的同志发挥建设性的主动精神了，我们的英雄们几乎是赤手空拳，驾着木船，在我们蓝色的亚得里亚海上同意大利占领者，后来是同德国占领者的铁甲军舰作战。*

* 摘自《写在我们海军诞生日之际》一文（铁托：《言论集》，第七卷）。

“比哈奇共和国”

真正的人民政权

最高统帅部和几个无产者旅，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战士们来到克拉伊纳以及一九四二年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部队共同作战，对于起义后来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战争第二年对敌人取得的许多次胜利，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比哈奇战役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一批新的旅的建立，推动了这批旅组建成师和军。当时，大约有八十万敌军对付我们的十五万名战士，这一事实最有力地说明，我军具有多大的力量。

一九四二年岁末，比哈奇成了解放区的首府，解放区的面积几占战前南斯拉夫的五分之一，超过了比利时、瑞士等欧洲国家的面积。

老百姓称这一大片连在一起的解放区为“比哈奇共和国”，它的存在使得这个地区各个领域的活动都十分活跃。在这里举行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军医代表大会，在这里还举办了党的和其他方面的许多训练班。在解放区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体系。人民政权同社会政治组织和军队合作，在解放区边缘地区抢收庄稼，组织生

产服装、鞋类以及我军所需要的一切。

还在半解放区，甚至在敌占区开始建立得到人民信任的人民解放委员会。人民解放委员会越来越成为真正的人民政权，它除了向我们的部队提供支援外，还完成其他许多任务。因此，一九四二年秋天，情况表明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的总的政治机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比哈奇举行的历 史性 大会上，组成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代表机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组成为 南斯拉夫 各族人民真正的 友爱和团结， 为一种新的、 比较公正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 摘自贝尔格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出版的《比 哈 奇共和国》一书的附录(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七卷)。

奈雷特瓦之战

我们必须了解敌人的意图

这次战役开始于敌人在科尔敦发起的第四次攻势^①，从科尔敦跟随我们一起撤退的大约有八万人，包括妇孺，他们想逃避形形色色的敌人的屠杀，逃避德国人、乌斯塔沙、意大利人、切特尼克。

早在科尔敦的卡尔洛瓦茨附近作战时，我们就估计，敌人在准备发动一场新攻势。我们得到各种情报。由于我们当时很了解在各条战线上的情况，了解柏林—罗马轴心处于何等状况，我们明白，正在酝酿某种重大行动。

当然，敌人在拟订自己的战略计划，我们也没有睡大觉：我和同志们在制订我们自己的战略计划。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世面，我们已经能够迅速地作出估计，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意味着什么，将导向何处。敌人的行动表明，这一次不是要在狭小的范围内来包围跟随最高统帅部的部队，而是一次重大的行

① 敌人的第四次攻势指的是德军、意军和伪军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四月期间发动的战役，目的在于消灭波斯尼亚西部、巴尼亚、科尔敦和达尔马提亚以及克罗地亚独立国其他地区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

——原注

动，目的在于一并消灭我们的作战集群和最高统帅部，继而全部消灭我军。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意图。鉴于我直接指挥下的几个师在波斯尼亚西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作战，我们明白，敌人的意图是，把我们赶到不具备实施机动、逃避正面冲突的有利条件的地区，也即把我们赶向山区，赶向普罗佐尔、黑塞哥维那，继而赶向黑山。然而，我们的计划和敌人的计划就行动的方向而言，看来是吻合的。因为我一直在考虑，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么多部队放在这些地区，我们应当把部队调到当时斗争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地区。我们打算开赴黑山，继而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以及向马其顿进发，那里有可能动员大批新战士入伍。

因此，敌我这两个战略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是吻合的。由于我估计敌人将对我们实行大包围，我认为，普罗佐尔是我们必须占据的最重要的地方。普罗佐尔过去在我们手里，但是在第三师开赴波斯尼亚中部之后，意大利人又把它占领了。我们必须把意大利人从普罗佐尔赶走，这一点我们办到了。同时，我们决定，派一个师经伊莫茨基前往德雷日尼察，切断通往莫斯塔尔的公路，而从波斯尼亚中部赶来的一师，则应占领马克连。无产者第二师则随同我一起从比哈奇前往普罗佐尔。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战略计划的第一部分是如何结束的。我们消灭了意大利“穆尔杰”师，缴获了它的全部装备，火炮和其他武器，卡车和大轿车，缴获了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在奈雷特瓦河和普罗佐尔受了重创。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阻止了德国人占领马克连。接着，巴尼亚第七师和达尔马提亚第九师与上述三个师会合。尽管我们在那里已有五个师，我们却未能向前推进，因为我们有四千名伤员和伤寒病号。由于伤员的关系，我们在那里又呆

了三个星期。我们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之后，本可以经由奈雷特瓦河上的几座桥，继续向前挺进。但是，伤员怎么办呢？他们会遭殃。此外，我前面已经说过，跟随我们的还有大约八万难民。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很大的问题，通常的军队所没有的问题。因为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军队——而我认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军队——把为伤员生死而战视为自己的任务。你们知道，这对伤员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人人都知道，我们不会把他弃之不顾，听凭敌人处置，而是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抬着他们，拯救他们。万幸的是，我们从德国人那里缴获了许多卡车和大轿车，我们利用来运送伤员和病号。

奈雷特瓦河谷和拉马河谷的这场战斗进行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从敌人发动攻势算起，则进行了两个月。

我们特别困难的是有四千名伤员和病号。我们没有粮食，因此要是我们没有从意大利人那里缴获各种食品的话，我们就很惨了。我们首先保证伤员有吃的，剩下不多的食品再分给战士。但是，疲乏和饥饿使得许多战士筋疲力竭，常常因此而牺牲。我还记得，我们渡过奈雷特瓦河，我见有一名战士坐在一个地方，靠着一杆枪。我对他说：“同志，全都走了，我们是最后一批人了”。他不回答。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倒下了。我仔细一看，他已死了，心脏已停止了跳动。而这样的人为数不少。

我们这一胜利十分重要。我们向德国人表明，我们是懂得打仗的，我们能够打退他们，如果我们拥有他们所拥有的武器，他们早就被赶出我们的国土了。

在这场战斗中，敌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伪军——的兵力很强。切特尼克就有大约二万五千人。敌人总共约有九万人，而且装备比我们好得多。我们当时只有二万战士，我们还得保护和

拯救四千名伤员和病号。

渡过奈雷特瓦河以后，我们继续实施我们的战略计划：消灭切特尼克，解放奈韦西涅和黑塞哥维那的其他城市，强渡德里纳河，向桑贾克挺进，给部队补充新战士，等等。

三月下半月，我们的几个师在黑塞哥维那东部实施强攻时，击溃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集结在那里的切特尼克，他们本想给我们以所谓的致命打击。在格拉瓦蒂切沃、奈韦西涅、克尔斯塔茨、乌洛格以及最后在卡利诺维克的战斗中，切特尼克的部队遭到重创。我们还夺得意大利人给他们的两门榴弹炮。

由于在这些战斗中遭到惨败，切特尼克再也未能恢复元气。他们的队伍人心混乱，四处逃窜。我们的这一胜利也标志着奈雷特瓦之战最后一个阶段的结束。

我们的部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奈雷特瓦战役中，我们俘虏了一大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其中包括德国人的一名营长，名叫施特雷克。当然，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干掉，因为遵循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款。

尽管我们完全知道，德国人不仅杀害我们被俘的战士，而且还杀害我们的伤员和病号，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德国俘虏干掉，因此我们建议交换俘虏，德国人立即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我们的三位同志^①前去谈判，给他们的指示是就交换俘虏问题进行会谈，从而使德国人承认我军作为交战一方的地位。我们只办成了交换俘虏，从而把我们的许多同志从刽子手的魔掌中解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各个部队中去。

在这件事情上，我遭到斯大林的责难，我是通过共产国际向

① 他们是科查·波波维奇、米洛万·吉拉斯和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原注

他报告的。我报告说，我们在同德国人交换俘虏，原因之一是饥饿威胁着我们，人们死于筋疲力竭。他对我的答复十分粗暴，指责我们同敌人交换俘虏。我们不同敌人交换俘虏，又能同谁去交换？我当时对斯大林作了简要的答复：如果你们不能援助我们，就不要干预我们，我们自己会设法对付。一九四四年，我在莫斯科见到斯大林，他对于我作了这样一个答复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我当时望着他说：“斯大林同志，你处在我的地位的话，很可能你的答复会更粗暴。”他听了没有作声。*

革命的命运

可以说，奈雷特瓦战役决定了我国革命的命运。在这场战役中，联合起来的占领者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乌斯塔沙军队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的援助下，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这是我们最光荣，同时也是最人道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德军和意军遭到痛击，而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一起冲向我们的阵地的切特尼克被击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再也恢复不了元气。

在这次攻势中，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得到了什么呢？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再次丧失了他们本来想占领的整个地区，因为我们留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很快就收复了整个这一地区。他们唯一做到的是焚毁村庄，掠夺居民，使百姓血流成河，迫使数万名妇孺老人离乡背井，逃进大雪纷飞的森林或者撤退到其他地区去。他们

* 摘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亚布兰尼察举行的纪念奈雷特瓦战役三十五周年的盛大集会上的讲话和祝词(铁托：《七八年言论集》)。

做到的是，使人民对他们的仇恨变得更深。

对于我们来说，敌人第四次攻势的特点是为拯救伤员而斗争。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伤员。我们的战士从未对此表示不满。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精神因素，因为伤员们知道，我们不会把他们弃之不顾。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救一个伤员而牺牲两、三个战士，正是这一点更加提高了我军的士气。我们不仅抽调一部分战士去拯救伤员，而且还确定达尔马提亚第九师全师、第七师的一部分以及俘虏来抬伤员和病号。这是很重的负担，但同时也是对这些同志的义务。当然，后果是严重的，因为这两个师的大部分战士从他们所抬的病号那里传染上了伤寒，结果使我们的突击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又累又饿的战士往往一坐下就死去了。看到这种场面，是令人很痛心的。

跟随我们的老百姓尽管无能为力，还是竭尽所能帮助我们的伤员。我还记得一件事。我们渡过奈雷特瓦河以后，我遇到一位不过十六、七岁的姑娘，她坐在一位濒于死亡的伤员身边。伤员的伤口流着血，无法救援他。伤员显然要死了，守在他身边是徒劳的，我对姑娘说，走吧。但是，姑娘不肯把伤员留下不管，坐在他身边哭泣。这件事表明，我们的人民理解自己的职责，富有牺牲精神地救援伤员。

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全体战士，充满了无论如何要取胜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这样一种精神。要是别的军队的话，可能投降了，不会继续打下去，而我们这里没有逃亡的现象。有的只是我们定能克服这些困难的信念。*

* 摘自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奈雷特瓦》写的文章(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八卷)。

苏捷斯卡之战

只要我们中间还有人
活着，敌人休想通过

当敌人的第四次攻势结束于奈雷特瓦河，当我们在这次战役中以胜利者的面貌出现以后，最高统帅部采纳了我的计划：向黑山挺进，粉碎那里的切特尼克，改善政治形势，然后开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以便截断德国人同马其顿的联系，对于德国人的交通来说，马其顿是最敏感的。此外，我们认为，拿下莱斯科瓦茨和其他工业城市将十分有利，我们可以征集兵员，加强和扩大我们的几个旅和师。但是，敌人肯定觉察到了我们的计划，开始准备第五次攻势。^①

五月底的一天夜里，我接到达尔马提亚第二旅的无线电报。该旅的任务是占据上巴雷，不让德国人截断米林克拉德的道路，我在那里的一次战斗中受了伤。达尔马提亚第二旅英勇地完成了任务，尽管在战斗中，他们的处境极其困难。一位营长从阵地上

^① 敌人的第五次攻势包括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的军队和伪军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在桑贾克和黑山发动的战斗，目的在于消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主力作战集群。——原注

给我一份报告说，他的营三分之二的人牺牲了，但是他们仍将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他报告说：“只要我们中间还有人活着，德国人休想通过。”

我和最高统帅部撤到苏捷斯卡河的峡谷，第二天是我在解放斗争时期最艰难的一天，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来拯救伤员。*

* * *

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苏捷斯卡战役都具有巨大意义。因为在这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使得有关我们的斗争的真相得以传到国外，传到全世界，使人们知道谁在这里战斗。在此以前，南斯拉夫的斗争被神秘化了，被说成是切特尼克和鬼知道什么样的卖国贼在进行，我们则不得不咬紧牙关，既同德国人作战，又同意大利人作战，既反对保加利亚占领者又反对匈牙利占领者。

苏捷斯卡战役还表明了另一个事实。我们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作战的，我们只有轻武器，弹药不多，我们得爱惜每一颗子弹。我们要对付的敌人拥有最现代化的重武器，有飞机坦克，有医疗设施和足够的粮草。而我们吃的是野菜、草根和马肉，才能勉强维持生命，才能抗击越来越猖狂地向我们发动进攻的敌人。但是，在这里什么取得了胜利？胜利的是共产党员始终站在前列进行战斗。共产党员中间的那种精神、团结和党的路线为所有的战士所接受，一无例外，不论他们是不是党员。他们是战士，每遇战斗间隙，就发奋学习不少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便在理论上武装自己，掌握能够战胜一切人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今天也应该是这样。在经过许多年的平静岁月之后，我们年轻的一代应当了解，他们的先辈，战时的年轻一代是如何渴求知识，是如何努力掌握

* 摘自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一日在布里俄尼就七月十三日黑山人民起义日与铁托格勒电台台长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而他们是知道明天或许会牺牲的。

我们当时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将来为个人谋求高官厚禄。我们中间谁都不知道明天是否还会活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战斗的。

我已经说过，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特殊的装备，只有一些轻武器。就是这点武器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当时，一九四三年，在这一次大战役期间，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们一支手枪，一颗子弹。

我们的斗争是英勇气概的象征，鼓舞了许多国家的人民起来同殖民主义作斗争。*

我在苏捷斯卡战役中受了伤

在第五次攻势中，我们的处境最困难。我想，最困难的是在米林克拉德。我还记得，我当时说过：“我们要么全都牺牲在这里，要么设法从这里脱身。”抬着老诗人纳佐尔的意大利俘虏设法逃跑了，德国人从他们嘴里了解到我在哪里，因此不断向森林里打炮。

我当时还不知道臂上受了伤。有东西击中了我的胸部，我以为击中了心脏。炸弹爆炸后，我抬起头来，问别人是否都活着，我站起来拿我的自动步枪。我觉得手臂麻木。不过，我没有在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我的手臂完全麻木了，我跟马尔科说了。我的毛衣紧，血积在里面。我察看了一下，见外套

* 摘自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在坚蒂什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上有弹孔。我说：“你们帮包扎一下”。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奥尔加(米洛舍维奇大夫)才想起来看看我的手臂。手臂已经发紫了。后来，我再一看，发现还有一个弹孔……

后来，我们往山下走，普尔利亚陪同我，每当他想帮我一把时，他总是抓住我受伤的手臂。我只好咬紧牙关，一再告诉他，站到另一边来。*

* 摘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速记记录(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铁托传补遗》之二，里耶卡——萨格勒布一九八一年版)。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敌人的第五次攻势使我们承受了巨大的牺牲，这次攻势过去以后，我们的部队重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解放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在敌人的援助下占据的领土。

我决定向波斯尼亚中部，向波斯尼亚克拉伊纳进发。我们在弗兰杜克至奈米拉之间地段强渡波斯尼亚河。我们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夜里渡过这条河的。河水很冷，我们得泅水而过，只有少数人骑马渡河。

为什么我主张开赴波斯尼亚中部？我们收到无线电报告，谈及轴心国的一员出了毛病。报告谈到不排除意大利有可能不久就投降，于是我考虑：如果意大利投降了，而我们却只在这里跟德国人周旋，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人有可能携带武器逃跑。我下了决心，决意不让他们带着武器跑掉。我特别希望我们的精锐部队第一师能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我们为此而前往那里。

当时并没有打算，并没有通过决定，要举行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我们抵达亚伊策之前，在佩特罗瓦茨波列我们就在考虑，由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快到了，再开一次会很有用。到了亚伊策，我们下了决心：最高统帅部和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比哈奇会议的同一天召开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我们立即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而这意味着邀请各个民族的代表和各个地区的代表前来赴会。是否能够来到，我们不可能作出确切的预料，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代表尽管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还是会来的。

国外反对我们的宣传很猖狂。莫斯科虽说是倾向于我们的，也不怎么样，因此我就不想象一年前在比哈奇那样向他们报告，我们将召开第二次会议。我决心什么都不告诉他们，免得又来妨碍我们。于是，我向他们没有报告任何情况，同时，我们却在准备开会。

开会的日子临近了，各地的代表团开始抵达。万幸的是，大部分代表都抵达了，只有一小部分代表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也有个别代表牺牲了，但是多数代表还是抵达了。在亚伊策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在我们的斗争处于高潮的气氛下，在十分乐观的情绪下召开的，因为我们一到亚伊策，我就派无产者第一师去达尔马提亚解除意大利人的武装，派达尔马提亚第一旅去斯普利特，充当组编达尔马提亚大部队的核心。达尔马提亚第二旅在黑山与无产者第二师在一起，因此我们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解除了意大利人的武装，几乎解放了达尔马提亚全境。

一句话，局势和条件使我们能够更加坚信，我们不仅必须建立立法机构，而且发展顺利的话，建立作为某种政府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因为必须存在进行领导的某个执行机构。最高统帅部无法从事这些事务，因为军队越来越扩充，最高统帅部的任

务越来越繁重。*

* * *

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是在斗争正在我国十分激烈地进行的时候召开的。敌人的两次大攻势——第四次攻势和第五次攻势——刚刚结束，第六次攻势又告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除了通过其他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决定外，还组成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它具有临时政府的性质，任务是采取一切措施，继续顺利地把战争进行下去，巩固民政权并使之正确地发挥作用，组织解放区的经济，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人民解放斗争的成果，采取措施来缓和人民解放军所解放的地区的贫困状态，同我们的几大盟国建立联系，谋求南斯拉夫的现状得到承认，也即使人民解放运动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得到承认。**

* 摘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与《解放报》和萨拉热窝电台编辑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 摘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铁托：《言论集》，第二卷)。

敌人空降德尔瓦尔

老百姓的表现英勇无畏，
令人难以置信

敌人的空降是在第六次攻势^①发起后进行的。

我得先谈一谈当时的形势。当时，盟军即将在法国登陆。苏军进展神速，已经抵达罗马尼亚。德国人担心盟军在这里，在亚得里亚海登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在第六次攻势中，德军未能粉碎人民解放军，希特勒就想消灭最高统帅部，不惜一切代价把我打死或者活捉我。于是，就安排了这次空降。

对于希特勒来说，当时的形势十分不利，极其困难。他希望这次空降能成功，就如他借助于伞兵抢走了墨索里尼那样。但是，这里结局就不大相同了。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正在值岗的警卫员把我叫醒，说远处有飞机。我走出来用望远镜观看。我立即觉得情况有点可疑。

① 德国人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四日在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克罗地亚沿海地区以及戈尔斯基科塔尔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发动了第六次攻势。——原注

我发现这些飞机后，立即把山洞下面一座房子里的同志们统统叫到上面来。我觉得这里面有鬼，要发生大事情。我是在这一天的前夕同卡德尔一起从巴斯塔西来到这里的。我们两人一般在巴斯塔西的一个山洞里工作。白天往往到德尔瓦尔来，但是，我们每天晚上都回巴斯塔西。但是，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留在德尔瓦尔过夜，因为第二天是我的生日，我们想热闹一番。那天晚上我去了电影院，上映的影片是《卓娅》。我还记得很清楚。如果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巴斯塔西，德国人就倒霉了。我们就会位于空降地区以外，我们就能迅速采取比较有效的措施。情况就会好得多，而现在这样，我们就困难得多。

应我之召，同志们都来到了山洞。这时首先飞来了轰炸机，对德尔瓦尔狂轰滥炸了一番。接着，开始降下伞兵。当我看到伞兵降在山洞前面乌纳茨河彼岸的一片草地上时，我气极了。因为十来天前，我曾对阿尔索·约万诺维奇说过，在乌纳茨河我们这一边部署几挺机枪，以防敌人派伞兵来。如果在那里修了两、三个机枪工事的话，一个伞兵也降不到那个地区，一个都活不了。他们在空中就会被干掉。但是，约万诺维奇是个怪人。他的想法是，有什么好害怕的？于是，他就没有照办。因此，德国伞兵平平安安地在那里降落了。

德国人在德尔瓦尔市内肆虐，杀害了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他们在寻找我。那些天，德尔瓦尔的一位裁缝正在给我做一套元帅制服。伞兵别的没有找到，找到了被炸弹炸坏了的这套制服。

老百姓的表现英勇无畏，令人难以置信。每一个德尔瓦尔人都知道我在哪里。每个伞兵都拿着我的照片。他们出示照片，挨个询问：铁托，铁托在哪里？没有人想提供任何情况。甚至连孩

子也都如此。德国人没有马上打听到我们在哪里，不知道我们在山洞里。我们从上面往下都看得清楚。从山洞里突围不出去，只有下到一条小溪的沟底才行。我们的一位同志，我的警卫，一个很好的青年，刚走出山洞，额头上就挨了一枪。我操起枪想打，同志们把枪夺了下来。我往下瞧，看见德国伞兵开着我的吉普车在那里横冲直闯。

我们终于下到了小溪的沟底。我是第一个攀着绳子下去的。我的那条狗——“老虎”在我边上沿着小路跑着，它一边望着我下沟，一边汪汪地叫着。这条小溪的左边是一个死角。我在那里歇了一会儿。“老虎”奔到我身边，继续吠叫着。我抓住它的嘴，不让它叫。我几次掏出手枪，想把它打死，因为它暴露了我们，不过我还是未能开枪。这时德国人终于发觉这里有人，于是开始向山洞开火。

我们终于撤了出来。我让一名战士，我的一个侄儿留在山洞里。如果德国人进了山洞，让他销毁档案和其他一切东西。德国人没有进山洞。我确信，在德国人占据这个山洞之前，我们的增援部队会开到。因为我已派了通信员去利卡第六旅，让该旅火速赶来。当时只有我的警卫营和军官学校在场，他们立即投入了战斗。但是，他们的武器不够。

他们一直坚持到利卡旅开到。利卡旅一到，局面当然就完全改观了。我们立即分两部分撤到山洞上面。我领着一部分人，阿尔索·约万诺维奇领着另一部分人。我们立即向沙托尔山进发。我领着一部分人在太阳还没有出来时就赶到了，阿尔索领着另一部分人则迷了路，十点或者十点半才赶到。

我们过了姆利尼什特，在一座小树林里过夜。我走过的那条路的对面有一座牧羊人的小屋，小屋顶棚上堆放着干草。后来我

才了解到，在这堆干草里藏着一个叫瓦西奇的家伙，他一直瞄准着我。但是他没敢开枪，因为他看见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别人。他若把我打死了，他也逃不掉厄运。

后来，我们开赴库普雷斯。夜里，英国人给我们空降了物资，有弹药、自动步枪等。路上，苏联科尔涅耶夫将军强烈要求我离开作战部队，找一个我能不受干扰地工作的地方。他说，情况变了，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不能再在前线工作。最初，我不愿听他的。后来英国人斯特里特也站在他一边。后来，我想到我们有维斯岛，我们到那里仍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他们建议我飞往意大利。我说，我不想飞往意大利。他们说没有别的办法，我得先去意大利，然后从意大利去维斯岛。最后我同意了。

那是我第一次脱离作战部队。苏联驾驶员，一些很勇敢的人，夜间来到库普雷斯，我乘这架飞机走了。而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开往布戈伊诺和瓦库夫，并接着开往特拉夫尼克、波斯尼亚中部……

后来，我还曾乘飞机前往苏联，就解放贝尔格莱德时苏联提供援助问题，同斯大林举行了会谈。后来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在维斯，有我们的大批部队。第二十六师在那里。后来，坦克旅也开到了那里。

关于空降事件，我再说几句。派到德尔瓦尔去的是一些最凶恶的匪徒。大部分是被降职的军官，已答应他们，如果他们把我捉住或者打死，或者把司令部人员俘获，就官复原职。在七百五十至八百名伞兵中，只有大约一百一十人生还。其余的人，统统都给打死了。

这是我们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插曲之一。奈雷特瓦之战是艰苦的，但是我们战胜了。战时，我们在南斯拉夫进行的最艰苦

的一仗是在苏捷斯卡，我们在那一仗中牺牲了大约八千人。

但是，在这里的是整个南斯拉夫的最高领导。因此德尔瓦尔战役属于大战役之列，尽管敌军要比参加奈雷特瓦战役和苏捷斯卡战役的少。*

* 摘自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同德尔瓦尔区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战斗报》）。

与盟国的关系

我军开抵索查河

从一九四一年起，西方盟国就从现场得到有关我们的情况。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英国军官赫德森就来到我们解放区。但是妨碍传播我们斗争真相的主要障碍具有阶级性质：有人竭力想确保旧政权在南斯拉夫重建。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同所有的盟国都保持外交关系，给我们制造了极大的困难。它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说成是在南斯拉夫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力量，还要求盟国也这样对待他们。因此，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年底，我们斗争的成果都被归在站在德国人一边反对我们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头上。因此，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来向全世界证明，在我国土地上是谁在流血反对法西斯征服者。

我们就这样，一边作战并在军事上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一边又揭露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切特尼克勾结占领者，指出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盟国中的某些有影响的人士逐渐地清醒过来了，他们越来越认清了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和事实上力量对比。

这一切的结果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底，英国军事使团作为派

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的第一个盟国使团空降到我们黑山的解放区。意大利投降后，英国又派来了新的军事使团，其中包括美国的一名代表。一九四四年二月，苏联军事使团也抵达了德尔瓦尔。

一九四三年底，我们向中东和英国，稍晚些时候又向苏联派了军事使团，以便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提供尽可能确切的材料。也就是说，我们也开始发动外交攻势。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援助问题。就武器而言，在一九四三年年中以前我们只有我们自己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武器。我们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过武器。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盟国领导人才一致认为，应当向我军提供物质援助。一九四四年初，西方盟国的援助开始大量运来，主要是从意大利运来的。通过意大利，我们还开始得到苏联的武器。这便与我们武装越来越多的战士。而大家都知道，我们当时已经有三十多万士兵。*

* * *

当时，盟国不承认全国委员会，只承认最高统帅部。因此，我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可以同盟国解决许多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通过派驻最高统帅部的盟国军事使团以及通过我们派驻开罗、意大利，后来还有英国的盟军司令部的我们的军事使团解决的。例如，在盟国的援助下，我们把二万五千多名难民，包括儿童，从意大利送往非洲。此外，又用飞机把我们的一万多名伤员送往意大利和马耳他。经与盟国达成协议，我们在巴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基地除了向我军提供给养以外，还负责上述事务。

随着以韦莱比特少将为首的我们的使团先是前往开罗，后来

*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又前往伦敦，我们同盟国政界建立了最初的接触。通过我们的这个军事使团，我们使盟国公众充分了解了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此外，这也促成了同舒巴希奇先生的会晤，他是国王指定的伦敦新政府的组阁人。会晤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在维斯岛举行，在这次会晤中就舒巴希奇先生的政府与全国委员会的合作以及就国内有三人进入他的政府任大臣问题达成了协议。

在与舒巴希奇会晤之后，我在意大利会见了盟军最高统帅威尔逊先生以及其他军界领导人，我还会见了丘吉尔先生。与丘吉尔先生的这次会晤涉及加速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的问题，并讨论了与协同作战有关的一些问题。*

* * *

我是怎么在意大利会见丘吉尔的？当时盟军准备进攻法国南部，在意大利集结了大批船只，准备登陆。丘吉尔乘飞机从英国赶来。第二天，我就会见了他。我们当时详细地会谈了伊斯特拉、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的里雅斯特等地的命运问题。我要说，丘吉尔在这方面态度是很灵活的。他不想玩弄外交手腕，而是开诚布公地说：“你们将得到伊斯特拉，但是，的里雅斯特你们拿不到。你们将得到的里雅斯特附近地区，但是的里雅斯特我们不能给你们，因为意大利站在我们这一边参战了，我们得给意大利一点地盘。”

我们还谈到普拉。丘吉尔说：“我们需要普拉，来对奥地利发动攻势，因为在的里雅斯特解放之前，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港口。”我同意盟军可以利用普拉的机场以及从普拉到的里雅斯特的公路。就这个问题，我们当时进行了顺利的会谈并取得了一致意

* 摘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铁托：《言论集》，第二卷)。

见。我当时想，以后可以加以改变，我们十之八九可以更快地打进的里雅斯特，一旦我们解放了的里雅斯特，这个问题那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了。我也是这么做的。因此，我下令第四集团军强行军，开赴的里雅斯特，放过里耶卡，从里耶卡边上经过，只在那里留下小部队，直奔的里雅斯特。因而，五月一日，的里雅斯特就落到我们手里。我军打到索查河边，在索查河上与亚历山大元帅手下的新西兰部队会师。

我们在的里雅斯特留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军不得不撤离。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少次讨论，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强烈支持意大利人占有的里雅斯特。后来商定，我军和意大利军队都不留驻的里雅斯特，而由盟军部队留在那里。我们把军队从的里雅斯特撤出来，大体上撤到今天的边界上。你们知道，这后来成了一个大问题。*

* 摘自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克拉尼布尔多向卢布尔雅那《劳动报》记者博格丹·波加奇尼克发表的谈话（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战斗报》）。

南斯拉夫军队的最后几仗

我们成功的秘密

我们在塞尔维亚境外的全部时间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一个想法：一旦条件具备，我们必定重返塞尔维亚，我们认为，塞尔维亚是结束解放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对于我们来说，塞尔维亚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众多的卖国贼在那里实行了残害人民的骇人听闻的恐怖统治。第二，我们认为，通过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我们在进行一场反对旧制度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社会斗争，我们把塞尔维亚看成是我们民族大家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努力不让塞尔维亚成为南斯拉夫的旺代^①，不让反动分子把它变成以后可能挑起可怕的内战的一个基地。因此，我们始终是关心塞尔维亚的。

我们的同志曾几次考虑打回塞尔维亚去。一九四二年在坚蒂什特，我们的一些同志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当时在敌人的第三次攻势中，我们被赶出了黑山。有同志建议，我们带领五个旅，开

① 法国的一个省，法国大革命时，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聚集地。——译者

赴塞尔维亚。我当时坚决反对这么做，同志们立即表示同意。我说，在塞尔维亚，我们不具备靠五个旅作战的条件，我们会被吃掉的。我们会牺牲掉我们的精华——由政治上高度自觉、高度成熟的人组成的五个旅。我说，我们应当到能够扩编这五个旅的地方去，那就是波斯尼亚西部。

我们去了波斯尼亚西部，我们的设想和计划完全兑现了。在那里，我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扩充了这几个旅，新建了几个旅、师和军，投入反击敌人的第四次攻势。后来我们被迫撤退，我们带领五个师开赴黑山，敌人第五次攻势后，我们又到了波斯尼亚东部，我们的一些同志又产生了打到塞尔维亚去的想法。我又说，我们不去，因为形势不成熟。五个师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最敏感的地区，德国人经由塞尔维亚同非洲、希腊和俄国保持联系。我说，他们会守住塞尔维亚，往那里派遣大部队把我们消灭。而我们如果在塞尔维亚打一场败仗，那将对我们今后的斗争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我认为，最好是我们再去波斯尼亚西部，特别是由于我已看到意大利人快投降了，因此我们必须靠近亚得里亚海岸……

一支军队开到一个地方，如果它不能使当地的居民足够地相信它的力量，那是最糟糕的一件事。那时，居民就会几乎敌对地看待这支军队，虽说不是把它看成是敌人，但是也不把它看成是兄弟。我们在战争中每当失利后，总是要设法迅速继而取得胜利。为了提高士气，必须迅速地打一胜仗。这就是我们取得成功的秘密所在。*

* 摘自一九五三年七月就七月七日塞尔维亚人民起义 日与贝尔格莱德电台编辑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

*

*

一九四四年一月中，盟军由于大部分部队被派往法国，在意大利的进展迟缓。但是东方战场日益接近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边界，因此对于希腊的德国“E”集团军群来说，存在越来越大的危险。为此，德国人于一九四四年年中在塞尔维亚对在那里的我军发起了强大的作战行动。当时，塞尔维亚的解放运动正蓬勃发展。

由于这一切，最高统帅部于那一年把作战的重点转向塞尔维亚，以解放塞尔维亚并同东方战场连接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在上半年就从南斯拉夫的西部和中部向东部地区派去了我们九个最精锐的师，而在塞尔维亚已经有塞尔维亚的五个师在作战，另有三个师在组建。在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土地上，仍有三十二个师和十来个游击支队在作战。

这些情况使德军东南战区司令感到不安。他立即从希腊抽调第一山地师，并经由铁路调来第二装甲集团军。

我们的作战集群——第二师、第五师和第十七师，还有第二军的第三突击师把德国人彻底击溃了，消灭了党卫军第二十一师，渡过了伊达尔河。

这个突击集群后来又转到科帕奥尼克，解放了布鲁斯、亚历克山德罗瓦茨和拉兹博伊纳，并朝着特尔斯特尼克、克鲁舍瓦茨、库尔舒姆利亚和普罗库普列方向继续作战。

从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德国人在巴比奇山、科兹亚克、奥兹伦山、托普利察和亚布拉尼察地区对我塞尔维亚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二师、第二十三师、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发起了强攻。参加作战的还有保加利亚的四个师，德国的几个配备

有坦克的警察营，还有奈迪奇分子的塞尔维亚志愿军的四个团以及切特尼克的所谓冲锋军的四个大队。我军第二十一师、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于八月四日与第二师、第五师和第十七师组成的作战集群在科帕奥尼克会师，一起转入反攻，解放了塞尔维亚南部莫拉瓦河左岸地区，直到克鲁舍瓦茨和莱斯科瓦茨。第二十三师解放了索科巴尼亞和博列瓦茨。

第一师和第六师在兹拉蒂博尔对保加利亚部队的阵地发起猛烈攻势后，彻底消灭了保加利亚占领者，并在迅速行动中解放了乌日策，又于九月十八日攻下瓦列沃市。

第一军和第十二军继续作战，解放舒马迪亚的农村和城市，到达奥布雷诺瓦茨——科斯马伊——帕兰卡——拉波沃一线，在那里同苏军一个摩托化军会师，这个苏军摩托化军是根据我一九四四年九月访问莫斯科时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从保加利亚开来的。从那里，我们的这两个军和苏军一起朝着贝尔格莱德方向采取作战行动，并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终于解放了这个受苦受难的城市。

一九四七年，阿·克鲁季科夫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书第一百三十三页上写道：“在南方，红军发动了成功的攻势，于十月把打击指向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地区，目的在于使匈牙利退出战争，转而反对德国。这一作战行动的结果是，苏军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接上了头，并一起解放了贝尔格莱德。”

这就是苏联和情报局领导人^①今天想加以歪曲的事实真相。事实就是这样，而不是现在他们叙述的那样，说什么是我们解放

^① 指接受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情报局关于南共状况的决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各国的领导人。——原注

了我们。

在我们上述几个军向着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展开作战行动期间，我军在我国各地都发动了强大攻势，在部分地区采取了防卫行动。第十四军在塞尔维亚东部作战。这个军解放了莱斯科瓦茨，在保加利亚第二集团军^①的援助下解放了尼什，并朝着科斯梅特方向继续作战，解放了许多地方，包括米特罗维察。第二军解放了整个黑山，并把作战行动扩大到波斯尼亚地区。第八军解放了整个达尔马提亚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包括沿海岛屿，以及黑塞哥维那。第十五军的马其顿部队解放了瓦尔达尔河以西的马其顿，该军的其他部队与第十六军一起解放了瓦尔达尔河以东的马其顿。

当红军抵达我国时，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是这样一支力量：有五十一个师组成十五个军，还有根据全国委员会八月十五日法令组建的民防军，此外还有各有两个旅的两个作战集群，有十六个独立旅和一百三十个大大小小的游击支队。八月中，我们已经有一个坦克旅，它是在西方盟国的援助下在非洲组建的，有一个战斗机中队，这也是在非洲组建和接受训练的。

这些事实最雄辩地驳斥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九四八年说什么我们的游击队发生危机的无聊断言。苏联领导人和西方最喜欢称我们为“游击队”，就是不称我们为军队。

经过四年多时间，我们饱受苦难的国家最后终于重新完全获

① 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德国法西斯一边，鲍里斯国王政府被推翻后，才向德国宣战，一九四四年十月保加利亚新政府派出由特尔佩舍夫、托多罗夫和布拉戈耶夫组成的代表团，到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会见正途经罗马尼亚赴苏联的铁托，要求就结束南保之间的战争状态签署协议，并允许保军参加反对德国人的共同战斗，铁托表示同意。这里的“保加利亚第二集团军”系指保新政府的军队。——译者

得解放，我们的解放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牺牲，进行了英勇奋斗。

在一九四五年的最后几次战役中，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各个战场上共有八十万战士，编为十七个军、五十二个师、二十三个独立营和一百零七个游击支队。

衡量我们的作战活动的价值的准绳不能是看我们的战士穿得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武器，有多少和有什么样的技术兵器，而是在于我们在战争中对付了敌人多少个师，在于我们能够给敌人多少打击和什么样的打击，最后在于我们拥有多大的兵力。

为了说明问题，我列举几个数字，以资比较。一九四四年底，我们对付的德军就有二十五个师，加上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伪军的力量，我们对付的是四十多个师，五十八万人。同期，德国人在意大利总共只有二十七至二十八个师，大约三十五万人，对付盟军二十四个师，两千辆坦克和五千架飞机。我认为，就贡献而言，对我们来说，不是负数，而应是正数。这种比较也适用于对东方盟国。^{*}

* 摘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庆祝南斯拉夫人民军建军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铁托：《言论集》，第二卷)。

苏联的援助

给一个军

我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当时我从维斯岛前往莫斯科。我想就下一步作战活动进行会商，并要求苏联政府提供一个坦克旅供我们支配。为了解放贝尔格莱德，我要求一个坦克旅，别的什么都不要。我之所以有这个要求，是因为我们除了有一个配备有英国“斯图亚特”式坦克的旅之外，没有别的坦克部队。而我们需要苏联“T-34”型那样的重型坦克，或许还需要其他一些武器，需要一点飞机等等。

斯大林当时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在索非亚的托尔布欣元帅。斯大林对他说：“铁托在我这里。他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坦克旅。你那里有坦克吗？”我听着他打电话，我听见托尔布欣作了肯定的回答。斯大林就说：“给一个军！”也就是说，他下令派一个军开赴贝尔格莱德，同我们的部队一起参与解放首都。

此外，苏联还以援助的名义给了我们一个坦克旅、两个航空师和其他各种重武器。这有助于武装参加我们队伍的越来越多的战士。

从一九四四年年中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年底的解放国土的最后

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我们解放了达尔马提亚和沿海岛屿、黑山、马其顿、塞尔维亚全境、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的大部分。当时，苏军已抵达南斯拉夫边界。根据在莫斯科达成的原则协议，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就苏联某些部队进入南斯拉夫东部领土并参与解放南斯拉夫这一地区达成了协议。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役是我们两支军队战斗合作的顶峰。*

* 摘自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一文(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与巴尔干诸邻国的关系

要做的事有的是

兄弟的保加利亚党的路线在解放斗争问题上始终是不正确的。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它没有任何符合政治发展各个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相反，往往完全丧失路线而强调不符合这一路线的口号。例如，他们要求保加利亚人团结起来为争取彻底的政治大赦和取消集中营而斗争，号召保加利亚人民准备投入坚决和果断的斗争，而忘掉了涉及路线的一些基本口号。保共在自己的文件中，在有的地方谈到要刻不容缓地推翻现政府，把占领者赶出国。但是，在实践中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做任何事。

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措施来赶走占领者。号召人民和军队准备将来从事某种斗争。今天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充当占领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工具的军队，往往被称之为保加利亚人民的希望。不去号召军人拒绝服从并转到被占领的国家的解放军方面去。根本就不奉行发展这样一支军队的方针，而是充满了幻想，以为整个军队在“决定性关头”会转到“人民一边”来。

整个文件没有一处号召举行全民起义，以把保加利亚从德国魔爪中解放出来，从文件中也看不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

党倡议建立祖国阵线。祖国阵线建立了领导机构——有四个党参加的全国委员会。然而党自己就害怕祖国阵线扩大。

在马其顿问题上，祖国阵线是这样陈述自己的立场的：“为了避免犯新的历史性错误，求得马其顿的牢固和平，祖国阵线提出‘马其顿属于马其顿人’的口号”。“这一口号将结束巴尔干国家之间的不和。制止敌人的任何分裂活动，我们也反对马其顿完全归属于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完整的、自由和独立的马其顿。唯有这样一个马其顿才会不再成为产生纷争的因素，而成为巴尔干各国人民之间的一个可靠而稳定的单位。”

不仅仅根据这一文件，而且根据最近从保加利亚传来的报告来判断，可以看出，那里的游击运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谅解并有条件发展，祖国阵线如果奉行正确的政策，它很快就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和支持。保加利亚党目前的政策是不会取得积极成果的。它对军队所采取的态度，只对德国占领者有利，因为它不去破坏保加利亚反动政治和德国占领者压迫其他国家人民的这一工具，反而寄希望于这一支军队有朝一日全部转到祖国阵线一边来。这样的政策是不符合保加利亚民族的利益的，是不符合一个进步、民主的保加利亚的利益的，而是首先符合占领者的利益，其次符合保加利亚国内外想在保加利亚加强自己的反动地位的那些集团的利益。

就我现在所知，保加利亚的情况现在正在改善，不论是在组织游击队方面，还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面，都是如此。我确信，凭着您^①在保加利亚同志中间的崇高威望，你们定能使局面完全

① 指格·季米特洛夫，下同。——译者

正常化，从而在这几个兄弟党之间得以展开最密切的合作，我们对于进行这样的合作，始终具有强烈的愿望。

希腊全国委员会的一位代表——他是希共中央委员——前来找我们的全国委员会。他随身带来了我们现在寄给您的这份文件，从中也可以看出，希腊共产党的路线是十分动摇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宗派主义的。依我之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希腊的解放运动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因为英国和其他盟国人士对希腊解放运动很不友好。不能说希腊党没有取得巨大的成绩。它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它建立了很大的武装力量，但是人民的这些斗争力量过多地在与国内的反动集团较量，而从事反对占领者的实际斗争却要少得多。此外，我担心，希腊党吸收的党员过多，因为他们说，他们有二十多万名党员，另一方面，我认为，它又没有成为统率希腊其他民主力量的领导力量。首先存在党内出现各种偏差的危险性，因为思想水平过份低下，其次存在它孤立于其他民主力量的危险性。

希腊代表来时，我们的马其顿代表团跟泰波也一起来了。在谈话过程中，我们看出，马其顿人和我们的希腊同志们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他们彼此指责对方。马其顿人指责希腊人不让在希腊马其顿^①组建任何马其顿的游击队。他们说，希腊人甚至不让讲马其顿语，不承认希腊存在马其顿人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希腊人指责马其顿人从应受审判的希腊难民中搜罗马其顿人。我们致力于平息这些争吵，对我们的马其顿人施加影响，不让他们现在提出希腊马其顿人归属于南斯拉夫马其顿的问题。我个人得到的印象是，希腊同志们在希腊的马其顿人问题上确实

① 指爱琴马其顿。——原注

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我将施加影响，来纠正这种态度，而又不给希腊的解放运动造成损害。

在阿尔巴尼亚，情况发展得很好。已经建立十二个旅和许多游击队：整个阿尔巴尼亚南部已经解放，与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存在最密切的合作。阿尔巴尼亚党是一个年轻的党，但是发展很快，因为居领导岗位的是一批十分富有牺牲精神的年轻人。我们在那里始终派有两名代表，现在我们打算向那里再派一名更强一些的代表，他将更有助于把我们的经验传授给阿尔巴尼亚并且加强联系。*

* 摘自约·布·铁托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自维斯岛写给格·季米特洛夫的信。

与保加利亚的关系

承认自己可耻

现在我再谈谈一九四四年十月我从莫斯科回国的情况。当时，我在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稍事停留。我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才去伏伊伏丁那。有一天，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的代表特尔佩舍夫以及还有一位将军——我想，他叫托多罗夫——来找我。他们提出了请求，希望让他们的部队也能在我们的领土上同占领者作战。

我得说，我不是太高兴。我知道，我们的人民对于保加利亚占领军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愤慨，我担心可能出现各种过火的行动。但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人以某种方式对我说了，如果保加利亚参加进来的话，那将是一件好事。还说，现在的保加利亚军队已经不再是法西斯军队，而是祖国阵线的军队。出于道义上的原因，应当这么做，这在政治上也是影响很好的。因此，我就同意了。我同意，我们允许他们的某些部队参与对德作战。于是，他们的某些部队参加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南部的某些战斗。后来，又从那里调到斯雷姆前线。在那里，保加利亚部队战斗了几周，后来撤到匈牙利领土上，在那里，与苏军一

起向前推进。

我还想谈一谈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军的某些部队根据共同协定参与在我国领土上的战斗的问题。它们与我们的部队一起，在马其顿西部、科索沃、黑山以及后来在波斯尼亚，同德国人、阿尔巴尼亚民族阵线分子和切特尼克作战。后来，也是根据协定，它们返回了阿尔巴尼亚。*

* * *

他们[特尔佩舍夫和托多罗夫]请求我，作为最高统帅和当时的政府——全国委员会——主席，允许以前受法西斯指挥的保加利亚军队，现在跟我们一起参与解放我们尚未解放的部分领土。他们说，他们承认感到羞耻，他们的人民上了当，他们的军队参与这些作战行动会对他们很有用。我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保加利亚部队就同我们的部队一起参加了这几次战斗。请看保共中央当时对这件事说了些什么，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的来信中说：

“你所组织和你所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不仅为我们四分五裂的祖国的解放，而且对在巴尔干半岛沉重打击希特勒匪帮和把他们赶出巴尔干，立下了丰功伟绩。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首先是英勇的塞尔维亚人民，率先揭竿而起，同希特勒德国坚决展开了人民解放斗争，给被奴役、被压迫的各国人民指出了走向自由的道路。受欺骗、受掠夺的我国人民受到你们光辉榜样的鼓舞，并向你们学习，同希特勒和他在保加利亚的代理人展开了武装的游击斗争……

*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一文(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对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特别是对于塞尔维亚人民和马其顿人民，我国人民自感有罪，因为听凭保加利亚的法西斯掌权者把保加利亚变成德国奴役者的据点，把保加利亚军队变成希特勒在巴尔干的宪兵，并对正在争取自由的各国人民犯有一系列暴力和出卖行为。我国人民切身感到卖身投靠希特勒的保加利亚掌权者对自由战士所犯有的种种可怕的暴行和出卖行为，竭尽所能来尽可能彻底和尽可能迅速地抹掉刚刚成为过去的这一切，并为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建立起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兄弟般的紧密联盟开辟道路……我们永远感谢你们所给予的支持和兄弟般的援助，使我们第一批游击队得以在我国建立。”

请看，这就是季米特洛夫同志领导保共中央的时候保共中央写的信。*

*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在莱斯科瓦茨举行的纪念南莫拉瓦第一旅的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战斗报》）。

战争的尾声

我们一直作战到五月十五日

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获得解放之前，我们已有五十三个师，有海军和空军。战争结束时，我们有八十万人手执武器。

这里我还要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把五月九日作为胜利日来庆祝，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我得说，我们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才结束对德国人和伪军的战争。一大批敌人，有德国人、乌斯塔沙、切特尼克、白卫军，麇集于斯洛文尼亚，麇集于奥地利边界附近。我军被迫与他们作战，一直打到边界。而且不仅是打到边界，还阻止了绝大部分敌人突破到奥地利境内。驻巴尔干德军总司令勒尔将军直到最后还想这么做，以免落到我们手里，以免对他指挥下的部队在南斯拉夫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但是，由于我军包围了这一群敌人，他们无路可走。经过激战，他们被迫投降。我们俘获大批德国人，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武器。被俘的还有乌斯塔沙、奈迪奇分子、切特尼克、白卫军，总之，有形形色色的叛徒。有一部分人越过边界逃跑了，但是大部分人被俘了。就这样，我们不得不又打了六天仗，才把自己的

国家从敌人手中最终地解放出来。

可见，实质上，我们是自己解放了自己的国家的。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得到了比较大量的援助，因为以前不存在获得援助的条件。事情就是这样，这是历史真相。*

*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一文(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新南斯拉夫时期

新南斯拉夫

我们树立团结和友爱

我们的新南斯拉夫是怎样的一个国家？都说它是民主联邦南斯拉夫。应当很好地认识它的本质。而我们党员首先必须理解这一深刻的实质，因为共产党员在战斗年代曾经率先站在最危险的前列，现在也应当带头建设真正的联邦南斯拉夫。为此，我们拥有的是存在着多个民族的联邦南斯拉夫，我们有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黑山族，还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生活着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但是，假如我们现在走一条阻力较小的道路，让每一个民族靠损害别人在自己范围内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单位，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等，那就错了。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国家——南斯拉夫，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民族都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完全平等。实质还在于：我们在建设由各个民族，由多个联邦单位组成的强盛的南斯拉夫的民族国家。

第二个问题，第二项任务——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团结和友爱，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应当捍卫的，正是这样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南斯拉夫。分裂的因素总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其他省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成为维系这种团结和友爱的纽带。他们必须是把一切统一成为一个整体的因素。共产党员必须发扬国际主义的深刻意义。热爱自己的民族，无论是克罗地亚族还是塞尔维亚族，并不意味着否定我们的整个国家——南斯拉夫。相反，热爱自己的联邦单位也就意味着热爱磐石般的南斯拉夫。因此，我向你们，塞尔维亚的所有共产党员，而通过你们也是向南斯拉夫的所有共产党员说，你们必须阻止任何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旧遗产还没有被根除掉。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根除沙文主义。这个或那个联邦单位是否想得到这个或那个村庄，这不应当成为问题，因为它们是属于全南斯拉夫的。的里雅斯特不仅是斯洛文尼亚的，也是南斯拉夫的。里耶卡不仅是克罗地亚的，也是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不仅是塞尔维亚的，也是南斯拉夫的。就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些事情。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很清楚了。每个人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们都会给身居我国领导岗位的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这种愿望并不是出于我们想把你们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而是因为我们把这看成是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和保证。有一个内部统一的、强大的南斯拉夫，有南斯拉夫的平等公民，我们将会巩固世界上一切爱国力量的同情和钦佩，并把对我们的这种感情提到更高的程度。

对外是统一的和强大的，也就意味着为我们国家的安全创造了条件。拥有强大的军队是不够的，尽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还必需要有一致的看法。在旧南斯拉夫，我们曾经拥有强大的军队，认为这个军队之所以如此迅速地瓦解是因为带领作战的是一

帮腐败的将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不，原因还在于这支军队不是统一的。军队的弱点产生于：第一、领导软弱；第二、民族之间存在纷争。现在我们建立了军队，并用一切技术兵器装备军队。但同时应当武装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人民意识到需要团结，需要友爱相处，需要让克罗地亚扎戈尔耶的克罗地亚人在马其顿边界上所发生的情况分忧担愁，塞尔维亚人在伊斯特拉发生的事情分忧担愁。总之，大家都应该认识到现在在南斯拉夫在我们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或许也是在各国人民的生活中出现的历史性转折点。共产党员应该这样去做，应该这样去认识任务。*

* 摘自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于贝尔格莱德在塞尔维亚共产党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塞尔维亚共产党建党代表大会》，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二年版）。

资产阶级反对派

敌人的旧营垒

我们在南斯拉夫走的是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建立比较公正的内部制度的道路，一条创立真正的人民民主、社会正义和民族平等的道路。这是我们的新国家所依靠的根基。自然，这从根本上同过去的情况是完全相对立的。

反对派代表着一切旧的东西，代表着过去当政的那些人。那些在过去曾经当政，压迫南斯拉夫的各个民族，阻挠社会正义，践踏劳动群众的人组成了反对派。反对派就是这样一批人。

我们的处境很好，因为我们代表着进步。人民赞同这种进步，人民赞同我们缔造的这样一个新南斯拉夫。而反对派想要恢复那些在旧南斯拉夫存在过的旧东西。然而，在新南斯拉夫，极少有人想复旧。

我不把我国的这一“反对派”称为反对派。一个国家里的反对派在某些策略问题上持不同的意见，它想搞得更好一些，它对制度或者对政府采取反对的立场。我们这里的反对派不是这样的。它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比我们在人民阵线纲领中提出的主张更好的主张。它根本就没有纲领。这不是反对派。这是那个人民敌人

的旧营垒，他们想拉历史的车轮倒退，而车轮将向他们自己驶去，自然将把他们压得粉碎。

当一个国家处在南斯拉夫所处的那种形势下的时候，当着应该拿出一切力量，以便使国家尽早地站立起来，大人和孩子不至在冬天冻死，在经历这一可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好日子的时候，——“反对派们”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事情，仅仅是能否重新掌权。

然而，人民并不这样看。“反对派”如果以为人民群众只对它抱有希望，那就想错了。不仅在我们这里是这样，而且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不过在南斯拉夫这种情况显得突出而已。对我们来说，反对派不是某个特殊问题。它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可能妨碍我们。

有一天，大约有三十六名民主党的代表来到我这里。这个党的领袖，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就是格罗尔，他脱离了自己的支持者。到我这里来的是农民、过去的议员、民主党的部分成员。他们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会后就来到我这里。我同他们交谈了两小时，我看不出在他们同我们之间有任何差别。他们和我们都在人民阵线内。他们都在各地人民委员会中工作，从事恢复我们的国家的工作。我问他们，我们人民政权有没有错误行为。他们说，有，但这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无知。在这些民主人士身上我看不到在格罗尔和他的小集团那里见到的那种东西。格罗尔周围的“民主人士”不想看到任何积极的东西。他只看消极的事物，并且经常用这些消极的事物作为炮弹。而真正的民主派看到积极的东西，并且把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区分开来，而对消极的东西，他们说让我们共同来消除和纠正。

格罗尔的反对派，只要还有外国的施舍，就可能生存，而一

且外国拒绝给予援助，它就会自行消失。因此，对我们来说，它不是问题。*

* 摘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与波兰记者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二卷)。

一 党 制

他们的民主不适用于我们

在这里，我还想就我们的民主、我们国家的民主化讲几句话。我知道，外界这次也会象以往那样地认为：这仍然是一党制。这个一党制是无论怎样也不会从他们脑海里消失的。他们始终强调这一点，并且不论谁来到南斯拉夫总是在这一点上非难我们。我们千百次地对他们进行解释，为什么这不是一党制，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不可能有在他们那里有的东西。按照我的观点，在我国的发展阶段以及由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这一点看上去就如同有人制造了一辆新型汽车，然后套上了马，用马来拉汽车一样。他们的民主不适用于我们：这是封建制度以后的旧式民主，诚然，这种民主曾经是好的，但它本身已经过时了。它是形式上的民主。而在社会发展的目前阶段，在二十世纪，人们要求更前进一步，要求民主成为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民主，要求民主具有物质基础：不只是意味着人有骂街的权利，而且意味着人要有可能得到吃的、有钱买东西、获得就业、文明发展、人人平等，等等。今天，我们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要做，但这些事情再也不可能象在西方那样并且按照西方的那种制度去做。

我们向他们解释了我国内部性质的、我国特殊条件下的许多事物。我们向他们解释，我们这条道路取决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和我国人民的思想水平。我们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多少世纪一直被分裂，我们一直在长期的战乱中生活，我们始终在战斗和自卫，使各种各样的占领者无法向西方推进。在他们有可能得到发展的时候，我们却手中握着刀枪，于是我们成了尚武精神颇强的人民。一句话，我们还没有能够创立一个由这些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在各方面都是统一的国家，虽然这些民族是完全相近的。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在我们这里，人们的意识中还有很多旧的残余，还有很多在西方的现代文明社会中已不复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而我们必须使用某些强制手段来疏通民主意义上的发展。我和我们都对他们说，我们首先要解决民族问题，这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在我国曾经有过民族仇恨和民族之间手足相残的斗争。还应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沙文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沙文主义的不良倾向继续扩散。当然，这一切不能称之为民主的道路，但是，如果人民的多数愿意走这一条道路，那么这也是一种民主的道路，因为民主毕竟是多数人的思想反映，而不是少数人的思想反映。我们对他们说明了许许多多的基本道理，但他们不愿理解这些道理。当然，我们还将继续向他们作解释，但是，最好的解释将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的进步、我们的发展。

有个外国人有一天对我说，西方的进步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抱着极大希望注视着南斯拉夫，因为他们对苏联感到失望，说“苏联始终不断地助长和加强一小批人的专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同样感到失望，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让工人阶级参加管理生产，参加分配国民收入，等等。一句话，资本主义

制度是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正如东方目前的制度也使他们难以忍受一样”。他告诉我说：“唯独你们这里是例外，现在我们正看着你们。”对此，我说：“你们看，如果社会党的领导人以及某些个人指责我们实行一党制，并说他们不喜欢这种制度，说这种制度不好，并且说我们还不成熟，还不能进入社会主义运动或者社会党国际，那么就应当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好，为什么在你们所推崇的这种民主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你们经常退出你们在其中掌权的政府，次数多得数不清呢？你们曾经掌过权，在你们根本还没有开始把属于工人阶级的东西交给他们的时候，你们就已经下台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所推崇的这种民主，实际上是企业主、大资本家的专政，而不是民主。那里存在的民主是：你可以有饿着肚皮在市里游逛的自由，谁也不会关心你有没有面包。一句话，你是摆脱了一切，但是也丧失了你生存所必需的一切。这样的民主，我们不需要。这一点，请你们想一想，然后再来批评和指责我们的这种所谓的一党制，它绝不是那样的一党制，而是我国劳动者的联盟，是一种比过去在任何国家里有过 的联盟水平要高得多的人们的联盟，因为人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有统一的认识，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这是那种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一党制”。而一小部分人——占百分之几的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威的力量来要求我们现在为他们创立某些新的党。

对于指向我们的、很可能现在还会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些。我们不左顾右盼，我们不是在做实验。当然，我们是在勇敢地向前迈进。我们不是进一步退两步。我们是在向前进，只不过时而有点偏离方向，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事情没有周密估计到的话，我们本可以更迅速地向前迈进。事情

就是如此。

因此，我们这个议会要反映出当前我国国内的情况和我们联邦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经济自治和政治自治的最充分的权力下放，但是，在我国，正是在这种权力下放的基础上，我国各民族得以最完好地、最成熟地、最健康地牢固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权力下放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个更高水平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国的劳动者、我国的公民努力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四年战争的过程中，在战后的年代里，他们为了建设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作出了超人的努力。*

* 摘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贝尔格莱德选民大会上的讲话(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我感到痛心

问：您作为一个革命家曾度过不少艰难的时刻。其中之一就是与情报局的冲突，当时您和南斯拉夫所有的共产党员一起经受了新的考验。在您看来，这场斗争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最大的影响在哪里？

答：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当他所信仰的一切和他所信赖的一切都化为泡影的时候，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需要镇静下来并且好好地思考，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应该说，我反复思考过许多问题。我难于下决断。然而，我感到十分痛心，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在一场残酷无情的浴血斗争中为了自己并为了我们曾经视为圣地的苏联做了能做到的一切之后，竟收到了那些盛气凌人的信件^①，我们党和我国的领导竟然遭到指责。因为我们的人民在倒下去的时候，

① 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月四日、五月十九日和五月二十二日致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这些信件被收入《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一书，于一九四八年在贝尔格莱德发表。——原注

嘴里还喊着斯大林的名字。你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打击，而且要深刻得多。我仔细地想过，事情会往何处发展？这一切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时，我第一次谈到：这里有值得为其活着、为其斗争的某种东西的，而一个人不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他就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为争取权利和争取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平等关系而斗争的战士。我在复信的初稿中就写进了这一点；这就是在信的结尾谈到的关于平等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今后的发展问题。早在那时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只是吉拉斯和其他几个人后来在修改我的复信时把这一点删掉了。但是，我留有原稿。

当然，那时我感到痛心，因为我酷爱俄国人民。我毕竟在那里呆过六年，经历过和饱尝过许多痛苦。后来，我还是随着革命而活下来的。对我来说，革命是我迄今的全部生活。十月革命不是一般的革命，那个国家的人民是极其优秀的人民。我的许多同志同样也在那里呆过，然而，他们并不象我那样深深地被苏联人民的生活所打动，他们对这一点的感受稍有不同。所以，他们找到我并问道：“现在怎么办？”我对他们说：“没关系。现在才值得活着，才值得战斗。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做法，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导致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曲解的话，那么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到底”。我没有说错。我们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屈膝的仅仅是个别人，是一些软骨头，比如原参谋长阿尔萨·约万诺维奇。他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当年曾迫害过共产党人。

至于那些我们派往苏联进修的青年，其中某些人认为那里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留在那里更多的是出于这一考虑，而并不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对我们失去了信任。某些人也可能是这样。但是，

那些从这里逃跑的人则是一群软骨头，这些人出于他们个人的野心，想出人头地，想自封为反对派，从而为自己谋取某种地位。

当时是十分艰难的。那时我们通过了决议，我不前去布加勒斯特^①，也不去基辅^②。我懂得此行将意味着什么。我早就活够本了，我可以去，也可以死在那里，如果这样做是有益的话。但是，我知道这是无谓的，而只会发生一场悲剧。

我想到一件事，这件事我是顺便提一下，早在准备这项决议和会议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正青云直上的年轻工作人员马舍托夫来见我。他来到乌日策街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封短信——现在我已想不起这封信是谁签署的——邀请我和我的同志们一起去基辅参加会议。我心里想：我去基辅或是去莫斯科，这和以后去布加勒斯特有什么两样？这首先使我发生了怀疑。我说：不，我不去。我说，我们被指控有罪，叫我们去是坐被告席，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

正是在那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我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两幅巨像：列宁和斯大林。而在马舍托夫进办公室前不久，挂着斯大林像框的钉子脱落了，像框掉了下来，落在书柜上，靠在墙

① 铁托指的是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情报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状况的决议》，这项决议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布。约·维·斯大林坚持要南共派代表出席会议，但是南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的声明中申明，它不能派代表参加议程不为它所接受的会议。南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立场：由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直接接触来解决一切分歧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取消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状况》的议程。——原注

② 这里系指苏联代表提出的建议，即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之前（一九四八年六月底），情报局先在乌克兰（基辅）聚会，他还暗示斯大林有可能出席会议。——原注

上。这个家伙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以为是我取下了像，但还来不及把它藏起来。然而，这完全是一种巧合。

可见，曾经想了种种办法，要我们到那里去。我们没有去，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时刻。

问：据我所记得，苏联大使是在萨格勒布向您递交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的。

答：是的。

问：这件事给您留下的印象如何？

答：噢，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我在那里的一座别墅里接见他。我站在桌后，靠着桌子，读这封长信。我感到很不好受，我极其愤慨，火冒三丈。随后，我坐了下来，但没有让他坐下。我只是用俄语对他说道，我们将“研究并作出答复。完了。再见”。他转身就走了。

我立即坐在桌旁，一口气写成了那封很长的复信。我回到了贝尔格莱德，在旧王宫里，我和同志们讨论了这封复信，而在场的有茹约维奇，以及多少有些动摇的其他一些人。

问：您那时对斯大林说，“不行”。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回答。铁托同志，今天当您回顾这些事件时，是否可以说，在战前年代共产国际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态度所出现的种种困难中就已经存在着误解和同斯大林政策冲突的苗头了？

答：不。我不想说是这样。因为斯大林对我是很不错的。可以这样说，他是想用某种方式把我套住。我想起了四六年在莫斯科的一次会晤。在场的有科查·波波维奇和兰科维奇，我们去了好几个人。已经是深夜了——斯大林平时是在夜里工作的——我们来到他的别墅，他们政治局的全体成员都在那里。斯大林情绪很好，突然抓住我的腰把我举了起来。他望着我，问道：“你身体

好吗？”我答道，身体健康。他说，“望你保重身体，为了欧洲，你应当保重”。随后，我们围在他四周，有人说：“斯大林同志，您健康强壮，您会长寿的……”。而对这样的话他说道：“不，我清楚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身体状况。”

但是，事隔不久，四八年交换信件之后，我闻悉，斯大林在一位美国人面前说道：他不喜欢我那种固执己见的态度。

问：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

答：在四四年，当时战争即将结束，我第一次去苏联。我最初几次见到他是在个人会谈时，当时会晤了好几次。斯大林总是在夜间十点到十一点时把我叫去，因此我在他那里有时要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

问：是什么时候您第一次感觉到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或误解？

答：是在四七年，当时他们开始指责我们对他们在那里的专家抱敌视态度。因此，我看这有点与那个故事相类似：狼责备羊羔，说它把水搅混了，尽管羊羔是在狼后面喝水的。那时我就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

问：您有一次谈到：不尊重本国和本国人民的人，是不可能尊重别人的。在当时以及在现今世界上霸权主义的欲望的实质是否就在于这种不尊重态度？

答：在今天也还是如此。

问：我想向您提个问题：与情报局的冲突在国内，在我们国家内的影响究竟如何？

答：正是由于我国人民的团结，我国人民无条件地接受当时我们庄严宣布的政策，这对于我国的内部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显然，就是在今天也还多少存在着那一时期留下的残余；在我国仍然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能正确地评价我们那时的立场。还有

些人由于我国目前国内的某些困难而认为，要是我们采取另外某种态度的话，可能会好一些。这些人想的是，生活中的一切都轻而易举地渡过，他们认为，那样困难就会较容易被克服，因为那是一个大国，等等。但是，对于象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不可能实行如此简单化的政策。我们必须争取使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平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要求保持这样的关系。这不仅适用于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全世界，对所有国家，也都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意充当别国的卫星国，或者屈服于人。这并不意味着不热爱苏联，不热爱苏联人民。这仅仅意味着，愿意同他们保持平等关系，尽管苏联是一个大国。

问：今天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场争取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不是吗？

答：是的。这是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一场争取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内发展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各种因素不可能象在苏联一样，而必须使之适应本国特定的条件。尽管如此，就是我们自己也不总是估计到了一切应当估计到的事情。

问：我们那时选择了自治道路，这条道路在一九五〇年成为法定的道路并开始实现。这无疑是当代工人运动中的新事物。

答：但马克思主义科学并非新事物……

问：实行自治的这种思想在我国是怎样形成的呢？

答：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尽可能多地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自己的生活中去。那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我们所考虑的是如何使我国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动力和干劲。除非使劳动者有可能今天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否则没有别的办法，尽管那时我们还缺乏物质基础。但是，让劳动者现

在就来创造这种基础。这就是使我们更迅速地发展和使劳动人民广泛的首创精神得到发扬的基本因素。*

* 摘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与贝尔格莱德电台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同苏联的关系

我将开诚布公地把
一切都告诉你们

不管谁说什么，不管人们怎样议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威胁任何人，我们的军队迄今也从未威胁过任何人，将来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尽管我们在各种国际讲坛上为满足我们国家的正当要求以及为使属于我们的东西为我们所有而进行了徒劳无益的斗争，尽管我们没有取得我们所希望取得的并且是我们有权取得的东西，但是，自从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开始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以来，我们一刻也没有想过要用武力夺取什么东西，或者去威胁任何人。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对我国进行攻击的当前阶段，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想把我国说成是侵略国家。难道一个被孤立的小国，在它的对立面具有巨大的优势的时候，特别是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能够走上侵略的道路吗？尤其是它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它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任何人都清楚的，而正是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更加不可能这么做。

① 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

却开始受到阻挠。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当我们已经顺利地走过我国五年计划的前一半路程的时候，情况表明，采取经济封锁以及其他手段来反对我们，这种种方法并没有得逞。于是，对我们施加了更加沉重的压力，采取了更加恶劣的方法。结果又怎样呢？最近，在布达佩斯上演了最新的一幕。我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而我现在只想强调指出，一个小国，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打它一记耳光，它决不应该沉默不言。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管他是谁，威胁一个小国的人民，他们在不久以前的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战争中流过不少鲜血和献出了不少生命，他们绝不容许别人毫无根据地诽谤和侮辱他们。任何人，不论他是谁，都休想仅仅由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任何侮辱和诽谤不会沉默而是用真正的事实保卫自己，就以战争胁迫这个国家的人民。

打我们的耳光，侮辱和诽谤我们，用最下流的言词诋毁我们，而我们对此却必须沉默不言，有谁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来要求我们这么做吗？当然没有人有这种权利。因此，我们是这样看待事情的：我们有权说，捏造就是捏造，谎言就是谎言。我们由于捍卫了真理，可以平静地展望未来，而不管已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们知道，作为自由的人民，为了正义和真理，宁可光荣地在斗争中牺牲，而决不屈服，决不俯首听命，决不看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伟大原则被践踏而不反对。

现在，我要对你们谈一谈有关我国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情况。当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封信第一次攻击我国的时候，你们不要认为，我们是轻松愉快地对待这种攻击的，只是简单地说：“我们不再听你们的了”，就此了事。不是的，我们对这封信件再三考虑，而且被这封充满谎言内容的信件弄得目瞪口呆。但是，在我们的复信发出之后，

又来了第二封信，一封更加恶毒的信。我认为，你们是同意这一复信的，因为复信的处理是正确的。这就更加使我坚信，这里面涉及许多比信中实际援引的那些东西更坏的事情。第三封信就足以清楚地证明，他们之所以如此错误地批评我们，其目的并不象信中所说的那样，这只不过是作为达到另外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这种另外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使我国变成它们的一个附属的省。而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今天，我将开诚布公地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就象在上帝面前忏悔那样，我们说过些什么，是怎样说的，以及我们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对斯大林，对莫洛托夫，以及对苏联其他领导人，我们总是说：“同志们，我们是同你们生死与共的，只要有必要，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将同你们在一起，而不论我们必须为此作出怎样的牺牲。”我们对他们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是他们最可信赖的同盟者，而他们对此回答说，这种说法在过去的战争中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反映出来了。此外，这还表明什么呢？尽管我们通过行动使他们相信我们所表示的一切，情况表明他们更多相信的是他们在这里从白卫军和其他堕落腐化分子中间搜罗来的普通间谍，而不是我们，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为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为了宣传苏联而进行了斗争，而蹲过多年的班房。这在共产党内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它的领导人竟然更多地相信普通的阴谋分子和腐化分子，而不相信那些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献给了为劳动人民美好未来的斗争的人们？遗憾的是，事实正是他们不相信我们，而相信那些分子，结果事情现在闹到了何等地步！

如果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我们自己所走过的道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可感到羞愧的。我们尽到了真正国

际主义者应尽的义务，我们尽到了受过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的人们的职责：我们捍卫过并且捍卫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一切偏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现象，而今天想这样做的确有其人。特别是在最近时期，你们已经看到，这些信件究竟是否有根据，或者，真相是否是某种其他的东西：来信中的那些提法说明，某种完全是其他的东西被掩盖起来了，而信件却以堂堂正正的面目出现。

情报局决议^①被通过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还动用了其他党，这就是说，他们利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这种最先进的思想应该是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改造人类——来达到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的那种目的。以后情况又如何呢？

在事经一年半后的今天，如果我们看一看，当时为反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我们就会看清，我们对最粗暴的攻击所作的回答是心平气和的，是希望他们会认识他们是不对的。如果你们看一看，我们在这方面迄今所写的东西，你们就会看到，使关系紧张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你们也会

① 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状况的决议》。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情报局的会议上通过此项决议。决议指责南共领导“在国内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犯有一系列错误。南共中央拒绝这一切指责；一九四八年七月举行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赞同南共中央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据理指出，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和情报局决议中的批评是不确切的、不正确的并且是不公正的。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底在波兰西部名叫斯克利亚斯卡·波伦巴的小温泉场召开的会议上成立的。在这次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决议，决议指出情报局的任务是“组织经验交流，并在必要时，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情报局最早设在贝尔格莱德，后来易址布加勒斯特。情报局于一九五六年四月解散。——原注

看到，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你们还会看到，在他们打我们耳光时，我们只是挡住他们的手，不让他们打我们的耳光。我们并不想使事情尖锐化，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总有一天会清醒过来，看到自己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但是，实力蒙住了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有着强大的实力，所以他们允许自己干那种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自己干的事情。

依照共产主义的道德，实力的概念并不具有任何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共产主义道德应该决定所作所为是符合共产主义道德的。他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我们能够对这一切沉默不言吗？我公开地说，我们决不能沉默不言。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轻松地生活而随波逐流和低头屈服，那么，不论是我，还是我们大家，都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不成其为革命者了，因为，在今后的革命发展中，处在那种情况下，可怕的悲剧就会发生；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与社会主义道德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就会确立起来。

我们接受了这场斗争，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斗争，这也不仅仅是我党和我国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进步世界的斗争，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重蹈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说，靠红军的刺刀带来自由——这实际上形同受奴役，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而已——那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也就被断送了，而建立起的所谓新的社会关系同过去的社会关系也就没有多少差别了。我们接受了这场斗争。而接受这场斗争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要为一种不仅对社会发展的当前阶段，而且对遥远的未来都具有重大和不可估量意义的事业而斗争。甚至即令我们大家都要在场斗争中死去，这是已经超越我国疆界并将会进一步发展的一种事业，因为这是真理。真理将取胜，尽管他们的电台更加

猛烈地诽谤和诬蔑我们，真理正日益迅速地在东方和在西方为自己铺平道路。

请原谅，我有点生气了，而你们必须承认，我生气也是事出有因的。现在，我想尽力用几句话来向你们说清这件事的发展过程。你们已经看到，他们从第一封信起就说我们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当我们向他们作了答复之后，他们又说我们象托洛茨基分子。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带来了多少危害，我们知道，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正确地作出评价的话，他的工作是有害的，至于在他之后所出现的那种情况，那是另一回事了：有多少正直的共产党人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名目下受到了迫害，尽管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当他们看到这一点未能奏效的时候，于是他们开始逐个宣布我们是间谍，一会儿说这个是间谍，一会儿又说那个是间谍，企图用这种方式在我们党内制造不和，分裂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

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清算了这一切。会上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和磐石般的坚定，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罕见的。但是，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声音——会上代表我党的二千三百名代表是从全体党员中以最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对他们并不具有权威的意义。他们没有停止用谎言来攻击我们，而是相反，他们越陷越深。他们开始谈论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谈论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偏向。他们以前称呼我们为“同志”，而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是称呼我们为“同志”，而是把我们叫作“狂暴的法西斯分子”。

头脑健全的人，特别是有马克思主义头脑的人都知道，容易理解和看到，这是他们所做出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他们自己还提出过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有其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

义曾是大资本家的思想基础，他们打着新的，然而实质上是最反动的形式——阶级合作制度等旗号，而奴役这些国家的人民。没落的中间阶层成了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群众基础，这种法西斯主义思想成功地把这一阶层引到占领者阴暗的意图和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方向上去了。而我们这里法西斯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已经消灭了法西斯主义。那么，这种新的臆造的东西又从何而来呢？这不过是一派愚蠢的谎言而已。其次，法西斯主义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占领者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我，除了我再没有任何人”。法西斯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如果我们对这种东西稍加探究和分析，那么就会看到，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特征究竟能同谁有关系，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是同我们有关系。再次，我们没有想过要侵占任何国家。我们并不会因此说，我们已经对自己很满意了。但是，我们是以热爱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教育自己，教育我国全体人民的。我们珍视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化和成就。我们充分肯定其他国家人民在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越大，我们对这些成就的评价就越高，我们不会忌妒他们。这一切能称作是法西斯主义吗？这不过是愚蠢的胡言乱语，不屑一听的言词，如同第一封来信中不值一驳的东西，算计着缺乏经验的人们会相信谎言就是事实。难道能够把我们这些为了消灭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而真正贡献出一切的人称为法西斯主义吗？根据何在呢？我们是否把政权留在资本家的手里了呢？没有，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政权在工人阶级的手里，别人的东西，我们概都不要，而我们想的仅仅是，首先让我国各族人民享用我国的财富。我们希望为我国各族人民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民族主义，总之，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对的。但是，这还不是一切。在最近时期，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逐个地称我们为间谍，而是开始把我们整体都称为间谍。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大家是一致的，而且我们人数众多。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所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战士都是间谍，而且我们全体都是间谍。对于他们来说，明天，我们的整个军队，后天，我国全体人民，都将统统被称为间谍。我可不知道我们向谁从事间谍活动，又是为谁从事间谍活动。

在这方面，有些东西完全走了样，有些东西被大加歪曲，以至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一套，他们要这一套又有什么用？难道他们果真认为别人都相信他们所编造的东西吗？我不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不得不仓促行事，以便至少使某个魔鬼相信，以便把我们同其他国家人民隔离开来，以便在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人民面前，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解释自己的敌对行动。可是，进步人民仍然会认识到什么是真理。而我们将不倦地、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证明，事实真相就是事实真相，谎言就是谎言，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我们，不论他是谁。

他们以为，他们在这里放开手脚用棍棒鞭子抽打我们和刮我们耳光，而我们在联合国却会蜷缩在椅子上并沉默不言。我们为什么沉默不言呢？我们说话，不是说给西方反动派听的，因为他们也不是好东西，而是由于这样做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我们有责任讲清楚，他们说的是一码事，实际反对我们又是另一码事。我们有权捍卫自己的国家，并且不让我国人民陷于孤立，否则那时我国人民会陷于更大的困难境地。我们决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来在一切国际会议和讲坛上也将这样地按原则办事。如果

苏联在某个问题上做得对，我们就同它站在一起。如果它做得不对，搞两面派，那么我们就会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我向你们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迫使他们尊重最基本的道德观念，那么我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说出和证明他们言行不一。这就是我们斗争的实质所在。我们必须争取世界上每一个进步的人，使他决不相信我们是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叛徒，全体进步人民必须知道我们为真理和正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而进行的伟大的、历史性的斗争。为此而活着，是值得的，如果需要，为此而死去，也是值得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布达佩斯的审判案^①上来，这一审判案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为骇人听闻的事件，可能也是迄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类似的审判案有过，类似的欺骗方法也有过，但是，象这次审判案那样不道德和粗暴，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是如此愚蠢地加以安排好了的，类似这样的事件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为什么苏联需要进行这起对拉伊克及其他同志的审判案呢？比如说，为什么他们不在苏联组织这种审判案呢？他们无论是在苏联或是在任何一个东方国家都是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的，答案也是相同的，这就是自我控告。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首先是在匈牙利这么做了。

① 指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布达佩斯组织的对拉伊克·拉斯洛的审判案，这次审判是根据捏造的罪名——拉伊克在“美帝国主义者”和“铁托法西斯集团”的帮助下，同某些领导人一起准备在匈牙利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建立资本主义——将这位匈牙利共产党党员和政治局委员处决的。拉伊克审判案是东欧国家一系列捏造罪名的审判案中的第一起，其目的也是要使南斯拉夫威信扫地。一九五六年，拉伊克和匈牙利其他共产党人恢复了名誉。

——原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之一布兰科夫居然一开始就声称赞成（联共（布））致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大家都知道，布兰科夫是一个普通的窃犯和盗用公款者，关于这一点过去已经写到过。这个骗子曾想打出所有类似于他的那些人的旗帜，而他们靠这些人来围攻我们国家，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个骗子却被放在被告席上来扮演这种角色呢？还有，为什么拉伊克坐到了被告席上呢？我认为，无须使任何人确信这样一点，即我们与之打交道最少的人恰恰是拉伊克。我们与之打交道最多的人是拉科西、福尔高什以及其他，而拉伊克则呆在一旁，一声不吭。

他们不止一次到我国来，他们那时说，我们是他们的榜样。他们说，他们去了罗马尼亚，看到情况不妙，而他们来到我国是为了看看应该如何做，等等。在有他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们就是这样逐字逐句地谈的。

他们说，罗马尼亚的人民阵线和工会在他们看来不行，而在那里一切都很出色。早在那时他们就是带着别有用心的意图来的：他们想引我们上当，想让我们放弃赔款，公开提出要我们原谅他们。我问道：为什么呢？福尔高什解释说，我们应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需要建立军队。而我回答说：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你们完全可以和平地工作，你们可以和平地从事发展，而赔款你们是要给我们的，因为霍尔蒂的军队使我们国家蒙受的损失实在太大了。我们需要赔款，以便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重大的损失，此外，如果我们很好地武装起来了，那么你们也无须害怕什么。

他们对我的这一回答很不高兴，我向他们解释说：同志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忍受了多大的困难，我国人民还在作出多大的努力？请你们想一想，你们的法西斯分子给我们造成了多少损失。所以，现在请你们帮助我们。好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

就不要把这种赔款视为赔款，而把它看作是一种援助，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它，因为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然而，他们那时来是为了可耻地欺骗我们的，是想让我们正式同意放弃赔款，那时他们手里就握着石头，准备用它来砸我们的。可是，我们并没有放弃赔款。在此以后仅仅过了一个月，他们就同其他人一起通过了反对我们的那项岂有此理的决议，把我们叫做“托洛茨基分子”，并且说了其他一些捏造出来的话。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是谁导演了布达佩斯审判案呢？根据我们从其他人而不是从拉伊克那里得到的情况，拉伊克确实在开始的时候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动摇不定，虽然他在同我们的人打交道时总是态度傲慢，生怕有人要说他对待我们的人的态度是友好的。他之所以动摇，是因为他不喜欢对南斯拉夫采取这样的方法，但又害怕说出来，因为他是个胆怯的人。由于这种动摇，他一九四八年到莫斯科去“改正错误”。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对他进行这种“改正错误”的工作的，但是他是去了莫斯科的，当他回国时，他成了外交部长，而不再是内务部长了。他原先的内务部长的职位由另一位部长担任了，便于后者能够组织对拉伊克的审判案。因此，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好了的。拉伊克被捕后，同布兰科夫一起又被送到莫斯科去“改正错误”。在那里，用他们所拥有的某些方法让他们两人准备好出席这一审判案。

你们已经看到，在那里他们想做的一切都做到了。用什么方法做到使人们尽可能多地控告自己，这一点我不清楚，但是有某种奇特的方法，这是肯定无疑的。在这方面，他们需要的是对南斯拉夫进行恫吓。然而，在这次审判案中，除了提到的那些受到诽谤和诬蔑的人名外，甚至连这些人名也不都是确切的，所有一切都是常见的谎言罢了。整个这次审判案和在审判案中提到

的一切，都是卑鄙的谎言和天大的无耻行径。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一审判案必然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大的污点、最大的耻辱，但是苏联却利用了这一点作为撕毁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签定的友好互助条约的所谓理由。

你们只要看一看，他们给南斯拉夫的照会并且用布达佩斯审判案来解释这一照会，在这一点上表明他们是多么不聪明。苏联是苏联，匈牙利是匈牙利么。那么，为什么苏联必须断绝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呢？非常清楚，因为那里组织这一审判案的目的正是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恫吓手段。你们是否看到，在这一件事情上显露了今天在诽谤我们的那些人的赤裸裸的真面目。就是说，这一审判案是一种针对我国的蓄意制造的可耻行径，图谋在今天或在明天把我们说成是侵略者和法西斯分子，说成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人，等等。后来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他们通过报刊和电台广播不断地大肆渲染同一种货色，企望某些人会因此而受到某种影响。^{*}

* 摘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塞尔维亚军事演习结束时 在托波拉的讲话(铁托:《言论集》,第四卷)。

关于我国的真情实况

播下微风，收获风暴

你们大体上知道导致波兰事件^①和匈牙利事件^②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回溯到一九四八年，当时南斯拉夫第一个给斯大林以有力的答复，当时南斯拉夫说，它希望保持独立，希望按照自己国内的特殊条件来建设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它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它的内政。当时并没有发生反对南斯拉夫的武装干涉，因为南斯拉夫是团结一致的，并且由于我们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消灭了反动派的主力，各种各样的反动分子已无法进行挑衅。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磐石般团结一致的共产党，它经受了战前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锻炼，我们也有一支强大的和经过锻炼

① 指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兹南车辆工厂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以及一九五六年下半在波兰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一系列变革。此外，波苏之间的国家关系的某些问题，其中包括苏军留驻波兰境内的条件以及其他问题得到了解决。——原注

②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底在匈牙利发生的示威游行，要求改变政治和经济体制，与苏联建立平等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的情绪相对立，并请求苏军镇压骚乱。这引起了更大的不满，示威游行转变为反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反革命暴乱。——原注

的军队，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体现这一切的人民的团结。

当关于我国的真相大白于世，同那些在那项不光彩的决议通过之后与我们断绝了关系的国家关系正常化时期到来之后，东方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希望我们不再提起对我们所作的事情，希望我们不究既往，我们同意了，这只不过是为了尽快地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但是你们后来就会看到，对于那些今天又重新开始在诽谤我们的国家的、在东方国家以及某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某些人们，确实有必要提醒一下，他们在过去的四、五年里，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里，对南斯拉夫所做的事。当时南斯拉夫只身对付强大的宣传机器，当时我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展开斗争，来维护我们人民革命的成就，维护我们已经开始建设的社会主义基础，一句话，我们要洗雪他们想用各种各样的诽谤加在我们身上的耻辱，我们要证明真理在哪里。我们应当提醒他们说，当时也就是这一些人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指责我们的国家，说它是法西斯国家，说我们是嗜血成性的人，说我们正在消灭我国人民，说我国劳动人民不拥护我们，等等。今天他们又想把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的罪责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应当提醒他们，叫他们记住这一点。现在我只希望告诉你们，我们必须根据整个这一事态的发展情况来看待匈牙利事件。

根据苏联的愿望和倡议，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了。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新领导人看到，由于斯大林的原因，苏联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不论是在外交政策还是在国内政策上都是如此，而且由于他们鼓吹并强行推行斯大林的方法而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里也是如此。他们认识到所有这一切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什

么地方，所以他们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①上谴责了斯大林的行为及其迄止那时的政策，但是他们错误地把整个事情当作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不是斯大林的方法和实践的问题。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方法或实践的问题，我们说，根源就在这里，应当不断地和顽强地根除这些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办到的事。根源何在呢？在于官僚主义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以及某些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他们抗拒民主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他们曾经对斯大林制度的巩固出了不少的力，他们今天还在努力恢复这种制度，使它继续占据优势。根源就在这里，需要纠正的也就是这种情况。

至于说我们，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我们已经走得远了。我们已经改善了这种关系，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定，这些协定对我们很有利，是根据非常有利的条件签订的。还通过了一项宣言和一项声明，前者是在贝尔格莱德通过的，^②后者是在莫斯科通过

① 这里系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由于通过了大会的决议和对斯大林的内外政策的批判而标志着开始同最恶劣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畸形决裂。这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论点，促进了为克服教条主义观点而作的努力。代表大会还确定了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和友好合作的政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尼·谢·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搞的几次清洗的真相，此后，为无辜受害的共产党人恢复了名誉。——原注

② 指《贝尔格莱德宣言》（一九五五年），由于这项宣言，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恢复了正常关系。《贝尔格莱德宣言》是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在以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期间，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的协定。宣言的主要内容为：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发展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并进一步使相互关系正常化。这项宣言消除了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决议通过

的。^①实际上这两个文件不仅对我们两国相互关系，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都具有意义。

当我们在莫斯科起草关于我们党的关系——主要是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声明时，这方面遇到了一点困难。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未能完全达成一致意见，但仍然通过了一项声明，在我们看来，除了南斯拉夫和苏联以外，这项声明还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我们一直提醒说，那些以前曾经在南斯拉夫引起如此有力反抗的倾向，在所有国家都是存在的，有朝一日也会在其他国家中表现出来，那时就将更难以纠正了。

你们知道，赫鲁晓夫曾经来这里度假。那次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会谈，在贝尔格莱德又举行了更为充分的会谈。由于我、兰科维奇同志和普察尔同志被邀请前往克里米亚，我们就去了，并且在那里继续进行了会谈。我们看到，对于其他国家，事情难办得多，因为苏联领导人对于其他国家持有另外一种态度，也即他们同这些国家、同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关系有一种错误的和有缺陷的看法。

之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发展国际关系和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原则和条件。——原注

① 指《莫斯科声明》，这项声明是在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这项声明基本上肯定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中的观点：同意关于在各个国家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同道路的观点，以及关于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工人阶级政党之间合作的观点。这两个文件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被否定了。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和在非斯大林化方面给予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推动。——原注

但是，我们对于这一点并不看得那样悲观，因为我们看到，这不是整个苏联领导方面的态度，而只是一部分人的态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态度强加于另一部分人。我们看到，那些主张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更加有力、更加迅速地发展，主张摒弃一切斯大林主义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的人，仍然有可能通过内部的演变而在苏联领导机构内取得胜利。我们看到，朝着这一方向的发展也将出现在对外政策方面。从某些迹象上，从会谈中，我们看出，后一部分人并不软弱，而是强硬的，但是这种朝着进步方向，朝着放弃斯大林主义方法方向出现的内部发展还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阻碍，它们通过自己的宣传和不断重弹有必要“解放”这些国家而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和妨碍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迅速地发展和改善。因为苏联认为，由于这种对内政的干涉已经在电台宣传，用气球运送物品等方面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如果他们完全对这些国家放手不管，而且让它们，比如说，得到象南斯拉夫那样的地位，那就会产生不愉快的结果。他们担心，那时反动势力将在这些国家里获得胜利。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他们对于这些国家的内部革命力量没有足够的信任。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所有后来这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些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力量没有足够的信任。

当事情发展到你们都知道的波兹南事件^①的时候，苏联人中间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一种突然转变。他们开始变得冷淡起来了。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应归咎于我们南斯拉夫人。是的，我们之所以有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我们还是我

① 铁托是指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兹南车辆工厂工人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示威游行变成了同保安机关和军队的武装冲突，由此引起了全国的抗议集会。——原注

们，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目前这样的南斯拉夫，因为它的活动的影响正扩大到我国境外。即使我们并不希望这样，我们的国家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活动得非常积极和有益。

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迫害，但是波兰仍然留下了一个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领导核心，他们在第八次中央全会上，有力地掌握了局面，果敢地给新方针，给实现民主化、同时也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方针定了调，坚决地抵抗对他们内政的干涉，由于这一切，必然存在的反动势力才未能抬头，而这种势力是一直希望一旦在共产党人发生冲突时能够出头露面的。由于苏联领导人的深思熟虑和采取了及时地停止干涉的态度，波兰的情况现在已相当稳定，而且发展得相当好。

我不能说，波兰的这种与我们非常相似的积极发展，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中引起了某种欣喜。不，不能这样说，这种积极的发展受到了批评，不过是在私下、在他们中间受到批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公开受到批评。在这些国家中，波兰甚至还没有得到它在已经同意了波兰的态度的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的那种支持。在社会主义阵营某些国家的那些领导人中间，甚至在西方的某些共产党的中间，波兰并没有得到谅解，因为斯大林分子仍然在那里掌权。

当有那么一名历史学教授在法国讲课，说南斯拉夫是帝国主义的阴险的代理人，当法国共产党中的掌权人物在可悲而困难的时刻也在千百万人民面前提出如此严重的指责的时候，难道这能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会在将来正确地发展的保证吗？不能。对于这些不负责任的堕落分子的这类粗暴攻击，其罪责在于那个党的领导人。

又如，恩维尔·霍查写了一篇关于南斯拉夫的文章，虽然没

有点南斯拉夫的名，但是打击的是南斯拉夫和波兰，在文章中他坚决地谴责了走自己的道路的倾向和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的发展，他甚至反对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已经承认了的东西——走向社会主义有各种特殊道路……

当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①，当然也曾谈到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我们说，拉科西政权和拉科西本人毫无资格来领导匈牙利这个国家，来促进内部团结；正相反，他们只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遗憾的是，苏联同志不相信我们的话。他们说，拉科西是个老革命家，他为人正直，等等。

说他是个老人，这确切无疑，但是这还不够。说他是正直的，就我所知道的，我可不能证实这一点，特别是在拉伊克审判案和其他一切事情发生之后。对我来说，这些人不是正直的人。苏联同志们说，他是个聪明人，说他会获得成功，并说他们不知道在那个国家里还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依靠。正是由于我们的政策，不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党的政策都反对手干涉别国内政，而且为了避免再一次同苏联同志发生冲突，我们并没有充分地同苏联领导人争论要把象拉科西和格罗这样的班子排除掉。

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人们十分奇怪我为什么不去道匈牙利。正是由于拉科西我才不愿意取道匈牙利。我说，我不打算取道匈牙利，即使那样会使旅程缩短三分之二。当那个国家里共产党队伍本身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满的时候，当他们要求拉科西下台的时候，苏联的同志这才认识到，事情不能象这样继续下去了，他们同意撤换拉科西。但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同意也把格

① 铁托指的是，一九五六年六月以他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逗留，当时签署了《莫斯科声明》。——原注

罗以及其他那些在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的拉科西追随者撤换掉。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只有保留格罗才能同意撤换拉科西。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格罗同拉科西丝毫没有两样，他奉行同样的政策，他同拉科西一样负有罪责。

我们现在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看出，事情有点不妙。当我们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格罗“碰巧”也在那里，而我们“偶然地”遇上了他。我们同他进行了会谈。格罗谴责了以前的政策，并说那是一种错误的政策，说他们曾经诽谤过南斯拉夫，总之，他表示忏悔，并且要求建立良好的关系，答应以前的错误都要纠正，再也不会回复到旧的情况了。我们希望表明我们是不念旧恶的，我们不是心胸狭窄的，所以我们同意同格罗和即将准备到南斯拉夫来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举行会谈。我们希望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建立关系。

然而，事态的发展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当初所了解的地步，无论是格罗的来到南斯拉夫还是我们所发表的联合声明都无济于事了。匈牙利人民要求撤换这些人和过渡到民主化的道路上去。当格罗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回国以后，格罗由于已经处于困难的局势之中而重又显露出自己过去的面目。他把当时还只不过是在举行游行的几十万游行者称为暴徒从而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请想一想他的愚昧到了何种程度，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导人吧。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当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当全国人民都在不满的时候，他竟敢用“暴徒”这个字眼来称呼人民，而这些人民当中有为数很多，甚或是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青年。这就足以点燃火药桶，引起爆炸了。于是，冲突就发生了。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去调查是谁放的第一枪。格罗请来了军队。在游行还在进行的时候请来了苏军，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甚至枪杀，这是严重的错误。这一举动更加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在这场暴动中，共产党人发觉他们自己，事与愿违地同各种反动分子站在了一起。反动分子混在这场暴动之中，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难道那里没有许多霍尔蒂分子吗？谁改造了他们呢？难道拉科西能够改造他们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霍尔蒂在匈牙利有强大的法西斯势力，有“父”组织，其他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纳吉·费伦茨的信徒们，等等。总之，有很大数量的人不赞成共产主义，他们不仅反对拉科西，而且总的来说，也反对社会主义。所有这些人都混在一起了。以前，尽管国外召唤他们进行暴动，尽管他们从国外得到援助，这些反动势力是不敢抬头的，而且只要他们感到党团结得如磐石一般，他们也就没有力量和胆量起来造反。但是，一旦看到党分裂了并且一大批党员起来反对拉科西集团和过去的残余了，他们便立即插足进来了。

这些反动势力在两三天内很快地暴露了它们的真面目。由于在全体人民反对过去的一切作法的暴动中，那时的领导没有表示愿意消除那些激怒匈牙利人民的因素，从而开始沿着具有匈牙利一切内部特殊性的真正的匈牙利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事情急转直下，反动势力开始日益得势。这个反对一个集团的正当的造反和暴动变成了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暴动。在反革命分子已把局势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后，参加这次暴动行列的共产党人终于无可奈何地发觉他们参加的斗争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恢复旧制度。他们发觉他们事与愿违地处在这样的一种境地了。

在西方，苏联的干涉被充分地利用了。迫不及待地进攻埃

及^①的帝国主义利用了这种干涉。他们正是在匈牙利悲剧的这个阶段进攻埃及的，他们进攻埃及，相信苏联难以分身而不能干涉这次侵略。这样，在匈牙利再次掀起了斗争。苏军得到了增援。纳吉逃跑了，同时一个新政府建立了。我可以对你们说，我知道这个新政府的人员，并且据我看来，他们是一些匈牙利最正直的人。他们在拉科西时代受过迫害，他们坐过牢，并且真诚拥护有一种新的发展。你们已经读过的卡达尔宣布的纲领本身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苏联的干涉削弱了整个纲领，因此这个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

现在有人问，苏联的干涉是否有必要？第一次干涉是不必要的。应格罗的请求而进行的第一次干涉是绝对错误的。第二个错误在于：负责人士只是等待第二次干涉，而不是采取他们后来在苏联进行第二次干涉时所采取的行动——那就是，成立一个新政府并且发表一项宣言。如果他们当初建立了新政府并发表了这样的一项宣言的话，工人和共产党人原可以从反动分子当中脱身出来，从而会比较容易摆脱危急的局势的。

在我谈到苏军的第二次干涉以前，我必须说，匈牙利国内的局势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你们已经看到了有关这一局势的许多消息——以致那里显然会有一场可怕的屠杀，一场可怕的内战，而在这种屠杀和内战中，社会主义有可能被完全埋葬，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因而爆发。因为苏联政府不可能容忍来自西方的干涉和霍尔蒂分子以及原先的反动派重新当权。

这些反动分子做了些什么呢？我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很早就暴露出了真面目。事情已经很明显，他们越来越多地在上层占据

①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进攻埃及。——原注

了上风，他们下令禁止使用“同志”这个词和必须摘掉红星。当一个共产党员不能说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否则就会被处死的时候，以及共产党员被吊死的时候，这一点就很明显了。如果说这类事件只发生过一次，如果说他们所吊死的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专行恶事的警察，那么还可以说发生这类事件是一群人自发闹事的结果。但是，他们在大街上到处抓人杀人，只要他们是穿黄色皮鞋的话，因为警察是穿黄色皮鞋的。其次，他们破门入户杀害共产党员。所有这一切都是野蛮的法西斯反动暴徒们干的勾当。

纳吉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这一切。它一直在电台上哭哭啼啼呼救求援，而没有对这一切展开斗争，并用某种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决心。它没有那样做，而是发表了一篇宣言，即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宣布独立，等等。似乎这就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似乎它的退出华沙条约有什么意义。

现在有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苏联军队的第二次干涉呢？我们已经说过而且将继续这样说：我们反对干涉，反对使用外国的武装力量。但是现在哪一种祸害比较轻一些呢？是混乱、内战、反革命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呢，还是已经在那里的苏军的干涉呢？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将是一场大灾难；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将是一件坏事。如果这会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那么，虽然我们反对干涉，我们可以说，苏联军队的干涉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他们该做的事情早一些做了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军事干涉。因此现在我只能这样说，第一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情况中最为糟糕的事，而第二种情况——苏联军队的干涉——也同样是坏事，但却是必要的，如果它能够使社会主义在匈牙利得以保住，也就是说能够在那个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能够

导致世界和平，那么终有一天这将成为一件好事，但是条件是：一旦那个国家的情况稳定和平静下来以后，苏联军队必须立即撤出。

我们向苏联同志们说过这一看法。我们没有隐瞒什么东西。苏联同志们表示，那时他们的军队将会撤走。应该懂得：苏联现在也处境困难。他们的眼睛现在已经睁开了；他们发觉投入战斗的不仅是霍尔蒂分子；而且还有工矿企业中的工人。

我深信，匈牙利境内所流下的鲜血和匈牙利人民所作出的可怕牺牲，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苏联的同志们，会清醒地看到，迄今所发生的那种事情再也不能那样做下去了。

我们所痛心的，也是我们大家所痛心的，是社会主义遭受了一次可怕的打击。社会主义威信扫地。而你们是否还记得，我们常常说，这种方法只会使社会主义威信扫地？我们确实说过这些话。而我现在并不是要大家得意洋洋，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这样做不对。”如果他们要想扭转那里的形势，不是用匈牙利的方式，而是用一种和平的、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扭转形势，那么他们就应该批判消极的东西，倾听群众的呼声、党员的呼声，以及全国人民的呼声。

南斯拉夫脚跟站得很稳，它迄今已经受过多次打击，因此来自国外的这些诽谤是不会使它离开自己的道路的。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满意于我们的国内发展状况，但是我们将努力使我国人民尽量得到满足，不管我们现在和将来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开展活动。

有一次，我对苏联同志们说，即使斯大林没有死，这也是会发生的，如果他活着的话，这甚至会发生得更早一些。他们并不否认这一点。我们无权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只能

指出他们的这种或那种行动可能引起的错误和消极的后果。我相信，匈牙利事件可能是最后一次悲剧，促使苏联的同志们以及仍然对此视而不见的其他各国的领导人，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在其他国家中发生与目前匈牙利情况相同的那种局势。

在东欧的一些国家里和党内，某些领导人说，这种事是不会在他们那里发生的，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批强大的警察；他们说他们的全体党员已经知道了一切情况；他们说他们能够控制整个局势。格罗也说过同样的话；拉科西也说过。但是这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们不改变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如果人民一旦起来反抗的话，那是丝毫无济于事的。他们一九四八年以来所播下的种子，现在得到了收获了。他们当初播下的是微风，而现在收获的却是风暴。

匈牙利的这些事件使我国也存在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和分子受到一点鼓舞。他们为数不多，但却大放厥词。他们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想的是从中渔利。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已经完全消灭和改造了乌斯塔沙分子、切特尼克分子和梵蒂冈的那些顽固不化的支持者们。我始终说，只有人民团结一致，才能防止他们在我国作任何尝试或干成什么事情。今天，人民和党的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在我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南斯拉夫毕竟不同于匈牙利或其他任何国家。我们是用自己的鲜血，经过解放斗争，完成了我们的革命的，我们在革命期间已经彻底清扫了我们的房子。因此，我们是不存在这种危险的。

我不想说，我们的人民感到百分之百的满足，我们这里万事如意。实际上连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是，南斯拉夫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有前途，而且在我们国内劳动人民每日每时都在

创造更远大的前途。还有什么使我感到不满意的事呢？你们会记得，我去年作过一个报告，我在报告中指出必须改变我们的投资政策的方针。我深信，领导经济的人们会理解这一点，而且我们应当首先认真地关心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种转变，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物价的飞涨已经停止，这种飞涨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并非我所期望的一切都已做到了。我们现在再次决定要更加有力地制止一味搞建设的倾向。我们现在必须重视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加强我国的国防。这两件事是优先要办的事，我们一定要关心这两件事。

现在我想谈谈有关在我国存在的各种分子的情况。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匈牙利局势严重，霍尔蒂分子以及梵蒂冈和其他分子将会在那里得势，这可是我们的一个机会。”照他们看来，南斯拉夫将再度被孤立和包围，他们将有可能在南斯拉夫比较顺利地进行活动。现在仍然有这种分子，但是我要说，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我们的党内并没有八十万党员，但是我们有大约六十万党员、干部，他们曾经在革命和斗争中经受过考验，他们不是带着各种追求地位的和其他的倾向参加我们党的，他们都承担着建设我们国家的重担。他们始终懂得及时阻止试图在我国策划阴谋的任何人。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着拥有六十多万盟员的共产主义者联盟，有着拥有七百万盟员的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这七百万人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有自己的纲领，并且知道他们朝着什么目标前进。这七百万人随时都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如果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再把这样大量的资金投入基本建设方面，或者如果他们认为这件事或那件事

是必要的话。当然，不管是我的或者是我们的全体领导人，无论谁也无权违背我国各族人民的愿望，那就是：用今天可能达到的速度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你们知道，当你们每天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你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工厂建成而明天就会产生使情况得到好转的结果的时候，当你们还看到要保证大量增加生产只需要再追加数百万第纳尔投资的时候——与你们仅仅看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们多少是忽视了别的东西——忽视了我们的人。你们仅仅看到的是工厂而没有看到人！

显然，我们的处境仍然困难。我们的对外贸易有很大的逆差，这种逆差现在还继续在增加，尽管在过去一年半期间，我们签订了一些相当有利的协定，首先是同苏联签订的一项协定，我们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即以百分之二的利息获得一笔大宗贷款。其次，我们已经签订了关于德国支付赔款的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勾销了，即抵销了一亿美元，而与匈牙利之间的债务将要根据它的可能来解决。由于签订了这一些协定，我们已经缓和了建设方面的状况。最后，我们已经以信贷的方式从美国获得总值约为一亿美元的小麦和某些原料。我们的状况并不象某些人希望把它说成的那样困难。粮食和面包将不愁短缺。

在我国，市场有点混乱，因为人们太不注意设法使市场有充分的供应，虽然在这方面全国存在着非常有利的条件。例如仅拿贝尔格莱德来说，这个城市近郊有潘切沃沼泽地带，那里有适宜种植蔬菜的极好条件。有许多县和其他一些公社可以为市场生产大量消费品，但是它们并没有生产这些东西。又例如，今天是从卢布尔雅那运蔬菜到科帕尔去。这是一种什么政策？而过去科帕尔是向的里雅斯特供应蔬菜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存在着一系列这

类不好的现象。

我多少有点离开了我所谈的问题。我希望告诉你们，从前途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事态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我们之所以应该帮助它，是因为它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们必须反对所有那些现在正在不负责任地把全部过错归咎于俄国人的分子。是的，苏联的同志们没有事先发现和纠正拉科西政权的错误，没有让那些得到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信任的人们能够执政，他们应当对这些情况负责。因为谁也不能把某个领导人强加于一个国家的人民。这是办不到的事。

在波兰，局面已经开始稳定，但并不十分巩固。同样的分子也在那里活动，他们是反对波兰同苏联有良好关系的。你们知道，那些持有反动观点的波兰人是憎恨俄国人和苏联的。必须把波兰人民同不仅憎恨苏联而且总的来说还憎恨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区分开来。因为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有着远大的眼光，并且知道他们可以从苏联得到什么支持。例如，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波兰人就很难保卫奥德—尼斯河边界，而德国人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条边界的，他们想把这条边界再要回去。总之，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相互帮助和支持。

同样，我们必须同波兰政府和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他们。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来反对无论东方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其他党内的这样的倾向。

南斯拉夫不能只顾自己，它必须在各个方面进行努力，但是绝不用从内部破坏这些国家而在那里招致消极的滥用权力的现象的办法，而是要在思想方面，通过接触和交谈，以便使新的精神获得胜利。不应该回避公开地批评这些党内的不好的现象。你们

已经读到了《战斗报》上的那篇文章，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作为第一篇文章是写得不坏的，但是它还不够充分。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写文章。向我们的盟员解释这个问题，是你们共产主义者和在基层工作的领导人的责任。

现在，让我简略地谈谈对埃及进行侵略的问题。你们已经读到了关于我们在联合国所采取的态度的消息和我就这次侵略事件发表的声明^①，你们也读到了我们的报纸。但是我还是想回顾一下情况。当我在访问印度后的归途中第一次会见纳赛尔时，他向我谈到了他们在埃及的一切困难的确切情况。埃及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缺乏工业，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没有任何强有力内部组织，即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党。纳赛尔说，埃及的领导人都是这样一些军人，他们夺了权以便为本国人民服务，为人民争取自由，保卫它的独立。当他陈述所有这些困难时，看来这些困难确实是几乎难以克服的。

后来，第二次，当我们访问埃及和开罗时，我们又进行了谈话，并且看到这些困难是艰巨的。但是，我们注意到那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开始觉醒，它已经开始有了民族觉悟。由于长期被占领和法英殖民主义的行径，这个国家的人民过去受到压迫并且处于冬眠状态。我们看到，若是有和平，纳赛尔和他的班子在执行他们艰巨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是可以依靠人民的。

我曾向纳赛尔公开表示我的担心，我说我难以相信帝国主义者会让他们有和平，因此他必须小心行事，不要给帝国主义者丝毫可能得到任何借口来插手中东事务。当然，我不能够详细告诉他应该怎样做，而只能指出可能酝酿成熟的那种危险性。我告诉

^①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发表的谴责以色列、英国和法国政府侵略埃及的声明。——原注

他，他应当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择手段的，他们现在并没有放弃他们的野心，他们认为埃及——世界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和亚洲的属地来说是最危险的，埃及的强盛和发展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国家阻挠埃及旨在发展它自己所作的努力。

我们的看法，我在同纳赛尔举行的会谈时表示了这种看法，这就是，他们应当首先加强内部，建立一个内部政治组织，建立一支强大和巩固的军队，从经济上提高自己，争取获得他们可能获得的贷款，让人民立即看到新的政权是有些作为的，使他们感到有一定的改善。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而他们欣然接受了。

早在第一次会见时，纳赛尔就已经对我们说，他们将不得不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因为埃及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不能容忍外国人在它自己的领土上来管理运河的。当然，他们有充分的权利把它收归国有，只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当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时候，英法这两个殖民大国反应很强烈，发出了付诸武装进攻的威胁，以阻挠收归国有的行动。但是，由于联合国，战争的第一次威胁得以防止。当时通过了一项决定，要求进行谈判以便使这个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突然的侵略。埃及最先遭到以色列的进攻，后来又遭到了英法两国的进攻。

整个这次侵略可能是联合准备好的，而发动进攻的时机选在发生令人遗憾的匈牙利事件的时候。他们对匈牙利的混乱表示欢迎，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英法两国利用以色列的侵略作为说明它们必须保护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借口。

这是同殖民国家过去发动的传统侵略没有任何区别的最典型

的侵略。这完全是一样的。在我看来，发动这次侵略的人今天已在后悔，因为他们没有得逞。他们原以为：第一，他们会在几天之内毁灭埃及，推翻纳赛尔；第二，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上占优势，那就是人们将不会出面干预，联合国将不会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组织中会得到多数票。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情况恰好相反。埃及没有被毁灭，虽然它遭到巨大的损失，它的军队打得很好，侵略者没有能够占领整个苏伊士运河，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开火。埃及人民并没有象艾登所预料的那样推翻纳赛尔。在英国本身，工党对侵略和政府的政策采取了一种非常激烈的反对态度。在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都谴责这种侵略行动，为埃及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我们也表示愿意为这支部队提供我们的部队。也就是说，埃及人自己要求这样做，所以我们大概也会派出我们的部队。

这次以色列表明它是大国的一个工具，因此它构成了对和平的危险。不错，在阿拉伯人当中，存在着对以色列的强烈的反感，因为将近一百五十万阿拉伯人被赶出世界这个地区，这些人现在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生活着。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愿意缔结和约，也不愿意就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看待作出保证，即它们不承认它。它们现在仍然不承认它，但是这并没有给以色列发动侵略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没有给它这种权利，正如英国人和其他的人希望把事情说成是这样。

阿拉伯人是否将承认以色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平谈判和说服，取决于自从停战以来所产生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在我看来，最可悲的是法国社会党人丢了脸，并再次表明他们是那些企图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旧的、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的集团的忠实仆从。他们的脸上将永远洗不清这个污点。他们希

希望通过对埃及的侵略不仅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且在其他近东国家获得好处。他们相信这次冲突定会蔓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从而会加强他们的殖民地位。英国人以为，在占领苏伊士运河之后，他们将在近东牢牢地站住脚跟，在打垮埃及之后，将能保障他们在中东的利益。可悲的是，这场侵略居然在法国议会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而只有共产党人和一小部分社会党人反对它。

这样，它就迫使我们要谨慎小心。因为，这已经表明所谓西方民主的维护者——法国和英国——仅仅是在口头上主张和平、正义和民主，而实际上它们是一旦有机会就可能导致极端反动和侵略行径的温床。我确信，正是因为以居·摩勒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人奉行的这种政策，不幸的法国人民总有一天会不得不付出代价。

我们希望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帮助法国人。我们对纳赛尔说，我们认为要法国人离开阿尔及利亚是困难的，而且最好还是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建立联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访问法国的时候，我们对法国的领导人也说到了这一点。“与其每天花费十亿法郎来维持你们现在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倒不如把这笔钱的半数用来提高那里的人的生活水平，用来修筑道路和建设其他工程，这样阿尔及利亚人民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你们的了，他们也就不会反对同法国结成联盟了。与其一天花费十亿法郎，即一个月花三百亿法郎，你们倒不如走这条道路为好”。

法国某些领导人承认这样做是对的，可是另一些领导人则说，那样法国的威望就成问题了。难道他们现在就有威望吗？！他们已经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全世界都谴责法国政府的行动，侵略的行动。

问题还没有澄清，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何在，他们将做到何

种程度。我怀疑派遣国际警察部队这件事是否能够顺利地进行。英国人很可能会这样希望：他们的一部分军队可以以警察身份留在埃及，但是，无论是根据联合国章程还是因为他们是侵略者，这样做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不能留在埃及。埃及决不会同意这样做，任何正直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们永远可以找到某种借口来继续他们的侵略行径。由于苏联政府较强烈地过问这个问题，他们才有点慌了并开始仔细考虑。

我们必须比迄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南斯拉夫是非常活跃的，在联合国中积极地发挥作用。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绝大多数人民是不希望发生战争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人珍视和平的话，我认为那就是我们各族人民，他们希望和平，为的是能够在和平条件下建设他们的更美好的生活。在过去的一次战争中以及在以前的几次战争中，我们受尽了苦难，我们付出了许多鲜血，因此我们有理由要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来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越出了我们一国的疆界。

我们的国家是团结的、巩固的、磐石般一致的。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尽可能多地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我们的团结，这种磐石般的一致和沉着冷静，这种对世界上发生的即使是最严重的事情保持镇静而毫不慌张的态度，这种冷静的判断，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决不能允许各种各样的人物、形形色色的分子大放厥词。人民和群众应当从下而上地制止他们发言，防止他们散布不和。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们愿意随时为你们效劳，我们始终可以向你们解释有关的问题。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不能谈的。你们不应当认为我今天什么事情全谈了，因为我不

能这样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告诉你们的，那就是我没有告诉你们的事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方面的事。今天，南斯拉夫在世界上起着一种受到重视的积极的作用。*

* 摘自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普拉向伊斯特拉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发表的演说(铁托：《言论集》，第十一卷)。

实行自治

我们意识到，我们会遇到
足够的艰难险阻

今天，国民议会在审议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一项法律草案——《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的草案。这项法律的通过，将是国民议会继通过《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法》之后一个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行动。生产资料转到国家的手中，这还没有实现工人运动的行动口号：“工厂归工人”，因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并不是抽象的宣传性口号，而是本身具有深刻含义的口号。它包含着在公有制方面的，在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纲领。因此，如果我们真正地在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这一口号是能够并且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实现的。

我们制定的关于把工厂企业等交给劳动集体管理的这一项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是我国的人民政权在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继续。实施这项法律的条件已经部分地成熟了。我国的劳动集体每日每时都在表现出他们的成熟性，表现出他们通过英勇努力来完

世

成计划任务的高度觉悟。

为什么我国劳动人民在竞赛中，在提前完成计划任务方面会表现出这种热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呢？因为我国劳动人民懂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来进行，他们付出劳动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们有利的。我国劳动人民现在已经确信无疑，我国人民政权对他们是充分信任的和关怀的。另一方面，我国劳动人民正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准备克服他们工作中的最大的困难。因此，我国劳动人民正在作出这样的努力，正在以如此高昂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坚持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各种产品，正在以如此巨大的毅力建设新的工厂、新的工程、新的铁路等，他们表现出他们对自己工厂的热爱，从而坚决用一切力量通过革新改进生产工具。难道说这样的劳动者没有能力来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厂吗？当然，他们是有能力管理的，而加入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的新工人将会向自己的同志学习。

可能有一些人认为这项法律提出过早，工人还不能掌握管理工厂和其他企业的复杂技术。凡是这样想的人，都是在欺骗自己，因为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意味着对我国劳动人民缺乏信任，意味着对我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量视而不见，我国劳动人民的这种创造力量正是通过管理工厂将会得到发展，因为这项法律将为我国的劳动者更多地开创他们的未来和我国整个社会的未来的前景。因此，这项法律的提出，不仅不是过早了，而是晚了一点……

过去有些人，这样的人现在始终还有，曾经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生产资料的管理问题，只要任命最优秀的工人担任经理厂长或者管理人员就可以解决了。这固然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把我们可以信任的人，劳动人民的国家可以信任的人放到这些

职位上。通过这种由劳动人民自身的队伍中选拔出来的工厂厂长，人民的国家可以对于企业的经营进行更好的监督，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厂长也能够更好地了解工人的需要并且能够更多地关心工人和关心国家的即人民的财产。这曾经是在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时最迫切的措施。当然，如果我们希望避免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可能由此会产生的许多弊端，那么就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这是其一，而其二是“工厂归工人”的口号通过这种方式还没有实现，同时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思想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实现。

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这次会议正在讨论的这项法律草案，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但是，这项法律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它只不过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并没有完全停止起作用，但是它们不再是国家专有的职能了。这些职能随着劳动者被吸收参加管理而变得越来越弱。劳动者是逐步地而不是一下子全部管起来，这就是说劳动者作为生产者正在取得管理生产的权利。为什么劳动者是逐步地而不是一下子全部管起来呢？这一过程将会延续多久呢？不可能对这一过程究竟将延续多少时间作出答复，因为这取决于各种情况，取决于文化发展的速度，也就是说，要对工人进行全面的教育，以便使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能力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成功地管理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等。做不到这一点，工人就不可能实行核算和监督。没有文化的提高，工人就不可能获得管理方面的充分技术知识。此外，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等等。

劳动者的文化提高对于我们尤其重要，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言，我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

之一。我国的工业现在刚刚开始迅速发展。因此，经济管理的所有职能转到劳动人民手中的速度快慢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快慢。而这首先又是取决于工人本身，取决于他们对于尽可能迅速地和尽可能多地生产消费品的关心程度，取决于工人对厉行节约的关心而不是浪费……

为什么我把文化发展的必要性摆在第一位？如果我们看看旧南斯拉夫产业工人的人数有多少，而今天产业工人的人数有多少以及将来产业工人的人数有多少，那么就不难猜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今天是谁正在进入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是农民。因此，今天有大量的农民、半农民和半工人来到企业，必须首先把他们培训成为工人，然后才能把他们培养成工人管理人员。这既不是一件短时间所能做到的工作，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应当以最严肃的态度、极其耐心地和精力充沛地来从事的工作。在教育这些新工人方面，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做不少的工作来清除大部分工人存在的有关作为工人的职责、有关工人对国家的即人民的财产的态度等等方面与工人不相容的思想观点。

我们只要举出以下事实便可清楚了。我们正在我国最落后的地区，如波斯尼亚、桑贾克、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利卡、黑山等地，建设和开始筹建许多工程，甚至是最大的工程项目。而迄今为止，在这些地区，只有很少的工业，或者几乎没有工业。是谁将要在这些工厂、矿山以及其他企业中工作呢？是来自这些落后地区的农民。这些落后地区的贫苦农民应该到这些工厂和矿山去工作。他们应当从数世纪以来世世代代过着最低水平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贫苦农民变成为有觉悟的工人，成为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美好的建设者。这将不会是一个轻

松的和迅速的过程。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在把一个半农民半工人培训成为有觉悟的、守纪律的产业工人这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同时必须坚定地向这些半工人证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们不仅正在成为工业、采矿业等的生产者，而且正在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必须向他们说明，他们在进入这些工厂、矿山以及其他企业的同时，也就成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他们的那一小块贫瘠的土地永远也不可能使他们过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而工厂、矿山以及其他企业才能够保证他们过上比他们的祖先美好的生活！为什么必须把半农民半工人变成有觉悟的产业工人呢？之所以必须，首先是因为我们正在建设为数很多的工厂和企业，正在开发越来越多的新矿山，一句话，我们正在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以便使它更加富强，以便使我国尚未开发的财富造福于全体公民，从而使人民能够利用这些财富，等等。为了使这些工厂、矿山等能够开工，我们需要有能够掌握新技术的工人。半农民是无法掌握这种现代技术的，因为他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他们那一小块不毛之地，而不是更多地想到，现在我国的现代生产资料已经不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公有财产。这些生产资料已经不再是由资本家或者由他们的待遇丰厚的忠实的职员和官僚来管理，这些职员和官僚只关心资本家的利益和从工人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交给资本家，同时这些官僚也因此分得一小份。今天，在我国，这些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将由工人自己来管理。他们自己将决定如何进行工作和工作多少时间，他们将懂得他们为什么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将如何加以使用。为了在全国各地，包括最落后的地区，都能够这样做，必须把半农民提高到有觉悟的产业工人的水平，他们将认

识到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责任和权利。

由上述情况可见，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例如在我国，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存在着极其艰巨的困难。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要等到全体工人都成为同样地聪明和有能力管理企业的人呢？当然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必然会无止境地长期等待下去。只有在管理的过程中，在劳动和管理的不间断的过程中，所有的工人才会取得必要的经验。他们将不仅熟悉劳动的过程，而且会了解自己企业的一切问题。劳动者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学会运用核算，才会懂得应当用多少原料和节约多少原料，才会知道他们的劳动消耗在什么上面了，即他们的剩余劳动用于何处以及如何使用。他们将会知道他们企业的积累有多少必须作为整个计划积累的一部分，他们可以用多少其余的剩余产品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还必须懂得他们能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多少以及用多高的速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他们还必须无条件地懂得劳动纪律，因为从劳动人民将经济管理的责任承担起来的时刻起，劳动纪律的问题就成为他们首要的责任问题。

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劳动集体的委员会必须使劳动力的配备尽可能地合理化，不能允许在他们的企业中存在不必要的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力，即不允许在行政部门出现过多的官僚，因为这样只会增加生产费用而减少他们企业的利润率，这将给整个劳动集体带来损失。必须学会区别对待专门人才的需要和多余的、行政性的、非生产性的机构之间的差别。

把工厂、矿山等交给劳动集体管理，就能够使得一种名为官僚主义的传染病无法在我们的经济部门中传播。这种传染病是难以令人置信地迅速而轻易地从资产阶级社会中传来的，成为过渡时期的一种危险病症，因为它象水螅一样把它的触手伸向各个方面。

向，妨碍和阻挠正确和迅速的发展过程。官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正是由于它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人们一开始对它还无所认识。那种认为官僚主义在我国并没有开始扎下根的看法是错误的。官僚主义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各个机关、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中去了，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经采取了使其不能得逞的一系列措施。在这方面，仅仅采取搞运动的措施是不够的，而必须不断地开展斗争和教育人民……

在新的条件下，即在劳动者参加管理经济的条件下，工会的作用有了某种改变，因为现在工会的职能主要地是针对工会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劳动者和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工会的工作要针对新工人即过去的农民。工会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尽快地使新来的工人，也即过去的农民，提高到最有觉悟的产业工人的水平，尽快摆脱小业主的旧习惯，成为对待生产资料，对待工厂、矿山，对待社会财产、劳动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态度的工人。这些新工人必须尽快地受到教育，从而成为孜孜不倦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成为全体劳动者的美好幸福生活的建设者。

由于工人参加管理企业，即参加管理整个生产，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的任务有所削弱，因为现在工人是通过工人委员会以及生产管理委员会自己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这也就便于工会发挥它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得保护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同样又得照顾到人民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工人逐渐熟悉管理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诸如积累、生产费用以及过去必须由厂长本人、先前的管理机构和工会去解决的各

种各样的许多困难问题，工会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就比较容易做了。无论如何这将大大有助于巩固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的劳动纪律。

这项法律草案表明，劳动人民是用最民主的方式来行使他们的管理职能的。在工厂、矿山和一切企业中，职工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工人委员会。这些工人委员会和由工人委员会成员在他们之间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必须得到工会的全面支持。为做到这一点，管理委员会要包括企业中的职工工会的成员，这样，他们也就承担起他们应负的管理责任，而不再是作为不负特殊责任，不承担相应职责的咨询机关。

这项法律是我们迄今所制定的最富有民主性的文件之一；就其内容而言，这项法律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

从现在起，生产资料——工厂、矿山、铁路——的国家所有制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低级的形式，而不是象苏联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最高级的形式。

这一点正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国家职能消亡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让情报局分子们记着吧，他们诽谤性的叫嚣休想损害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另一方面，我们这项关于劳动集体即我国的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经济的法律，对于在哪里有真正的民主的问题，是在我国呢抑或是在被大肆赞扬和歌颂的西方民主国家呢，乃是最有力的回答。在我国，民主是建筑在最广泛劳动群众享有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群众感到他们正在使用这种民主来为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建设

美好和幸福的将来。对于那些大谈我国没有真正的民主，说我国是一个警察国家，等等，以及喜欢谈论我们物资匮乏和我们少这缺那的西方人士，这就是一个回答。诚然，我们确实还缺乏许多东西，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金，还不能生产出足够的消费品以及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足够的其他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将是为了所有的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不象西方那样仅仅是为了少数人……

我们意识到，我们将会有足够的艰难险阻，在我国工人克服由于我国的落后所产生的一切困难之前，我们的境况将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坚信，我国劳动人民将胜利地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因为他们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而且只有依靠自己顽强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创造性的热忱努力，这一切才能实现……

……已经在管理着自己的合作社的农民们，从现在起行将自己管理工厂的工人们，今天他们已经真正地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 摘自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国民议会第一次非常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把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交由劳动集体管理基本法草案的报告(《铁托领导南共联盟四十年》)，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版)。

自治十周年

工人不再是雇佣工人

问：在战后工会恢复十五周年和我国工人自治十周年之际，我们请您总统同志就工会在过去十五年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就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后发展，特别是在生产者自治的发展中的基本任务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当我们实行工人自治时，我们当然也为工会确定了重大的任务。我们意识到，我国的工人并没有继承一个业已形成的工人阶级的特点。我们考虑到，由于新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工业，因此工会必须特别重视这些新工人。在这十年期间，在教育和改造那些从农村来到工业并带有旧观念残余的人们方面，工会确实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工会成功地完成了把他们改造成为有觉悟的工人的任务，并在这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工人自治的实行和迄今的发展，雇佣关系的基本因素已经被消灭，但是，在这一时期，这些因素中的某些因素还没有被彻底克服。然而，我国的工人由于把生产者的作用和管理者的的作用结合为一体，他们日益在摆脱这些残余，并随着越来越直接地参加计划、分配、贯彻报酬政策而会更多地摆脱这些残余。因

此，工人不再是雇佣工人，而成为自觉的生产者，他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今天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工会将来也会大大促进使生产者地位发生根本的革命变革这一过程。

问：您是否愿意给我们谈一谈，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已经具有广泛规模的过程，特别是工会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答：我们将进行斗争，我在这里当然是指工会，来反对那种实质上是追求建立市场垄断地位的经济中的联合形式，例如某些烟草工业企业的联合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反对这种现象，决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将鼓励那种会使生产得到完善和成本得以下降的合作。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联合，而不是在市场上形成卡特尔和促成垄断地位。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看到和防止这样的消极倾向。

建立尽可能多的小型企业，使它们同大型的专业化的企业进行合作，这是一件好事。这样的实践应当得到公认。现在有许多大企业生产那些不应生产的东西，这就提高了生产成本。然而，已经有些企业在建立小型经济组织或者确定同现有的小型经济组织进行业务合作的方针。我们仅以克拉尼的“火星”公司为例。它现在把某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有更多的劳动力和存在着其他有利条件的地区。这些企业为“火星”公司制造零件，但它们都是完全独立的，设有自己的工人委员会。“火星”公司和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将是纯粹经济性的，相互的义务将确定下来，而价格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这些小企业不受歧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用行政方式在经济部门进行联合，如果不进行精确的经济核算，如果集体不大愿意同其他企业发生业务关系，也不会产生好

的效果。如果企业表面上联合起来了，但是实际上小企业却附属于大企业，没有任何权利，那么这种联合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效果。比这种做法正确得多的是，企业走生产专业化的道路，这使它们能够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这些专业化的企业在生产成品时进行合作。如果较小的专业化企业仅仅与一种成品有关，这是不好的。专业化企业最好是接受若干工厂的定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不会成为一个工厂的附属物，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有可能进行大批量生产，从而生产出比较便宜的产品。比如，有可能和有必要这样来发展克宁地方的工厂，就是让它生产许多工厂所需要的各种型号各种规格的螺丝钉。但是，由于对专业化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一些企业主要是生产自己所需要的螺丝钉，而它们的这些机器只有一个月进行生产，而其他十一个月则停着不用。这实际上意味着，那里所投入的固定资产没有被利用，而是被闲置、被冻结。

问：铁托同志，我们都知道，您对于培育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关系，特别是对尊重劳动人民的权利，给予了很大的关怀。您现在是否愿意就这一问题向工会会员和积极分子谈一谈看法？

答：关于劳动关系方面的某些问题的情况，我往往是从工会得到的。我总是花相当的时间来研究这些材料，因为这些问题的确使我非常感兴趣。当我读到坏的事例，我力求只要有可能不管是在哪里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对我来说最好的机会是在集会上这样做。我利用一切机会来提出自己对这一切情况的想法，而这实际上是我们领导班子的想法。工会的任务是对这些事情及时发出警报，一旦了解到某些不良现象，就立即发动工人开展斗争去消灭这些现象，而不必等待，看我们将做出什么决定。工会应当敏锐地进行干预，特别是对待侵犯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利的现象。

同时，工会始终应当想到在它们身后有人民政权和我国的现实法律，只要涉及不良现象，工会就有责任进行干预，并加以制止，不论牵涉到谁。因为这些不良现象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会造成工人情绪不振和引起乱批评，而以后会被某些人加以利用。诚然，这种人为数极少，但是，如果这类现象反复出现，他们毕竟能够用他们的观点来对工人施加消极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到让职工自己来决定劳动关系方面的一切问题。如果有人游手好闲，如果有人不愿意劳动，那么职工就会把他解职。

正如我已经强调指出的那样，在这一切方面的问题正是在于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今天，工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不再是处于雇佣关系之中，而是自由的生产者。因此他对社会的关系也不同了。现在不仅生产而且他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取决于他自己。而在企业中的生产者本身之间的关系也在日益变化。在这方面的消极现象越来越少，现在将完全消除。不会再出现从前的那种情况了。比如说，企业中的经理或其他某个领导人出于个人动机而不是出于真正需要，就把某个工人从一个岗位调往另一个岗位，从较好的岗位调到较差的岗位，以便用这种方式迫使他离开企业。这样的类似的有害行为，如果在某些地方还出现的话，那就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在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应当存在这种行为的。

问：您是否可以就企业和公社的关系问题向我们谈谈您对工会所面临的任务的看法？

答：在我谈到劳动集体与公社、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关系时，我经常考虑到工会在发展这些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关系不可能避开工会的活动而发展。比如说，有的公社把企业仅仅看成

是自己资金的来源，即可以从那里把资金拿来而用到其他方面，同时又不考虑企业本身的利益。然而，工会这时就要制止这种现象，工会应该拥有尽可能大的权利和可能性来起到这种作用。在我看来，工会今后在公社，在同生产者院的合作中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你们肯定都会记得，在实行工人自治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意见：认为在工人委员会成立之后工会就不再需要了。而实践却恰好表明，工会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它的意义和任务越来越增强。诚然，可能有人会把业已加强的工会作用称之为工团主义，就象那时把我们的管理民主化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一样。但是，正如对经济部门无政府状态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一样，这类指责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 摘自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贝尔格莱德与《劳动报》社长和编辑的谈话(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八卷)。

自治的根本问题

让自治者也管理收入

问：在您看来，什么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自治的根本问题？

答：让自治者最终不仅管理自己的劳动，而且管理收入，以使自治者成为将能够正确地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人。而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问：您认为，在象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中社会主义自治的特殊意义何在？

答：我把社会主义自治看作是一种强有力地发挥作用以使内部紧密结合的因素。多年以前，我曾经考虑过，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要形成长期紧密结合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然而，我认为，我们有着一个方向，即自治的方向，它将会成为捍卫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国家的一种力量。

问：尽管您近来多次谈到关于目前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情况和关于它在日益发展的自治条件下的作用，但我仍想请您再谈一谈。

答：在今天，当应该充分实现自治价值的时候，当工人阶级应该享有宪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的时候，当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成

为我国社会基本因素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联盟面临着复杂得多的形势。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切，更值得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我才建议进行一定的改组，使党的组织适应当前自治者社会的需要。共产主义者联盟必须在各个地方、在各个领域里发挥作用，但是，它不再是作为某个发号施令者，而是作为正确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发挥作用。这就比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提得更高一些，六大决定，共产主义者联盟将只是某种指导力量。而我可以这样说，在不久以前，即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这种指导作用还十分薄弱。

然而，我现在在巡视一些地方的时候看到各级组织正在适应我们的需要。一些拥有数百名以至上千名盟员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组织并没有过充实的党内生活。它们偶尔召开会议，会上两、三人发发言，无非是某些人表示同意，某些人表示不同意，如此而已。

共盟组织都必须在各个方面开展活动，研究各种问题，使所有的盟员都参加到其中来。这首先适用于生产部门的共盟组织，它们的作用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表现出来。其他群众性组织也一样，它们不能只满足于做点思想工作。它们必须更多地从事思想政治提高的问题。

我必须说，对共盟盟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相当死板。特别是各大学里的共盟盟员应当在这方面更加注意。*

* 摘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与贝尔格莱德电台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米洛万·吉拉斯事件

司空见惯地冲向洞开的大门

我想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要召集这次全会，谈一谈我们不得不召开这次非常全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当然，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谈的是那些并不涉及第六次代表大会议的小事情，那么我们就会采取别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由于米洛万·吉拉斯同志^①的文章具有不是本着六大的精神来贯彻六大决议的性质，由于这些文章具有这种性质，而使得本来只能由新的一次代表大会解决的、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大的

① 米洛万·吉拉斯(一九一一——)，曾攻读哲学和法学。一九三三年以共产党员的罪名被判处三年苦役。苦役期满后曾任南共贝尔格莱德地方委员会委员，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委员。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一九四〇年十月)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一年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任最高统帅部成员。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曾任部长、南共联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民议会主席。一九五四年一月在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被开除出南共联盟。由于从事敌对活动，一九五七年被判处九年徒刑；被剥夺职务和奖励并退休。他成了反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敌人。他在国外发表过反对南斯拉夫和反对共产主义内容的几本书和一些文章。——原注

内部问题，被提交公开讨论，即被提交给非党群众讨论了。不言而喻，所有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使我们不得不召集这次全体会议。

米洛万·吉拉斯同志的文章是他个人的作品，是他个人的意见。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他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为什么我们不早些采取措施呢？这样不是可以不动声色地、较少震动地使问题得到某种解决吗？

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我就必须承认：我们在这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责任的。因为吉拉斯同志早就写了这些文章，并且在今年秋天他曾有一次问过我：“老大^①，你对我写的文章有什么意见，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有一些事情我是不同意的，但是基本上还是好的，所以我想这些还不足以成为你不写的原因，继续写吧。”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文章中也谈到了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谈过或写过的事情。

只是在以后，在十二月份，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我才发现吉拉斯同志已经走得太远了。当时我发现，在这些文章中他实际上在攻击共产主义者联盟，我不想论及各种理论上的错误观点，这方面让卡德尔同志来谈，我看出来里面的问题是要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破坏纪律，是有可能使我们党的团结和我们国家的团结蒙受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是没有看错的。要是我们看错了，那倒好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错。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表明是非常糟糕的，这不仅对我们的联盟，而且对我们整个国家都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

不能说，吉拉斯同志的这些文章没有受到过个别同志的批

① 原文为“老年人”、“年长者”之意，为南游击队及党内对铁托的尊称。——译者

评、严厉的批评，不能说，个别同志没有对他谈过根本不同意这些文章的意见。这一点他们自己会来谈的。而我，当我看到，吉拉斯同志在个别接触和交谈中受到批评之后，仍然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文章中使问题更加激化，我得告诉你们，当时我不在贝尔格莱德，而在斯洛文尼亚治病，当时我不得不激烈地和严厉地作出反应，我要求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核心领导层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立即停止刊登他的文章。

吉拉斯同志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新思想》杂志上发表以前，就知道了我的否定意见。但他迫不及待地把它发表了。他这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能猜想到，事实上问题在于他想利用这篇文章使我们，使他在《新思想》杂志上所攻击的那个“集团”在道义上不可能以平等的地位来争论以及有某种充分的权利来反对他的一些思想论点和其他论点，他的这些论点抨击了官僚，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在消除我国的官僚方面，他冲向洞开的大门。

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或者谈论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居心叵测。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倒是他以前所写的东西。这些东西会引起什么结果？他想达到什么目的？我必须马上就指出：如果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有意识地做的，而且事先就考虑到这样的行为会给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我们的国家，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就使人感到太尖锐和太严重了。我认为，正是由于对我国发展的实质不了解和对由此而可能产生的事情不了解，促使他继续写文章，尽管我们已经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

他极其仓卒地，以一星期内写三篇文章的速度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这是不是某种独创的新理论？是不是关于我国发展、关于我国现实情况的发展的新思想？同志们，不是的。今天我们

有些同志问我们：“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攻击他？为什么要召开非常全会？有些事情你们自己也谈到过。”我回答说：是的，这里是有我和卡德尔的想法和说法，也有其他许多同志的想法，这些想法我们都在会议上公开地谈过。我是第一个谈到关于党的消亡、关于联盟的消亡的问题的，但是我并没有说过只要经过六个月、一年或是两年就可以办到，而是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最后一个阶级敌人还能为害，只要我国公民广大群众还不具有社会主义觉悟，那么共产主义者联盟就不可能消亡或取消，因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要与它在革命时期对革命的胜利负责一样对实现革命的成果负责。共产主义者联盟必须存在，而且不仅要存在，还要在思想上更加强有力，并意识到它本身应起的巨大作用。

这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事情，但是现在谈的是关于吉拉斯同志在他的思想方面，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在他的“哲学”观念方面所阐述的问题。当他提到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确实反映出来，并被利用来在冲破官僚制度方面和日益完美地形成我国社会生活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那些确凿的事物时，他在自己的那些“哲学”议论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他想以此来掩饰他所宣扬和所写的主张，即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复辟资本主义，而这已不是以前那样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形式，因为在西方的民主形式中必然也有一般的社会形式。

他向我们宣传的不是新型的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抽象的民主，这种民主本身似乎就足够了，而实际上是无政府状态。

对我们来说，民主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民主就是达到主要目标——社会主义的手段，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最民主的统治形式，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民主，而没有民主也就

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宣扬和描绘为民主而民主，而且是西方式的民主、形式主义的民主，这就是倒退到旧的社会制度形式中去，而不是像吉拉斯同志所说的那样向前进。为什么？他那里所写的东西，我们已经在许多修正主义者和最出名的改良主义者的著作中读到过。因此，他不能在他的“哲学”议论中自称似乎他在继续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民主，而我们这些同志，这些老共产党员实际上却在阻碍这种迅速的发展，因此应当用某种方式把我们排除掉。按照他的意见，我们是机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我们在革命的社会发展观上，却同他所写的东西相隔十分遥远，犹如天壤之别。因为他倒退得很远，所以我不想在此深究：这里是否有观点的混乱之处，因为实际存在着两种极端。但是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那种极端在他的文章里最为明显。

在这里，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安。我为我们党的许多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低得难以想象而感到不安。他们以为这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一步推进我国现实生活的一种什么新理论。这使我感到突然和震惊，这也是应当使每一个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感到不安并使我们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联盟中共共产主义者的内部生活的最主要的东西。

那么，由此而出现了极大的混乱，这是毫不奇怪的。我必须坦率地对你们说，如果我不是看到简直象南方大雪块开始从山顶上倒塌下来那种极其有害的后果，那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向同志们建议召开全会的。老实说，我认为只要读一读十二月间南通社《参考资料》上的外国通讯社的报导，就足以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所有一切反对者是怎样迅速地抓住了吉拉斯的这种理论，又是怎样为这种理论而兴高采烈的。他们说，很明显，民主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原来的想象，因为今天已有一位理论家能够采取这

样一种立场，他说绝对必须取消这，取消那，这样，正如他们在
那里所写道的，南斯拉夫已接近于西方的民主。确实，存在南斯
拉夫接近于西方民主的现象，但不是在内部制度的问题上，而是在
对外政策方面的合作问题上。

吉拉斯同志为什么会同与他已共事十七年的老同志们分手呢？吉拉斯同志始终有可能在我们内部发表他想发表的意见，甚至发表超过他的文章的意见。我们全都了解他，我们彼此间也争论过。我们彼此开玩笑，而一个人在开玩笑时是什么话都说的。但是，这些问题在我们内部从来也未以后来公开发表的那种形式讨论过。他在此以后仍认为没有必要在执行委员会甚至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说明自己打算朝这一方向来写文章。当然，我们不会同意他这样写，因为正如我在上面已对你们说过，这只有代表大会才能解决，而决不能通过舆论界或报纸来讨论解决。让那些从某些腐朽的自由主义动机出发来捍卫自由表达思想的倾向的人不要见怪。我们从来，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以后的近几年中，都没有阻碍过自由表达思想，但这些思想必须有分寸，必须是共同讨论的结果，必须是进步的、先进的、推动我国现实向前迈进的思想。

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谁要是妄想他能像凤凰那样从自己头脑里产生最成熟的思想，那他是自欺欺人，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我们迄今为止都是集体地工作的，除了集体工作、互相交换意见、彼此激烈争论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只要大多数人认为是最正确的，就应当采纳。这个原则以后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中也应当保持下去。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其他一切团体和党派所不同的地方正在于这一点，在于共盟有这样的纪律，那就是凡是大多数同志认为是必要的，那就是成熟的和最好的。我们中间

没有一个人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权利自称是这样的人。谁也不可能超越并凌驾于众人之上，我想，吉多[吉拉斯]也没有多少理由自称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置身于我们现实生活之外，他不知道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质何在，他也不懂我们的法令，不了解制定我国法律所经历的一切麻烦和艰难，不了解我国法律是根据哪些因素制定的，不懂得我们是在同什么东西进行斗争，不懂得我们是如何困难地获得目前所有的东西的，对一切困难和痛苦的历史，他都不了解。

吉多同志从来没有像我们已故的基德里奇同志以及那些被他宣布为官僚主义分子的人那样在日常工作中沤心沥血地工作，因为他认为这是平凡的、琐碎的事务主义者的工作。然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这正是真正的工作。社会主义正是由这些工作构成的，而不是由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具体地说就是吉多同志臆造出来的某些抽象思想构成的。社会主义绝非如此。谁不了解我国发展的实质，谁就不能自吹能从哲学的角度正确地描述和阐释我国的现实情况。而吉多同志却不是这样。我希望他自己会来说明这一点。

此外，从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看，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还坚决反对在布里俄尼岛上召开的第二次全会的决议，当时我们谈到了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异己的、被歪曲的、倒退的和过时的形式和观点的危害性。他也违背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这就促使我们必须而且只能在全会上来解决问题。当然，我不想去说明吉拉斯同志的议论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就让卡德尔同志来谈，他将对这一问题作一个报告。我想在接着讲之前先着重说明一件事。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证明我刚才就我们的态度所讲的话是对的，我说过，我们没有足够的警惕

性，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警惕，而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警惕性不够。我认为，早些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在吉拉斯黑字写在白纸上，一意孤行地向公众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前来解决吉拉斯同志及其观点的问题是困难的，因为人们会不理解，会认为这是集团内部某种争夺权力的斗争，因此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当时在他的第一批文章发表以后就已经提出了吉拉斯同志以及他能否留在联盟领导岗位上的问题。

在我看来，现在才传到外面去要好一些。让大家从中看到我们的民主的作法，看到我们的民主的宽容态度，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让大家看到，我们已经等到不能再等待的程度了，但是，事情一旦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说：停止吧，让整个中央来表态，在这件事情上该怎么办，有什么想法。我认为，这样做毕竟不会引起很大的恶果，而一切已经发生的恶果，完全是由于吉拉斯的过错而产生的，而无论如何不是由于我们的罪过而产生的。

有一个情况是十分有意思的。在吉拉斯的文章中以及他的所有观点中，十分触目的是，他一字不提工人阶级，似乎工人阶级不存在似的。也就是说，他根本不谈工人阶级这个我国整个革命前的准备斗争、革命斗争以及革命后的我国建设事业的主要代表，而在其“哲学”议论中却把过去的资产阶级剥削者、过去的大臣、过去的资产阶级宪兵同觉悟的工人等同起来，他把所有这一切等同起来，在他看来这一切现在都是一码事。

这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导致无法知道的可怕境地。因为，如果我们允许这样做，那么在一年内就不会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我要说的是无须经过流血的斗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就不存在了。这种观点以及这些思想在我国流

行的结果就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国还存在意想不到的残余和各种各样可能的观点。这一点现在再清楚不过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这几天内有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国内的反动势力以及一切动摇分子和不健康分子已经开始抬头，更不用说西方的反动势力了，他们认为，吉拉斯在我国举起了民主的旗帜。

当然，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的觉悟程度，但是也有成千上万这样一些人，他们扩大了动摇分子和各种冒险分子的队伍，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这不仅使我国的威望受到损害，而且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去争取一度已经取得的东西。

吉拉斯同志正是没有看到这些后果。我认为，作为我们党内长期的领导人，他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就像他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一样。现在有人问道：他确实是如此无知呢，抑或另外有什么背景？我提请全会来判断：这是不是有意识地、有系统地准备消灭最革命的因素？正是他们在我们队伍中传播社会主义的意识。

由此可见，正如我前面所说，他恰恰忘记了体现这一切事物的工人阶级，他根本不提工人阶级。这是不是企图分裂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这是不是下意识地或者有意识地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联盟队伍的团结？在我脑海里出现了这些想法，而这是应该加以澄清的，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很多人都在说：工人能做什么？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们不是什么理论家，他们有了自己的工厂，就让他们和以前一样在工厂里做工吧，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现在还管理着工厂。现在形形色色咖啡馆里的清谈家、政客、各种编辑部周围的人士、某些文学家等等，不约而同地都出头露面了，他们来自小资产阶级队伍，来自于某种原因早就不该留在我们的队伍里而早该被驱逐出外的那些人的队

伍。可见，这些人要成为今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优秀人物。

为什么我从吉拉斯的文章中看到了修正主义，这是不难猜到的。我想你们大家也都看出了这种修正主义，而我简直难以相信吉拉斯会没有看到这一点。这里的问题是不惜用任何代价实行民主的问题，提出与伯恩施坦对目的的提法完全吻合的提法——这最好由卡德尔同志来谈——以及其他许多提法的问题，这些提法在西方得到了某些修正主义集团异乎寻常的赞赏。而吉拉斯同志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就是修正主义，而且是最坏的一种修正主义，即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而不是他想在自己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那种革命的物力论。这里丝毫也没有任何革命物力论。这只不过是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转，而不是推向前进。请原谅我，我必须用极其严厉的措词来表达，这一切说明吉拉斯同志脱离我们并不是为要更迅速地向前进，而是拼命地倒退到旧时代去。

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否看到这一点？如果他是意识到的，那就是说他早就在考虑这件事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那我们希望他有朝一日会确信这一点。

从吉拉斯的文章中可以觉察到的影响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其中有一种影响我已经提到了，即他脱离了目前的现实，脱离了自己的同志，找到了另外一伙人，他有这样的另外一伙人；其次是西方的影响，出国旅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影响，只不过不是我国的现实、我国革命的历史和历史上一般革命经验的影响。

有人说，革命有自己的逻辑，有许多事情是会再现的。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对的。在革命初期，在武装冲突时期，当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革命就比较容易地向前推进；

当群众起来破坏那些过时的东西、陈旧的东西、为他们造成难以忍受的生存条件的东西的时候，这种动荡就少得多或者是罕见的，而跟不上革命的车轮这种情况简直是极个别的。但是，在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即在武装冲突和革命胜利之后，成为这次革命代表者的人们碰到斯齐拉和哈里白德^① 的各种各样的暗礁，那时情况就变得十分艰难，特别是当事情不是象某些人所期望和想象的那样轻易而迅速地进行时，一些软弱者便垂下双手，他们扔掉武器或者要求事情进行得更迅速些，而根本不问这是否有可能，并且寻找各种借口、理论和哲学来指责社会改造的这种缓慢发展。

具体地说，这就是吉拉斯同志事件。他是对我们痛苦的现实，对我们繁重的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发展感到厌倦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他在这里如坐针毡，陷入自相矛盾，与其本性发生矛盾，于是，他现在寻找其他的借口，毫无任何根据地责备我们，说我们是进一步迅速发展的障碍。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在这场革命中如此大胆地消灭了他们昨天所做到的而今天已认为不合适的东西，以便创造某种新的、更好的东西呢？什么地方又有过这样的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在这场革命中如此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便象在我国这样使一切事物向前发展呢？没有！那么他为什么自称有权谴责他所说的“一潭死水”，他向那里投进了一块石头，以便掀起波浪，促使事情更迅速地向前推进。

我不知道给我们这些担任负责职务的人加上什么保守和机会主义罪名的这种想法是从何而来的。显然，这是不了解我们所从

① 古希腊神话中狭窄海峡两岸上的两个害人的怪物。——译者

事的事业的结果，是不了解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条件的结果，是不了解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发展，即在一个大多数居民具有各种各样看法的落后国家内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受到历史制约的结果。这就是说以无视的态度对待这一切。

当然，那时他所写的一切东西归根结底都是司空见惯地冲向洞开的大门，虽然关于这一点其他同志已谈过。我同意，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谈到过，但是当我们谈到关于共盟的消亡，或者关于党和国家的消亡时，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这将是明天、后天或是过一、两年的事，而是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艰难困苦的发展过程。

在由于吉拉斯的文章而引起的整个这一事件中，显露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唯一的一点是：这一事件使我们和我们许多人头脑清醒过来，使我们大开眼界，这就是，看到了我们从未怀疑过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相信有这么一大批人，他们，特别是吉拉斯同志，认为我国已经消灭了阶级敌人。吉拉斯认为，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敌人，现在大家都一样。而正是吉拉斯事件却表明了，我们这里的阶级敌人是多么危险。阶级敌人还存在，这一点在吉拉斯的文章发表以后就可清楚地看到，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也有阶级敌人，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露自己。有积极意义的是，我们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使任何一个人不要以为阶级敌人及其消灭的问题只是武装斗争和结束这一斗争的事情，而是只要存在社会主义建设，在我们进入最高阶段即共产主义之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可能的敌对势力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反对我们，为我们设置障碍，如果注意到还有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就尤其如此。

诚然，吉拉斯同志一向对青年寄以特别巨大的希望，而他在

这里却力图取消青年。青年也不需要！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既然要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而只留下一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可以成群地在酒店饭馆，在各个角落和屋里彼此争论和吵架，那么他必定也要取消青年团，这是不言而喻的。

他甚至也不让工会在我国有立足之地。我想听一听他是怎样来说明这是正确的，我们都知道，我国的工会还负有重大的任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工会的任务是要帮助在生产者中间扩大社会主义意识。

我想在这里用几句话来说明我对吉拉斯同志所犯错误的看法。这是有关我国整个团结方面的重大错误，而在国外也给我们带来危害。在结束讲话时我应该强调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也可以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我们和我们的全体盟员现在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并且如同在尖锐的革命斗争时期那样行事的话，那是绝对错误的，不仅是无益而且是有害的。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如此强大，以致可以完全用另外的方式，用新的方式，用我们来进行反对这种企图的斗争，并且不赞成把那些犯错误的人，甚至犯有极大错误的人加以消灭，而是使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错误，并且今后尽力工作，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他们所做的错事。

我知道吉拉斯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必须并且应该认清自己所作所为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就应该接受一切批评和党给予的任何处分，然后继续工作，而不致离开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的队伍，而只有继续工作，才有助于弥补他给我们的国家和共产主义者联盟所造成的损失。

我想谈到这里为止了，我希望这次讨论应采取这样的方针：吉拉斯在这里不是批评所针对的唯一目标；批评也应当针对我们

联盟内外目前的整个状况。我必须说明，在吉拉斯事件之前就有许多材料和证据，说明应该更坚决有力地反对那些想在民主的外衣下危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目前这些人由于吉拉斯的文章便以为中央已发生分裂，而他们可以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了。这次讨论应该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我们要使这些人不能得逞，虽然发生了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的这种不幸事件，但我们毕竟不应当犯新的错误，陷入另一个极端，而是应当通过一些决议来使我们能够顽强地向我国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方向前进，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改变我们进一步正常地向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方针。但愿这不致成为某种警报，使人们以为现在又得改变我们的方针，因为我们在贯彻这一方针时犯了错误；我们应当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化道路前进，但是要倍加警惕和更加谨慎，使我们以后不致会说，我们又一次瞎了眼。*

* 摘自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共联盟中央第三次非常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铁托：《言论集》，第九卷)。

不结盟政策

团结第三世界

问：现在，请允许我提几个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在冷战时期，出现了不结盟政策这一概念。您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之一。请你对我们谈一谈，这种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答：就我个人而言，在万隆会议^①以及通过潘查希拉^②决议之后，我产生了这种想法。我曾经充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感到这还不够，觉得这更多是宣言式的东西。我曾经说过，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再前进一步。我看到的不仅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而是更广泛的范围。因为，存在着两个集团：早就建立的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在我看来，作为一种抗衡力量，东方集团必然会出现。这一点已经开始通过联合国反映出来了。在联合国内很难

仁

① 万隆会议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万隆（印度尼西亚）召开。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些国家宣布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赞成共处政策，支持新解放国家的独立斗争。——原注

② 和平合作五项基本原则，是印度和中国于一九五四年提出的，而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强调了五项基本原则的意义。所谓潘查希拉的基本原则是：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平等和共处。——原注

通过一些好的解决办法。联合国成员国大部分国家都处于这两个集团之外。我想，这些集团之外的国家毕竟应该通过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不是要具有作为第三集团的某种组织形式。但是，所有那些反对划分为集团，而赞成在万隆通过的原则以及后来又在贝尔格莱德^①加以补充的原则的人士和国家，应该以某种方式团结起来。总而言之，我考虑过，我们应该通过某种方式把第三世界团结起来。

贝尔格莱德会议、开罗会议以及卢萨卡会议的思想传遍全世界，这些思想甚至在集团国家内部也起着作用。现在，集团之间的对抗缓和下来了。如果你们记得，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我们整夜开会，以便商定并通过决议：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而另一个代表团去华盛顿，要求他们至少见见面并举行会谈。那时，我强调指出：“ONLY MEETING, ONLY MEETING”（只有会谈！）。我们长时间做了努力，做工作，促使他们开始相互会谈，紧张局势稍有缓和。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有使世界缓和的思想。不结盟政策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召开这次会议^②的想法是我们，即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恩克鲁玛总统和我提出的。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是会议的倡议人，而后来其他人也同意召开这次会议。这就是说，我们把这一想法告知了后来出席贝尔格莱德会议的其他国家元首，理由是在当今混沌的国际形势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极其必要的。当然，那时

① 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原注

* 摘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与贝尔格莱德电台电视台记者的谈话（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② 指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原注

我们并没有预料到，会有如此众多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而在今年四月，当我和纳赛尔总统在开罗会谈时——我同纳赛尔总统在这些问题上合作得非常好——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必要的，哪怕只有少数几位国家元首会同意我们对于当今国际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方式的观点。然而，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们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可以说，我们的预见说明我们过于悲观了。

在我看来，贝尔格莱德会议开了几天并通过了决议，会议是开得很成功的。会议的成功出乎我们意料。当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在一切方面都会存在一致的观点，但是，我们设想，这次会议将会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对保卫和平的斗争，在为制止新的世界大战作出努力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会取得一致意见。在这方面观点确实是一致的。当我就会议的筹备问题致函一些国家元首的时候——纳赛尔总统也这样做了——我还表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不应该讨论各种地区性的问题，不应该涉及某些国家的相互争论，因为在这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使我们感到特别满意的是，我们可以说，不仅在全体会议上，而且在秘密会议上，大家都坚持了这一点。全体与会者最后通过了和平呼吁书和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宣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并不抱幻想，以为在个别问题上绝不会有不同的观点。曾经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坚持尽最大的可能使不同的观点协调起来。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某些特殊问题。其中许多国家还存在着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考虑在内。特别应该考虑到不久以前刚获得解放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在它们的对外政策方面，以及在它

们的内部发展方面，还同过去的宗主国有着联系。*

问：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从第一次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至今已经十五年了。总统同志，您认为，不结盟国家在迄今的活动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答：我认为，我们可以自豪地回顾一下从一九六一年贝尔格莱德会议至今所经历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一种运动和一种新的政策，会如此迅速地确立起来，并且变成一种国际力量，而没有这种力量的参加，世界性的问题就不可能顺利地得到解决，这在历史上是很难有这种例子的。仅仅在十五年的时间内，不结盟国家的数目不断增加，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一次会议时为二十五个国家，而在去年在利马召开部长级会议时增加到八十三个，肯定会有更多的不结盟国家出席科伦坡会议。

在这里，我只提一下不结盟取得的某些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体现了作为国际关系积极的发展动力的不结盟政策的不可替代的革命作用。

不结盟国家对确立积极和平共处原则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推动了在对所有国家人民同样安全以及所有国家平等参加解决国际问题的基础上缓和紧张局势。

在世界和平面临最严重的考验的某些时刻，不结盟国家对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一九六一年，当冷战的逐步升级有可能把世界推向一场新的灾难的时刻，不结盟国家施加了建设性的压力，使对抗转为谈判。类似的情况是在一九七

* 摘自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在萨格勒布与《团结报》社长的谈话（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五卷）。

三年十月近东战争时期，当时根据不结盟国家的建议派出了联合国部队，从而阻止了战争的烈火在这一地区的蔓延。

属于不结盟国家的伟大功绩的是：没有使整个世界划分成集团，而某些国家与地区摆脱了外来的统治和集团争夺。

不结盟国家对加速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摆脱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依附的解放进程也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多数国家的人民和国家来说，不结盟已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和加强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的行动纲领。因此，几乎所有的新解放的国家都决定赞成不结盟，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结盟国家是发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的国际因素。它们为解决目前整个世界面临的我们时代的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原则，确定了范围。

不结盟国家通过自己的全部活动为使人们认清以下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问题：在事实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应该怎样为建立这样的关系进行斗争。不结盟国家不仅是一支道义和政治的力量，而且是一支日益增强的物质力量，要是没有它们作出这样的贡献，今天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且在每一个方面都会更加贫困。因此，不结盟不是一时的和空间上受到限制的现象，而是当代人类的长期需要。

问：您认为，使不结盟政策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有吸引力并使这一政策得以有力地确立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答：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上居于优势的各种条件。强有力地解放潮流和各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的增强使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大

一批新的独立国家的建立。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各国人民之间和各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新问题。有相当一部分的新兴力量倾向于向新的社会关系发展，倾向于已经成为世界性进程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坚持用一切手段阻碍或延缓这种积极的进程，因此也就开始了冷战。

接着，很快就形成了以美国和苏联作为两种支配力量而起特殊作用的两个集团。但是，同时人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世界的前途、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围绕某些大国而把各个国家划分成为集团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国人民的解放进程也具有了替代按集团划分世界的新出路的性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一九五六年始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即从我同尼赫鲁和纳赛尔签署了布里俄尼宣言以来，经过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以及以后的事件，我们会看到，这种要求独立的愿望在不结盟运动中日益明显表现出来并得到具体化。这首先是因为这一政策的目的和原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最进步的愿望。

不结盟政策的吸引力从一开始就表现在：越来越广泛的国家相信，它们奉行独立政策的愿望和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主体地位之所以能够最好地得以实现，正是因为他们属于不结盟运动。

这一政策的普遍性和生命力还表现在：甚至某些集团国家也表示希望同不结盟国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这在客观上也影响到不结盟政策在新的地区得到确立，并导致逐步地克服集团的划分。

目前正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对待那些希望参加我们的运动的国家的要求。我在这方面赞成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特别

在对待列席国方面。对于正式成员国来说，应该保持严格的标准。但是，我认为，也应该使其他某些愿意改变自己政策的国家有可能接近不结盟。这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不管对不结盟施加了种种压力和进行了种种攻击，我们的思想正日益深入到集团国家的人民中去，因为各国人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显然，这种发展会引起来自各个方面、特别是来自主张按集团划分世界的人的反对。他们首先试图贬低不结盟。随后就攻击不结盟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不倾向于任何一个集团，而据说是建立自己的一个某种特殊的集团。以后出现的就是另外一类指责。这就是说，一些人说，不结盟国家不够中立，另一些人说，它的缺点是把集团与集团等同起来。还有一些人说，如果说不结盟在冷战时期还具有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今缓和时期就没有理由存在了，等等，不一而足。

无须强调指出，这些指责是多么没有根据。但是，他们无法减少不结盟作为对任何具体问题采取独立立场的建设性政策，作为以整个世界统一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的价值。

不结盟政策和不结盟国家的建设性作用今天毕竟得到了许多方面的承认。甚至还得到了过去经常攻击它的那些人的承认。

但是，压力和讹诈并没有停止。随着科伦坡会议的临近，这种压力和讹诈还在加强。某些大国得以在某些不结盟国家之间制造障碍和混乱。有人企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破坏不结盟国家的团结。有人提出各种条件，提出会议应该采取的立场。然而，任何人都不能使不结盟国家脱离它们自己选定的道路，科伦坡会议也将表明这一点。

问：总统同志，您是否能回顾一下在同不结盟国家国务活动

家初次会晤时的某些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布里俄尼会议和贝尔格莱德的第一次会议以前的那些会晤。

答：二十年前，就是在这里，在布里俄尼，尼赫鲁、纳赛尔和我一起开过会。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就是在这里产生的。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严重。冷战有变为热战的危险。我们讨论过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决定，应该致力于使所有不在集团之内的国家团结起来。这一点反映在我们三人当时在布里俄尼签署的一项简短的宣言之中。这也就是为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采取行动的开端。

当然，我们当时还不能想到这件事后来竟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会有这么多的国家团结起来。即将召开的科伦坡会议的东道主班达拉奈克夫人也曾经是贝尔格莱德会议的参加者。遗憾的是，我的大多数朋友、不结盟政策的倡导者——尼赫鲁、纳赛尔、恩克鲁玛、苏加诺和其他几位朋友——今天已不在人世了。

但是，我们在布里俄尼这里所设想的，以及后来在贝尔格莱德所阐述的东西逐步地实现了。

最初的情况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发展我们的事业和加强不结盟国家在世界上的作用方面经历了苦难的、然而是极其成功的道路。

对于和我一起致力于这项活动的同代人的任何回忆都是使人难以忘怀的。比如，我还记得我同尼赫鲁的会晤情景。在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期间，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份，我曾出席过在马德拉斯近郊举行的国大党的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集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成百万的人民群众以极其关注和赞许的态度听取了尼赫鲁和我的演讲，当时我们谈到了要为自由和独立以及为各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斗争。尼赫鲁在会上公开谈到了，印度必须沿着

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第一次会晤以来，我和尼赫鲁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尼赫鲁——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位伟大领袖——和我，我们相互有很深的了解。

问：总统同志，我国的革命以及我们决心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南斯拉夫联邦内部各民族的平等关系，对南斯拉夫采取这样的对外政策活动有多大的影响？

答：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决心奉行不结盟的根源在于解放战争，甚至可以追溯到我们在战前的革命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如果谈到不结盟政策的实质——这首先是为争取民族独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内部发展和平等的国际合作而进行的斗争——那么，在我们的革命的各个阶段，这些原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显然都是得到体现的。在我们所有较重要的文件、决议或讲话中都反映了这些原则。

早在人民解放斗争时期，我就强调指出，每个民族都享有成为自由的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以及成为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民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同我们的所有同盟者建立关系的。我们坚决地抵制了外来的一切发号施令的企图，反对了瓜分南斯拉夫的计划，抵制了使它屈服以及限制它独立自主和自由的发展的计谋。我们一向都拒不同意把我们当作任何人弈棋中的小卒。

一九五〇年，当我们制定工人自治法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自治发展和独立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完全一致和相互依存的。

南斯拉夫国内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同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所赞成的原则相一致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实践中是在实现各个民族的完全平等，而不管民族人数的多少；我们在发展自治制度；我们

在为加速发展不发达地区而进行斗争；我们是通过协商制定一切决定的，等等，而这一切基本上也同样是 我 国 对 外 政 策 中 的 原 则。

总 而 言 之，国 内 的 自 治 和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不 结 盟 乃 是 独 立 的 南 斯 拉 夫 的 完 整 的 政 策。

问：总统同志，是什么鼓舞您，使您个人确信不结盟国家的生命力和未来呢？您对这一政策在今后的年代里有什么预测？

答：如果希望有长期的世界和平和合作，那么除不结盟政策外别无其他选择。我一向担心，事态发展要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那样，就会导致新的灾难。我认为，应该有尽可能多的人民和国家积极参加制止帝国主义和其他的图谋，那么就不会爆发新的战争。

我一向反对战争，赞成通过和平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我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我知道人类为这两次大战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两次大战吞噬了千百万人。几十年所创造的一切都毁于一旦。所以，反对战争的这种情绪是如此深刻地印在我心底。

正象我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确立了终身为之奋斗的方向那样，我在这里也决心为人类以另一种样子组织起来而斗争。我曾经深信，世界必须改变，我们不能容忍如此不公正的各种关系。这就是我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当然，我从来不抱幻想，认为这一切都将是一帆风顺的，不会发生冲突的。所以，我们必须创立一种运动，它将为克服这样的状况而斗争。

自然，这样的一种趋向妨碍那些想使现状保持一成不变的人们。但是，我们关心的是斗争，关心的是始终信守共同制定的原则。这在将来也不会是轻而易举的。还会经受许多令人失望的事

情。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人们丧失信心。可以肯定，坚韧不拔精神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将会带来成果。当然，坚韧不拔的精神应该建立在深刻的信念之上，深信这是今天应该在世界上占优势的唯一正确的原则。

请你们看一看，这次将会有多少国家出席科伦坡会议，而这对世界今后的发展将意味着什么。诚然，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团结，这是我们斗争胜利的条件。我知道，我们将会珍惜这种团结，而这一点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同样相信，我们今后将会有更多的有组织的活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不结盟国家始终有足够的积极性。也许，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作些自我批评。*

* 摘自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一日在布里俄尼向南通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一九七六年八月一日《战斗报》)。

反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

请你们理解我的意思

在六月十六日举行的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曾讨论了国家保安部门某些机关的工作中的一些不正之风问题。执委会在那次会议上决定选出一个调查这些问题的党和国家委员会。在此之前，曾经成立一个应该从技术上确定我们国家保安部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的技术委员会。这也是促使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成立一个政治委员会，也就是成立党和国家委员会的一个原因。委员会将在以后提出关于迄今工作的报告，因为对我们国家保安部门工作中发生的各种偏差和不正常现象进行的调查尚未结束。

我想在这里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些情况。我记得，我们在一九六二年三月曾召开过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了涉及到我们领导中的关系、我们党内的关系，以及已经发生的各种不正常现象的种种问题。那次会议开了三天。会议的参加者是会记得十分清楚的。那时，我们大体上确定了各种不正常现象和偏差表现在哪些方面，但是我们没有弄清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坚持做到底，而是出

于某种妥协的愿望，希望不致影响到我们党的团结、我们领导的团结——这种团结其实早在当时已被破坏——我们半途而废了。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的原因和我们将要讨论的事情并不是最新的情况。这些事的起因几年以前，几乎是在近十年以前就存在了。

我们的错误在于，在我们国家保安部门存在的二十多年中，我们听凭我们国家保安部门自流，而其主要领导人是兰科维奇同志。你们知道，在战时和战后最初年代，我们的国家保安部门曾经起过重大作用，当然，在这方面兰科维奇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其他同志也有一大部分功劳。但是，正是由于我们对兰科维奇同志以及对国家保安部门的巨大信任，我们在我们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一次也没有讨论过保安部门的问题。有哪一个组织，有一些机关能够如此长期地不受党的监督，不受我们党的领导的监督呢？不用说，这是我们的过错。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时，应该从以下事实作为出发点：我们的保安机关在消灭那些在战时和战后想在我们这里活动的阶级敌人和其他一切敌人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不看到这一点。这是历史事实。在这一机关工作的人，有很大的功劳，兰科维奇^{①②}同志也是这样。但是，当这样一个组

①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马尔科（一九〇九年），青年时代即参加革命工人运动，先加入南斯拉夫共青团，后加入南共。他曾被判服苦役；一九三七年起为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委员，一九三八年五月起为南共临时领导成员，在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一九四〇年十月）上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过组织一九四一年起义的准备工作，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成员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一九四五年四月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战后担任过重要的国家职务和社会政治职务：内务部长（一九四六年—一九五三年），联邦政府即联邦执委会副主席，共和国副总统（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六年），南共盟党中央委

织后来发生了变化，并且由于种种不正之风而形成一种压迫我们整个社会的制度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权利，我们是否能够原谅这种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当然，我们既没有权利也不能够这样做。功劳是功劳，大错误是大错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并作出一定的结论。当我们着手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逐步地看清了这些不正之风达到了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那时我们才明白——我认为对这一切将会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无法贯彻执行我们在各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特别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决议。在通过决议后总是出现推不动、行不通的现象。决议是很好的，老百姓拍手赞成，为之高兴，我们的劳动人民感到兴高采烈，他们说：“终于要前进了”，然而仍然没有前进。

这就是说，必须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整个事情，这是政治问题。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经济改革，是我们社会为改善我们整个生活和加速前进的重大行动。如果我们研究了一些不正之风，那么我们就不会说是个别人的问题，是偶然的问题。我现在不能确定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且个别人也未必就是那些主要负责人；这是一场派别集团的斗争问题，是争夺权力的斗争问题。因为，不然怎么会在一九六二年我们讨论和研究了这些问题之后，这些问题现在又以更激烈、更严重的形式出现呢？我认为，进一步的调查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我们必须弄清楚，因为这危及我国人民的团结，危及共产主义者联盟

员和中央书记等。由于坚持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立场而反对社会主义自治和民族平等的政策以及滥用国家保安部门的职权，在南共联盟中央四中全会（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上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稍后（同年九月）被开除出南共联盟，根据联邦议会的决定被解除国家职务，并退休。——原注

② 兰科维奇因患心脏病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去世。——译者

及其团结；一句话，这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

请你们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指整个国家保安部门。那里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好人。我说的是个别人，他们蛮横无礼，形成了凌驾于人们之上，凌驾于共产主义者联盟之上，凌驾于我国社会之上的权力。这些不正之风蔓延到下面，蔓延到企业、工厂、各种社会组织，到处都有。为什么在企业中我们会收到这么多的申诉？正是因为下面的某些机关认为，它们有权进行监督，作出决定，对舆论作出评价，而这并不是它们的职责。

在这次全会上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即关于健全我们党的问题，以及把内部保安部门和共产主义者联盟分开，而不象迄今那样混为一体以至使内部保安部门凌驾于党之上。现在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必须正视事实，并尽一切努力作出有利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和捍卫我们在世界上的威望的结论。我们是十分强大的，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且能够作出将使我国和我国人民更快地前进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

我不想在开幕词中去谈详细的情况，但是我必须指出，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说什么从上到下互不信任。这不是有点类似以前斯大林时期的情况吗？我认为，相当类似。正当我们整个社会发展以高速前进的时候，国家保安部门不仅踏步不前，而且还倒退了。

国家保安部门畏葸不前，没有跟上我们社会发展的潮流，而是另有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有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的倾向。*

* 摘自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在布里俄尼举行的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的开幕词(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九卷)。

具有人道内容的社会主义

为了人和人的真正利益

问：你们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的化身。在不结盟国家中间，你们是东西方之间的纽带。在对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态度上，南斯拉夫力求提供一个范例，说明具有人的形象的社会主义是可能存在的。辩论的实质是在这一点上吗？

答：我根本不同意这种论断，说什么我们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的化身。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只不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社会朝着共产主义方向的今后发展的看法与其他某些人不同而已。我们希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人和人的真正利益放在注意的中心，从而，使整个社会发展获得尽可能人道的性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想消除无视法纪的现象和过去留下的教条主义方法，实行社会改革，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充满人道的内容——这一切并不是某种狭隘的民族的东西；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和世界上进步力量普遍愿望的反映。当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人道发展的范围内，民族性也应该得到体现，应该全面地确立民族的个性。应该是这样。因为，谁首先不尊重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民族，他也就不可能尊重其他的民族。我们同世界

上所有进步力量所共同坚持的，同时也是民族的。而对民族权利的这种观点也包括国际主义的义务。因此，我们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国际主义者。*

* 摘自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对《巴黎竞赛画报》社社长的谈话(铁托：《向记者发表的谈话集》，一九八〇年版)。

民族问题的解决

这使我们有可能
胜利地反对占领者

战前的南斯拉夫是列强通过凡尔赛和约人为制造的产物。因此，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内，始终充满了各民族之间的纷争。在最近的这次战争中，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希特勒和其他占领者的斗争，我们宣布了民族自决的政策、民族自由的政策，它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我们的政策以及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利益的。这使我们有可能胜利地反对占领者。在战前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以及斯洛文尼亚人与其他民族之间所形成的对立，对于南斯拉夫的国家活力和能力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因此，从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了符合我们各民族利益的立场并宣布了这样的原则。因为，众所周知，在克罗地亚，帕韦利奇相当顺利地把群众动员起来了，而在塞尔维亚，则有切特尼克，在斯洛文尼亚，有白卫军，等等。所以，我们在民族问题上也必须明确地确定自己的政策。我在战争一开始时写过一篇文章——《从人民解放斗争看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文章清楚地说明战后的南斯拉夫在这方面应该是怎样一个国家。这样，我们早在战时

就已经为新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那时并没有宣布要实行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明确地谈到了关于解决民族问题、关于各民族的平等以及关于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都不得拥有霸权。由于这样的立场和原则，我们在人民解放斗争中成功地把南斯拉夫的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当然，在战前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政策的，不过，在战争中应该具体地解释和彻底地执行这种政策。*

* 摘自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在贝尔格莱德向英国《女王》杂志编辑发表的谈话(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五卷)。

反对单一民族政府主义

我们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

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诚和深信为消灭对人的剥削而斗争是民族真正解放的前提，使共产党能够成为南斯拉夫各个民族的引导力量，并且在为争取民族自决和为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定性的岁月里成为这一斗争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是各平等民族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原则上正确地解决了民族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联邦制以及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制度是南斯拉夫各民族自由和完全平等的保障。这保证了南斯拉夫团结的真正前景。

自然，在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以及在南斯拉夫的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中，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最通常产生于经济方面，并且是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解决的。尤其是，如果我们遵循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原则和精神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么这对南斯拉夫的团结不会构成危险，对于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不会形成障碍。

近来，越来越少听到南斯拉夫这个词，而人们无论写文章还是谈论主要是用联邦一词。我们必须大力强调使用南斯拉夫这个词。我们是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

黑山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员，但是，我们大家又都是南斯拉夫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加强各平等民族都属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同体这样一种精神。这并不是指单一民族政府主义意义上的南斯拉夫主义，因为这种南斯拉夫主义否认民族或者企图降低各民族的作用。我们曾经坚决地反对过单一民族政府主义意义上的南斯拉夫主义，而现在应该以及将来还应该反对那种孕育着不管哪个民族的霸权主义的哪怕是最不足道的任何单一民族政府主义倾向。问题是有必要加深关于我们是属于南斯拉夫的认识，加强我们南斯拉夫共同体是我国各民族的事情的认识，唯有这样的南斯拉夫共同体才能保证我国各民族的繁荣昌盛和未来。

为了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全面发展的利益，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客观困难，坚决地消除一切主观上的障碍，开展经常性的和毫不妥协的斗争，以反对民族主义，不论它表现为单一民族政府主义的形式，还是表现为沙文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形式。正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各平等民族的自由共同体，它不能允许与民族主义作任何的妥协。

世界上有些人士把南斯拉夫的多民族组成视为南斯拉夫的弱点和迅速发展的障碍。而我要再次肯定，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多民族组成是我国的优势，因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日常的实践中培育着真正尊重各个民族的感情。所以，象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共同体是世界上为民族关系的平等和为民族关系的民主化进行斗争的重要力量。*

* 摘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卢布尔雅那大学接受荣誉博士称号时的谈话(约·布·铁托：《社会主义自治发展新阶段中的南共联盟》，诺维萨德，一九七六年版，另见铁托：《新阶段中的南共联盟》)。

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

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 是阶级敌人的基础

昨天和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同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执行委员会和克罗地亚的社会政治组织领导人一起开了会。当然，会上谈的是那里当前的迫切问题。正是由于那里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在南共联盟主席团这次会议不仅有必要讨论克罗地亚的形势，而且有必要讨论南斯拉夫全国的形势，因为在所有的共和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昨天的会议上，我要求讨论一下导致萨格勒布大学罢课的原因，以及目前在克罗地亚发生的消极政治动向，这种动向并没有受到足够有力的反击，甚至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中也是如此。

至于罢课的原因，当然这不是始于昨天。这从很早，即几个月以前就开始准备了，但是，看来，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也就是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人们谈论过，甚至在报刊上也曾报导过，说即将举行罢课，而且规模很大，它将是一次总罢课，并定于一月份举行。因此，这种现在使我们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的坏事，人们从报刊上和大街上都知道了。然而，不

清楚的是，为什么罢课提前举行了，为什么罢课正好发生在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革命节日前夕。我们要看一看并弄清楚，是谁在支持这次罢课。

大学罢课事件不只是大学生的问题。那里有一批相当出名的坏人在幕后支持罢课。我要说，我在同克罗地亚的同志们开会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坦率地说，他们的错误是，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制止罢课。幸运的是，克罗地亚的工人阶级觉悟很高，他们不为所动，因为罢课的学生曾经想把工人阶级也拉进去。但是，他们未能得逞。这样，他们就孤立了，没有能够做他们想做的那些事情。显然，这件事也有国外插手的迹象。

但是，当发生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和领导人——无论在克罗地亚还是在其他共和国——不能去寻找一切可能的辩解理由。这是丧失警惕，懒散，对这些分子采取腐朽的姑息主义态度。这样，敌人就非常容易进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因为，我认为，这是反革命活动。

那些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反自治分子在报刊上，尤其是在克罗地亚玛蒂察的报刊上，甚至在《信使报》和其他报纸上——有的报刊上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发表完全违反宪法、必须受到惩处和追究的言论。他们任意发表言论，而人人相安无事。我必须告诉同志们，这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所谓五十人革命委员会——而我称它是反革命委员会——在领导着这一切活动。其中有四、五个人是主犯，但我们知道他们的人还多得很。这是一个既从事合法活动又从事非法活动的组织，而它的老巢是克罗地亚玛蒂察。这些事情已经走得很远了，不能再等待了，我们不能再容忍继续对他们这

样放任不管了。我们不能允许这样一些个人或者反革命集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活动。

我曾经对克罗地亚的同志们说过，有许多不清不楚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不符合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和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某些人的讲话和声明中，有许多话不仅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内，而且在广大群众中都会造成一定的混乱。我只举一个例子，即组织一个民族运动的问题，组织一个什么人都收罗的群众运动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某些讲话中，而且在报刊上也有，尤其已经开始在群众中扩散开来。我昨天向同志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运动？谁将参加这个新运动？在这个新的运动中肯定会有形形色色的流氓无产者、反革命分子、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以及——鬼知道什么人不会有呢？他们要干些什么呢？究竟是谁改造谁呢？显然，我们必须面向我们的现实，面向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纲领所作的规定。我们有社会主义联盟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政治组织，我们必须使它积极活动起来。的确，社会主义联盟中的共产主义者没有积极开展活动。因此，我们就应该面向我们这个组织，而不允许成立另外的某种新的运动。绝不能允许这些东西从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中散布开来，因为这意味着企图把共产主义者联盟撇在一边，而成立某种新的组织，以便成为某种支持，而它会支持什么人什么事呢？

我只是简单地向你们介绍了我们所谈到的内容。我最坚决地拒绝了这些东西，我认为，你们大家都会同意，这种情况绝对不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因为我们早已奠定了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建立了我们的社会政治组织。我们有共产主义者联

盟。我们有社会主义联盟，其中既包括工会，又包括青年组织以及其他所有社会政治组织。如果其中有不良分子，那是这些组织本身的问题。应该力图对他们进行改造，或者，如果他们捣乱，就是说，如果他们在这些组织的掩护下搞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反自治的活动，那么就要把他们驱逐出这些组织。我们必须遵守我们自己在我们组织中所订的规矩。因此，要绝对地谴责关于某种新的运动的各种捏造，我是不同意这种运动的。

昨天的会议共开了二十个小时，中间只休息了一会儿。所有的同志和主要负责人都谈到了第十次会议^① 和第二十二次会议^② 等通过的文件中所确定的立场。他们说，这些文件最后是一致通过的，我认为他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不过，三分之二的多数同志批评核心领导说：是的，的确我们多多少少是一致地通过所有这些文件的，并表示同意这些文件，但是，以后对这些文件作了另一种解释，并没有按照这些文件的规定去做。这就使他们的工作很不协调，达不成一致意见。这使我极其不安。

在这次长时间的讨论中，我未能，也不想阻拦哈拉米亚同志、皮尔克尔同志、萨夫卡同志以及其他同志谈论克罗地亚的经济问题，尽管讨论的纯属党内的事情。我必须说，我完全同意哈拉米亚发言中谈到上述问题的部分，因为他说得完全正确。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这只是皮毛而已。如果我们现在加速解决正在解决的问题，谁也不应该认为，这是我们在萨格勒布发生的事情的

① 铁托总统提到的是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召开的克罗地亚共盟中央第十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作为南斯拉夫具有更广泛的利害关系的现象的单一民族政府主义问题，并认为这是主要的政治危险。——原注

② 指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召开的克罗地亚共盟中央第二十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问题。——原注

压力下进行的。这些问题早在解决之中。

我昨天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前，我常说，实际上我多年来一直说，有必要解决外汇、外贸和银行的制度问题，还谈到关于转口贸易公司等问题。但是，我们既然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也规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就应该照章办事。就是说，我们应该在领导机构中而不是在大街上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快慢，现在就取决于我们了。我赞成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可以就这些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然而，我已经对同志们说过，就是在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在外面还照样这样干，听凭敌对分子以此作为自己的口号，把大学生拉到自己一边去。我认为，大部分青年人甚至不懂得外汇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却把它当作口号。我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同意把国家的各种问题拿到大街上去解决。

我们还讨论了有关党的生活的其他各种问题。在我看来，讨论是高水平的，执委会的多数成员对这次会议讨论感到满意。也作了些自我批评，但也尖锐地批评了执委会本身的工作和内部生活。他们谈到了许多问题，因此，最后我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执委会内的状况不好。这也影响到党的地方上的领导机构。在许多区中已有类似现象，有两种方向的表态。我认为，他们援引的方针是对的，但一旦实际做起来，正象人们所说的，这种方针就拐了弯，转了向。

几个月前，我在萨格勒布曾同执行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一些同志。我当时就曾经十分尖锐地向他们指出所有这些问题，指出所有这些疏忽和错误。我还对他们讲，我认为，应当做些什么，才能防止局势急转直下，才能防止阶级敌人的活动升级。当时没有宣布这件事。但是，在小范围内作了口头的

不完整的传达，于是出现了许多猜测，猜测我到底讲了些什么。我当时所说的话，同志们都接受了，并且着手采取一些措施。但是，这一切都进行得很缓慢，而且也没有把我对他们讲的话贯彻到底。当时我讲到了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克罗地亚玛蒂察、各种敌对分子的活动，以及胡乱写东西的现象。所有这些在当时我都是讲得十分尖锐的。

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他们把我抬出来，援引我的话。就是不说哪些话，而只是说这是铁托的话。

我昨天已经声明，我不支持这样的政策。我今天在这里还是说，我不支持这样的政策。如果在其他共和国也执行类似的政治，我也不支持。我不会，也不能这么做，我要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原则。而公众这次也应当知道，我是不支持这么做的。这一切对我来说并非轻而易举，但是我不得不说。如果有人幻想可以把我抬出来，那么我将亲自予以驳斥。

在昨天的谈话中，所有的人都发了言，都知无不言。我也要求大家把过去也许从来没有讲过的话统统讲出来。我希望在我们所有的领导机构中都开展这种开诚布公的讨论，谈出你们的看法，不用怕得罪人。如果有些东西不是事实，那么就立即讲清楚，展开争论。但一定不要不讲话，要公开地讲出来，如果不这样来说明情况，如果大家都不具体地参加讨论，就不可能作出合适的决定。如果作出的决定不好，那么就是白白浪费时间。因为，出于——我姑且这么说——保持一团和气而不讲话的人，他也许会投票赞成这些决定，但是并不一定同意这些决定。

今天清晨，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我发现领导同志仍然缺乏批评的态度，实际上自我批评很少，尤其是那种共产

党人式的自我批评，而要使事情能够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和赢得信任，作这样的自我批评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不管他是谁，包括我在内，都不可能指望有权得到人们的完全信任。仅仅作某种表示忏悔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因为以后还会犯错误。

最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志们现在准备做些什么事情？我要求我们在这里就此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一致同意，把所有这些事情提交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来讨论，并就必须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作出决定。

此外，我说过，我不同意在嘴上总是讲那个单一民族政府主义，我要求一劳永逸地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单一民族政府主义。如果指的是凡尔赛和约确定的南斯拉夫的那种单一民族政府主义，那我当然是最激烈地反对的。如果指的是教条主义的单一民族政府主义的残余，我当然也同样反对。但是，如果是指我们国家的统一，是指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南斯拉夫，那么我赞成这样的单一民族政府主义，赞成这样的统一的南斯拉夫。那就不是什么单一民族政府主义，而是我们的统一了。

但是，分清两件事：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与单一民族政府主义。这样做是好的。我不相信克罗地亚有好几百名单一民族政府主义者。然而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有广泛的基础，而且他们正在利用这一点。此外，宪法修正案为同单一民族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对他们用不着害怕。他们不可能成为某种势均力敌的力量，因为，除了政治手段以外，我们还可以使用行政手段。但是，你们不要上当，不要放松对确实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的警惕，而这就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是阶级敌人的基础。这是主要的危险。我认为，其他共和国的许多人也

应该从我们所讲的一切中吸取某些教训，因为，在别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我不希望我们在别的什么地方再遇到这种事情，而要立即医治和防止出现这样的事。现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的情况复杂，我们不能不管。我们应该帮助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

我昨天已经说过，主要过错在共产主义者联盟身上。因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内有许多人早就应当在党外。由于自由主义，我们没有这样做。我建议他们把这样的人尽早地清除出党，然后把那些站到搞反革命活动的人一边的组织解散。

现在，共产主义者联盟正在进行改组。但是，我们不能只等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召开。我有一种印象，由于上述缺点，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召开这次会议。我们的准备工作不仅要在纸上进行和就文件达成协议，而且要在实践中，从上而下地作准备。我们必须进行解释，而在必要的地方，还要清洗。我们一定要准备好了，再召开代表会议，并在会上通过关于改组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及有关我们今后政策的其他问题的决议。当共产主义者联盟有了明确的路线时，那么那些在我们当中进行捣乱的，通过其活动使我们在全世界信誉扫地的形形色色的分子进行渗透的可能性就会少一些。今天国外什么话都在说，说南斯拉夫有在世界上丧失威信的危险。我们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

行动迟缓是我们的弱点

我已经说过，一般说来，在萨格勒布发生的事情，是所有共

* 摘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卡拉乔尔杰沃举行的南共联盟主席团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铁托：《新阶段中的南共联盟》)。

产主义者的责任，当然，首先是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的责任。那里思想非常混乱。我不是说别的地方没有，不是，别的地方思想也很混乱。因此，我们大家对这一问题应予十分注意。要多做工作。我们共产主义者，我们大家在这方面都负有很大责任。很清楚，克罗地亚的同志们不轻松。但是，我认为，这里提出的批评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每当发生象克罗地亚同志那里所发生的现象和错误的时候，很少进行过这样诚挚的讨论，开展过这样带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式的批评。这表明，主席团的委员们把这种批评大部分都自己承担了下来。因此，我们这次会议对教育我们的领导人和全体干部将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我们的最高领导，我们各中央委员会的弱点尤其在于我们十分迟缓地、而不是及时地看到敌人的某些活动，因而不能马上作出反应。最多只是互相议论，互相诉苦，比如，说这家报纸或那家报纸又写什么问题啦，如此而已。但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外。我们开的会不少了，但是我们又开过多少次会象这次这样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并对我们应该怎么办作出具体的决议呢？非常少，屈指可数。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弱点，我们的责任就在这里。而这又会影响整个共产主义者联盟。

我还想说——这在讨论中也提到了，我反对一个共和国批评另一个共和国。然而，当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会，为什么一个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者无权批评别的共和国的某些事情和现象呢？因为，这是善意的。但是，一旦通过报刊或用其他方式指着鼻子指责别的共和国，或一个共和国公开批评另一个共和国，这就不好了，就不应该这么做了。

这样，我们就涉及到了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委员会和南共联盟主席团的关系问题。我发现，我想我没弄错，某些人提出要使

共产主义者联盟联邦化，而且任何人，甚至连南共联盟主席团也无权干涉，这使我十分不安。确实有过这样的事，这使我感到不安。

在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如果我们真想对共产主义者联盟、对所有的领导机构进行我们谈过多年的改革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准确地、清楚地规定，南共联盟最高领导机构拥有哪些权限？它对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委员会又有哪些权利？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许多东西必须作出明确规定。在我看来，南共联盟主席团无论如何要有一定的权利，因为它要对整个南斯拉夫的发展负责，而不只是对南斯拉夫的某些部分负责。而各共和国的共盟中央委员会不仅要对自己的共和国的活动负责，而且要对整个南斯拉夫负责。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关系摆正确。因为，如果南共联盟主席团，比如说，连批评某个共和国共盟中央委员会的权利都没有，如果连事先了解一下某个共和国共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或会议的材料的权利都没有，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然，如果南共联盟主席团看到某些事情做得不好，就有权批评。因此，我们要是把这点付诸实践，那就太好了。这不是倒退一步，在我看来，在当前条件下，这是极其需要的。就是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应该了解各地发生的事情。南共联盟主席团的成员应该了解这些会议的主要文件，特别是当问题涉及到有关整个南斯拉夫共同体的重大问题时，尤其如此。如果有需要，南共联盟领导成员还应该参加这些会议。这种做法必须付诸实施，那时冲突就会少一些。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有人希望把联邦的原则也搬到共产主义者联盟中来，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委员会也象解决国家事务那样行事，就是说，要拥有从国家方面给予各共和国的那些权限。

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唯一有权在全南斯拉夫范围内开展思想政治活动的因素。这不意味着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委员会的主权和权利有丝毫的削弱。南共联盟主席团在南斯拉夫的整个工人阶级面前对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决定负责。主席团的决定对各共和国也有效，因为这些决定是在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作出的。将来也要这样做。

南共联盟主席团不是随意选出来的，也不是不考虑各共和国和民族因素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南共联盟主席团内，各个共和国都有代表，因此这些决议对各个共和国都应该有效。显然，有些决议将只对某一共和国有效。南共联盟主席团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并不因此而损害有关共和国共盟中央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克罗地亚的同志们听取了象今天在这里进行的这样一次讨论，我认为，许多事情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这对克罗地亚的同志们确实是一大帮助。而且也不仅是对他们，也是对其他各个共和国的同志们的巨大的帮助。因为你们在这里是所有共和国的代表。我们在这里谈到的一切都必须传达到南共联盟各级组织，它们都应该了解这一切。

我想跟你们谈一谈有关工人阶级的问题。

曾经有过一种一定要把工人阶级完全纳入民族范围的倾向。然而，南斯拉夫只有一个工人阶级，即全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我指的不只是它是混杂在一起的。不同民族的人在塞尔维亚、在斯洛文尼亚、在克罗地亚、或者在其他共和国里是在一起劳动的。之所以只有一个工人阶级，这是有许多理由的，特别是思想上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比如说，在就业问题上，决不允许去计算工人阶级的人数。我一向赞成，在我国经济部门，在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能力应当放在第一位，但是，民族成分当然也要

考虑到，以免因此而发生不良现象。

一句话，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够按共和国来划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但是，它首先是各个共和国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它应该越来越成为这样的因素：它应该成为共和国权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就象今天在这里所讲的那样。我们向工人阶级许下了许多诺言，而兑现的却很少。所以，我们必须更坚决地执行涉及工人阶级的那些宪法修正案。

你们看，我们这里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现象。在克罗地亚这种现象够多的了。我已经批评过他们了，但是，我认为，还应该批评克罗地亚和其他共和国。

我必须坦率地告诉塞尔维亚的同志们，我曾听到这样一种意见：似乎谁也无权干涉他们的事情，也即无权干涉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如何生活的问题。我说：对不起，如果你们认为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为了加速发展的某种需要而必须勒紧裤带的话，我们不能同意这样做。至于我们有的共和国比较发达，有的共和国不太发达，这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说，我们能够在某个共和国强迫工人阶级勒紧裤带。工人阶级有权反对这样做，而我们作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也不会给你们这种权利。诚然，这已经不是现在的事情了，而是很早以前我从你们那里听到的。近来，事情看来有了变化。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各共和国在自己共和国内闭关自守问题上采取了什么措施？各共和国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但是那样做也是不能接受的，不应该建立那种把我们相互隔离开的各共和国的界限。不但如此，我们必须在各共和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当然，在这方面还要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采取更重大的政治行动。我们将以此加强我们每个共和国。因

为，我们只谈友爱和团结，这是不够的。看来，有些人对这一口号已经感到厌烦并且不再关心这种友爱和团结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显然，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首先就要用我们的正确行动来加强共产主义者联盟。你们看，除了行政事务，除了国家职务，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如果我们对于这些工作真正很好地确定了方针并且尽早地做好这些工作，那么谁也不能责怪我们在这方面向谁发号施令。正如查纳达诺维奇同志所说的，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也不应该不好意思采取行政措施。我还听到有更多的同志谈到这一点，而我对于这一点很早以前就谈到过了。

滥用我国民主的现象实在太多了。我赞同我们应有尽可能多的民主。但是，对反对我们这个共同体、反对这个民主共同体的敌对分子，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措施，甚至是行政措施。

在许多被认为是民主的国家里，大批人被关进监狱，他们不赞同那个国家的制度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社会最贫困的阶层所处的地位。我们则不仅应该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对于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民主的行为来说，不能期待用民主的办法来对待这样做的人。因为，对于我来说，这种做法既是民主的，又是革命的。为了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使之不致受到任何可能的侵犯，我们必须使用在当代文明世界中所普遍使用的一切手段，无论谁都无法因此而指责我们。至于我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我们将如何去做，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鲜明而纯真的立场。而不要形成有些人哇哇叫，说他们不喜欢这样做，说这样做是不民主的，而其他人又赞成这样做。我们，共产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是观点一致的。一切愿意我们的南斯拉夫社会

主义共同体真正繁荣强盛，走向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人，都必须这样看问题。而那些不能够接受对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采取这种做法的人，都不是拥护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人，那就请他们退出共产主义者联盟。

现在再谈谈如何达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团结的问题。我们不久即将召开南共联盟第二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我们确实需要讨论关于章程的某些问题，我们要看看，章程是否需要加以修改。当然，这是代表大会的事情，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这方面作些努力，以便加强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使之成为革命的真正有效工具，成为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代表会议上来商定，不过，我们今天已经讨论到这个问题，这也是好的。

我早就说过，我们必须让共产主义者联盟从组织上发挥作用。你们看到，我们试办过有上百名盟员的共盟大型基层组织，它们的工作往往归结为一点：这就是“做报告”，只是个别人在讲，实际上是有限的几个人换来换去地做报告，这就是一切。这样的组织缺乏党的生活。在一些企业和车间里建立人数少一些的组织不等于不能召开大会，来讨论整个企业、一个联合企业的问题。然而，如果基层组织规模小一些，那就会为更好地进行教育以及在那里建立起一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生活创造条件。自然，共产主义的行为准则也必须适用于家庭。那时将会更容易对共产主义者联盟内可能存在的敌对分子进行监督，并且将能更负责地吸收南共联盟盟员。我今天不想展开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要求作深入一些的解释。我只是提一下，我们在代表会议上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听你们的发言，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

在我们之间，在克罗地亚所发生的事件上怎么会如此一致呢？这确实是团结的生动体现。这样的团结——这一点我已谈到过了——应该传到下面去。

我们之所以达到了这样的团结，是因为我们都认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由他自己来解决比如象目前在萨格勒布出现的这样的大问题。就是说，这是需要有全体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的支持，以及我国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正因为如此，今天在这里我们的团结非常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米亚托维奇同志在这里以赞许的口吻提到，萨格勒布的工人阶级没有被牵连到大学里采取的敌对行动中去。这些人想指挥三万五千名萨格勒布的青年人来给我们制造麻烦。还不只如此。这还给我们带来了耻辱，给我们抹黑，尤其在国外。大学生是我们未来的知识分子。我知道，西方的某些人正因此而在那里兴高采烈，期待着这样的知识分子过去。工人阶级的确表现得很好，没有被牵连进去。但是，我曾期望，如果不是所有的集体，至少也有某些集体给这些人以更有力的回答。也就是说，要更加有力地告诉他们：你们无权来为我们操心，我们自己会关心自己的。这是不足之处。

发生罢课的时候，我注视着这一事态的发展，我看到，存在着混乱局面，我无法搞清谁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们也许有必要找工人阶级，请他们来对此作出回答。但是，这会意味着进一步升级。然而，我的出发点是，在那里有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有领导机构，它们会来制止这种情况，并且它们在必要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向工人阶级解释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到那时我们再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因为工人阶级是站

在我们这一边的。

我从各方面得到很多消息，说外国已经插手这一事件，一些参加这一事件的人是从国外来的。所以，这不仅仅是施加影响的问题，而且还是参与和制造混乱的问题。

但是，不仅在共产主义者联盟里，而且在工人阶级中，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有觉悟的公民中间，我们是有足够的力量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使用某些极端的手段。但是，我们也早已公开讲过，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和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

我必须对你们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未来这一点上，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在我访问美国时，在一次有五百多名新闻记者到场的集会上，有人问我：在我身后将会怎样？

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应该由我们现在来找出某个人来。今天，我们大家都应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有一致的看法。在我身后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具有这样的方向，它已经很好地探明了，应该坚持这一方向。

谈到进一步民主化，这一点同样也不会导致任何危险。这是由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特别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团结来保证的，今后将更加如此。

我还想谈一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我们在南共联盟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也将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实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党内历来就有的。当然，不是在每一件琐事上都这样做。重要的是，要保证执行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处于少数的人也应该执行。自然，在我们今后的活动中，在各种会议上，在确定立场时，应该注意使这样的少数派尽

量减少。在确定立场时，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但是，决议一旦被通过，任何人都应该懂得必须执行这些决议。不仅不能在南共联盟之外反对这些决议或者搞什么运动，而且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些决议。大多数人都同意的一些决议，必须受到尊重，因为这对整个共同体，或者对一个共和国，或者对一个地方，是有利的。我认为，在我们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对这一问题也必须加以讨论，因为民主集中制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在发生了重大事件，发生了同阶级敌人的冲突的情况下，在一个时期内保持民主集中制，其重要性更是如此。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应该显示出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力量，而我相信我们能够取得成功。

现在我要谈谈，在我看来，克罗地亚的同志们应该做些什么。今天和昨天我们都讨论了这个问题。诚然，并不是说就只有这些问题了，在其他共和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还有其他问题。我相信，克罗地亚的同志们能够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但是，我可以这样说，首先应该克服的是内部的困难，我们中间即执行委员会中的困难，从而达到团结。不应该从某些人的威信或其他东西出发，而要用共产党人的态度相互对待。要纠正过去那些不好的东西，要在我们现在应该采取的行动中团结起来。你们将不会那么轻松，将有许多工作要做。

你们的首要任务，可以这样说，是要自己战胜自己，要团结一致，不论是在执行委员会中，还是在中央委员会中，都要如此。这要求你们团结，而谁若是反对这一点，那么最好不要呆在里面。

其次，在这里很难确定，你们将如何行动，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对那些叫得最厉害的人，对你们危害最大的人，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早就应该被孤立起来，使他们完全失去活动能力。

然而，他们却还一直在自由自在，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正如我已说过的，克罗地亚玛蒂察已经成了与你们平起平坐的政党，它现在力量很强。在它的卵翼下产生了反社会主义的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反对你们，反对南斯拉夫的领导，而且还反对南斯拉夫整个国家，正如你们所说的，他们不赞成这样的国家，而是赞成另一种帕韦利奇式的国家。

在谈到各共和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时候，我觉得，这并不是一切都弄清楚了的，必须使这个问题更加明确。宪法修正案确实为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有力的基础。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主权，并有权捍卫它，但是，南斯拉夫对外只有一个国家主权，这就是南斯拉夫的主权。这个主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不是某种抽象的南斯拉夫的主权，而是由我们各个共和国的主权组成的。在这个统一的主权里，各个共和国有自己的一部分。各个共和国在自己的宪法中应该根据联邦宪法修正案来确定自己的主权。

最后，我想谈谈，即各个共和国的共盟中央委员会应该给予克罗地亚的同志们以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不要去指责那里发生的事情，而要给予真正的、原则性的支持。要让克罗地亚的敌对分子知道，克罗地亚的领导得到各个共和国和整个南斯拉夫的有力支持。那种已经开始出现的以不信任的态度看待整个克罗地亚的现象，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在其他共和国也有，应该迅速消除。但是，你们也应该表明，我们大家都跟你们站在一起。这样，这种情况就会很快得到克服。这些就是我在今天会议结束时想说的话。*

* 摘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在卡拉乔尔杰沃举行的南共联盟主席团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闭幕词(铁托：《新阶段中的南共联盟》)。

我们必须要有统一性、 统一的共产主义者联盟

我很高兴地在这里听到一些教授、大学的代表的讲话，他们强调在大学里不能有不赞成共产主义者联盟政策，不赞成我国整个社会制度的人。这是很清楚的。我们早就说过：是我们，是创造财富的工人付给他们工资。其实，他们所得的工资除了来自工人们创造的资金以外还能来自其他什么途径呢？这样一些人却干着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勾当。而他们在为我们培养青年。不过，我不想再重复说了。我现在正等待他们采取措施，付诸行动，以便把那些毒害我们青年的家伙从这些岗位上撵走。我早就说过这件事。可他们总是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甚至还对我有点冷嘲热讽。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闭口不讲这件事。我说过，我们总有一天会得出这样的看法的——看，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看法。现在我们将采取措施。而对那些不愿采取措施，又负有责任的政治领导人，我们要责问他们为什么不采取措施？

其次，你们都知道，有许多人给我写信，在你们当中可能也有其人。这些信件说：铁托同志，为什么你总是谈这些事？为什么不说出这些人是谁？而你是知道这些人的。然而，我一直在犹豫，因为我期待这些人会觉悟过来。但是，看来，有些人皮厚得很，不可能回心转意。我们举克罗地亚发生的事件为例。现在有些先知先觉者说道，这件事为什么不早早处理？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在六个月以前采取这个行动的话，在克罗地亚只会有少数公民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事情已

经完全明朗时，当每一个人都开始觉得刺眼时，我说：唉，够了，现在时机成熟了。

我一直在提供机会：一而再地警告过。但是，我对他们说的那些话他们听不进去。在座的克罗地亚共盟中央的同志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延误。我们及时地采取了行动，并且将永远这样做。因此，让我们大家都这样做，而不应进行打击，因为在党员中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将这些事情永远连根铲除。

这就是在我国发生的、令人惊讶的一件重大事件。但是，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也上了当。我应该赞扬在这里作报告的克罗地亚的同志们，他们抓工作抓得很好。不过，我只想劝告他们一件事，这就是不要去乱抓一气。否则，我们就会打不中要害。对那些违反党的路线的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出党。对那些根据调查结果证明犯了刑事罪的人，应当受到法办。对那些经过调查证明他们同国外某些人进行勾结的人，应当对他们起诉，控告他们犯有叛国罪，并交由法庭审判。但是，这必须要确有实据。现在正在做这项工作。我们必须要掌握证据。而其余属于党内的问题，则进行党纪处分。但是，不应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某人已被开除出党，而他却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说东道西，暗地里搞阴谋活动。如果他还是干这种事，那么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应该采取另外的办法对付他，就要对他进行打击了。即便是在党外也是一样，决不能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待这种人，我们要采取严厉态度。

现在，在克罗地亚还有一些人在说，他们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这就是说，他们事先对这一切都知道，并且提出过警告。你们记得很清楚，我早就告诫过，而且告诫过多次。而他们对于确实执行正确路线的现领导不是进行帮助，而是在党外，在组织以外进

行活动，给现领导的工作制造困难。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个别地方，在老战士协会中以及在党组织以外也有这种人，他们散布完全不同的观点并且制造对立情绪。绝不能每个人想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克罗地亚共盟中央要对此负责任，如果它有些事没有做，它也要向我们交代，因为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的组成部分。因为，共产主义者和各共和国的中央领导机构的表现问题并不只是他们个人和它们的内部事情。这同样也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事情。而过去的克罗地亚领导人就是不愿这样看问题。这种情况在塞尔维亚和其他某些共和国过去有并且现在还有。也许这种情况现在不会再有了，但是过去曾经有过。我们不能有几个党的中心，它们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或者干反对整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利益的事。我们必须具有统一性、统一的共产主义者联盟。

在谈到决议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所设想的和一致商定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必须一致地和有纪律地去贯彻执行。现在，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这个武器并没有过时。在这方面，思想的统一是重要的，而当我们一致商定和都表示同意时，那么当然必须要有行动的统一。因此，这一口号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效的，诚然，情况已有所不同。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必须明确的事情。在这里决定了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公布于众，以便全体党员都了解。我在这里奉劝大家都不要经常地同基层、同工人、同工厂保持牢固的联系，并且不是通过文件，而是亲自和直接地下去。我们应当到工人中间去，不要吝惜力量去向他们解释情况。而我们这里这样做的领导人恰恰不

多。我是很高兴多下去走走的，可是没有时间，我实在太忙了。不过，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此而抽出一些时间。这样做不但对某个企业有好处，而且对他所到的整个地区都有好处。我们的确有许多事情要去作解释。

至于说由于克罗地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局势混乱而造成的心理状态，外界当然必须理智地看到，我国不是用玻璃腿站立着的。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共同体。我在开幕词中谈到过这一点。让人们都看到，我们有结实的双腿和强有力的躯体。这就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它们确实都是十分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但是，我们必须付诸行动，开展斗争。*

* 摘自一九七二年一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共联盟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闭幕词(铁托：《新阶段中的南共联盟》)。

反对伪自由主义

同志们，这对我是侮辱

四天来，我认真地听取了在这次会议上进行的所有讨论。我先向你们讲清，我无意起某种仲裁者的作用，而是想就你们所谈到的问题，就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内的状况谈谈我的意见，谈谈我对这种状况是怎么看的。关于其中某些问题，我在会议的开幕词中已经谈过了。我的那个开幕词，尽管有些人没有表明对它的态度，但大多数人在发言中都表示同意。

然而，我必须先向你们说明，在口头上接受批评，而同时又表白你们那里主要方面一切都好，只是在这里或那里存在一点某些弱点和缺点，这种态度对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几乎毫无意义。

请允许我一开始就提请你们注意有关我们的国家和南共联盟的状况，特别是有关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状况的几个事实。在其他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讨论你们的问题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你们在南共联盟中在人数上是最强大的组织以及塞尔维亚是我们最大的共和国，而且首先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对我国革命今后的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们

社会和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最近，我曾多次批评了我国社会的普遍状况。南共联盟主席团就此问题也召开过多次会议，会上我们还通过了决议，提出要解决积累的问题以及排除困难和许多消极现象。最后，我在对《信使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明确地谈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我还和执行局一起就此向南共联盟全体盟员发出了一封信。

我深信，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以及塞尔维亚和全国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同我们一样看待我们的问题、消极现象、任务以及我们现行的方针。

我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解决问题和消除消极现象。他们要求贯彻已被通过的结论，对他们来说，决议、宣言以及没有行动的空谈已经够了。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人民一直强烈地提醒我们注意反常现象、缺乏效率和消极态度。我们的革命任务就是改变这种局面。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信任，只有这样，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才会遵循我们的路线和政策。

我认为，我们在这里不必说明，共产主义者和全体劳动人民是如何接受我们这一方针的，以及我们又怎样从全国、从党的组织收到有关支持我们的方针，也就是支持执行局的信件和我的讲话及其他同志讲话的材料的。

这四天来，在这次会上曾无数次提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是否与南共联盟的路线一致？我认为，在诸如为自治而斗争、反对民族主义和官僚主义、实现有关工人宪法修正案以及其他一些主要问题上，还谈不上存在不同的路线。然而，接受由我们的纲领所确定的，并在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中得到发

展的南共联盟的路线，也是为在各条战线上贯彻这条路线而坚决斗争的前提。我再说一遍，是在各条战线上。这就意味着，要展开同样激烈的平行的斗争，在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保守势力和兰科维奇分子的同时，也要反对无政府自由主义、阶级敌人、民族主义和小市民思想。忽视对无政府自由主义和阶级敌人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助长那些主张奉行铁腕政策，以及追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势力。这种现象在你们这里有，也不只是在你们这里才有。

除了这些危险性以外，还有其他的危险性，它们对我们全国来说也是紧要的。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些具体的表现，这些表现可能意味着，而有时已经意味着，塞尔维亚共盟同我们其他共和国的组织相对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最近的一些宪法修正案已通过了，并在政治上得到了确认，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那些有关共和国的独立性、主权以及它们在联邦中地位的条款，而有关工人的条款更多地只是作了些宣言式的宣传。忽视了有关工人的条款的实施情况。这首先应当反映在银行、转口企业、外贸及批发部门的面貌的彻底改观上，在这些部门实际上几乎无所作为。有的说，在修正案具体化之前，这些组织就无法作出任何重要的变动，或者认为，比如说，银行从形式上修改一下章程就万事大吉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来自所有共和国的最深刻的批评都是针对在这些机构中的资本积累和保留资本关系的，而这些问题在全国都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的确，这不仅是塞尔维亚的问题，但是，这种状况助长了民族主义，并在相互关系中制造不信任，这也是真实情况。谈论同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斗争，是比着手去完成艰巨的、又是唯一可行的克服旧有关系的发源地要来得容易，因为这种关

系助长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

我还想谈一谈有关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标准不一的问题。我有一个印象，你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比较自由主义的，无论是在思想政治上的针锋相对方面，还是在执行刑事处分和判决政策以及宣传报导方面都是如此。这就引起塞尔维亚同南斯拉夫党的领导机构之间相互关系中的互不信任。你们这么做的借口是，反对的是思想，而不是人，而且还要用其他的“民主”方法来进行斗争，似乎人是没有思想的，这正好为来自右的和左的反对派的观点开了方便之门。在报刊、出版物和出版发行事业中的民族主义现象及其他现象，容忍极左分子的现象，说什么：这些人是主张实行理想的自治，只不过是不切实际，抱有幻想而已。这些情况清楚地证明，在这一斗争中思想斗争和革命性都削弱了。这样，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概念的本身又掺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杂质，这与离开低估我国整个革命斗争的阶级内容这一点也就不远了。

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某些共和国曾多次提出警告和抗议，贝尔格莱德的报纸报道其他共和国的政治事件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故我，这是不利于增进相互谅解的。我指的是，根据对其他共和国的某些现象的报道，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与塞尔维亚的情况不同，在这些共和国中是保守势力在起作用，而在塞尔维亚则是进步势力在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我不得不指出，外国的报刊大量地利用贝尔格莱德报刊的材料并接过这样的评价来攻击南斯拉夫。

几乎每一次讨论差不多都是以宣誓忠于我为开始的。对于我来说，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对南共联盟政策的忠诚要通过执行它来证明。同时还听到一种说法和论证，说塞尔维亚的共产主义者如何热爱我。同志们，这对我是侮辱。我的革命工作和生命的大

部分是在这里、在塞尔维亚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度过的。我们的起义是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开始的。至少对我来说，无论是同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的关系，还是同其他任何共产主义者的关系，从来都没有成为问题。我是南共联盟盟员、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和领导人。使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不得不重新谈到这一点。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担心是不是有人企图通过政客式阴谋手段在散布谣言，说我与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发生了冲突。而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并且从来都不曾存在过。然而，事实是，有时有人不仅对我的人品和为人进行不能容许的非议，而且也不考虑我是南共联盟主席，我从一九三七年起，长期以来一直担负主要领导职务。我作为南共联盟主席要对整个南共联盟的状况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状况负责。然而，当这一切还没有成为可能会引起广泛政治后果的投机活动的对象以前，我并没有给予重视。

尤其使我感到难过的是，有人开始议论，说我似乎是一个希望复旧的人，似乎我在改变南共联盟的政策，修改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而且我是在没有经过民主讨论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这种议论的目的在于，要把我们目前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消除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而采取的共同行动宣布为改变政策和复旧。我不想重复，实际上在这种企图的背后，在客观上，而有时也是在主观上可能有哪些东西。

让我们仅看一看他们对我在讲话和信件中所提到的看法提出异议的几个问题。

我想首先提到的是南共联盟内的民主集中制和人们希望我们把南共联盟建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党，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这种愿望。关于这一点，第九次代表大会和以往的历届代表大会都有过非常明确的决议。然而，我们把这一切忘记了，或者，我

们没有把这些决议贯彻执行，这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以肯定地说，造成我国现状的一个基本原因正是忽略了我们的这种义务。

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和章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组织在我国自治社会中的作用。我常说，共产主义者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负有责任。任何时候我们从不认为，在国内和社会上成立民主机构就意味着使共产主义者联盟同下述的义务和责任分离开或者保持距离：即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在思想政治上、行动上和组织上发挥作用；共产主义者在所有这些机构中作为个人应贯彻执行南共联盟的政策。这一立场被恶意地歪曲了，并被错误地解释为打算重新使党国家化，说什么各自应该仅仅对自己范围内的工作负责，同时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用被归结为对盟员进行最一般化的思想教育。但是，这种思想教育到底有多少，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实际上，这意味着企图使共盟变成一个辩论俱乐部。然而，甚至连这样一个政治引路人的作用也没有真正做到。我仅仅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几乎在我们的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学大纲上消失了，这不是偶然的。

至于思想水平和对批评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至于报刊上有关国际和国内事件的报导以及我国史料学方面的状况等，又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这些任务也没有完成。有人企图散布说，加强共产主义者联盟作用的行动是复旧，是恢复中央集权主义、保守主义，等等。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政治组织，它的目的是在自治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不断地为加强自治的、国家的和其他社会的机构的作用而斗争。这同时也意味着，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领导机构，还是整个组织——对这条道路负有责任。让那些不同意共产主义者

联盟这一立场的人公开讲出来，而不要企图把这一行动说成是复旧。实质上，反对这一立场是为外来思想、敌对影响在南共联盟内部进行活动打下基础并提供适宜的土壤，为所有那些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削弱是恢复党的国家主义、官僚主义观点和铁腕政策，把党变成小市民类型的党的好机会的人进行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提供方便和创造条件。

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小集团现象和派别活动，这不是偶然的。从我们党的历史，从整个工人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种现象总是出现在工人阶级的党失去自己的明确的思想方针、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的时候，在它失去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的时候。

我过去和现在都要求工人阶级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直接的影响，一贯认为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中拥有共同的利益，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不存在各自的工人阶级。在口头上，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一点，然而，在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人们把我们主张各民族、即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拥有自主决定权和主权这一坚定的方针同全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团结和统一混淆起来了。忘记了在我国的制度中，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社会关系发展的目前阶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种凝聚力量和整体力量，它在统一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是唯一有能力解决我国所有社会和经济矛盾的力量。

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被忽视了，这就是干部政策。这首先指的是通过根本改善干部的社会构成使南共联盟和塞尔维亚共盟面目一新。我们大家都强调指出并夸耀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成长得很快，而同时我们又说，在党内，工人的数目相对地减少了，这里我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是指从体力劳动者直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因为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工人阶级。

如果再看一看从区到联邦一级我们党的机构、国家和社会领导机构的构成，情况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这种构成的后果是机关式的工作，各干各的，忙于制定一般性的政策，而忽视在基层、基层组织进行生动的频繁接触和工作，忽视在发现这些基层组织中出现问题的同时加强它们的作用以及自下而上地制订我们总的政策。领导机构的工作忙忙碌碌，而基层组织又相对地无事可干。这不是一个从党员的生活和活动中汲取力量的革命党应有的特征。只要倾听一下我们的基层组织围绕信件^①而举行的会议，只要看一看信件是如何为人们所接受，你们就会看到那些讨论同这里的讨论是多么不同。

我一直强调指出，必须关怀青年人和把责任交给年轻一代，但是，实际情况——例如在我们的大学和学校里——同所说的相反。大学里的南共联盟组织缺乏真正的影响，大学和学校中的基层组织不大活跃。这种情况总的来说削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未来的知识分子的联系。因为，我们既没有在为培养明天将有能力担负起在我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共产主义者而开展活动，也没有对敌对倾向展开真正的斗争和给予抵制。这些敌对倾向，部分地是从国外传播来的，部分地是由国内敌对势力煽动起来的，而在大学里泛滥成灾。我们有些人不是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来评价这种不良状况和确定造成这种状况的真正原因，而是甚至说反知识分子方针的根源在于共产主义者联盟上层，企图以此来使我们同知识分子及其对我国斗争的贡献分割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确实需要知识分子的贡献。

① 指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八日南共联盟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南共联盟主席和南共联盟主席团执行局致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信》，一个月以后（十月十九日），在报刊上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原注

党的大门，我们斗争的大门，对他们是敞开的。他们的贡献无法用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当然，这不是说应该把知识分子看作是清一色的整体，也即不应该看不到知识分子中间客观上存在着的，我们应指明并与之斗争的那些流派，这么做正是为了确认创造性的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知识分子真正的贡献。

同样地，我必须指出，在谈到青年一代时，首先强调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和重视，在青年一代当中绝大部分是青年工人，无论在人数方面还是在社会作用方面，他们现在和将来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要关怀他们的教育问题。在这部分青年队伍中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是我们首要的和长期的任务。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不要在各个部分的青年中间制造人为的障碍，而要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策方面使青年联系并结合在一起。

我必须强调指出，我从来没有低估，也不想低估塞尔维亚共产党主义者联盟及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机关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关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果硬说没有取得成就，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不客观的。然而，今天我们是在谈我们的问题和缺点，目的是希望克服它们。

因此，我希望在这里讲清，在讨论党的路线、党的路线的成果和缺点的时候，参加讨论的人对一些说法或对状况的评价是持赞同抑或反对的态度，其人数的多少对确定革命的方针和评定应该往哪里走和应该做什么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在一个领导机构这么做的时候，那就更是如此。只有整个联盟中共产主义者的总的决策，工人阶级的决策才能明确指明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以及应该为什么而斗争。

现在让我具体地谈谈讨论情况以及我得到的印象。当涉及到

人们对我在开幕词中简短地谈到的缺点提出批评时，我一开始就能看到，讨论完全偏离到另一个方向，而不是我所希望的方向。我原想，讨论应该回答我在这次会议前和开幕词中提出的批评。

也就是说，事实表明，我听了不少同志的发言，首先是领导同志的发言，我认为，他们都缺乏自我批评这样的美德。关于这一点，我想稍微多讲几句。

众所周知，批评和自我批评始终是我们党内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出现某种危机并有必要确立团结的时候。我指的首先是思想和行动的团结，这在今天尤其重要。批评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看清各种缺点、各种失误、漏洞等，而自我批评则有助于我们更容易尽早克服这一切。自我批评具有教育作用，有助于树立共产主义者的形象、革命者的形象。害怕自我批评和批评，这是小市民的特点，而共产主义者必须克服自己身上的这种毛病。

为什么要开这次会？塞尔维亚共盟的状况是好还是不好？我同多数人一样，包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认为情况并不好。当然，这促使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来纠正这种状况。

比如，我不同意讨论中出现的这样一种说法，说什么本来就没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因为这会导致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分裂。但同时又说，同意我在开幕词中提出的批评。你们看，在这里的讨论中出现不少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他们接受我的批评，可是又说，这不关他们的事，这就是说，与那些本应公开检讨一下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过错，也即受到批评的同志无关。他们在次会议上应该表现得象一个共产主义者才对。

我认为，这次会议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使这次会议产生我们大家都预期的效果和意义。我和你们大家都期望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团结，也即期望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

联盟团结。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双方的讲话。许多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存在着两方，也就是说，在批评面前维护自己的一方，和提出批评的另一方。共产主义者之间从来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就是说，不能作这样的划分，而应该进行分析，找出对过失、错误以及对今后行动的共同看法。

在讨论中所提出的许多论点以及我在开幕词中谈到的那些情况不仅关系到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而且关系到整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我认为，大部分论点符合执行局的信件以及我和我的同事们的讲话。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承认，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出现的不健康状况完全是很多同志在这里所谈到的各种缺点和错误所造成的结果。

我个人掌握着相当多的报刊材料以及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同志的讲话和声明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些事情和提法是自相矛盾的，其中有些是同我，而且不仅是同我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进行直接的和间接的论战的。经过考虑，我决定不提这些事情，因为我首先期望的是，肯定会有些同志在进行自我批评时会自己讲出来，也就是自我批评地回顾自己的工作时会讲到。可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使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在这里的讨论中不少人提到，除了总路线之外，是否还存在另一条路线？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是否同南共联盟的路线背道而驰？当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只存在一条路线。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一条路线，而在于这条路线是否付诸实施。而这条路线没有在足够的程度上得到贯彻，现在你们这里存在的情况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说，这条路线更多

地是停留在口头上，而缺乏足够的效果。这条路线为什么没有付诸实施，这有多种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存在另一条路线，而是对贯彻总路线存在着错误的解释，存在着玩弄手腕、摇摆不定、机会主义等现象。当然，这就会产生分歧。你们看，对这些事我们本来应该也必须在这里谈到，可是，我们没有谈到。

这些天来，我看了有关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各种会议的材料。我必须说，我没有发现这些材料同南共联盟的决议有分歧，在这些会议上作出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是不够的。文件、决议和谈话不足以消除某些思想差异。而当决议不能付诸实施时，那就存在差异。我知道，那些帮派势力、小市民势力和其他抵制势力即施加压力的势力常常阻挠这样做。问题正在于我们对这些家伙要毫不让步，要坚决反对。因此，对一切竭力破坏南共联盟发挥思想领导作用的人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到了，这也是南共联盟全体盟员的任务。

我完全同意，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在自己工作中是做出了成绩的。正如我刚才已经谈过的，我认为，在这里没有人会对有成绩这一点提出异议。但是，在这里，问题不在于罗列成绩，而是要研究造成我们今天的这种形势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认清尽早地消除妨碍共产主义者联盟团结以及有效地贯彻执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决议和塞尔维亚共盟决议的一切障碍的必要性。

无可争议的是，在工作和言行中存在着错误和弱点，而且有不少，这我是知道的。因为，几个月以前，可以说整整一年以前，我就曾经事先多次表示过不满，对各种事情提出过警告，可是，我没有看到事情得到了纠正。现在我在这里又得到了一种印象，即问题不是如何去克服在贯彻总路线中妨碍思想和行动团结的所有那些东西，而是去争谁胜谁负。我们的会议还未结束，在贝尔

格莱德就开始传开，说取得了胜利的是受到批评的人，而不是提出批评的人，并且还要同这些人算账。这种行为是不符合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品行的，不管这样做的人是谁，都是一样。他们不是严肃地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与南共联盟中一切妨碍实施总路线的消极现象进行斗争，而是不负责任地乱发议论，并且还以清算相威胁。你们看，如果我们容忍以带有派别活动烙印的方式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进行清算，那就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我认为，南共联盟和塞尔维亚共盟的多数盟员也会这样认为，而且他们期待于我们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应该与之清算的是那些站在壁垒另一边的人，是那些阶级敌人。而如果说要清理党的队伍，即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队伍，那就必须在执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所通过的决议过程中来进行。

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象贝尔格莱德目前存在的状况是不能允许的。在贝尔格莱德可以感到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小市民习气以及来自各种谣言公司的强大影响。这种情况不仅只涉及贝尔格莱德，而且还波及到南斯拉夫所有的大城市。贝尔格莱德有十万多共盟盟员，有四十余万工人。他们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精神应该在这个城市占上风。然而，这种精神却不够，因为过多的是机关式的工作，而缺乏同工人阶级，特别是同塞尔维亚共盟盟员的牢固联系。

我想再次提一下我和执行局发出的信件所具有的意义。切不可再重犯过去那种读完信件就万事大吉的旧做法了。这封信以及在最近向党员提出的一切任务，都必须在进行工作和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贯彻执行。在基层、在党组织中，大家会知道他们犯了哪些错误，对哪些事情应该提出批评。每个人也都会找到自己的一

些问题。应该这样去贯彻信件，而且这不是几天的事，而是一直要到第十次代表大会。

我认为，我们现在负有很大的责任，不仅要在口头上接受信件，而且要迅速地、而是逐步地去完成信件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我应该说，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和各民族是十分关心的，他们认为，我们有可能摆脱一切困难，条件是领导要同人民和群众的愿望步调一致。

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正期待着塞尔维亚共盟有关领导机构立即开展具体的斗争，来实现信件以及我和我的同志们最近所谈到的那些事情。关于这一点，在各级领导机构，塞尔维亚的领导同志也谈到了。只不过这要付诸实施。因此，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些愿望和做法一致起来，并把它们付诸实施。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信任我们。

有一些同志在这里谈到塞尔维亚共盟有发生分裂的危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要说存在分歧，这是对的，但分歧主要存在于领导同志之间，而不是盟员之间。如果沿着派别斗争的道路走下去，那就可能造成分裂。而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

让那些从事地下政治活动的黑暗势力、民族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兰科维奇分子、吉拉斯分子以及其他又重新抬头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反自治势力不要以为，如果我们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公开讨论自己的困难和缺点，那就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和阴谋就可以得逞了。相反，我们这样做，是为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中央对这些势力进行更加强有力的斗争打好基础。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一向懂得正确评价同我们的一切敌人进行斗争的意义，我坚信，今后他们也是会这样做的。

因此，我呼吁你们大家要克服分歧，为了南斯拉夫劳动人民

的利益，在南共联盟主席团执行局信件这一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各民族人民将会为此而感谢你们。

我认为，你们都会同意，在这样一次非领导机构的会议上不可能涉及领导机构中的某些人事变动，因为只有你们的领导机构才有权这样做。这是你们的事情，是你们中央委员会的事情。我之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人说，在这里准备撤掉一些同志的职务。我们有章程，在这种问题上，我们也就必须按照章程办事。我认为，今后的主要标准必须是在执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所面临的任务中的表现。

我认为，这次会议揭露了许多我们必须尽早加以克服的缺点。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这也是你们的职责。*

* 摘自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六日在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政治领导干部座谈结束时的讲话(铁托：《新阶段中的南共联盟》)。

停滞和不时出现的危机状态

我们将只提到某些情况

我国社会也免不了遇到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问题，遇到暂时的停滞和不时出现的危机状态。我们经常地、公开地和批评性地谈到这些现象。作一番最简短的回顾，我将只提到某些情况。

众所周知，从第五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是一个严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们为争取走本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而进行了斗争。我们取得了我们所进行的战斗的胜利。这对于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析了所走过的道路，并且特别强调了争取基于社会主义自治的新的社会关系的战斗任务。在反对教条的中央集权主义和无政府自由主义的倾向的同时，需要明确地确定共产主义者联盟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代表大会也做到了。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党和国家政权的分离以及党作为思想政治的引导力量直接参与建立自治的社会关系。但是，在执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曾发生过严重的偏差。

其表现之一是，认为共产主义者现在可以摆脱对社会主义命运的责任，因为社会主义将会自发地发展和加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勿需再进行反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和势力。这种倾向把共产主义者联盟引进某种辩论俱乐部，使它丧失它的革命性和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

后来，在各个时期，以不同的形式也出现过问题。例如，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我们为改革而进行的斗争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加强自治的物质基础。我们把社会再生产从国家的权限范围内划分出来，但是，却出现了强烈的倾向，要把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集中到各种财政实力中心的手中，摆脱自治因素的影响，要使之处于技术官僚主义垄断势力的控制之下。此外，这也影响到在为实现第八次代表大会和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进行的斗争中发生动摇现象。

在这一时期，我们也遇到了对自治的强烈反抗，这些反抗是出自教条的中央集权主义的立场。后来，也就是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又不得不再次大力开展反对无政府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势力的活动和主张的斗争。那时的困难在于，这些倾向和主张在某些地方已经深深地侵入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队伍，它们使共产主义者联盟无法对其展开斗争，从而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内，共产主义者联盟也成功地克服了这种状况。就在这时，我们通过宪法修正案指明了权力下放的今后进程，指明了各共和国对各自的发展，以及对联邦的顺利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同时，这些都是建立在进一步发展自治以及加强工人阶级的作用和联合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一九七四年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奠定了为争取自治作为我

国社会政治关系的整个制度的胜利而进一步斗争的基础。一九七四年的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联合劳动法，为我们今天正在实现的这些任务确定了法律和制度的基础。

重要的一点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始终在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为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扩大人的自由，为充实民族平等的内容以及加强我国民族独立和加强我国在世界上的不结盟地位而不断地展开活动。*

* 摘自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伊加洛在访问美国前夕向《纽约时报》记者发表的谈话(铁托：《七八年言论集》)。

关于自己和自己的工作，
关于战友和同时代人



关于个人的作用

人民是动力

我同意，在历史上有的时候个人的作用可能是十分重大的，因为作相反的断言是愚蠢的，几乎是否定现实。但是，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特定时期的觉悟程度相关联的。如果个人反映了本国人民的愿望，如果他实现本国人民的愿望，那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就重要，但是个人不是动力。实际上，人民是动力，人民推动个人，推动一切，而个人是组织者，在涉及理论问题时，个人只不过是阐明一些事情罢了。*

* 摘自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与南斯拉夫青年团代表的谈话（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青春报》）。

关于“铁托”这个名字

这是我地下活动时的名字

问：我们还想请元帅向我们谈一谈战时用的名字。“铁托”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

答：这个名字不是什么“战时用的名字”。这是我地下活动时的名字。我受到不同当局的迫害。我曾蹲过班房。我不得不使用一些非法的名字。除了“铁托”这个名字外，我还用其他一些名字，例如：“鲁迪”、“格奥尔基”等等。“铁托”这个名字我不常用，免得别人知道是谁。在克罗地亚文中，“铁托”只是一个名字，没有别的什么意义。*

* 摘自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答美国记者问(铁托：《言论集》，第二卷)。

南斯拉夫人民的特点

自豪感和开诚布公

问：南斯拉夫人民有哪些特点？

答：南斯拉夫人民最突出的特点是自豪感、开诚布公和好客。

问：好客我们自己已经领受了。对于开诚布公，你指的是什么？

答：我指的是，我们的人民总是开诚布公地谈他们的想法，而不管别人是否喜欢他们的想法。我要说，这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特点。

问：你如何做到不远离人民？

答：我喜欢到人民中间去。要是脱离人民，我就无法生活。对我来说，这简直活不下去。我认为，要解决国家内部发展和本国人民的问题的人，必须接近人民。如若不然，如果他们疏远人民，人民也会疏远他们。

问：你以什么方式保持这种联系？

答：我经常访问各地，我参加集会，在家里接待代表团。我还收到许多报告，一句话，这是一种全面的活动，并不轻松，但

是必须做。

问：您能否谈一谈领导是什么，领导这个概念实质上是什么意思？

答：领导的目的是指导一个社会发展中最积极的东西。因此，领导是指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动。

根据我们的新宪法，领导人的作用有所不同。他们仍由人民选举，但是领导工作的期限越来越短，以便让越来越多的人参加领导。总得有人居于领导地位，不是为了发号施令，而是为了统一行动。因此，领导获得了协调和统一行动的性质。*

* 摘自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在贝尔格莱德与英国《女王》杂志编辑的谈话(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五卷)。

关于宗教

我是无神论者

问：当您会见卡特总统时，您会发觉，他怀有真诚和深刻的宗教感情。在您的一生中，宗教信仰是否起过重要作用？

答：战时也好，战后也好，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要消灭宗教信仰。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知道，许多人信教，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认为，他们应当跟我们一起为我国的自由和进步而斗争。例如，在战时，在我的最高统帅部里就有一位神职人员。他就是弗拉达·泽切维奇。对于信教的人，我们设法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这种感情，这也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我们的斗争的信任。

问：但是您本人并不信教……？

答：我本人是无神论者。但是，谁愿意上教堂祈祷，就让他去祈祷，我不反对他这样做。*

* 摘自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伊加洛接见《纽约时报》记者时的谈话(铁托：《七八年言论集》)。

关于自己，作为一个领导人

必须始终了解人民的愿望

在谈到我自己的时候，我总觉得有点拘束。在我看来，似乎别的同志，别的一些事，都被忘记了。我知道，个人可以有很大的作为，但是如果他不称职而又身居这样的岗位，他又同样可能坏事。例如，德国人由于希特勒而受了罪，因为他不是一个聪明人。他们先是把他奉为上帝。一个人必须始终了解本国人民的愿望，考虑本国人民的愿望。如果看不到这种愿望，只看到自己，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那就完了。只有在了解并理解来自人民、群众和生活的一切，才能取得成就。正是由于我们来自人民，我们懂得评价什么是正确的，我们了解我国人民的愿望，我们相信他们，我们才能为实现这些愿望而展开斗争。*

问：您如何工作？您的工作方式如何？

答：最最主要的是，我任何时候都不能看到桌上有未办完的事。我的习惯是，一有事，我就立即着手工作直到完成，不论是夜间还是白天。因为对我来说不存在工作时间，对于我来说，工

* 摘自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访问鲁马时的讲话（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作时间是从早晨到半夜。当然，我也有一点时间休息，有一点时间散步。但是，总的来说，我不让文件堆在我桌上，我得办完才算了事。这是我的工作方式。

最艰难的时刻

真 理 将 取 胜

我不是信徒，我认为我没有义务向国外的任何人交代，即便是在布加勒斯特，当情报局要求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这样认为。至于在国内的工作，在自己人民当中的工作，我们有义务只对人民负责。有权要求从我这里听到全部真实情况的，莫过于你们。你们同我一起在乌日策战斗过，我们一起越过利姆河，穿越波斯尼亚东部和克拉伊纳，在格尔梅奇山下，在奈雷特瓦河第一次遭到切特尼克的腹背攻击，经历了伊格曼的惨重损失，目睹了从巴尼亞和科尔敦来的一队队饥饿的孩子和妇女，目睹斑疹伤寒流行，在苏捷斯卡我们的数千名战士染上了瘟疫……我清楚：你们同我一起开拓革命的征途，同我一起护送过斑疹伤寒患者的队伍，用希望鼓舞在被烧毁和洗劫的村庄里幸存下来的人，正是你们一定会最理解，而且更加相信，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

我同我们的许多同志曾被宣布为盖世太保的特务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只是因为我们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和国际主义的原则，不同意有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不同意仰仗他人的鼻息，不同意把我们的财富弄走，要我们的人必须俯首听命于外国

的军事和经济顾问，为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效劳。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难道有什么比不公正地宣布他为叛徒，今天全世界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否定我们的党并宣布我们的国家为瘟疫地区这件事更难受的呢？我相信，我们会有力量战胜这一切，但是问题是：是否能预见到真理将取胜的时刻的到来。

现在我比迄今任何时候都更难受。在地下活动被人追捕的时期，在狱中和向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候，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不仅仅是我们对我们斗争的正义性和必不可避免性有不可动摇的信心，而且还有世界进步运动给予我们国际声援和支持的强烈感情，哪怕这种声援和支持是道义上的也罢。而今天，由于真理被迫处于无可奈何的地位，我们成了孤立无援的人。我们能否选择盲目屈从的道路？在多年的艰苦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将面临可能更加困难的时期，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我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向斯大林和情报局屈服的道路。假若我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仍然会受到赞扬，说我了不起，而且对我个人也有好处；我也不会成为“叛徒”，“出卖灵魂的人”。但是，这样的道路我不能选择。假若我这样做了，将给我的整个一生蒙上耻辱，而我是一个房无一间工人和无产阶级战士，一个尝过什么是被剥削，依附他人的滋味，经历过革命者之路，经历过牺牲在战场上和断头台上的人的指挥员之路的人。那样做的话，我真的会感到我是一个出卖了灵魂的人……*

* 摘自南斯拉夫人民军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在 舒马迪亚的托波拉演习结束时的讲话(见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军报》)。

整个一生都非常艰难

问：总统同志，请允许我以南斯拉夫人民青年团机关报《青春报》编辑部的名义请求您对我们的读者谈谈：在您的一生中什么时候您感到最高兴？什么时候您感到最困难？

答：我说不上有这样一个时候，因为这样的时候很多，既有美好的时刻，也有困难的时刻。我只列举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某些时刻。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在俄国革命时期的那一段时间，我目睹了革命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情景。当时的情景的确使我十分兴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第二个这样的时刻是，当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贝尔格莱德，然后我们在斯雷姆战线上继续追击敌人的时候。自然，还有其他许多美好的时刻。

然而，艰难的时刻比美好的时刻要多。这样的时刻甚至有时是非常艰难的。我不想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的艰难生活，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医院躺了十三个月，不能动弹。病好后，由于我是俘虏，不得不服劳役。这种日子不好熬呀。我想谈谈生活中那些艰难的日子，而不谈曾经遇到过的许多一时的困难。

例如，在一九三七年，当我看到我们党面临解散的局面，也就是说，共产国际想解散我们党的时候，我很难过。当我看到由于派别斗争，我们党的确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时，我感到难过。这些都曾是困难的时刻。我还要提一提我在莫斯科经历过的事情，当时我曾想方设法保住我们党，并消除派别斗争，为此必须克服我

碰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困难。这几次显然是最困难的了。

当然，在战争期间也有过困难的时刻。而且也不少。我最感困难的是，在敌人发动攻势，进行激烈的战斗期间，我们还得抢救伤员。一九四一年在兹拉蒂博尔的那些日子，对于我来说是困难的时刻。当时我们不得不把三百名伤员留下来，后来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害了。当时我们无法把所有的伤员都撤走。因为我们办不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工具。同样，在敌人第四次攻势中，我也感到不好受，我眼看着人们由于精疲力竭而死在行军路上。在敌人第五次攻势中，尤其是当我眼看我们无法抢救所有的伤员的时候，我也感到不好受。我想，没有必要再列举这样的时刻了，因为这种时刻有的是。要不然，要是我思索起来，我就还会回想起许多艰难的时刻。总的来说，我的一生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未能救出所有的伤员

我们的斗争是这样一种性质的斗争：发生过许多难以忘怀的事件。因此很难挑出一件事情，说这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因此我将谈谈不仅使我，而且使所有参加过这场斗争的人都很难忘怀的几件处境艰难的遭遇。斗争的初期，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我们就已进行了几场十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阵地离贝尔格莱德只有十五公里。当时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伤亡很大，而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却欺骗世界，把这场战斗说成是切特尼克进行的。我不明白人们根据什么竟然相信——一开始就相信——这一斗争是切特尼克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领导下进行的。因为

* 摘自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同《青春报》社长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十一卷)。

大家知道，我们已就此发表过公开声明，是我们公开号召人民起义的，关于这一点也发表过文件。切特尼克只字未讲应当进行斗争，而是说应当等待，一直等到战争临近结束。但是，虽然如此，世人还是相信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说的话。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很不好受。我们的战士很气愤，可是我们没有传播手段，无法把这一切向全世界说清楚。这是一件令人很痛心的事。

接着在敌人的第四次攻势中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在一个谷地打了一个多月的仗，为的是救出四千名伤员。当时的处境也是十分艰难的，我们所有的人对这件事都感受很深，记得很清楚。不过，我们不仅救出了伤员，而且终于教训了把我们的力量围在这一谷地的切特尼克。当时他们有一万八千人。

在敌人的第五次攻势中，我们的处境尤为困难。德国人发动的这次攻势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参加第五次攻势的有各种各样的卖国贼、意大利人以及其他帮凶。我们被围困了很长时间，我们必须突围，同时还要把伤员救出去。但是遗憾的是，一部分伤员又遭难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损失了大约八千名战士。这对于一支解放军来说是一件大事，它无法象正规军那样容易得到补充。*

问：对于您来说是在战时作出同希特勒进行艰巨的斗争的决定难呢，还是后来作出与斯大林的态度有关的决定难呢？

答：您想想看，是哪个决定难呢？作出同希特勒作斗争的决定并不难，当时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决定。作出与斯大林的态度

* 摘自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向波兰电视台记者发表的谈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战斗报》）。

有关的决定要难得多，因为，您知道，作为共产党人，作为受共产国际纪律约束的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我作出这一决定是十分痛苦的。但是，由于我看清楚了问题在哪里，看清楚了斯大林的意图——这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关系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问题，于是我作出了这一决定，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个转折点，这个决定使我们投身于斗争，为的是不听命于斯大林。^{*}

* 摘自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克拉尼布尔多与卢布尔雅那《劳动报》记者博格丹·波加奇尼克的谈话(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战斗报》)。

勇 敢

有各种各样的勇敢

问：您个人对勇敢下的定义是什么？

答：有各种各样的勇敢。有些人表现出来的勇敢是他们不怕危险。有些人表现出来的勇敢是他们不吝惜生命，无缘无故，毫无目的地把生命献出来。有一种勇敢，其出发点是，一个人必须做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一切事情。而这意味着面对现实，同现实发生冲突，同他所面临的事情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在战时有过，在别的某个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勇敢不是体力上的，或者心理上的那种勇敢，而是首先意识到必须做某种事，意识到一个人，尤其是处在这样一种地位上的时候，必须全力以赴，而不管他个人会发生什么事。

问：在您的一生中哪些决定需要拿出最大的勇气？

答：一九四八年同斯大林决裂的决定。

问：同斯大林决裂需要体力上的勇敢，还是需要思想上的勇敢？

答：可以这么说，当时这样做是需要思想上的勇敢。因为我和我的同事们当时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那么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失去它应有的性质。

问：一九四八年之后，您依旧是马克思主义者。您还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实行共处的忠实支持者。难道马克思没有说过某种社会制度本身孕育着战争，犹如乌云孕育着雨吗？

答：这话不错。马克思说这番话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讲的，他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孕育着矛盾，必将导致战争。帝国主义是产生战争的根源，因为帝国主义要奴役和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奉行干涉其他国家人民的内政的政策。帝国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产生战争的潜在可能。*

问：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类似二十年前南斯拉夫所经历过的那场危机。为什么苏联当时没有下决心入侵南斯拉夫？

答：苏联没有下决心这么做，虽然当时南斯拉夫也完全受到西方的孤立。但是斯大林毕竟及时地看到了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步骤会造成的后果。斯大林是个聪明人。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对待人民的愿望采取了极

* 摘自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六日向荷兰电视台记者发表的谈话（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九日《战斗报》）。

为粗暴的态度。

捷克斯洛伐克所处的地位不同于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所处的地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件时，捷克斯洛伐克得到几乎全世界的同情。它还得到西方各国共产党的支持。而我们在当时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支持。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世界都攻击我们。我们被革出教门。在边界上对我们进行威胁，以武力相威胁。但是，我们决心抵抗，决心进行斗争，我们全都作好了准备：维护独立，维护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自由道路。而斯大林已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抵抗，那么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击败的……

问：戴高乐将军感到遗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没有抵抗。

答：他们往捷克斯洛伐克投入了如此大量的兵力，因此对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来说，抵抗意味着徒劳地流血。因为您已看到西方国家对这件事是如何作出反应的。例如，美国的态度非常温和。他们不准备有所作为。这也证明，以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说什么西方那边的人站在边界上准备随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在我们这里不可能出现象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那种情况。我们不可能强迫人民对……熟视无睹，即便我们想这么做也办不到。*

* 摘自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对《巴黎竞赛画报》社长的谈话(铁托：《谈话集》，一九八〇年版)。

关于战友与同时代的人

贾科维奇走过光荣的道路

一九二九年四月，南斯拉夫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最优秀的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书记久罗·贾科维奇同志。秘密警察设了埋伏，把他同南斯拉夫援助革命者国际组织书记赫契莫维奇一起逮捕了。在他们被捕几天之后，居住在南斯拉夫奥地利边界地区的农民发现了两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他们就是久罗·贾科维奇和赫契莫维奇。

久罗·贾科维奇一八八六年生于克罗地亚的布罗德—瓦罗什市的市郊，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里。读完了三年小学，一九〇一年父亲送他去(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学锁匠手艺。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于一九〇六年举行总罢工期间，他十分积极地参加了罢工。当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奋起争取自己的权利时，久罗·贾科维奇欢欣鼓舞地参加了这一斗争，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此后他作为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参加了五金工人和卷烟厂工人的各次罢工。因此他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群众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并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一九〇八年，久罗·贾科维奇就成了杰出的工会工作者，一九〇九年，他积极地参加了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制订纲领时，他对机会主义分子采取了严正的态度，坚决主张同奥地利的专制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主张用革命方法推翻资本主义。在社会民主党于一九〇九年建立之后，久罗·贾科维奇始终站在它的左翼。他出席了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工人代表也总是把他选入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总委员会]。一九一五年战争开始时，他在萨拉热窝市郊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讲话反对战争，因此奥地利当局逮捕了他，把他当作塞尔维亚的间谍判处死刑。就在执行判决前，他获大赦，被驱逐到匈牙利，在匈牙利的科莫朗，接着在阿拉德服劳役。

他的流亡生活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奥地利被打垮之后才结束。他一回到波斯尼亚，立即开始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内工作。一九一九年他被捕，但是这次是塞尔维亚当局逮捕了他，指控他为所谓的奥匈间谍，但是经过长时间调查之后，当局只好释放他。

从一九一八年起，他为把各地的社会党联合起来而斗争，赞成新联合起来的党取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并赞成南斯拉夫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四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各党联合代表大会上，久罗·贾科维奇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八十名代表的领队。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全力以赴，以使大会采纳他的建议[关于党的名称的建议]，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七十名代表的支持，但是由于当时机会主义分子仍很强大，由于有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同意：党取名为“南斯拉夫社会工党(共产党人)”。他当时对自己的同志们说：“这次机会主义分子欺骗了我们，但是下次我们要战胜他们。”

他的强烈的愿望于一九二〇年在武科瓦尔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以大多数取胜，给党取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一九二〇年萨拉热窝的工人阶级选贾科维奇为议员，派他参加议会。他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动摇分子进行了斗争。老板容不下他，把他解雇了，于是他从一九一八年起基本上找不到工作。他的妻子和孩子经常挨饿，但是他明白，更大的家庭——工人阶级需要他，他没有垂头丧气，而是为了这个大家庭——工人阶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一九二〇年党被取缔之后，他转入地下工作。一九二三年他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党的四月全会，在这次全会上他目睹了党内的两派斗争。因此这次全会结束时他十分不满。同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他对这两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两派当时已在进行明显的派别斗争。他既批评了左派，也批评了右派，因此两派对他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排挤他。一九二六年久罗·贾科维奇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进行的激烈的派别斗争使他立即决定拒绝同派别分子一道工作，并返回了农村。一九二六年克罗地亚工会委员会提名他为杜加雷萨地方纺织工人组织的书记，一九二七年萨格勒布五金工人选举他为克罗地亚地区五金工人书记。

一九二七年秋天，党派久罗·贾科维奇去苏联学习。一九二八年夏天，在共产国际发表《公开信》之后，他回国并做领导工作。在一九二八年秋天举行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南共中央书记。由于萨格勒布的党组织已开始同两派进行坚决斗争，因此当贾科维奇来到我们萨格勒布，并对我们讲了如下的话时，我们感到很自豪。他说：“同志们，你们做了我最近几年时常反复考虑的事情：如何使我们党摆脱那个祸害。而现在我相信，

我们将帮助党的所有正直党员结束党内的派别斗争和消除派别分子。他为这项工作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是他一开始进行这项工作，阶级敌人就从我们当中把他夺走了。

这位南斯拉夫被奴役的工人阶级的受人尊敬的代表走过了光荣的道路。在南斯拉夫工人运动中很少有这样的领导人：从青年时代的初期起，就致力于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解放而斗争。由于他在工人运动中的出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壮大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前奥匈帝国最落后的被占领和受民族压迫的地区。他参加了这个省的社会党的建党工作，并通过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断的斗争教育整个一代无产阶级战士，这些战士后来同他一起建立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久罗·贾科维奇毫不留情地批评社会党内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倾向，因此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他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

他后来对共产党内的各种左右倾派别分子的批评也是毫不留情的，因此社会党人的反动领导人在他死后也未能原谅他。他认为这些人是工人运动中的害群之马，对共产党的发展有很大的危险，所以他同这一祸害进行了斗争。一九二七年南共内的派别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有正直的党员都坚决反对派别分子，他们差点使党和工会发生分裂，这时贾科维奇领导了党的这个忠诚的健康核心。他的不小的功绩在于：把南共中最危险的派别分子和害群之马从党的领导机构中清除了出去。

久罗·贾科维奇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可能获得必要的理论知识，这一点极大地妨碍了他同机会主义分子和各种派别分子进行斗争，但是他具有异常强烈的无产者的本能，这使他能够辨明方向。但是他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知识的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究他能得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单行本或小册子。他常在讨论

时十分恰如其份地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他致力于掌握这些伟大导师和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学说。

久罗·贾科维奇不仅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所熟悉，而且在南斯拉夫其他各地区也很出名，在当时的领导同志当中，他是享有南斯拉夫全国工人阶级的无限信任的唯一的人。南共所有正直和忠诚的党员，不管是哪一个地区的，都同样热爱他，信任他，因此当他成为南共书记时，全党都为此欢欣鼓舞。正因为如此，阶级敌人才怕他，所以当军人法西斯实行独裁统治时，阶级敌人一有机会就把他干掉了。

贾科维奇之死使南斯拉夫工人阶级遭受沉重的打击，但是久罗·贾科维奇虽死，对于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所有敌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威胁。他是所有南共党员的典范——受人尊敬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按照他的榜样，党的忠诚干部不断经受锻炼，新干部不断受到教育。*

* 摘自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与《巴黎竞赛画报》社长的谈话(铁托：《谈话集》，一九八〇年版)。

关于洛拉·里巴尔牺牲的消息

我深感震惊

问：既然您已谈到亚伊策的影响，我们想请您向我们谈谈由于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您已经知道洛拉·里巴尔牺牲的消息，这一令人悲伤的消息对代表们以及对会议整个气氛有什么影响？

答： 我得到了这一消息。开会前三天我就得到了消息。现在我向您讲讲洛拉·里巴尔的事。他为了组织机构的事当时奉命去意大利，到盟友那里去。本来他应当是我们驻那里的代表，担任使团团长的职务，后来只好由韦莱比特接替他担任。

我们有一架飞机，两名克罗地亚飞行员就是驾驶这架飞机投向我们的。这是一架崭新的飞机，停在利弗诺波列。在确定好代表团后，(与代表团同行的除了我们的同志外，还有几个英国人，他们都到利弗诺去了，我命令洛拉：飞机起飞的时间必须绝对保密，未得到我的命令，他们必须呆在利弗诺，哪儿也别去。我不清楚是谁向他们提的建议，但是他们未听我的命令，却从利弗诺

飞到格拉莫奇波列去了，在那里，他们被人发现这架飞机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当飞机飞到格拉莫奇波列时，特务机关已知道飞机将从那里飞往某个地方，于是把情况通报了敌人。他们作好了袭击的准备，当我们的人登上飞机，立即遭到了一架德国飞机的攻击，被炸弹击中。洛拉，还有一些同志以及一个英国人牺牲了，后来，我们没有破获干下这一勾当的间谍网。

我得到这个消息，深感震惊。我非常喜欢洛拉，可以这么说，洛拉是在我一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即便我在国外，在巴黎时，他也常来找我。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极有才干、很有前途的青年。他的死对于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没有勇气对老里巴尔说洛拉出了事，因为我怕给他打击太大。开会之前我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但是总有一天得告诉他。我们想来想去：到底由谁告诉他，最后同志们决定还是得由我告诉他。于是我把洛拉牺牲的消息告诉他。洛拉走时，交给我一封信，并对我说，当我认为必要时，就把这封信交给“老头子”，这封信是封好了的，洛拉牺牲后，我决定拆开看看。洛拉写这封信的口气仿佛是诀别，象是预感到会出什么事。信是写给他父亲的，他向父亲致以亲切的问候，然后说：“亲爱的爸爸，要是我在某地遇到不测，请别过分悲伤（里巴尔已失去了第二个儿子尤里察），而要想想你还能给同志们什么帮助。”这封信使我深感悲痛，既然这封信使我都这么悲痛，于是我决定在那种情况下不把这封信交给里巴尔，后来也没有交给他。*

* 摘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萨拉热窝答《解放报》和萨拉热窝电台编辑们的问(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在莫沙·皮雅杰灵前的讲话

你坚持到底始终不渝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你出访前我们分手的时候竟是我同你作最后一次谈话。二十五年多来我们已习惯于以另一种方式见面，共同分享为建立比较公正的新社会、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取胜而每日进行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和欢乐。这次诀别使我格外悲痛，因为噩耗来得这样突然，出乎意料。

虽然你的革命生涯，你的思想为我国的每一个劳动者所熟知，甚至在国外也为世人所了解，但是我仍感到有必要，而且有责任谈谈你，谈谈你的革命活动，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要对你的一生和工作作出评价，而是因为我要以我个人的名义、以我们党和我们各族人民的名义，向你，我亲爱的同志和战友表示感谢，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我要向青年一代指出，哪怕是极其简明扼要地指出我们有过一个什么样的人，最近却失去了他。

我们第一次在莱波格拉瓦监狱见面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不可磨灭。我们两人都感到很高兴，我们终于相识了。我记得你身上裹着狱中的一条粗麻毯，由于寒冷两手冻得发紫，坐在那里翻译《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日复一日、月复

一月，年复一年，你不知疲倦地从事这项工作，而我和其他所有的同志都钦佩你那坚忍不拔的精神，你那顽强的毅力，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

很难谈到你而不涉及我们党和我国工人阶级在旧南斯拉夫君主法西斯统治下的斗争，不涉及我们的革命、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维护我国的独立和社会主义自由发展的斗争，我国为各人民间建立起真正的平等进行的斗争。

你的一生和革命工作忠实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旧南斯拉夫反对奴役和剥削进行的艰巨斗争，因为你事实上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后来，你又成了建设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积极的先锋之一。你很早就深入钻研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从一开始起，你就领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为了实现这一使命，你贡献出了你的一生。

亲爱的莫绍*同志，你四十年的革命活动历经艰险，这种艰险的经历曾使许多人跪倒在阶级敌人面前。但是，你却充满了毫不动摇的信念，确信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定将获胜，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你离开你坚定地走上的道路。

你在君主法西斯政权的监牢里度过了十四个年头。这也并未使你情绪沮丧。你在服刑期间，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展开了广泛的政治思想工作，来巩固我们的党，你把监牢变成了教育我们年轻干部的学校，我就曾从你手中接过你所翻译的《资本论》的译稿。我还记得，甚至在这样的处境下，你还找出时间来从事绘画。

你利用十四年服刑的机会，使自己和许多同志准备好投入行将到来的同阶级敌人和外国征服者的生死攸关的较量。在人民革

* “莫绍”是皮雅杰的名字“莫沙”的昵称。——译者

命的日子里，你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群众组织者和无畏的战士的异彩。在解放战争中，你发挥了组织者的巨大作用。我还想特别指出，你在为第一批劳动人民政权机构确定原则和实际形式方面所作的工作和贡献。

国家获得解放以后，你在各个领域内都展开了不倦的活动，特别是在立法，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法律关系方面。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我们中间，象你这样的有多方面才赋的共产党人是不多的，因为你的活动表明，你既是杰出的革命家，又是明达的政论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家、翻译家、富有天才的画家。今天，已经难于找到一个人来替换这样一位赋有才华的人了。只有你所教育的成批的年轻同志才能替换你。

亲爱的莫绍同志，不仅我们——你的最亲近的同志们，不仅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盟员们，而且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和各民族，怀着深深的忧伤与你诀别。你是我们党最受人爱戴的战士之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你作为革命家、人道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盟忠诚和始终严守纪律的盟员、劳动人民火热的代言人、不倦的工作者，作为一个勇于行动和充满创造性精神的人的光辉形象将留存下来。

这样的形象将永远保存在我国各族人民的记忆中，成为后代的榜样：为了祖国的自由和进步，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工作和斗争。*

* 摘自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莫沙·皮雅杰的葬礼上的讲话(《铁托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议会中，一九四二——一九七七年》，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版)。

得悉爱德华·卡德尔去世的消息

四十年来一起工作和斗争

我们亲爱的同志爱德华·卡德尔一贝夫茨去世的噩耗使我深为震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成员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卡德尔同志的去世，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我们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于我国各民族，对于南斯拉夫的全体劳动人民和公民，都是一个巨大和无法弥补的损失。

半个世纪来，卡德尔一直是我国革命运动的一名士兵，一位不知道退让和喘息的毫不动摇的战士。

作为一名进步知识分子，他投身于为工人阶级服务，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始终站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权利斗争的前列。

在艰难而光荣的革命道路上，四十多年的工作和斗争把我个人与贝夫茨同志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们亲密合作的四十年，我们的合作直到最后一天，始终贯穿着谅解和相互间的深刻信任，是建立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思想和行动充分一致的基础上的。早在战前为党的纯洁和巩固而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我就得到爱德华·卡德尔的强有力的支持，后来，在准备人民解放斗争时也是这样。他以革命家的特殊才干，参与制订我们运动

的战略，特别是参与建立各民主力量和爱国力量的广泛阵线。战时，他以勇敢、思想的深刻和积极投身于创建新的人民政权而引人注目。

爱德华·卡德尔在整个战后时期，以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的坚定性和顽强性，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 的杰出理解，在国家的建设和社会主义自治发展，在巩固国家的独立方面，始终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我特别记得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几次谈话。我记得，他满怀激情参与实行自治的准备工作，在通过南共联盟纲领时，他以深刻的洞察力阐明了国内和国际事态发展的进程，这一纲领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丝毫没有失去其意义和现实性。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自治共同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历次宪法改革，在制订新宪法，在发展和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直接民主制和工人阶级政权方面，卡德尔同志的作用和贡献格外突出。

在外交活动中，在加强我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确立和执行不结盟政策，在为在各国工人党、共产党和其他进步政党和运动之间以及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建立民主和平等的关系的斗争中，爱德华·卡德尔是我最亲密的合作者。

总而言之，亲爱的贝夫茨同志对我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我国革命的连贯性，对我国革命的人道主义 和民主的内容，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爱德华·卡德尔是毫不妥协的战士、平易近人和谦逊的同志、不倦的工作者的象征。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他是英雄，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然是英雄。*

* 摘自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在大马士革就爱德华·卡德尔逝世发表的谈话。

关于历史性人物

我信任懂得团结人的人

问：我向有幸接触到的世界上的一些杰出的领导人都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您看来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第二个问题是：谁对您本人，不论是在童年或者后来影响最大？

答：我很难回答这两个问题，因为绝对不可能提出一个人来，说他是最伟大的人。因为相对于所在的环境和条件而言，人人都是伟大的，如果他把握住了本国人民的愿望并朝着这一方向来安排工作的话。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他就是一位伟人，人民承认他。这样的人有不少。在某些方面，他们的伟大程度高一些，在某些方面，则又低一些，但是在这里我不想来划分等级，我无法作出评价，他们中间哪些人更伟大，哪些人又不那么伟大。任何人都不能光凭自己就成为伟人，他的伟大取决于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与他合作共事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伟大的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跟他一起工作的一批人。我不相信超人，而只相信懂得团结人的人。

问：我所指的不是不同哲学的代表人物，而是指个人有吸引

力的那些人物，例如邱吉尔、尼赫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或许他们中的某些人是从反面意义上来说是突出的，而另一些人又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说是突出的。

答：我不大喜欢谈我们的当代人。我承认在英国，特别是在战时，邱吉尔曾是一位伟人，作为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他显示了自己的伟大。我高度赞赏艾森豪威尔总统，既把他看作是军人，又把他看作是致力于维护和平的人。在某个时期，我也曾赞赏斯大林，我今天也仍然承认他的某些功绩。今天，我赞赏赫鲁晓夫，因为他在国内发展方面有不少大胆的设想，在对外政策上有灵活性。我非常赞赏尼赫鲁，他把四分五裂的各个民族结成了一个印度民族。印度人民跟着他走。我赞赏他是伟大的和平拥护者，是奉行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政治家。同样，我也赞赏纳赛尔，他也把握住了人民的愿望，致力于阿拉伯国家的壮大和相互接近，埃及和叙利亚目前的联合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在我看来谁是过去最伟大的人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过去和现在我都钦佩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进行了顽强的工作，懂得历史地来分析许多世纪以来的整个社会发展，特别是分析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预见到今后社会发展的前景。对我来说，列宁是最伟大的榜样，就是在今天，我也高度赞赏列宁，对于我来说，列宁是一位伟人，他懂得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问：在您看来，斯大林的品德如何？

* 摘自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贝尔格莱德向《纽约时报》评论员发表的谈话(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一卷)。

答：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客观的。我认为，斯大林是一位很能干的国务活动家。诚然，他是很狡猾的。我跟他曾多次见面，有时，我们甚至还相互开玩笑，有时看来他是一位有人情味的人，他爱人民。但是，由于我早在战前，在我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所做的一切、他的作为以及当时有多少人遭了殃，我发现，在他看来，人是无足轻重的，他使一切都屈从于自己的野心。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没有勇气来相信人。他只相信执行他的命令的人，例如雅戈达，雅戈达后来也遭了殃，又如贝利亚。贝利亚确实是一个坏蛋。这些人形形色色，都是坏家伙。^{*}

* 摘自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伊加洛向《纽约时报》记者发表的谈话(铁托：《七八年言论集》)。

关于陶里亚蒂

少有的思想家之一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陶里亚蒂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位特殊人物。我最初注意到他是由于他在共产国际当时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写的文章。

总而言之，他是少有的思想家之一，在共产国际里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存在。季米特洛夫、埃尔科利[陶里亚蒂]和皮克是近一、二十年来在共产国际里工作过的三位最令人感兴趣和最重要的人物。这三个人，我都很熟悉，我也很赞赏他们。我是他们的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陶里亚蒂是在莫斯科，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众所周知，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之一是讨论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来抵抗法西斯主义。这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实行对外开放。

我设法在代表大会之后同陶里亚蒂本人有所接触。代表大会闭幕时举行的招待会提供了这一机会。

回想起同他的这一次第一次会见，我只能重申，他确实是一位罕见的思想家。他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是非同常人，是探讨性

的。甚至他对我也是这样看的。他讲话时 带有一定程度的克制，并稍带讽刺意味。

事实上，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特务，他们什么人都跟踪，他的克制是由此而来的。

不过，从他的文章中和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一切都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存在的某些不可取的现象采取 某种保留态度，不同于 某些人，后者 认为万事顺遂。*

* 摘自陶里亚蒂去世六周年时同 米洛伊科·德鲁 洛维奇的谈话(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战斗报》)。

关于共同的工作

我们大家在一起工作

巴卡里奇同志在这里谈到我，我感谢他对我^的赞扬。但是，这不是光关系到我，我并不把他的话看成是对我一个人的赞扬，而是看成是对所有与我、与我们大家合作共事的人的赞扬。

我想说一件事。我是共和国总统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但是，如果在我的周围没有这样一些给我以教益——当然，我也给了他们以教益——的人，我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共同建设，共同前进，尽管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意见都是一致的。

因此，我很难接受对我的赞扬。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全归功于一个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在一起集体地创建了新南斯拉夫。领导这场斗争的是我们党。因此，我们大家的功劳是相同的。我已经说过，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同志，没有这样一个集体，我是不可能有多大作为的。^{*}

*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贝尔格莱德与最亲密的合作者共度生日时的讲话(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关于自己的著作

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

对我的这些著作的价值作出评价，不是我的责任。历史和科学将对此作出自己的评价。

这些著作是对我们在革命斗争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和活动的可能性的历史见证。这些著作描绘了我们自身的成长、我们的作为以及我们干得如何，我们的认识和评价有时是片面的，有错误的。

然而，我认为，我无权对作为见证的这些著作作任何改动，以使有些事情在今天看上去是另外一种样子。不，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作这一类美化。我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是怎样发展壮大的？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的？关于这一切，就让历史和后代来作出判断吧！

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对历史文件我不能作任何改动。我仅仅根据编辑部的意见，在我的文章的某些地方加注作了一些解释，以说明我们的某些评价是在什么样环境下作出的，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有一些人一度是真正的革命者，后来脱离了运动。对于这些人，我决不认为文件能不提到他们，或者对文件应作什么改动。例

如，我与安德烈·赫布兰一度曾密切合作。在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中我和他是坚决反对左右两派的少数派。但是，赫布兰后来由于长期被监禁而开始退让了，尤其是被乌斯塔沙关押后，他屈服了。正是由于他的堕落，在斯大林攻击我们的时候，苏联的某些机构就试图利用他来反对我们党。

米洛万·吉拉斯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他一度是塞尔维亚党的领导的杰出代表，后来进入了我一九三八年初在国内建立的南共临时领导。但是，由于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感到灰心丧气，很可能也是由于性格上的弱点，他后来投靠了外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他现在在自己的祖国享受着一名前领导人的全部权利，但却经常恶意捣乱。

在我的这些著作中，有一些著作，例如一些告人民书、决议、报告等等，有时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我的一些同事参与了起草。但是，往往是我提出基本原则，起草草案或者准备好了多少是完整的文件，编辑部认为，应当把这些也都收集进这一版。对此，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说明这是集体的工作。*

* 一九七七年五月写于贝尔格莱德(铁托：《选集》，第一卷)。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革命活动大事记



一八九二年

五月七日 约瑟普·布罗兹生于克罗地亚扎戈尔耶的库姆罗韦茨，是一个贫农家庭里的第七个孩子。他父亲叫弗朗茨·布罗兹，母亲叫玛丽娅·米齐卡。在铁托和其他的一些文件里，出生日期记载不同，曾提到他生于五月五日、六日、十二日和二十五日。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铁托的一些战友开始把五月二十五日当作铁托的生日来庆贺。解放以后，这一日子就被作为铁托的生日，自一九五七年起，作为青年节来庆贺。

一九〇〇年

九月一日 上小学一年级。由于学习克罗地亚文学语言有困难(布罗兹在祖父马丁家住时只讲斯洛文尼亚语)，他曾留级。

一九〇七年

秋天 前往锡萨克，先是学当旅店招待，后来学习锁匠手艺，开始对工人运动有兴趣。

一九一〇年

秋天 从三年制徒工学校毕业，在萨格勒布一私人工场就业。参加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和五金工人工会。参加工人反对尼古拉·托马舍维奇亲匈牙利政策的首批行动。失业并返回库姆罗韦茨。

一九一一年

二月至三月 为了找工作曾前往的里雅斯特，后来返回萨格

勒布，三月底，受雇于一家私人机械工场。

五月一日 参加萨格勒布两千工人的五一节游行。

五月二日至五日 参加萨格勒布机器厂工人的四天罢工。

一九一二年

五月初 与一批斯洛文尼亚工人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地方琴钦夫，八月初前往比尔森，就业于“斯可达”工厂。

十月中 离开比尔森，前往曼海姆，先在一家锚厂工作，后在“本茨”厂工作。从曼海姆前往鲁尔，后又前往维也纳，就雇于一家桥梁厂。十一月初在维也纳诺沃梅斯托火车站当铁路工人，后又在“戴姆勒”汽车厂当试车员。积极参加工会活动，阅读社会主义书报。

一九一三年

秋天 离开“戴姆勒”汽车厂，回国服兵役。年底被送往军士学校。

一九一四年

五月 参加奥匈军队击剑大赛，获二等奖和银质奖章。

八月初 由于从事反军国主义宣传而被关押数天。

一九一五年

一月初 布罗兹所在的第二十五后备团开往加利西亚前线，在一个侦察部队中与俄国人作战。

四月 全营为俄国人所俘获。受伤。在一座修道院医院里住了十三个月。学习俄语，阅读俄国经典作家的作品。

一九一六年

春天 在阿拉季尔俘虏营，后被送往阿尔达托夫俘虏营。在卡拉谢耶沃村替一名富农当磨坊技工。

秋天 在孔古尔车站当翻译。在那里与铁路工人和布尔什维克有接触，出席他们的会议，阅读反战材料和列宁的文章。

一九一七年

二月底三月初 布罗兹由于与车站站长发生口角而被捕，几天后为孔古尔的武装工人所释放。

由于组织俘虏示威而被关十四天禁闭。六月底逃往彼得格勒。

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 参加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反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七月示威。

九月至十月 被武装押送回乌拉尔，重新被关进孔古尔俘虏营。逃往鄂木斯克。在那里从武装工人那里获悉，十月革命已告胜利。报名参加国际赤卫队，在那里服役几个月。

一九一八年

春天 申请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要求取得苏联国籍。

六月 高尔察克政权在鄂木斯克建立后，逃往离鄂木斯克六十五公里的一个吉尔吉斯村庄。十二月返回鄂木斯克。

一九一九年

三月或四月初 成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南斯拉夫支部的成员。

九月七日 与佩拉吉娅·别洛乌索娃结婚，并一起返回南斯拉夫。

十一月初 经维也纳和马里博尔抵达萨格勒布。在一家机械工场当工人，成为共产党员，积极投身于党为参加立宪议会而展开的竞选活动。

一九二一年

一月底 离开萨格勒布，在别洛瓦尔附近当技工。在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八月被查禁后，布罗兹与党失去了联系，在农村开展政治工作。

一九二三年

五月上半月 与别洛瓦尔党组织建立联系。

一九二四年

年初 进入党别洛瓦尔州委。

一九二五年

一月至四月 布罗兹所在的党的领导机构决定搜集武器。由于从事反对当局的政治活动而被判关押八天，出狱后一直受警方监视。

九月 前往克拉列维察，就业于那里的造船厂，成为党组织和工会基层组织的书记。

一九二六年

八月 组织一百三十五名造船厂工人罢工，经过十六天斗争，

罢工胜利结束。

十月 造船厂厂方镇压罢工工人，布罗兹首批被解雇。十月中旬前往贝尔格莱德。

一九二七年

一月 前往斯梅德雷沃帕兰卡，就业于车辆修配厂，三月作为“危险的共产党人”被解雇，重返贝尔格莱德。

三月底 返回萨格勒布，成为工会基层组织书记，并被选为南共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委员。

七月初 南共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当时领导国内最大的党组织之一，选举布罗兹为组织书记。七月十四日，萨格勒布警方逮捕布罗兹，并把他押送到锡萨克预审监狱。八月上半月在监狱里绝食。八月二十二日获释。

九月初 接掌南斯拉夫皮革加工业工人和手工业者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职务。十月领导萨格勒布制鞋厂工人罢工。

一九二八年

一月五日 领导萨格勒布“力量”厂工人罢工。二月，在萨格勒布党组织第八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地方委员会书记。五月一日，组织萨格勒布五一节游行，被警方逮捕。六月，南共中央局任命布罗兹为组织书记亚科布·佐尔格的副手。领导萨格勒布党组织举行有三万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的示威。七月被捕，后设法逃跑。八月二日，南共中央局任命布罗兹为南共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省委书记。八月四日再次被捕。十一月十四日被判五年徒刑。

一九二九年

二月底 被送往莱波格拉瓦服刑。

一九三一年

四月中 莱波格拉瓦监狱被判刑的共产党员举行绝食，布罗兹也参加了斗争。五月，布罗兹被转移到马里博尔监狱。

一九三三年

十一月 布罗兹在服完五年徒刑后，又被押送到奥古林法院监狱，服四个月的徒刑，这是该法院由于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克拉列维察的行动而判处他的。

一九三四年

三月 服刑期满获释。四月，转入地下。六月，南共中央政治局在维也纳开会决定，选举约瑟普·布罗兹为党的这一最高机构的成员。七、八月，应南共中央之召，前往维也纳，在南共中央会议记录上，他使用“铁托”这个假名。十二月，南共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布罗兹与戈尔基奇、帕罗维奇、霍尔瓦廷和穆克一起被选进南共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五年

二月 铁托前往苏联执行党的任务。三月，用“瓦尔特”这个名字出席共产国际巴尔干国家书记处会议。南共中央决定任命乔皮奇、铁托、斯捷潘·茨维伊奇三人组成南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处。七、八月，作为南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

一九三六年

八月 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南共驻莫斯科领导机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南共中央转回国内，铁托得到特别授权在国内组成领导机构。十月，离开莫斯科，经由华沙抵达维也纳。十一月，南共中央开会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了由戈尔基奇、铁托、乔拉科维奇、茹约维奇和莱斯科舍克组成的党的新领导。

一九三七年

三月 在国内从事三个月的地下工作后应南共中央之召前往巴黎。四月底回国，为西班牙招募志愿人员并帮助巩固南斯拉夫共青团。五月，重返巴黎并前往维也纳。六月再度回国。八月，一些中央委员在巴黎开会，决定由铁托领导中央的工作。党的总书记戈尔基奇当时在莫斯科，不久他在那里被捕。

一九三八年

二月 法共中央书记通知铁托，戈尔基奇已被捕，他被控是英国的间谍。五月，在斯洛文尼亚组织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代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和南共塞尔维亚省委代表会议，并组成南共临时领导，除铁托外，还有以下人员：斯洛文尼亚的卡德尔、莱斯科舍克和马林科；塞尔维亚的吉拉斯和兰科维奇以及克罗地亚的克拉什、日阿亚和佩特罗维奇。九月，就南共状况以及南共在人民阵线范围内在国内的活动，向共产国际作了详尽的汇报。

一九三九年

一月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铁托受权在国内组

成中央委员会，也即同意当时的临时领导成为中央委员会。携带工程师约翰·亚历山大·卡尔逊名义的护照离开苏联抵达巴黎。三月回国召开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九月，在前往莫斯科途中在波罗的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九月二日抵莫斯科。

一九四〇年

三月 在萨格勒布主持南共中央会议。五月，在贝尔格莱德主持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十月，在萨格勒布近郊杜布拉瓦召开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铁托就南共组织状况作了报告，并致闭幕词。

一九四一年

三月 在贝尔格莱德出席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和贝尔格莱德地方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在贝尔格莱德的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政治形势以及确定南共对西莫维奇将军的新政府的态度。四月六日，轴心国进攻南斯拉夫，铁托当天在萨格勒布，化名为斯拉夫科·巴比奇。四月十日，与南共中央委员和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们开会，到会的有：卡德尔、兰科维奇、米卢蒂诺维奇、康查尔、罗布、帕普、克拉什、马特斯、奥雷什科维奇、亚尼奇、巴卡里奇、布拉热维奇、姆拉佐维奇、萨伊利、乌加尔科维奇。会议决定南共中央由萨格勒布迁往贝尔格莱德，建立以铁托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并继续搜集武器。五月初，铁托主持召开各民族各省党的领导人会议，确定南共的任务是，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团结人民群众，同占领者及其国内帮凶作斗争，反对煽动民族仇恨，维护和巩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团结并扩大党的组织。会议决定，南共各级领导都建立军事委员

会，负责准备武装斗争。五月底，会见苏联驻贝尔格莱德武官，告知德国准备进攻苏联。六月二十二日，获悉德国进攻苏联后，即与在贝尔格莱德的南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开会(兰科维奇、米卢蒂诺维奇、吉拉斯、里巴尔、茹约维奇、伏克曼诺维奇)。会后，铁托写了告南斯拉夫人民书，号召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占领者及其仆从。六月二十七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来替代军事委员会，铁托被选为司令，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米卢蒂诺维奇、康查尔、莱斯科舍克、茹约维奇、里巴尔和伏克曼诺维奇被选为司令部成员。六月底，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政治局获悉，南共马其顿省委书记梅托迪耶·沙托罗夫·沙尔洛专横地让马其顿组织脱离南共，并入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人)，决定将沙托罗夫开除出南共，并派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去马其顿贯彻这一决定。七月四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举行全民起义，并为此目的，派伏克曼诺维奇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派吉拉斯去黑山。九月一日，指示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委，派州委委员杜尚·穆戈沙去地拉那，调查有无可能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组织反占领者的斗争。九月十六日，与南共中央委员们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成员们一起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塞尔维亚西部解放区，以便直接领导起义。九月十九日，在斯特罗加尼克村会见切特尼克司令米哈伊洛维奇上校。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和南共各民族各地区领导机构代表在斯托利策村开会。会议决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改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统帅部，而在各地建立总司令部。十月初，敌人发动所谓的第一次攻势。十月二十七日，在布拉伊齐村与米哈伊洛维奇上校第二次会晤。十二月二十

一日，南共中央决定组建无产者第一旅。

一九四二年

一月十一日 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统帅部决定建立由前切特尼克组成的志愿军，为此，最高统帅部改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最高统帅部。敌人发动所谓的第二次攻势。十月，南共中央在德尔瓦尔附近开会，决定召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十一月，发布命令，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最高统帅部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比哈奇召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四三年

自一月二十日起，敌人发动所谓的第四次攻势。五月，铁托接待以斯图尔特上尉为首的盟国第一个军事使团。奈雷特瓦战役。六月，苏捷斯卡战役。六月九日，铁托在米林克拉达受伤。九月八日，获悉法西斯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十月二日，铁托就美、英、苏三国外长行将在莫斯科开会，致电苏联政府，内容如下：“第一，我们既不承认南斯拉夫政府，也不承认在国外的国王……第二，我们不允许他们来南斯拉夫，因为这将意味着内战。第三，我们是代表人民的多数讲话的，他们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民主共和国。第四，现在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以反法西斯委员会为首的人解放委员会。”十一月底，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铁托作《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和国际事件》的报告。第二次会议通过以下决定：关于南斯拉夫反

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南斯拉夫人民执行代表机构，关于建立作为临时政府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关于剥夺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权利，关于禁止国王回国，关于按联邦制原则建立南斯拉夫，关于赞扬和感谢人民解放军，关于在人民解放军设立南斯拉夫元帅称号。根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铁托被任命为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并被宣布为南斯拉夫元帅。

一九四四年

二月 以科尔涅耶夫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使团在梅德诺波列降落。五月二十五日，德军在德尔瓦尔实施空降。六月，铁托转移到维斯岛。铁托与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首相伊万·舒巴希奇签署协定。根据协定，流亡政府承担义务，发表声明，承认人民解放斗争在民族和民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呼吁人民联合起来为最终的解放而斗争以及将在全国解放后由人民来决定治理的形式。八月，在意大利会见盟国驻意陆军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并与驻地中海盟军司令威尔逊将军会谈。在那不勒斯，与英国政府首相温斯顿·邱吉尔会谈。九月十九日至十月四日，访问莫斯科和罗马尼亚克拉约瓦。在莫斯科，于九月二十七日就红军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南斯拉夫土地上联合作战以及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提供作战物资事与斯大林签订协定。十一月一日，在贝尔格莱德，铁托与舒巴希奇结束谈判，就组成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达成协议。

一九四五年

三月七日 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人民政

府，铁托任主席和国防部长。四月五日至十七日，访问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十一月十一日，全国举行立宪议会选举。十一月二十九日，铁托出席立宪议会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宣言。

一九四六年

一月三十一日 向立宪议会两院联席会议提出政府辞职并受权组成新政府。同天，立宪议会颁布第一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二月一日，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和南斯拉夫军队最高统帅。三月十四日至十九日，访问波兰并签署两国友好互助条约。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五月九日签署南捷友好互助和和平合作条约。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同苏联最高领导人就两国关系进行会谈。

一九四七年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一日 在布莱德主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联席会议。保加利亚代表团是由季米特洛夫率领的。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两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领域内的关系。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率南斯拉夫国家代表团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签署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十二月六日至十九日，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签署南匈和南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一九四八年

三月二十日 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身份致函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信中指出苏联政府从南斯拉夫撤退民用军事专家的行动是有害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主持南共中央全会，讨论苏联政府和联共（布）党对南斯拉夫的指责。经过全体中央委员的讨论，根据铁托的建议，会议通过了对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来信的复信。五月二十日，南共中央全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南共不派代表出席行将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会议还决定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召开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六月二十日，南共中央发表声明，强调不能派代表出席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六月二十九日，南共中央开会并就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共内部状况的决议发表声明。会议决定，在报刊上全文发表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和南共中央的声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主持南共五大开幕，并就南共中央的工作作政治报告。在南共一中全会上，铁托当选为总书记。

一九四九年

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主持南共二中全会、讨论南共的农村政策。全会选出了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组织局。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主持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作报告。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主席。

一九五〇年

六月二十六日 在国民议会联邦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上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

一九五一年

十一月四日 签署南美两国政府关于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

一九五二年

十一月二日至七日 出席南共六大，作题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选举铁托为南共联盟总书记和由十二个人组成的南共联盟执委会。

一九五三年

一月十四日 当选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主持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四大开幕，当选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①主席。二月二十八日在安卡拉签署南、希、土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相互合作协定。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对英国进行友好国事访问，会见邱吉尔首相。

一九五四年

一月十六日至十七日 主持南共联盟非常三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吉拉斯的观点和政治表现遭到尖锐批评，他的文章被认为是小市民和无政府主义的。吉拉斯在这次全会上被开除出南共联盟中央，后来，他被开除出南共联盟并被审判。四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访问土耳其。六月二日至六日访问希腊。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五年二月四日，对印度和缅甸进行正式访问。

① 自这次代表大会后，“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改称“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译者

一九五五年

二月五日 在回国途中经埃及，第一次会见纳赛尔总统。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二日，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参加南苏国事会谈，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政府在宣言中表示忠于和平共处和在平等基础上发展全面国际合作的原则。率领苏联国家和党的代表团的是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一日至一九五六年一月六日，对埃塞俄比亚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一九五六年

六月一日至二十二日 访问苏联，出席两国国家和党的代表团的会谈，签署莫斯科声明，声明强调不同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有不同的道路，重申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之间的合作必须建立在自愿和平等、友好批评和同志式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从苏联回国途中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访问。七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与尼赫鲁和纳赛尔在万加岛会谈。

一九五七年

九月十六日 以南共联盟总书记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身份签署南共联盟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及南波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一九五八年

四月十九日 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出席南共联盟七大并作报告。在南共联盟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南共联盟总书记。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五九年三月六

日，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锡兰、埃塞俄比亚、苏丹、阿联、叙利亚和希腊。

一九五九年

十二月四日 接见阿尔及利亚、英国、希腊、意大利、南斯拉夫、黎巴嫩、马耳他、阿联和突尼斯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组织的代表。

一九六〇年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十一日 出席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并与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苏加诺等人会谈。

一九六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二十二日 访问加纳、多哥、利比里亚、几内亚、马里、摩洛哥、突尼斯和阿联。九月一日至六日，主持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一九六二年

二月四日至八日 访问阿联和苏丹。九月二十九日，在万加岛与自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三日访问南斯拉夫的勃列日涅夫进行政治会谈。十二月三日至二十日，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

一九六三年

六月三十日 当选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布里俄尼与赫鲁晓夫进行政治会谈。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五日，访问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墨西哥和美国，并于十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发表讲话。

一九六四年

一月 率领南共联盟代表团同陶里亚蒂率领的访问南斯拉夫的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三月，在布里俄尼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会谈。六月，正式访问芬兰。九月，正式访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十月，访问阿联并出席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十二月，主持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并作报告。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南共联盟总书记。

一九六五年

六月 被选进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书记处。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同苏共和苏联政府代表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和柯西金进行正式会谈。九月，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一九六六年

二月 主持南共联盟三中全会，会上讨论了南共联盟为贯彻经济改革而斗争的迫切问题。七月，在布里俄尼主持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会上讨论了与某些保安机关的恶劣行径及其有害后果有关的迫切问题。十月，主持南共联盟五中全会，会上研究了南共联盟领导机关的改组和选举新的中央机关。

一九六七年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四日 访问苏联和匈牙利。二月十三日

至十七日，访问奥地利。五月，第五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六月，在莫斯科出席保、匈、德、波、苏、捷、罗、南八国共产党、工人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议。七月，在布加勒斯特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和政府首脑会议。八月，访问伊拉克。

一九六八年

一月七日至二月八日 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埃塞俄比亚和阿联。四月八日至三十日，访问日本、蒙古、伊朗和苏联。六月，就南斯拉夫学生示威发表电视讲话。八月九日至十一日，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八月二十一日，主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和执委会联席会议，会议谴责苏、波、德、匈、保五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

一九六九年

三月 出席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十月，就南共联盟、南共青团和工会运动五十年发表讲话。

一九七〇年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十七日 访问东非和北非国家，计有坦桑尼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阿联和利比亚。九月八日至十日，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在卢萨卡举行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日，与访问南斯拉夫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十月六日至二十三日，访问比利时、卢森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和法国。

一九七一年

五月 在卡拉乔尔杰沃接见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七月，在克罗地亚共盟中央执委会会议上谈民族主义现象和反革命分子。十月，访问伊朗、印度和阿联。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八日，访问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在卡拉乔尔杰沃举行的南共联盟主席团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发表开幕词和闭幕词，会议谴责了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现象和国内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这次会议对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给予了强有力的打击，克罗地亚的部分领导不久即被撤换。

一九七二年

一月 出席南共联盟第二次代表会议。五月二十四日，第二次获得南斯拉夫人民英雄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授予铁托以苏联最高嘉奖：列宁勋章。六月五日至十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邀请，对苏联进行六天正式友好访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对波兰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一九七三年

四月 与访问南斯拉夫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勃兰特会谈。九月二日至十日，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一九七四年

二月 联邦议会宣布颁布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新宪法。五月十六日，在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铁托当选为终身总统。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正式

访问。七月八日至十一日，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一日，对丹麦王国进行正式访问。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

一九七五年

三月十日至十三日 对波兰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六月七日，与访问南斯拉夫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进行会谈。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一日，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欧安会。八月三日，迎接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两天正式访问的美国总统福特。

一九七六年

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 对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和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对瑞典进行正式访问。六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率领南共联盟代表团，出席在柏林举行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席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劳动法》。

一九七七年

五月 荣获第三枚人民英雄勋章。五月二十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铁托十月革命勋章。八月十六日至九月七日，对苏联、朝鲜和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十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对法国、葡萄牙和阿尔及利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十二月三日至四日，对罗马尼亚进行两天正式友好访问。

一九七八年

一月 在伊加洛接待应邀访问南斯拉夫的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三月七日至九日，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三月十日至十一日，对英国进行工作性友好访问。六月二日，在布里俄尼与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进行会谈。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出席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盟章确认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选举铁托为无限期共盟主席。八月二十一日，接待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十月十日，在赫尔策格—诺维接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十一月十六日，应铁托邀请，罗共总书记、罗马尼亚主席齐奥塞斯库对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一九七九年

二月一日至十二日 对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进行正式访问。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邀请，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五日，访问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马耳他。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九日，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十月十一日，在贝尔格莱德接见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十一月二日至四日，对罗马尼亚进行三天正式友好访问。

一九八〇年

一月 由于生病，到卢布尔雅那检查身体。五月四日，病逝

于卢布尔雅那。五月八日，铁托下葬于贝尔格莱德住所花园内，有一百多个国家派代表出席葬礼，其中有三十五位国家元首、三位君主、八位共和国副总统、二十四位政府总理、四十六位外交部长和十几位政府成员，还有来自全世界的一百多个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和其他进步政党的代表团以及解放运动的代表团。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